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大跃进”运动
和
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
(安徽卷)**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刘延年 杨久梅

审 稿 周言久 刘彦培

目 录

一、“大跃进”运动

综述	3
专题资料	
农业“大跃进”	31
工业“大跃进”	42
淮北河网化	62
新民歌运动	74
教育“大跃进”	88
除“四害”运动	104
典型材料	
高丰社早稻放“卫星”纪实	117
1958~1960年的马钢建设	123
淠史杭灌区建设纪实	130
跃进中的水利之花	139
文化“卫星”——司集乡	146
界首除“四害”	158
大事记	171

目 录

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

综述	199
专题资料	
农业的调整	231
林业的调整	246
责任田始末	261
工业的调整	285
商业的调整	300
教育事业的调整	315
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的调整	336
大事记	349
统计表	373
后 记	409

二、六十年代批判大跃进

卷一	139
专题资料	142
农业的调整	231
工业的调整	246
责任田讨论	251
工业的调整	281
粮食的调整	300
教育事业的调整	313
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工作的调整	326
大跃进	349
政治要	373
卷二	409

综 述

刘延年

“大跃进”的发动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面貌，尽快赶上和超过英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了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总路线的制定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在总路线提出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大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结果造成严重的损失。

1957年底，安徽省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期间，安徽基本建设投资13.1亿元，新建、扩建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淮南煤矿、安徽造纸厂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并先后从上海内迁108家企业，初步形成了安徽机械、纺织、食品、化学工业的骨架。安徽电力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佛子岭水库电站、梅山

水库电站、淮南田家庵电厂先后建成；交通运输、邮电以及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通过治理淮河和推行农业三项改革，安徽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粮食产量不断上升。

经过“一五”的建设，安徽的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1953年到1957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由29.72亿元（按1950年不变价计算）增加到43.19亿元，增长45.32%；其中农业总产值由22.38亿元增加到28.19亿元，增长25.96%；工业总产值由7.15亿元增加到15.01亿元，增长1.1倍。城乡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一五”计划的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安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但安徽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是比较落后的，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尽快地发展安徽的经济和文化，希望安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速度更快更高。

1958年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根据《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新讨论修订安徽省经济发展规划。其中，对工业战线提出的目标是：从1958年开始，用5~7年时间，即到1962年或1964年，全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73.6亿元，超过农业同年预计达到的71亿元的计划。在农业方面，要求到1962年或196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上报产量的247.24亿斤提高到510亿斤，增加一倍多，平均单产到196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达到685.5斤。

1958年3月1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来一个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宣传运动，来一个思想“大跃进”，彻底改变精神面貌，把一切不利

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保守思想和暮气统统反掉，在思想上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胜利实现。

在宣传“大跃进”、制订新目标的浪潮中，“能不能大跃进，怎样大跃进；能不能提出高指标，怎样实现高指标”的大辩论遍及全省城乡各个角落。凡不相信或怀疑安徽能提前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5~7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都被视为“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智慧”而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都提出或重新制订了根本不能实现的高指标。从1957年冬兴修水利开始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在各地、各部门蔓延开来。

6月3日，省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宣传运动的通知》，要求“这次宣传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要比任何一次宣传运动更大更深更透，全省要组织几百万人的宣传大军，大大发挥群众在宣传运动中的创造力。通过这次大宣传运动，要使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插到全省每一个角落。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推向一个更加宏伟壮丽的新阶段”。

6月9日至20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提出安徽省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新的奋斗目标，即工业方面，要求坚决贯彻全民办工业的路线，力争在尽短的时间内使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全年计划完成工业总产值30~35亿元，比上年翻一番。要把全省省属市和六安建成重工业城市，要建设7000多个总设计能力为280多万吨的炼铁炉，全年安排生产铁70万吨、钢15万吨。全省每个县都要建成1~2个机械厂。在农业方面，力争全年粮食产量远远超过400亿斤的计划。

要求每个农业社都要建立土化肥厂，搞2~3亩丰产试验田，每种作物都要放高产“卫星”。淮北和淮南地区要在今冬明春实现水网化和河网化。全省在一两年内实现机械化。会议强调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要不断批判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右倾保守思想。

这次会议使党内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急剧发展起来，全省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根据省委新的生产跃进计划，各专、市重新提出新的跃进指标。合肥、蚌埠、芜湖、淮南等城市提出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基地、重工业城市、煤炭基地的目标。安庆、马鞍山、屯溪、铜官山等也都提出5年计划3年完成，到1960年超额完成“二五”计划指标。界首、肥东等几十个县，决定在当年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教育部门决定在1958年内办16所高等学校。

这样，从1957年冬和1958年春的兴修水利开始，经过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安徽省的“大跃进”运动逐步升级，全面开花，进入高潮。

全省水利化和淮北河网化

1957年11月6日，省委、省人委发出《立即开展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号召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省委和省人委要求各地在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中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各地应结合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关于水利工作的辩论。通过辩论，肯定8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绩，明确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一项根本措施，提高广大干群兴

修水利的信心和决心。二、根据各地冬季生产条件,合理安排劳动力,保证农村 70% 以上的劳力投入到冬修运动中去。三、加强技术指导,保证工作质量。四、坚决贯彻“社办公助”的原则。各地必须发挥群众的潜力,依靠合作社的力量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

省委和省人委在指示中还要求各地结合兴修农田水利,大力开展冬季积肥运动。

本来,在 1957 年安徽省冬修水利会议上,已经决定今冬明春兴修水利 4.3 亿多方。但是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以后,安徽省就对冬修水利的计划进行修改,决定完成 8 亿土石方的任务。这个计划完成后,可使全省灌溉面积增加 917 万亩,其中水浇地 465 万亩,改种水稻 365 万亩;减轻或减除涝灾 995 万亩;控制水土流失 1927 平方公里;长江主要干堤可确保 1954 年洪水位不溃破,一般江堤和重点河堤争取 1954 年洪水位不溃破。

1957 年 11 月 22 日,《安徽日报》发表《组织千军万马,以排山倒海之势,为完成八亿方的兴修水利任务而奋斗!》的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千军万马,用尽智力,用尽劳力,挖尽潜力,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为国家,为自己,为子孙后代造福。

经过一个来月的战斗,到 12 月中旬,全省 8 亿土石方的任务胜利完成。接着,省委又提出利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以前的 4 个月时间,再完成 8 亿方的任务。不久,第二个 8 亿方的任务又告完成。1958 年 1 月 28 日,省委扩大会议对春季兴修水利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连同已经完成的土石方,累计完成 24 亿方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发表《八亿、八亿、再八亿!》的社论,并逐日公布

各地的兴修进度。在整个冬春水利兴修运动中,全省每天都有1000多万人劳动在水利工地上,最多的一天曾达1400多万。

到4月底,有关部门宣布全省完成50亿土石方,相当于解放以来兴修水利总和的339%。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争取更大的劳动成果》,说农田水利“大跃进”特别惊人,安徽省一冬一春已完成50亿土石方。这个数字显然被严重地夸大了。

1958年9月下旬开始,安徽省兴修水利的战斗又首先在蚌埠和阜阳两个专区打响。据初步估算,在这次以河网化为中心的冬修水利运动中,淮北地区每人每天平均功效要达到25方以上,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

1959年冬,安徽进入治水的最后一个高潮。11月11日,省委、省人委召开“反右倾、鼓干劲,大干一冬春,加速实现河网化、水利化”广播动员大会。阜阳专区在会上向兄弟地区发起友谊竞赛倡议。

会后,全省每天有500多万治水大军奋战在水利工地上。到12月底,全省已完成土石方17亿多方,取得了治水第一战役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省委又提出再接再厉再提高,打好治水第二战役的号召。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各地党委根据省委花力小、花钱少、收效快、收益大的指示精神,开展了以技术革新为中心内容的治水高功效运动。据1960年2月5日统计,全省累计完成土石方41.1亿多方,超过原订冬春兴修水利计划任务的23%。在超额完成计划的基础上,全省人民又提出春季再做12亿土石方的口号,合计达52亿方,比原计划超过50%以上。

安徽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也在“大跃进”期间开始建设。从1958年8月起,先后开工建设的有花凉亭水库、淠史杭沟通综合

利用工程、淮河蚌埠闸工程、陈村水库、临淮岗水库、龙河口水库等。

“大跃进”期间，安徽水利化建设在淮北地区，就是实现淮北河网化。

淮北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灾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淮北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水灾。1952年，治淮委员会召开豫、皖、苏三省除涝会议，制订了“以蓄为主，以排为辅，采取尽量蓄、适当排，排中带蓄，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治淮方针。1953年，安徽省委推行农业三项改革，在淮北低洼易涝地区种植水稻，终因缺水而效果不佳。1957年11月，国务院召开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1月25日召集流域各省负责同志谈话。谭震林在谈话中提出淮河以北的冀、鲁、豫、皖、苏地区要变成水网地区，以种水稻为主。关于治淮方针，应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必要时修一些大型的。之后，他在河南提出淮北平原“一块土对一块天”、日降雨400毫米也应当蓄起来的要求。

1958年3月16日，省委提出“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全面规划，全面治理，小型为主，大中支持，以蓄为主，尽量少排，水网化、水稻化，把淮北变江南”的淮北平原水网化的治水方针。同时，还宣布了省委和淮河水利委员会共同制订的《淮北水网化的十条规定》。随后，淮委编制出《安徽省淮北河网化初步规划》，这是淮北河网化的基本规划。在淮委制订的初步规划的基础上，安徽省水电厅于1958年下半年提出《安徽省淮北河网化规划》，对淮委制订的规划进行部分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进一步提高治理的标准，扩大河网的蓄水能力，彻底消除淮北地区的水旱灾害。二是修改河网规格，规定河网由五级河道组成，一级河道口宽60米、底

宽 30 米；二级河道口宽 50 米、底宽 20 米；三级河道口宽 40 米、底宽 10 米；河深均为 6~7 米。大、中沟改为四、五级河道，其深度、宽度不变。

从此，淮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河网化运动。从 1958 年冬到 1960 年春，是大干河网化的 2 年，淮北各地集中力量挖大河网，规划的 9 条新河中，除涡浍新河未动工外，8 条新河全部开工。各县自行规划的大、中新河也陆续施工。由于土方任务太大，大部分新河都挖得深浅不一、宽窄不等、断断续续，未能按规划的断面全线贯通。大河网中只有界洪新河的涡阳段、界南新河的泉南段、符淮新河的怀远段，中河网中只有蒙城县蒙怀公路河、濉溪县杨柳运河、怀远县双龙新河等遗留工程较少，能发挥截水分流、洼地排水的除涝作用和输水灌溉效益。其余的工程由于做得很差，有的甚至在施工时堵塞了原有的排水口，增加了涝情。

在河网化过程中，阜阳和蚌埠两专区还进行了一些标准较高的小河网试点。濉溪县在卧龙湖建成了淮北第一个小河网。1958 年 10 月，刘少奇来安徽视察，特地参观了卧龙湖的河网化工程，并给予肯定：“这个地方好，全国都可以学这个地方样子搞。”另外，宿县紫芦湖、太和县双浮乡、临泉县单桥乡等地也建成了小河网。这些小河网由于没有排水出路或其他原因，带来许多问题，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安徽的河网化是在淮北地区治水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以大规模推广水稻种植和通航为目的而实施的大型水利工程。由于在水利建设上盲目求多求快，有的河网工程的质量不合标准，不能起到蓄泄兼筹的效果。改种水稻虽在个别地方取得成功，但大部分地区在 1959 年的大旱中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实践证明，

淮北地区以蓄为主的指导思想,偏离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违反了自然规律;在淮北平原坡水区开挖纵横交错、相互沟通的河网,打乱了原有的水系;不经协商在省界新老河道上节节建闸蓄水,造成了上下游河道排水的水利纠纷;而巨大的土方任务又远远超出人民的承受能力。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淮北河网化工程的建设基本停顿下来,以后河网化工程不少被毁,造成很大损失。

农业“大跃进”

1957年12月9日至13日,中共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审查、批准了12月8日省委一届五次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为提前和超额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制订全省10年粮食生产计划,提出到196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405.7亿斤。1958年1月28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修订全省今后5~7年粮食生产计划。修改后的计划要求到1962年或196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的247.24亿斤提高到510亿斤。

为了保证农业的丰收,除大力兴修水利外,各地从1957年冬就开展了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养猪积肥和改良工具运动。

1958年5月9日,在小麦开镰收割前的一个月,《安徽日报》发表《我省1500万亩丰产田小麦将获空前大丰收》的消息,消息说根据各地的预报统计,全省小麦总产量将超出去年73%。这些小麦产量的预报数,主要是通过对各地干部培育的丰产田的观摩评比得来的。安徽省从1953年开始就组织各级干部培育丰产田,目

的是以此来推动全省农业的发展。我们通常所说的农业高产“卫星”，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丰产试验田中“发射升空”的。

6月中旬，阜南县明光社陶园生产队传来小麦大丰收的消息。这个队132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以上，其中18亩老荒地亩产1113斤。

7月以后，进入早稻收获季节。7月26日，《安徽日报》首次以“卫星”为题报道了桐城县早稻亩产突破5000斤大关的消息。紧接着放出万斤大“卫星”的还有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枞阳县白柳乡、高丰农业社，桐城县寿元农业社，宣城县青峰农业社等。

早稻高产“卫星”的余波未尽，中稻高产“卫星”又腾空升起了。8月22日，繁昌县东方红社在1亩3分丰产田里放出亩产4.3万斤的大“卫星”。当时的《安徽日报》还登出一副照片，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盘腿坐在田里的稻穗上，却对“稻穗毫无影响，她愉快地笑了”。

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8月26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对安徽建立人民公社作出初步规划：第一批先在全省每个县试办几个人民公社，以取得经验，此项试点工作计划于9月底结束；其余的农业社全部要组织联社委员会，然后吸取已试办的人民公社的经验，全面转为人民公社。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基本上为一乡一社，根据生产需要，大的可以达到1~2万户。但是，全省成立人民公社的速度比预计的快得多。在到9月初短短10来天的时间里，全省已成立322个人民公社。9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对安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予了鼓励。毛泽东的鼓励，使安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0月初，全省已基

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不仅从事农业、工业、林业、副业等生产活动,还包括有学校、供销社等各项事业。在分配上,对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平均主义;在公社内部,则将穷队富队统统拉“平”。在生活上实行集体化,主要是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或者是粮食供给制。11月26日,省委制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并转发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人民公社1958年收益分配的意见》,对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进行规定。

1959年1月20日至24日,中共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作《在总路线的旗帜下继续前进》的工作报告,提出安徽省1959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目标: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00亿斤,棉花总产量要达到800万担,油料总产量要达到50亿斤(其中大豆15亿斤),麻类、水果、中药材、牲畜、家禽等也要有大量的发展;农业总产值要达到140亿元,其中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值要达到85亿元。

5月份以后,各地粮食“卫星”又开始陆续发射升空。但像1958年一样,不是升空,而是空升。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严重浮夸,本来只有176.9亿斤的产量被夸大为450亿斤,除去征收的69.68亿斤以后,农村只剩下107.22亿斤粮食(包括口粮、种子和饲料),比1957年还少21.33亿斤。

农村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首先,由于兴修水利和大办钢铁,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仅大炼钢铁一项,1958年全省就有近400万强壮劳动力弃地炼铁。其次,1958年全

省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大旱。从年初开始,淮北地区连续4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直至午收后旱情才告解除;淮河以南地区从5月开始出现大旱,到7月发展到顶点,许多地方塘坝干涸、河水断流,甚至连人畜饮水都发生困难。而由高指标带来的高征购,使本来就因旱灾而减产的粮食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全省1958年冬天就发生饥荒现象,以致12月底在粮食大丰收的桐城县发生了群众抢粮事件。1959年2月7日,省委批转《关于〈桐城县闹粮问题的真相〉的报告》,认为桐城闹粮荒的真相是“瞒产”,实质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于是在全省开展了“反瞒产”斗争。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以解决当时农村“共产”风和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郑州会议后,省委开始对农村工作进行一些调整,采取了整顿食堂、开放粮食市场、加强农村第一线等措施,但这对处于“大跃进”进程中的农村,并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农村问题依然严峻。1959年6月下旬,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视察工作,发现该县农村“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等“左”的问题十分严重,提出“两开放三还原”(开放水塘和自由市场,吃饭、房屋、自留地还原)办法,以解决农村存在的严重困难。张恺帆解散无为食堂一事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8月,省委连续召开会议,对张恺帆等进行错误的批判,最后作出《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会后,“反右倾”斗争在全省展开,使党内的民主生活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农村形势更加严峻。

1960年,安徽进入“大跃进”的第三年,这是安徽“特大跃进”的一年,同时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本年,全省粮荒蔓

延,2900万人口处于饥饿线上,“饿、病、逃、荒、死”现象十分严重,人口急剧下降。从春天开始,省委和各级党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农业生产。7月16日,省委作出下放大批干部加强农业第一线领导的决定。到8月底,全省已经下放8万多名干部到农村参加和指导农业生产。同时,全省精简职工,下放城镇居民,压缩吃商品粮人口,到年底共精简135万职工到农业第一线。省委还在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周王公社劳动力安排情况和当前农村劳动力安排意见》的批示中要求所有公社要有80%的劳动力使用在农业上。针对全国“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1960年8月10日和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省委随即向各级党委作出部署,号召各地拿出1958年大办钢铁的劲头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一切部门、一切单位、所有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都要参加农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集中力量搞好“三秋”,特别要搞好生长期短的荞麦的播种。之后,省委又号召全省开展一个抢种萝卜、秋菜的运动,号召全省人民充分利用一切田地,大种胡萝卜、乌菜、芥菜、腊菜等蔬菜和小杂粮,力争蔬菜自给。

至此,连续三年的农业“大跃进”终于草草收场。

工业“大跃进”

1958年1月28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制订了安徽省钢铁工业发展规划。后于1958年8月3日在佛子岭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作出《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决定(草案)》,确定1958

年全年产生生铁 120 万吨、钢 35 万吨。

5 月 31 日,省委发出《关于加速铁和水泥生产的通知》,全省冶金工业开始进入“大跃进”。这一时期,安徽省发展钢铁工业的指导方针是“小型为主、土法上马、多采多炼、遍地开花,开快车发展钢铁工业”。

6 月 7 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挂帅,在 6 月份突击生产 2 万吨生铁(超过过去一年安徽地方的生铁产量),并要求把当年铁矿石的生产比原计划提高一倍。根据省委的指示,各地开始大力兴建土高炉。

6 月 29 日至 7 月 4 日,省委在芜湖召开全省小高炉炼铁经验现场交流会,以求解决土法炼铁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技术难题,推动全省的土法炼铁工作。在会上,安徽省提出了“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办钢铁工业”的口号。

为指导和推进全省钢铁工业的发展,6 月 28 日,省委决定兴建省委钢铁厂。省委钢铁厂是用省直机关党费兴建的,建有炼铁、炼钢和轧钢等车间。

7 月底,省委、省人委成立省冶金工业指挥部,指挥全省的钢铁生产。

1958 年 8 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后,省委对下一段工作重新进行部署:一、全党抓钢铁生产。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集中主要力量,不但在政治上挂帅,还要在技术上挂帅。在全党全民中进行大办钢铁的总动员。二、钢铁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一切工作之纲。各级各部门均要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工作。各地机械工业部门务必按照分工包干成套供应的办法,在 8~9 月份完成全年冶金成套设备的制造任务。还要发动全民献铁献钢运

动,尽量回收废旧钢铁,供应机械制造工业。三、集中力量加强高炉建设,保证按期投入生产。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各地各单位要再加建一批高炉。四、已建成的高炉立即投产。五、加强技术力量的培训工作。六、抓具体计划。

省委还根据大别山区有几百炼铁经验和丰富铁砂的条件,动员上百万人上山进行土法炼铁。安庆专区于8月份组织31万炼铁大军,组成8个师的炼铁野战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大别山安营扎寨,决心大战4个月,炼铁12万吨,不完成任务决不下山;六安专区也先后组织40多万大军进山,在“就地取柴,就地烧炭,就地供应”的口号下,大规模地砍伐山区森林,进行炼铁。

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安徽视察。他对省委负责人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讲话使安徽已经兴起的炼铁热潮愈益高涨。9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连续召开省直各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要求为完成当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大量使用洋办法,另一方面大搞土办法。除抓紧8立方米以上的小高炉和土炉的建设外,还决定在全省积极推广坩埚炼铁办法,并在淮南铁路沿线成立专门指挥机构,抽调40万人搞坩埚炼铁。

由于是土法上马,规模很大,钢铁的质量问题日益突出。10月底,省委将原来“以土为主”的方针改为“土洋结合,以洋为主,质量并重,合理布局”。随后,搞了一个多月的淮南铁路沿线坩埚炼铁大会战也宣告结束。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安徽省分别于12月12日和21日宣布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的10万吨钢和103万吨铁的生产任务。

在全省大力开展土法炼铁的同时,省委决定在马鞍山集中力量抓好 200 立方米以上高炉的建设。经过 3 年的建设,马钢跨入了全国重点钢铁联合企业的行列。

在 1959 年的钢铁“大跃进”中,安徽仍然坚持大搞群众运动,提出“大搞小洋群,由小洋群向中洋群、大洋群过渡”的发展方针,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到 8~28 立方米以上小高炉的建设上。3 月,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书记会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确定省里主要抓大洋群的建设,各专、县则以兴建小洋群和土高炉为主。但是,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违反了客观实际,又缺乏指导,损失严重。6 月,省委召开全省炼铁会议,对“小土群”进行整顿,提出建高炉必须就矿石、就煤炭、就交通、就电力的“四就”原则。自此,全省钢铁生产的重点,按建厂条件放在长江沿岸的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等市和沿铁路线的合肥、淮南、蚌埠等城市,形成“T”字形的布局,形成安徽省钢铁工业发展的初步基础。

从春天开始,安徽省又抓住炼钢转炉的建设,以改变钢产量相对落后的状况。到年底,全省 3 吨转炉发展到 44 座。另外,合肥钢铁厂还建成了 2 座 3 吨电炉(后改为 5 吨),为安徽发展优质钢创造了条件。当年,安徽钢产量突破 10 万吨大关,达到 23.36 万吨,居全国第八位。

1960 年,安徽进入“大跃进”的最后一年。省委制定了更大的跃进计划,要求全年生产钢 46 万吨、铁 322 万吨、煤炭 2200 万吨,实现工业产值 75~86 亿元。不久,又将工业产值上调到 102.7 亿元。安徽省在钢铁跃进上进行了最后一搏,到年底,全省完成钢铁产量分别为 40.5 万吨和 280.3 万吨;工业总产值达到 52.93 亿元,与计划相差甚远。

在大办钢铁的同时,全省在煤炭、机械、电力等方面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在机械工业方面,省委于1958年上半年决定在合肥建立全省工农业机械设备中心,当年施工,争取1961年建成。它包括20多个主要项目,主要有合肥第一机床厂、通用机械制造厂等。到1960年,合肥起重运输机械厂、芜湖重型机床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已经建立起来;在煤炭工业方面,进行了两淮煤矿的建设;在纺织工业方面,这一时期兴建了蚌埠毛纺厂等,初步奠定了安徽纺织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他如电力、化学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文教卫“大跃进”

一、教育“大跃进”

安徽省教育方面的“大跃进”涉及到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方法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问题,而它最早是从3件事上开始的,即勤工俭学、群众办学和扫除文盲。

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全省城乡开展的大规模群众性扫盲、群众办学和勤工俭学运动上。据1958年7月初统计,这一时期全省共组织1070万人参加了文化学习,青壮年文盲半文盲930万人已基本入学。在群众办学方面,全省大量发展了民办小学和民办中学(主要是农业中学)。勤工俭学则主要在中学和师范学校中进行,通过勤工俭学,学生不但得到了劳动锻炼,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节省了国家的经费开支。随着形势的发展,全省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又进入了大办学校工厂的阶段。在这些工厂中,有炼铁小高

炉、机械厂、铁工厂、水泥厂、肥料厂、农具厂，还有化工厂、文具厂等其他工厂和作坊。

5月到7月，省委连续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教育方针。随后，省委发出《关于发展我省教育事业的决议(草案)》、《关于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加强党对学校领导的决议(草案)》，对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规定。

《关于发展我省教育事业的决议(草案)》指出，由于基础薄弱，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需要，必须全党全民大办教育，特别要大办大学和高中，迅速改变教育基础薄弱的状况。在教育发展上，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原则：公办、民办、教育部门办、行行业业办、机关团体办、工厂农场办、自己单独办、联合协作办；既要大办普通学校，也要大办职业学校；既要大办儿童教育，也要大办成人教育；可以办全日制的、半工半读的，也可以办业余学习的，多种学校制度并存。学校的发展，应该由小到大，由不正规到正规，一边发展，一边巩固提高。对各类学校，都应该培养典型，树立旗帜，并要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以原有的带新建的，使普及与提高密切结合。

《决议》还对安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目标作出规定：扫盲教育，1959年扫除全省青壮年文盲、半文盲。中学教育，1958年下半年乡乡有民办中学，县县有高中；1959年区区有公立初中；1960年全省普及初中教育，1962年普及高中教育。中等师范教育，1958年下半年县县有中师或初师，1959年县县有中师。中等技术教育，1959年各专区有1套(工、农、医、师)中等专业学校，各县有1套初级技术学校，并逐步向中技方向发展。高等教育，原有高等学

校 5 所,1958 年下半年增设高等学校 32 所。5 年内,各专区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并积极筹办皖西、皖江、皖南、淮南、淮北 5 所大学,每个市办 3~4 所高等学校,同时在肥东、肥西两县各办 1 所高等学校;1965 年,争取县县有大学;1967 年全省普及高等教育。

对于大中学校的师资、学生来源和经营及设备问题,《决议》也作出规定:(一)在解决大、中学校师资问题方面:大办高等师范和综合大学,扩大师资来源,高等学校抽调助教进修,培养开课教师;原有高校采用抽调教师、教师兼课和学生实习等办法支援新建的大、中学校;办学单位选送学员到高等学校进修;各地各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到学校中任课或兼课。(二)在大、中学校学生来源方面:大办高级中等学校特别是高中,扩大高等学校学生来源;每年划出一部分中师、中技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半耕半读学校可以在机关、企业内部招收干部、职工入学;从试行学制改革缩短修业年限当中附带解决一部分学生来源不足的困难。(三)在大、中学校经营和基础设备方面:国家分配的经费,各地各部门在保证完成省颁教育事业指标的前提下,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可以调度使用,不足部分由地方或部门自行解决;学校基建的材料和所需的劳动、技术力量,由各地统一安排,学校应发动师生参加建校劳动。

《关于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的决议(草案)》指出,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必须大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也必须大办学校。目前安徽省大、中学校在勤工俭学的基础上已进入到大办工厂、农场的阶段。学校办工厂、农场应结合学校的性质和专业特点,有重点地办一些较大的有特色的工厂、农场;在生产上应争取超过当地工厂、农场的水平。《决议》还

在生产资金、设备、劳动收益的分配、师生参加劳动的时间等方面，对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大办学校作出了规定。

在教育大发展同时，安徽还进行了教育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缩短学制、劳动入课、加强马列主义政治课教学、改进专业课教学等几个方面。

在学校的管理上，安徽省将学校的管理权下放，以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即将原属省直各部门领导的一部分大专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由专、市领导，普通高中一般下放到县、一部分下放到区，公立初级中学一般下放到区、一部分下放到乡，一般公立中学下放到社领导。

1958年，安徽教育“大跃进”主要表现在全党全民办学、教学规模的扩大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上，1959年则主要表现在教育质量的提高上。全省各级学校都在1958年大发展的基础上，把当年教育革命的重点落实在教学、生产和科研的三结合上。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校领导和师生的共同努力，把学校的教学质量搞上去，以此作为教育“大跃进”的中心内容。如在中学教育方面，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全日制学校以教学为主的精神，全面安排了教学、劳动和生活时间，保证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充足时间，建立教、学结合的新的教学秩序。各校还采用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新教材。在1959年的全国高考中，安徽的高考成绩一下子大大超过往年，获得高考全国第二的好成绩。

1960年，安徽省的教育事业进入持续“大跃进”阶段。2月2日至8日，省委、省人委召开全省中小学校持续跃进大会，号召在最近两三年内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同时，省教育厅还连续召开中学校长工作会议和中学各科教学现场会。会议总结了提高教

学质量的基本经验,就是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积极大胆培养新生力量;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会议还对各科教学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5月15日,全省文教战线群英会召开。会上,省委提出“一主,两辅,三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对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进行全面的安排。一主,即以教学为主;两辅,即以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为辅;三结合,即以教学为中心,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大跃进”中安徽的教育事业,出现了全民办学的局面,全省各级学校几倍、几十倍地发展,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教学改革中,大中专学校随意调整专业设置,改并课程,并号召师生自编教材,教学的科学体系被打乱;劳动入课,过多地占用了正常的教学时间;片面追求直接经验,忽视课堂教学,教师的主导作用被贬低;在教育革命中,不少大、中学校“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使一些专家教授受到过火的批判,伤害了一些好人。但是,在这几年中,安徽的教育事业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中、高等教育仍处在持续的发展之中,从1960年到1963年,大学在校学生一直保持在2万多人的水平上。

二、新民歌运动

文化战线开展“大跃进”运动,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新民歌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早在1957年冬季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中,安徽就出现了“水利网,沟沟通,涝蓄水,旱灌溉,保证年年无灾害”等新民歌。1958年

4月8日,省委发出收集民歌的通知。各级党委非常重视,立即组织文化部门和数万个农村文化馆、站进行收集工作。有些文化干部还翻山越岭,深入到偏远的山区和田间,进行访问和记录。

安徽的新民歌运动偏重创作。从内容来看,它包括农田水利兴修、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总路线、人民公社、教育跃进、文化扫盲、移风易俗等等,反映了安徽“大跃进”的各个方面。人民群众通过它来歌颂自己的生活、劳动、理想和热情。新民歌形象地反映了获得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后的安徽人民在“大跃进”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面貌:

跃进红花心里开,张口花香喷出来;

山南海北齐歌唱,唱出一个春天来。

从8月开始,全省开展了社会主义歌唱运动。在新民歌模范乡——巢县司集乡更是诗画满墙、歌声遍野,无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能开口成歌,上台就唱。1958年全国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现场会议就在司集乡召开。

除司集乡外,安徽当涂、繁昌、巢湖等地的新民歌创作也很有名,分别被称为“民歌之海”、“民歌之乡”、“安徽的乌克兰”等。

在新民歌运动中,各地还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民歌手,如肥东的殷光兰、贵池的姜秀珍、繁昌的汪邦云、舒城的潘慧英、蚌埠市的曹新云、怀远的郑九如等。殷光兰、姜秀珍在全国都很有名。他们有的是会唱的歌多,有的是歌唱得好,有的是会唱独特的歌种,有的是既能唱歌又能写歌。

1958年12月,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发表《进一步发展新民歌运动》,对安徽几个月的新民歌创作进行总结,同时也对以后的新民歌创作提出了意见。

三、除“四害”运动

“四害”当时是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195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好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号召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8年1月14日，安徽省除“四害”誓师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号召全省人民全部投入到除“四害”运动中去。会上，成立了安徽省除“四害”总指挥部，副省长陆学斌任总指挥。会后，除“四害”运动的高潮迅速在全省各地兴起。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书记挂帅，大干特干，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参加除“四害”斗争，有时一天投入的人数竟达到2000多万。

6月份以后，随着农村进入午收等农忙季节，除“四害”运动的重点转入城市。到8月份，钢铁元帅升帐，除“四害”运动又进入以节假日为主的突击活动阶段。

通过大规模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大大改变了安徽城乡的卫生面貌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状况。人们不但卫生习惯有了很大改变，健康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天花、回归热、斑疹、伤寒、黑热病等疾病都先后被根除或基本消灭。

“大跃进”期间，通过全省人民的艰苦奋斗，安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成了包括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铁公司在

内的一批地方钢铁企业,建设了两淮煤矿,机械、化肥、建材、电力等方面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安徽工业发展的基础。一批大型水利工程也在这时开始建设,经过以后的续建和完善,在防洪、灌溉、城市供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安徽的“大跃进”运动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工业方面,全省3年间对钢铁及其他重工业的投资17亿元以上,其中仅直接投资于钢铁企业的资金,3年累计损失3.1亿元,相当于同期全省轻纺食品投资总额的1.3倍。在大办钢铁期间,全省出动大量人力上山砍树伐木烧炭炼铁,全省被毁坏的森林面积约500万亩、超伐木材超过1000万立方米,不仅生态平衡和农林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破坏,而且土法炼出的钢铁基本都是废品。从1961年起,全国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安徽省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全省钢铁生产进行整顿。到1963年底,全省仅保留马鞍山钢铁公司9座高炉生产,其中3座是71~84立方米的小高炉,地方小高炉全部“下马”;一大批产量低、质量差、能耗高、设备简陋的炼钢设备也被淘汰。

在农业方面,持续的大办钢铁运动造成农村劳动力紧张,很多农田播不下种子,成熟的庄稼收不上来,再加上其他原因,农业连续3年减产。粮食产量下降了,而由浮夸风、高指标引起的高征收并没有降下来。实际上,从1957年,全省即出现高估产、高征购的情况,当年粮食实际产量205.4亿斤,上报产量247.24亿斤,征购77亿斤,农村出现粮食紧张的现象。1958年全省上报粮食产量320.39亿斤,实际产量176.9亿斤,征购69.68亿斤;1959年,全省上报粮食产量350.04亿斤,实际产量140.2亿斤,征购70.94亿斤;1960年,全省上报粮食产量150.48亿斤,实际产量134.92

亿斤, 征购 49.74 亿斤。

从 1958 年年底开始, 由于农村大办水利、大批农民进城办钢铁, 加上大办食堂, 放开肚皮吃饭, 粮食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再加上城镇人口由 1957 年的 330.49 万人猛增到 1958 年的 525 万人, 农村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困难。由于粮食紧张, 开始出现人口外流, 个别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从 1959 到 1961 年, 3 年间安徽净减人口近 500 万。

农业方面的困难和轻工、纺织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的紧张, 也使城镇生活受到影响。1958 年下半年, 部分生活日用品开始脱销。1959 年以后, 粮食、肉类、副食品及其他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全面紧张,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在此情况下, 全省开始精简职工、下放城市居民, 压缩吃商品粮人口 100 多万, 以减轻农村负担。同时, 采取降低口粮标准、压缩副食品用粮和大搞“代食品”等措施来缓解粮食的紧张。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从 1959 年开始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从 1961 年开始, 安徽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才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恢复和发展。

农业“大跃进”

专题资料

一、“大跃进”前安徽农村的政治经济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安徽有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向封建土地制度展开了神战。至1952年，全省农村胜利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贫苦土地的无地少地农民喜气洋洋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千年铁树开了花，农民当家还了家”，从内心拥护党和人民政府。

土地改革后，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为了打破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的局限，进一步发挥生产力，迫切要求组织起来。1953年前，全省44万多个互助组普遍建立起来，全省互助组总数达42万个，99%的互助组实行了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股分红办法，由于实行了自愿互利原则，农民踊跃参加，互助组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到了1953年，安徽省委在合作化问题上出现急躁冒进的毛病，认为“互助组的发展不可阻挡，这种办法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在接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曾指出：“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右的阻挠，这是完全必要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安徽在1953年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已开始出现片面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倾向，以致出现“左”的冒进。这种错误到1958年“大跃进”

农业“大跃进”

江鯤池

一、“大跃进”前安徽农村的政治经济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安徽省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向封建土地制度展开了冲击。至1952年，全省农村胜利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分得土地的无地少地农民喜气洋洋地歌颂自己的新生活：“千年铁树开了花，农民土地还了家”，从内心拥护党和人民政府。

土地改革后，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为了解决一家一户不能解决的困难，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便要求组织起来。1952年秋，全省44万多个互助组应运而生。随后，各地农民纷纷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全省合作社发展到12万个，98%的农民成了合作社的社员。办社的初始阶段，由于执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农民的积极性甚高，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到了1955年，中共安徽省委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急躁冒进的毛病，过火地批判了所谓右倾思想，这种做法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支持。1955年8月3日，毛泽东在签发安徽省委的报告中写了这样的批语：“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安徽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中，已开始出现片面追求生产关系改革而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到1958年“大跃进”

运动后急剧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安徽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多灾的省份。灾害一来,农民只能靠外出讨饭为生,千百年来农民就是过着这种家园毁了建、建了毁的悲惨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曾希圣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采取根治淮河和农业三项改革等措施,使安徽农村面貌迅速改观。“一五”计划期间,安徽省的水利建设和农业“三改”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稳步发展。农业“三改”对增产粮食的作用显著,195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7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半。据统计,按“三改”生产的农田,每亩增产粮食117斤。“一五”期间,全省农业产值由22.38亿元(按1950年不变价计算)增加到28.19亿元,增长25.96%,5年中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接近5.2%。1957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74.56元,比1954年增长23.1%,平均每年递增7.2%;农民人均消费支出72.85元,增长14.6%,平均每年递增4.6%。当时安徽农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1%和2.81%。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在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中已经潜伏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伴随着党内“左”的思想的抬头而日益加剧,在实践中产生重大失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二、大兴水利和粮食放“卫星”

1957年10月,中共安徽省委在讨论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纲要”)的时候,围绕着如何进一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发展,经过激烈争

论,制定了全省在一个冬春完成兴修水利 8 亿土石方的任务。安徽省水利建设的高潮由此兴起。这个任务仅仅两个月就完成了。过了一个月,第二个 8 亿方又超额完成。1958 年 2 月,省委再次提出新的目标:完成第三个 8 亿土方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发表评论:《八亿、八亿、再八亿!》,其中写道:“上山可以捉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八亿方土,算得什么!”

全省性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取得了“巨大成就”——到 4 月下旬,全省一个春季完成土石方总量超过 50 亿,相当于解放以后兴修水利总量的 339%。兴修水利投入的劳动力占全省农村总劳动力的 80% 左右。

在大兴水利的带动下,农村积肥又掀起高潮,全省积肥量由日均 2 亿担增加到 3 亿担。在高潮迭起的跃进中,全省农村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等浮夸虚假作风。舒城县在除夕和大年初一,动员 6 万多农民放弃假日搞积肥,“一昼夜积肥 150 万担”;桐城县也不甘落后,提出春节期间“实现每户积肥 1 万担”的目标。

水利建设方面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省委领导决策层。1958 年 1 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将一个月前修订的全省到 196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405.7 亿斤,接近《纲要》指标,到 1967 年超过《纲要》指标的计划,修改为到 1962 年或 1964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510 亿斤,比 1957 年增加一倍以上。省委认为:“重新修订全省粮食规划是必要的,正确的。兴修水利和积肥的事实证明,只要把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继续加以发扬,完成粮食规划指标是完全可能的。”不久,在全省第五次农业劳动模范大会上,省委号召全省农民“要以治水的劲头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为 5~7

时间内超额实现‘纲要’规定的指标而奋斗”。

全省农业生产规划指标的重新修订,促使各地纷纷修订农业发展规划,掀起一股竞相攀比高速度的热潮。3月,安庆、芜湖两专区率先提出在一年内实现粮食亩产过800斤,一步达到“纲要”。紧接着,淮北地区的濉溪、砀山等5个县也表态争取当年实现粮食亩产500斤,实现“纲要”规定指标。桐城县更是一马当先,决定当年就实现粮食亩产1000斤。

3月1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大跃进”宣传运动,来一个思想“大跃进”,彻底改变精神面貌,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保守思想和暮气统统反掉,从而在思想上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胜利实现。省委指示下发后,全省农村到处“大谈而特谈新形势,大讲而特讲新任务,大比而特比先进,大鼓而特鼓干劲”、“能不能大跃进,怎样大跃进”的辩论浪潮冲击了农村每一个角落,凡是不相信安徽能提前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5~7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都被指责为“保守”“暮气”而受到批判。甚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心主义的口号,也被当作革命口号在报刊上宣传。当时,桐城县为了鼓舞人们更大的干劲,到处扎起跃进门,甚至贴出“头可断,血可流,亩产千斤不可丢”的标语。《安徽日报》在1958年夏季抗旱时,出现了《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的通栏标题。连认为冒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看后也说:你们安徽人力气大,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我就没有端过。要懂得作诗同搞经济、办事情有区别。然而,1958年9月30日,《安徽日报》报道毛泽东来安徽视察,从安庆到合肥,“沿途看到标语很多,墙上、树上、屋顶上、田埂上,到处都有生动的标语,而且

很多地方有跃进门、宣传牌、宣传栏，毛主席说：“宣传工作做得很好。”毛主席到合肥以后，高兴地说：“沿途一望，生机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前不久还批评过“端起巢湖”的毛泽东，此时又表扬了安徽“大跃进”的宣传工作。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出了要批判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怀疑派”、“秋后算账派”、“观潮派”等思想观点。这次会议精神在安徽广大农村传达贯彻后，对全省业已兴起的“大跃进”运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大跃进”的表现形式首先是高指标。伴随高指标的是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强迫命令风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高产“卫星”的大量升空。

1958年7月31日，舒城县千人桥社槐树、中心、旗杆3个队培养的3.55亩南特号早稻试验田里放出亩产水稻11471斤的高产“卫星”。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等于7月31日连夜赶到千人桥，向当地干部、群众表示祝贺。8月1日，省委和省人委致电祝贺，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乘胜前进，积极做好中、晚稻及其他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力争中、晚稻等作物放出更多更大的卫星。”《安徽日报》也于8月2日报道了这一特大新闻，并配发社论《伟大的创举》。这一“奇迹”的出现使许多人为之振奋，连第二年冒着很大风险解决无为问题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也挥笔作诗为之讴歌：“千人桥上万人瞧，谁放卫星冲九霄？槐树中心旗杆队，社员风格比天高！”千人桥“卫星”上天，迅速在全省范围内产生了连锁反应：桐城

县寿元农业社放出早稻亩产 11105 斤的“卫星”、枞阳县高丰社放出双季早稻亩产 16227 斤 13 两(时用十六两秤)的“卫星”、繁昌县东方红社放出亩产水稻 43075 斤的“卫星”。

繁昌这颗大“卫星”还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在 9 月份来安徽视察经过芜湖时曾表示要去看看这颗大“卫星”。县里的同志为防真相暴露,向专区汇报说毛主席来繁昌的风声已经走漏,恐怕安全有问题。经专区向上汇报,毛泽东未能去成繁昌。

在南方水稻区“卫星”竞放的同时,淮北稻改区的阜阳、蚌埠两专区也是“捷报”频传。阜阳专区创造出大面积“卫星”,全区 101 万亩中稻,核定亩产 1304 斤,其中产量最高的阜南县 179385 亩中稻,平均亩产 17230 斤。蚌埠专区濉溪县卧龙人民公社在 1.913 亩稻田中共收稻谷 54852 斤,平均亩产 28673 斤 4 两。这个纪录比他们 8 月初发射的亩产 6395 斤的“卫星”高出 3 倍多。淮北地区的水稻大面积高产纪录,使原来水稻高产的桐城县放出的 35 万亩水稻平均亩产 1095 斤的特大丰收“卫星”相形见绌了。

除了粮食之外,其他作物同样“卫星”竞放。如凤阳县 1.2 亩烟草试验田收烤烟 12114 斤,亩产为 10095 斤;来安县丰产田黄豆亩产 1045 斤,最高合到 1231 斤 7 两;颍上县一盒蓖麻蚕种收蚕茧 96 斤;歙县丰产田茶叶亩产 1176 斤 14 两。当年全省棉花产量比上年增长 2 倍。

由于全省农村粮食的普遍“大丰收”,1958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被夸大为 450 亿斤,而后来核产只有 176.9 亿斤,比 1957 年减少 28.5 亿斤。全省按照 450 亿斤产量征收农民的粮食达到 69.68 亿斤,而实际剩下来的只有 107.22 亿斤(包括口粮、种子和饲料粮)。因此,到了 12 月底,特大丰收的桐城县徐河公社发生了社员

到怀宁县金拱粮站抢粮事件和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的坐车遭到该县食堂断炊的大关公社小关生产队社员围堵事件。这些情况并未引起省委领导的警觉和重视,相反,却派了100多人的工作组到桐城开展反瞒产斗争,写出《桐城县闹粮问题的真相》的报告,认为桐城闹粮荒的真相是“瞒产”,叫喊粮食紧张,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后,在全省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全国各地放“卫星”等弄虚作假之风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1958年11月上旬和下旬,中央先后在郑州、武昌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压缩空气”,把高指标降下来。安徽省委虽然根据中央会议精神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头脑发热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工作中仍然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如兼任桐城县委书记的桂林栖,一方面于1959年3月冒着风险示意桐城县“开仓放粮”,一笔回销粮食2000万斤,救活了不少饥饿的农民;一方面却要桐城县委再鼓干劲,致使县委提出“四千斤指标,八千斤措施,超万斤干劲”的口号。斗大字的标语,遍及城乡各地。直到5月上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调查组一行3人到桐城检查,对这个口号明确提出异议后,县委才将这些口号刷洗掉了。大家生怕否定“大跃进”的帽子随时扣来,县委领导人仍处于相当的矛盾之中。

三、大办人民公社和食堂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关于“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谈话发表后,安徽又迅速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9月15日,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在职干部学习人民公社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干部通

过学习人民公社的文件,作好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更好地迎接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实际上这个高潮已经来了,因为9月16日毛泽东从安庆到合肥的途中,已亲自视察了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在赞许该社吃饭不要钱之后,毛泽东又提出:“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毛泽东视察安徽6天后,省委于9月26日召开电话会议,全面部署大办人民公社工作。10天之后,安徽省广大农村即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由原来的1.68万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01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721.9万多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9.9%,公社平均规模为6746户,最大的有4万多户。

农村人民公社在体制方面,均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被认为具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导下,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等统统归公社所有。公社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平均主义。在公社内部,穷队富队统统拉“平”。为了兴修水利和兴办公社集体企业,可以任意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力,平调生产队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形式完备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人民公社在生活方面大搞“集体化”,不顾条件地举办公共食堂。1958年夏季,全省办起了农忙食堂24.8万个,常年食堂9.78万个,在食堂吃饭的有525万多户,占全省农户的72.8%。这些食堂均实行吃饭不要钱,按人均分配食物。无为县响山公社把社员的劳动收益统一放在社内,由集体供给社员主要生活资料,凭饭票到食堂就餐。社员生活必须的用品如肥皂、香烟、毛巾、衣服、雨鞋、雨伞、脸盆等,经公社领导批准后直接到供销社领取。遇到生

老病死,社员根据需要向社里领取实物和现金。同时还办起了免费或半免费的幸福院、托儿所。社员看戏、看电影都不要钱。9月23日,省委发出《关于(无为县)响山农业社三年来实行供给制情况的考察报告》(实际上是1958年夏末办人民公社时才搞起来的),称赞这是“可贵的共产主义萌芽”,主张大力推广。许多农村还大搞统一规划村庄,实行“撤村并庄”,即把分散的村庄拆掉一部分,归并到几个“居民点”建立新村。不少地方公社建制还实行了“军事化”,即将公社、大队、生产队改名为营、连、排、班,而且实行男女分居,以致有些现役军人回乡探亲后不能夫妻团聚。

四、农村工作的临时调整

高指标、浮夸风、高征购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带来的放开肚皮吃饭,以及1958年秋开始的大办钢铁,全省数以百万计的精壮劳动力离开农业第一线,已经成熟的庄稼收不上来,再加上其他因素,到1958年冬天,全省许多地方就已开始闹粮荒了,如前所述的特大丰收的桐城县就发生了农民抢粮事件。农民体力普遍很弱,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和安徽省委都有所警觉,省委于1959年春开始采取若干调整措施:

(一)整顿食堂。1959年4月,省委派出调查组深入各地了解情况,有30%的社员提出要求退出食堂,于是决定各地对食堂进行整顿,规定:1.办食堂要坚持自愿原则,参加自愿,退出自由;2.仍然办的食堂,取消“吃饭不要钱”的“共产”做法;3.提倡多种蔬菜,以补粮食不足;4.不准社队干部多吃、多占。这个规定一下达,

全省绝大多数食堂很快实行“分户开伙”，亦即实际上取消了食堂。当时桐城县除保留县委的点——石河公社石河大队红旗生产队一个食堂外，其余 5000 多个食堂统统到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检查组到桐城县新店公社看到食堂“分户开伙”后社员很是高兴的情形时说：“省委对食堂的新办法非常好。”

(二)开放粮食市场。为了便于社队、群众之间粮食互通有无、调剂品种，省人委于 3 月 11 日发出《关于开放粮食市场的通知》，规定各地恢复粮食市场交易，多余的粮食按等价交换原则，可以在市场相互调剂。

(三)加强农业第一线。为了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省委于 5 月 19 日和 6 月 30 日分别发出关于《固定工农业方面劳动力》和《调配劳动力回农村生产》的通知，并且决定从 6 月份起，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增加编制。8 月份，公交战线精简 10 万职工，加强农业第一线。

(四)加强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在全省范围内对人民公社逐步进行整顿，贯彻了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做法。此外，省委还就控制流动资金的使用和发展小商品生产做出了决定。

上述措施，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旨在纠“左”的调整性措施。但是，这些已经收到了一定成效的措施，到了 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决定在全党“反右倾”后，安徽同全国一样，不仅停止了纠“左”，而且还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21 日召开全省县、团级干部会议上，批判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和候补书记陆学斌的“反党联盟”，使得农村“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持续的“大跃进”。结果是，全省人民遭受更严重的饥荒袭击。1959 年、1960 年

全省粮食产量跌到谷底,除去征购、种子、水利粮,农村每人年平均口粮严重不足。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40.2亿斤,征购70.94亿斤,占50.6%;1960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34.92亿斤,征购49.74亿斤,占36.9%。全省农村绝大多数社队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现象。据《当代中国的安徽》记载,1957年底,全省农村人口为3064万,到1960年底,只有2577万,减少了487万。农村人口的下降,有正常死亡的,有进城做工的,有逃荒外地的,也有大量非正常死亡的。

工业“大跃进”

徐澍生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工厂企业,开发了近百种新产品,成功地恢复和发展了经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党认为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修改和提高计划指标,把1956年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比较切合实际的设想搁置起来,在经济工作中采取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做法,结果适得其反,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以钢为纲”和全民大办钢铁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毛泽东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此后,中国工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事实上

转到了“以钢为纲”，希望用钢铁产量的大突破来带动工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钢铁指标越提越高。1958年1月，国家经委建议全国当年的钢产量指标为620万吨，经过再三提高，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当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并号召全党全民为之奋斗。

华东地区提出5年实现钢产量800万吨的宏大目标，华东几位省、市委书记商定，上海、山东、安徽各承担200万吨，其余4省共同承担200万吨。当时，安徽仅马鞍山有一个小铁厂、6座炉，年产20多万吨生铁。

根据国家钢铁产量赶超英国的总体目标和华东地区的计划，中共安徽省委着手制订安徽钢铁工业的发展计划。1958年1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确定安徽钢铁工业的目标是：在5~7年内，铁产量达到52万吨，钢产量达到52万吨，煤产量达到400~500万吨。5月31日，省委发出《关于加速铁和水泥生产的指示》，将铁的年生产指标提高到50万吨。随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贯彻和宣传总路线热潮的出现，安徽“大跃进”热度进一步升高，钢铁生产指标一再加码。8月3日，省委在佛子岭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决定(草案)》，把全省钢铁指标大幅加码为铁120万吨、钢35万吨。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在安徽各地兴起，各地纷纷上马兴建钢铁企业。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批示，集中财力，进口和从国内订购上万吨钢材，准备自制炼钢设备。4月才开工建设的安徽钢厂(合肥钢铁公司前身)决定提前到9月份出铁，并把原设计年产5万吨铁提高到年产50万吨铁、30万吨钢及钢材，把钢厂建成钢铁联合企

业；马鞍山铁厂作出决定，利用原计划投资，扩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争取到1960年年产200~300万吨铁、100~120万吨钢；淮南也着手上马年产80万吨铁、60万吨钢的中型联合企业；铜陵计划用1年时间建成年产45万吨铁、30万吨钢的中型联合企业；芜湖市提出到1960年建成年产50万吨铁、30万吨钢的目标；蚌埠市决定在西郊建设“蚌埠的鞍钢”；安庆市也拟定了立即兴建中型钢铁厂的计划。

5月份以前，安徽钢铁生产还在有序地进行着。5月下旬，省委提出了“小型为主、土法上马、多采多炼、遍地开花，开快车发展钢铁工业”的方针，重新确定全年新建高炉147座、土炉381座的“大跃进”计划。6月7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在6月份突击生产2万吨铁，并把铁矿石产量提高1倍，还提出要依靠群众，想尽各种办法完成这一任务，以促使全省炼铁生产大大前进一步。从此，凭主观愿望行事、违反客观规律的现象开始在钢铁生产中出现。

6月下旬，省委连续召开会议，集中研究发展钢铁工业的问题，号召全省人民一齐动手尽快把安徽建成全国钢铁工业基地。会议还对安徽钢铁“大跃进”作出具体安排。一、在8月底以前建成3立方米以下高炉7300座，年内兴建3立方米以上高炉104座，立即加紧建设马鞍山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合肥等6个中型钢铁企业，并在年内达到151万吨的生产能力。全省每个机械工厂要在10月份左右建成1~2个炼钢炉，有条件的县也要建设炼钢炉。二、为保证钢铁企业建设规划按期实现，各级党委书记要亲自挂帅，每3天向省委汇报一次生产建设进度。三、钢铁工业所需的建设设备及材料，立足自力更生筹备。3立方米以下小高炉所需

器材,自行解决。

6月和7月是安徽全民大炼钢铁的第一个高潮。5月底,全省的小高炉共26座。从6月起,平均每天新建11座,7月底即增加到1168座。当时,各机关、工厂、学校纷纷修建小高炉。省委机关用党费创办省委钢铁厂,作为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曾希圣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亲自动手参加建造炼铁炉。各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也都领头办炼铁厂,有的还参加炼铁操作,研究炼铁技术。许多机关、工厂和职工个人集资建高炉。高炉建成后连续奋战,有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直到炼出第一炉铁水。同时,群众性的攻克炼铁炼钢技术难关的活动也随之展开。蚌埠电工器材厂工人任谓卿首次利用土法炼钢获得成功;合肥矿业学院学生孙茂科发明吹氧炼钢技术,省委立即向全省推广。6月底7月初,省委在芜湖召开小高炉炼铁现场会,请马鞍山、繁昌、当涂等地的厂长、技术人员讲授钢铁技术知识,要求各地学习繁昌土法炼铁的经验,并提出了“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办钢铁工业”的口号。

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安徽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再掀高潮。此前,省委、省人委于7月底设立省冶金工业指挥部,由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任指挥,专门指挥全省的钢铁生产。8月20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会上传达了曾希圣关于完成钢铁生产任务的电话指示:“在这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主席(指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今年钢铁生产任务完成的怎样?’各级党委在今后的4个月内主要是抓钢铁,这是一场恶战,要下死命令,今年原订钢铁生产任务非完成不可,少一吨也不行。主席在会上讲了3次话,内容

都是讲的钢铁问题，现在大家很紧张，因为都未很好地抓钢铁。”

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省委和省人委于8月28日晚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广播大会。李任之代表省委作了题为《全党全民进一步动员起来，为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指出：“完成全年钢铁计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毛主席指示我们，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现在我省粮食元帅已经升帐了，钢铁元帅也必须立即升帐。因此，我们要坚决保证今年的钢铁生产任务百分之百的完成，一吨也不能少。”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全力抓钢铁生产，不仅要政治挂帅，还要技术挂帅，要求各地、各矿订出每日每旬每月的建炉和出铁的具体数字，并且保证实现。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指标，全省平均每天参加找矿炼铁、砍树挖煤的劳动力达241万人，最多时达500万人。炼铁的浪潮从城市、工厂扩展到乡村、农业社。繁闹的城市，静静的乡村，偏僻的山区，都变成不夜的工地，到处都有为钢铁而战的人群。9月7日，全省兴建的各类高炉合计达到19322座，累计生产铁19万吨、钢1900多吨、铁矿石251万吨。

此时，距年底只有4个月时间，全省铁产量完成计划的1/6，钢产量完成计划的2/1000。显然，实现跃进计划已无可能。省委决心以更足的干劲、更多的智慧、更快的速度、更有效的措施去推动大办钢铁运动的发展。9月初，省委向全省人民发出“拼命干钢铁，为全省日产万吨生铁而奋斗”的号召，要求条件较好的县为日产千吨铁而努力。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发出的《致全省钢铁战士的慰问信》又提出：“全党全民一齐动手，鼓足干劲，奋战4个月，让钢铁生产也像我省农业生产一样，放出一个个‘高产卫星’。”省委大

部分领导成员带领7个钢铁检查组,分赴各地指挥督战。于是江淮大地又掀起建炉、炼铁的跃进新高潮。合肥大西门外,两个月前还是一片泽国,此时都“红透半边天”,全市10多家钢铁厂近20座高炉正加紧建设;安徽农学院把教室变成了破碎矿石的车间,数百名学生每天要砸碎6吨矿石;马鞍山钢铁厂一座2.4立方米的试验性土高炉创下日产生铁3.04吨的纪录,并放出全省第一颗“高产长寿卫星”;金寨县出动全县1/2的劳动力大炼钢铁;安庆专区组织30万人上山开矿炼铁,提出“大战4个月,不完成任务誓不下山”的口号。安徽人民深深卷入热气腾腾的大炼钢铁潮流中。

二、毛泽东视察安徽,炼铁再掀高潮

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安徽省视察。毛泽东对发展钢铁工业极为重视,先后视察了4个钢铁厂。在省委钢铁厂,他详细询问了这个厂的情况。当他得知这个钢铁厂是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时,称赞说:“对啊,省委应该带头办啊!”随后,在省委领导陪同下趋车前往芜湖市和马鞍山钢铁厂视察。离开安徽之前,毛泽东对省委负责人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对新闻界谈到了此次视察的观感:“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到现在,我们还有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视察安徽和关于钢铁工业的讲话肯定了安徽群众性大办钢铁运动。省委及时向全省人民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并发出

了“全民动员，全力以赴，拼命战钢，苦战到底”的号召。安徽大办钢铁运动掀起第三次高潮。

9月下旬，省委连续举行会议，决定在抓高炉炼钢的同时，动员组织群众进行坩埚炼铁。随后，进行紧急部署。坩埚炼铁最初是外省的“发明”，安徽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余叔等人去取经，回来后又在合肥矿业学院（10月改为合肥工业大学）试验，随后在全省迅速推广。

按照省委的部署，淮南铁路沿线成为全省坩埚炼铁的主战场。9月25日一夜间，沿线地、市、县全部成立了坩埚炼铁指挥部。40万炼铁大军部署在铁路沿线。整个10月，铁路两旁炉窑林立，人声鼎沸，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特别是进入夜晚以后，铁路沿线到处是熊熊的火光，铁水在坩埚内沸腾。运输大军通宵不停，来往如梭。曾希圣、李任之等到现场督战，还亲自动手做坩埚炼铁，宣讲操作要领。寿县有一位63岁的老木工，连续干了两天两夜，干部劝他休息，他却认真地说：“共产主义不是快到了吗？难道你们不让我快点到达共产主义吗？”

全省各地的坩埚炼铁同时展开。合肥市抽调了大批人力参加坩埚炼铁，并成立坩埚炼铁办公室。合工大集中2500多人制造坩埚和修建高炉，10月9日报道称该校创下一只坩埚出铁7斤的纪录。用瓦罐炼铁试验也获成功，并说：“瓦罐炼铁比坩埚炼铁效果还要好，成本低，出铁快”；淮南、蚌埠、安庆等地出动约50万人制作坩埚、运输矿石，彻夜炼铁。省冶金工业指挥部要求全省多用土转炉、低温法和坩埚等土法炼钢。

快建高炉多出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建炉缺钢板就用白铁皮做炉腹；冷热风管不足，就用水泥管、黄泥管、甚至用砖砌成风道；

鼓风机不足,就用风箱代替。小高炉高产“卫星”也一个接着一个放上天。9月21日,金寨县英雄人民公社一座小高炉创下日产10850斤铁的高产大“卫星”;9月29日,岳西县宣布实现日产铁1116.8吨,成为全省第一个日产生铁过千吨的县。10月28日,全省日产生铁、钢终于突破万吨、千吨大关。11月4日,全省日产铁27580吨、钢7984吨,创下了大办钢铁运动以来的最高纪录。

大办钢铁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被卷入到运动中去,处处建高炉,纷纷放“卫星”。由于坩埚炼铁方法落后,炼出的铁基本上都是废品。小高炉炼铁、土法炼钢的正品率也极低(约为1/4)。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造成了技术力量和矿石的紧张,冶炼设备、煤焦产量、发电能力、运输能力等都不能适应。在这种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全省非但没有降低“大办”热度,而且继续蛮干,即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炼铁矿石不足,就以回收废钢铁为名,把生活用的铁器和一部分农具都搜罗来,放到高炉里烧一下,变成大铁块抬去报喜;煤焦缺乏,就发动群众砍伐树木烧成木炭来代替;鼓风机不多,就靠人力风箱鼓风;技术力量不足,就把铁匠、铜匠、补锅匠,以及铸锅、铸犁等铸造工人和学徒集中起来,投入炼铁生产。所有这些都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

全民大办钢铁因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不尊重科学而陷入重重困境。9月初,省委意识到年产120万吨铁、35万吨钢的跃进指标订得太高。当中央明确下达安徽生产10万吨钢的任务后,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也不再提“大跃进”指标了。然而对工业基础薄弱的安徽来说,即使完成这个大大调低了的指标也相当困难,不得不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继续拼命干钢铁。

从建小高炉到坩埚、瓦罐炼铁，钢铁生产始终存在着质量问题。省委为解决质量问题作了许多努力。但是，随着大办钢铁规模的迅速扩大，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群众运动几近无序状态，只能抓产量，无法抓质量。10月份，坩埚炼铁、土法炼钢的质量问题进一步暴露，省委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加以补救，但仍不能解决问题。此后，即不再提倡用坩埚、小高炉炼铁，也不再提及“以土为主”的方针，而是以“土洋结合，以洋为主，质量并重，合理布局”的提法来代替，沸腾了一个多月的淮南铁路沿线坩埚大战便悄悄地结束了。

经过7个多月的“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特别是最后4个月的大规模群众炼铁高潮，12月12日安徽宣布提前19天完成国家下达的1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12月21日又宣布提前9天完成国家规定的103万吨铁的生产任务。

三、继续全面跃进和实行短暂调整

1959年，中共中央提出全国年产1800万吨钢的目标。年初，中共安徽省一届三次代表大会先是提出年产铁170万吨、钢50万吨的指标，几经修改，最后订出年产铁250万吨、钢120万吨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指标。另外，还把煤炭生产任务确定为1700万吨。

为实现新的跃进指标，安徽仍然以“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为根本，强调“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和“土洋结合、以洋为主”。在具体做法上，提出“大搞小洋群，由小洋群向中洋群、大洋群过渡”的发展方向，把主要资金、人力投入到建设8~28立方米以上小高炉的建设上。中型高炉也加速发展。1959年11月至12月，马鞍山钢铁公司两座255立方米中型高炉先后建成投产。年底，马鞍

山、芜湖、铜陵、安庆、合肥、淮南、蚌埠 7 个市已经初步建成钢铁生产基地。每个基地中的小洋炉，少则 10~20 座，多则近百座。一个以沿江 4 市为主，沿淮南铁路 3 市为辅的“T”字型钢铁生产布局初具规模，为安徽钢铁工业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建成的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铁厂等以后逐步发展为全省钢铁骨干企业。

在搞洋高炉的同时，土法炼铁也没有放弃。3 月，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书记会议，确定省里主要抓大洋群建设，各专区和县以兴建小洋群和土高炉为主，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各专、市、县再度兴起大办小高炉、土高炉的热潮。全省小高炉容积从年初的近万立方米，跃进到年中的 13525 立方米。年产铁能力达到 300 多万吨。由于将小土高炉改造为小洋高炉，致使各地的财力、人力、物力再度紧张。

1959 年夏，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安徽视察工作，已经发现“大办”问题不少。他在给中共中央的 3 份报告中写道：“安徽省高炉容积 1 万多立方米，经常开炉的占 40% 到 50%，炉子一般不能经常开的原因，主要是炉料运输跟不上，高炉一般都无隔夜之粮，同时也不能定点供料，影响对质量的控制。布点不合理，有的地点成本很高……此外，单位过多、战线过长，对领导管理有所不便，也妨碍进一步提高。合肥市 200 多座小高炉，就分属 40 多个单位（每个单位都办几座），开炉的也是一半左右。”“拿质量来说，不加强管理，就难以提高，现在大多数单位是：来料较乱，很少加以分析化验，不能分类入炉，冶炼操作没有一定的规程，出炉后化验制度不健全，或化验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生铁有把握地符合优质的标准，是很困难的。”

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造成了人力调配上的困难。从各行各

业抽调大批人员,冲击着轻工、纺织、食品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大批农民弃农炼铁,直接影响秋播面积和夏粮的产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1959年年初,省委大大减少炼铁大军的人数,以解决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但是,省委在指导思想对“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并没有动摇。曾希圣在《总结去年的经验,搞好今年的大跃进》一文中写道:“关于大搞群众运动问题,这是总路线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大跃进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我省去年大搞水利、积肥,大战旱情、大战虫害、大办钢铁,都是轰轰烈烈地大搞群众运动。没有轰轰烈烈而又健康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全面跃进的伟大胜利。”坚持搞群众炼铁运动,致使农村劳力严重不足。直到6月初,省委才动员城镇大批劳力赴农村投入农业生产。在钢铁生产方面则决定用兴建洋高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弥补劳力不足。此后,动员群众大办钢铁的热情逐渐冷却。

一味强调大办钢铁,搞重工业,造成工业、农业发展跟不上重工业的需要,生活资料和副食品的供应趋于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日趋暴露。在此情况下,安徽不得不减少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量,减少农村返销粮的数量,减少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量,人民生活因此受到影响。1959年冬,进入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安徽克服上述种种困难的努力,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一方面,连续召开干部大会、工业会议、广播大会等,号召全省人民开展增产节约、红旗竞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为实现更大跃进而奋斗。另一方面,由于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又动员城镇劳力下放农村,缩减大炼钢铁的人数,调低钢铁跃进指标,恢复与发展小商品

生产。省委意识到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无法完成,6月份酝酿降低指标。7月,省委批转省计委《关于调整1959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调整了主要工业品产量指标,钢由120万吨调整到23万吨、铁由250万吨调整到180~208万吨、煤炭由1700万吨调整到1500~16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额也从年初计划的12.2亿元调为6.8亿元。这次调整的幅度不大,不可能改变“大跃进”的总体趋势,各种矛盾和困难依然没有消除。

1959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迅速展开。这一斗争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后果,尤其是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出现了更大的错误。1959年国民经济的困难已经相当严重,但当时却强调经济状况“极为良好”,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否认困难的严重性。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又错误地决定1960年要继续“大跃进”。8月27日至9月21日,省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把“反右倾,鼓干劲,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确定为当年最后3个月的中心任务。

大办钢铁面临的困难越积越多,存在的问题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既继续大办钢铁,完成重工业指标,又加速其他工业的发展,缓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矛盾。经过3个月的最后冲刺,到年底安徽完成钢产量23.5万吨、铁产量223万吨、煤炭产量1600万吨,勉强达到调低后的计划指标。工业总产值完成45.1亿元,比年初计划的70亿元差25亿元。

1960年,安徽制订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跃进计划,要求全年产钢46万吨、铁322万吨、煤炭2200万吨,实现工业产值102.7亿元。

为了实现各项指标,全省范围内再一次掀起跃进热潮。各地为了完成计划,指标层层加码,在计划外又安排了许多自筹项目,各种“大办”铺天盖地,使国民经济比例日趋严重失调。年初,安徽农村已经出现严重粮荒,工业生产困难重重,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各项指标无法完成。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年底,全省完成钢产量40.5万吨、铁产量280.3万吨,都没有达到年初计划指标。工业总产值52.92亿元,与原计划102.7亿元相差甚远。196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跃进”运动紧急刹车,大办钢铁运动从此偃旗息鼓。

大办钢铁付出了巨大代价。全省以百万计的农村劳动力丢开农活,参加炼铁,造成农村劳力紧张。很多农田播不下种子,成熟的庄稼收不上来,农业连续3年减产。砍伐树木烧炭炼铁,使大片山林被毁,许多村庄的树木被砍光,致使岩石裸露,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农、林业的发展。3年间,全省对钢铁及重工业的投资17亿元以上,占同期投资总额的60%。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土高炉、小土煤矿等土法上马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在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绝大部分被砍掉。据统计,仅直接投资于钢铁企业的资金,3年累计损失3.1亿元,相当于同期全省轻纺食品业投资总额的1.3倍。

四、其他工业的“大跃进”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在大办钢铁的同时,与发展钢铁相关的煤炭、电力、机械、建材、交通以及轻工、纺织、食品等行业也掀起了“大跃进”。

1958年2月,省委提出发展地方工业的一系列计划,要求5~

7年内,使全省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按照这一计划,工业产值年平均递增率要达到45%的增长速度。在大办钢铁的高潮中,上述目标又不断提高。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许多指标被要求提前2~4年、甚至是翻番完成。如煤炭工业,原计划用5~7年时间达到年产400~500万吨,半年后即修改为当年产煤800万吨;电力工业也从原计划年发电量5亿度,调高到1959年完成10亿度;机械工业指标更是十倍、几十倍地增长。

为了保证钢铁“大跃进”,1958年全省掀起夺煤大战和建井高潮。淮南矿区在挖潜改造的同时,开工兴建了毕家岗和李咀子两对矿井。当年原煤产量816万吨,超过设计能力110多万吨,第二年增加到1414万吨。1960年,毕家岗和李咀子两对矿井建成投产,连同原来8对矿井,全局已有10对生产矿井。这年共生产原煤1614.5万吨,比设计能力翻了一番。

1958年7月,淮北煤矿建设委员会成立,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任主任委员。淮北煤矿大规模工程建设加速进行。徐州煤炭基建局3个工程处承担淮北矿井的施工任务,当年就开工烈山、张庄、岱河、扬庄4对矿井。为发挥地方的办矿积极性,省委提出淮北地区部分县“出钱、出干部、出劳力,得煤炭、得产值、得利润”的政策,各县纷纷承办建井任务。矿区附近的濉溪、萧县、宿县3县特地成立了支援煤矿办公室,动员数万名民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200多公里的铁路、公路和河流改道等土石方工程。淮北地区部分县还为煤矿筹集了35万元培训经费,支援1600多立方米杂木。在筹建开发中,淮北矿区当年共招收工人1.2万人,各地支援干部943人。到1960年年底,淮北矿区有烈山、袁庄、沈庄、张

庄4对矿井建成投产,当年全矿区原煤产量100.2万吨。淮北矿区已初具规模。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土法上马,到处开小井、开露天矿,乱上项目,造成严重浪费。如盲目投资827万元在合肥、蚌埠、芜湖、安庆、铜陵、淮南等地建设10个简易洗煤厂,不久即全部停产;有的矿井建设标准低,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淮南矿区为了完成指标,实行重采煤、轻掘进的办,动用全部储备煤,造成采掘比例严重失调,1959年煤炭产量虽达1400多万吨,但给后来的煤炭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大批小煤窑的兴建,浪费了煤炭资源,耗费了人力、物力,后来纷纷关闭、下马。

电力工业的“大跃进”十分艰难,但由于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各行各业用电量剧增,刺激了电力工业的畸形发展。梅山水库电站工程于1958年9月1日竣工,第一台1万千瓦的水轮机组投产发电。响洪甸水电站1959年9月第一台1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1958年至1960年,电力工程投资高达2.9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投资的15.19%,发电量也以拼设备为代价在3年中增加5.36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大跃进”中未经科学论证,一哄而上的陈村、毛尖山、相公庙、花凉亭水电站和芜湖、合肥等火电厂,都历经折腾。陈村电站施工方案一改再改,合肥电厂在已经施工1年之后另选厂址,花凉亭水电站工期长达23年。更多的电力企业在“只要锅炉不爆、发电机不烧,影响寿命在所不惜”这一当时被吹嘘为“揭开电力工业生产技术革命的序幕”的错误口号鼓动下,违反科学规律地蛮干,造成很大损失。芜湖发电厂连续3年超铭牌40%运行,使全厂主、辅设备完好率分别只有50%和29%。

“大跃进”期间的机械工业发展相对顺利。全省不仅兴建和扩

建了合肥起重运输机械厂、芜湖重型机床厂等一批骨干企业,而且县、社都办起了一批“小、土、群”机械厂。到1960年全省有1584个机械企业(其中社办企业占60%),职工12.89万人,完成工业总产值9.45亿元。据当时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机械工业平均产值年增长速度高达88.4%。机床、电工、轴承、仪表等行业先后崛起,炼铁设备、化肥设备等产量猛增,柴油机、拖拉机、电影放映机、圆弧齿轮减速器、变压器、低压电器、工业泵等数百种新产品相继问世,数以万计的技术革新项目应用于生产。1958年底机械工业厅从工业厅划出单独成立,标志着全省机械工业已形成一个独立行业。在此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了一些机械企业。1958年毛泽东观看了安徽电影机械厂生产的红旗牌35毫米放映机;朱德、邓小平、彭真视察了合肥砂轮厂。当然,这期间全省机械工业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也出现了指标过高,基建战线过长,管理较乱,造成产品产量和质量大幅度下降等问题。一些炼铁设备也达不到设计要求;社办企业滥竽充数,有的机械厂只有1台20年代的破刨床。1962年,全省被迫关停了一批机械工业企业。

轻工业受到冲击的首先是小农具和日用小商品生产。1958年下半年,手工业开始大规模升级过渡。到年底,全省县以下的手工业企业合并为1895个合作工厂,划给人民公社管理;县以上原属手工业系统的手工业企业合并升级为225个地方国营工厂和776个集体所有制合作工厂。凡政府设有专管机构的,均分别按行业归口管理;没有对口管理机构的,统归轻工业厅管理。由于企业合并,轻工系统的企业数由1957年的4457个减少为1199个。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巩固的情况下,匆忙进行并厂升级,退

还社员股金,取消分红,实行统负盈亏,导致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瞎指挥,干活“大呼隆”,分配上出现平均主义,挫伤了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加上手工业企业中的大量人员、物资、设备被调去“大炼钢铁”,许多原来生产日用品、小农具的企业转产,使日用品工业生产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1959年至1960年间,在全省许多地方,小商品供应奇缺。

在“大跃进”中安徽纺织工业出现了火热的建设高潮和短暂的兴旺。

1958年至1960年,全省用于纺织工业的总投资是8086万元。其中棉纺织工业占81.66%。3年间安装起24.74万枚纱锭,比1957年增加2.8倍。首先列入规划并兴建的是六大棉纺织厂,即:扩建安纺一厂,新建安纺二厂、安纺三厂(现蚌埠纺织厂)、安纺四厂(现淮南纺织厂)、安纺五厂(现安庆纺织厂)、安纺六厂(现阜阳纺织厂)。这些厂的设计规模都是5万锭以上的纺纱能力,配以相应的织布机和印染设备,均为中型企业。安纺二厂到六厂全部于1958年破土动工。同年,芜湖纺织厂进行了第一次扩建,也形成近5万枚纱锭的生产能力。这一年又在肥东、巢县、安庆、阜阳、蚌埠、宿县等地兴建一批单纺厂和单织厂。到年底,全省建成9.98万枚纱锭。与此同时,还鼓励支持土纺锭的发展。1958年,全省计划造土纺锭30万锭,实际制成15万锭,投入生产的有3.2万锭。1959年和1960年两年,棉纺织工业的建设继续大上,到处铺摊布点。与此同时,其他纺织行业也纷纷发展,毛纺织、小化纤从无到有,针织、麻纺织由少变多,生产能力成倍增长。

然而,由于纺织工业“大跃进”的计划脱离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好。1958年,全省计划兴建棉纺锭51.6万枚,而这只有安纺

二厂按期完成。3年中,国家和省投资的项目130多个,实际建成的只有36个。在建设方针上,错误地提出“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口号,使得一些消耗高、效益差的小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1958年的企业数比1957年猛增2.25倍。由于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原料、技术、管理跟不上,使生产不能维持。纺织工业连续3年大“滑坡”。到1962年,纺织工业产值只有17416万元,比1957年还少,跌到了谷底;同时生产效率下降,主要纺织品均下降6成多,企业数从1958年的260个减为33个。

1959年底到1960年,食品等工业发展滞后造成的问题逐步暴露。这时,省委开始注意对这些工业进行扶持。1960年省委发出鼓励城市养猪的通知,要求“城市各行各业、居民家庭齐动手,多多益善”。由于当时发展经济“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上述措施未能见效,经济比例完全失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无法避免。

在“大跃进”中,交通事业既取得了一定发展,也造成了严重损失。在“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为主”的公路建设方针指导下,1958年至1960年4年间公路里程增加到13616公里,比1957年增长63.4%,并兴建了芜湖、安庆、凤台等市、县的公路渡口。但由于只求数量,不注意质量,有些线路达不到最低技术标准,有的线路不能通车,给后来的改建和养护带来很大的困难。由于蛮干,公路运输事业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全省客、货车的平均完好率分别为57.6%和54.4%,比1952年还低20%以上,货车平均每车吨月产也只有1672公里,比1957年下降了35%。

1958年至1960年,安徽邮电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全省新增邮电处所365处,市内电话增容13098门,新增长话载波终端机

121部,新增长途架空明线 5983 对公里,农村电话架空明线 43196 对公里,延伸邮路 7129 公里,增加长途电话线路 163 条,有电传机的局由合肥市 1 个局增加到蚌埠等 7 个专、市局,初步建成以合肥为中心的连接全国的长途通信网和以县为中心的农村电话网。

1958 年开始建设的邮电工业,生产了一批载波机、交换机、会议电话机和其他一些设备,虽然质量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加快邮电建设、适应通信需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探索中的成绩和失误

1959 年至 1961 年前后,“大跃进”运动给安徽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灾难,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业生产急剧下降,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市场供求关系日趋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全省国民收入逐年递减,1958 年全省国民收入 49.04 亿元,到 1961 年只有 38.8 亿元。由于粮食危机和轻工、纺织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全省市场供应日趋紧张。1958 年下半年,一部分生活日用品开始脱销,粮食、肉类、副食品及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全面紧张,物价大幅度上涨。1960 年 5 月全省开始对城市居民、职工、干部实行凭票供应肉类、副食品和部分日用品。国民经济滑入危机的深渊。

“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开展,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安徽的经济发展也因此损失巨大。但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干部的积极苦干,安徽省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例如,在工业建设上,这一阶段开始建设淮北煤矿,新增煤炭开采能力 479 万吨;1962 年,淮南煤矿即成为当时全国五大矿区之一。组建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将原来的马鞍山铁厂发展成为中

型的钢铁联合企业。1961年,顶住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的压力,在马鞍山市郊的一片荒郊野地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万余名会战大军披荆斩棘,打响了兴建我国火车车轮轮箍厂的大会战,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火车车轮轮箍厂,结束了我国火车车轮轮箍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兴建了合肥钢铁公司等地方钢铁企业,全省新增铁矿开采能力386万吨,新建炼焦炉98座,炼焦能力达153.4万吨。这一阶段扩建和新建一批发电厂和水电站,新增装机容量36.69万千瓦。机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兴建了合肥重型机械厂等骨干企业。化学工业开始起步,兴建了合肥化工厂、淮南化肥厂、铜官山化肥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建材工业,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年产15万吨的巢湖水泥厂和100多个年产万吨左右的小水泥厂。同时还建设了一批工矿企业,如玻璃厂、陶瓷厂、油毡厂等。轻工和纺织工业也兴建、扩建了一批项目,有安徽纺织二厂、东方纸版厂、蚌埠卷烟厂、蚌埠肉联厂、萧县葡萄酒厂等。交通邮电事业也有所发展。

从总体看,“大跃进”运动不仅使“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造成巨大浪费,而且严重损害了农业,也使得稍有基础的轻纺工业因投入不够而难以为继,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招致了严重后果,成为1960年前后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着手纠正“大跃进”运动的错误。随后,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淮北河网化

李建军

50年代末,安徽淮北地区共23个市、县,土地面积3.8万平方公里。

淮北地区属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带,气候不稳定,降雨量在年际与年内都极不均匀。夏秋之际,冷暖气流常常在此交会、相持,容易发生大暴雨和连阴雨。在雨量稀少的年份,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干旱。该地区处在淮河中游及各支流的下游,上承河南省来水,下受洪泽湖高水位顶托。历史上黄河数次夺淮入海,又造成淮河水系严重淤积和破坏,排水出路阻塞。因此,淮北地区洪、涝、渍、旱灾害频繁。

新中国成立以前,淮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除沿淮有零星旱稻种植外,其余广大地区均种旱粮,以小麦、大麦、黄豆、高粱、山芋、棉花等为主,耕作粗放,广种薄收,水利不修,生产极不稳定,单位面积产量很低,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为了改变淮北地区多灾贫穷的落后面貌,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根治淮河”的决定,淮北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至1958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又制定了淮北地区“水网化、水稻化,把淮北变江南”的水利工作方针。同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视察淮北,指示将水网化进一步规划成河网化。由于河网化的规划目标和任务严重脱离实际,远远超出了淮北人民的承受能

力,致使工程在 1962 年不得不停了下来。

—

淮北河网化方针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在防洪除涝、改种水稻、蓄水灌溉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1950 年 7 月,淮河流域发生大水,淮北地区遭受严重涝灾。1952 年 8 月,淮北地区又发生大涝,成灾面积达 908 万亩。淮北地区迫切需要解决除涝问题。为此,治淮委员会于 1952 年 11 月 22 日召开了豫、苏、皖三省除涝会议。会议认为淮北除涝应该以蓄为主、以排为辅。在此基础上,治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了“以蓄为主,以排为辅,采取尽量蓄、适当排,排中带蓄,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治涝方针。1953 年,省委推行农业“三改”,对耕作制度、作物品种、耕作方法进行改革,把在易涝地区种植水稻作为农业防灾保收的重要措施。1954~1956 年间,淮北地区大力推行稻改,水稻面积最多时达到 198 万亩。一些地方因为种植水稻而减轻了涝灾损失。1956 年,安徽省水利厅根据省委要求进一步提出《淮北治涝改种意见》,计划 5 年内圈圩 1500 万亩,做畦田 3000 万亩,以消除 1952 年和 1956 年型的涝灾。以后几年通过沱河、北淝河、泉河等工程的实施,“沟洫圩田改种”在淮北一些地方逐步成为人民群众向洪涝灾害作斗争的一种方法,但大面积改种水稻终因缺乏水源而停了下来。

1955 年 8 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编制淮河流域规划的计划任务书》,并指示最大限度地、合理地对准河流域水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尽量满足国民经济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要求。当时,安

安徽省要求沿淮地区能排除 10 年一遇的内涝,在淮北地区改种 1000~1500 万亩水稻,并灌溉 3000~3500 万亩旱地。中央农业部也认为“发展农业在淮河流域具有特殊意义,应尽一切可能利用水源来扩大稻田面积,到 1967 年最好能发展到 1 亿亩水稻田”(摘自《淮河流域规划提要》)。因此,治淮委员会在编制《淮河流域规划》时尽量增加了水稻种植面积,远景规划达 8000 万亩,近期因限于水量,则规划种植水稻 6000 万亩。1957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1 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讨论研究《淮河流域规划》。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参加会议的流域各省负责同志谈话,谭震林指出:淮河以北的冀、鲁、豫、皖、苏地区,要变为水网地区,以种水稻为主;关于治淮方针应该以蓄为主,要依靠合作社修建水利工程,以小型为主,必要时修一些大型的,把能蓄的水尽量蓄起来,实在不易蓄的,才往下游放。会议据此形成了治淮方针。会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谈了兴修水利的目的、兴修水利依靠谁、兴修水利的方法等问题。在谈到兴修水利的方法时,他说:大中小工程中以小型为主,蓄泄兼筹方针应以蓄为主,尤其是小型工程更为重要。淮河以北地区之所以经常有水灾,不是水多而是大水年份的水没有积蓄下来改种水性作物的缘故。假如把水积蓄下来,大量旱地改为水田,把淮北变为水网地区,涝灾就可消除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精神,1958 年 3 月 16 日,省委在蚌埠召开 3300 多人的干部大会。曾希圣在会上提出“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全面规划,全面治理,小型为主,大中支持,以蓄为主,尽量少排,水网化、水稻化,把淮北变江南”的水利工作方针。同年 6 月,谭震林到淮北视察后指出:“水网化是我国平

原地区最完善的治水方法,应该进一步规划,把水网化变为河网化,今后河网化应该达到更高的要求,就是一年不下雨也要保证不旱,降雨 1000 毫米也要保证不涝,所有河网都要通轮船。”从此,河网化在淮北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二

国务院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以后,淮委和阜阳、蚌埠两专区水利部门即着手进行淮北水网化的轮廓规划。1958 年 3 月,曾希圣视察淮北后提出《淮北水网化的十条规定》,内容如下:

(一)70 天不雨不旱,10 天内下 400 毫米雨不排不涝,乡乡通船,社社、村村通小船、木盆。

(二)沟、塘、井三者结合,以沟为主,平地开沟开塘,高地打井,洼地打圩或蓄水,利用平坦地里的洼地开塘,大、中沟每隔 500 米下一泉。

(三)土方数:在 1 平方公里内,起码要挖 25 万方土方,淮北共有 3.7 万平方公里,大约总共要做 90~100 亿立方米。根据各县规划来看,3 年左右可以完成,每年要做 30 多亿立方米。

今年水利任务,按人口平均,每人应完成 200 方,要求尽可能超过,事实上现在已有很多县超过了。

(四)大、中、小沟的标准:大沟顶宽 30 米,底宽 6 米,深 6 米,坡度 1:2;中沟顶宽 20 米,底宽 4 米,深 5 米,坡度 1:1.5;小沟顶宽 10 米,底宽 2 米,深 4 米,坡度 1:1。大沟每隔 3 公里一条,中沟每隔 1 公里一条,小沟根据情况开挖,一般半公里一条。沿公路开大沟(地方水沟也可开一中一小),沿大路开中沟,沿小路开小沟,

不沿交通线的,根据蓄水需要开大沟或中沟。

(五)淮北原有河道以及新开的大、中沟都要节节拦蓄,使河道和沟塘相连,做到全面蓄水。增开若干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新河道,以补原有河道的不足。

(六)随着沟洫的发展,做好涵闸桥梁,尽量能使桥梁与涵闸结合,以减少工程。为做好涵闸与桥梁,必须建立技术工程队,每县成立一个技术工程队,修建本县工程;乡成立工程队,修建本乡工程;社成立工程队,修建本社的工程和下泉工程。

(七)湖泊洼地尽可能蓄水,以保证稻改水源,各级干部要建立蓄水思想,对蓄水规划作如下规定:1.大面积蓄水,由淮委规划决定;2.小面积蓄水,由专区或县规划决定;3.蓄水区的群众由受益区负责安排。

(八)大、中、小沟的涵闸规划问题,属于两个区或乡有关的规划由县解决;属于两个县有关的规划由专区解决;属于两个专区有关的规划由淮委解决。

(九)加强提水灌溉设备,要研究各种提水工具。目前淮北的提水动力要尽量利用风力,为此必须尽量改进风车和发展风车。

(十)加速水利工程效率,继续研究和推广运土工具、下泉工具、打井工具和挖土工具,要经常进行评比,务使月新日异。要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研究,发掘本省的和外省的先进技术(1958年3月21日《安徽日报》)。

根据十条规定和谭震林关于河网化的讲话,安徽省水电厅于1958年下半年相继提出了《淮北河网化初步规划报告》和《安徽省淮北河网化规划》,明确河网化的中心任务是3年内(1957年冬至1959年底)将2750万亩旱地改为水稻田,实现淮北水稻化、江南

化,其他旱地也改为水浇地,5天降雨400毫米不涝,70天不雨不旱,发展交通事业,做到新旧河道通轮船,大中沟通木船。《规划》主要内容综合如下:

(一)河网化就是使淮北平原沟河纵横,形成河河相通、沟沟相接的河网。河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大河网(河道河网),由计划开挖的9条新河和淮北原有15条主要河流交错组成;第二类是小河网(基本水网),由大、中、小沟及塘井组成,部署在大河网之间拦蓄当地径流并利用地下水以利灌溉,在汛期可拦蓄地面径流及排水入河道以消除涝灾。

原有15条河流进行疏浚、挖深,共需挖土3亿立方米。基本水网每平方公里起码要挖土方25万立方米,淮北3.8万平方公里共要做土方90~100亿立方米。

规划中对河网化的发展作了分析:每平方公里按25万立方米开挖,在一般的降雨年份仍有余水外排。如遇1954年、1956年等多雨年份,尚有大量雨水需要外排。而在中等干旱以上的年份,则灌溉缺水很多。为了扩大河网蓄水能力,彻底消除淮北地区的水旱灾害,河网化的标准仍有提高的必要。蚌埠、阜阳专区提出每平方公里挖土35~40万立方米的计划值得研究。今后,可以采用由一、二、三级河道和大、中沟组成河网,以达到每平方公里挖土35~40万立方米的要求。

(二)开挖界洪新河、界南新河、阜蒙新河、涡浍新河、颍淮新河、淮涡新河、符怀新河、浍濉新河、淮濉新河等9条新河,沟通原有天然河道形成大河网,以满足灌溉和航运的需要,也可排水、分洪和发电。9条新河总长960公里,需挖土方3亿立方米。

(三)河道控制建筑物:为了有控制、按计划调度水量,使河网

排洪、排涝、灌溉、航运运用自如,拟定在界洪新河上建节制闸 13 座、船闸 4 座,颍淮新河上建节制闸、船闸各 2 座,阜蒙新河上建节制闸、船闸各 3 座,淮涡新河上建节制闸 7 座、船闸 6 座,涡浍新河上建节制闸 3 座、船闸 2 座,阜淮新河上建节制闸 4 座、船闸 5 座,浍濉新河上建节制闸 4 座、船闸 2 座,淮濉新河上建船闸 1 座,濉河上建节制闸、船闸(滑船道)各 4 座,颍河上建节制闸、船闸各 3 座,涡河上建节制闸、船闸各 3 座,西淝河上建节制闸、船闸各 1 座,浍河上建节制闸、船闸各 3 座,崇潼河上建节制闸 1 座,濉河上建节制闸 1 座,茨河上建节制闸、船闸各 1 座。

(四)为了引用淮河干流的水源,供淮北灌溉用水,在淮河上修建临淮岗水库和蚌埠节制闸两个大型控制枢纽。临淮岗水库枢纽由拦河土坝、节制闸、引河、船闸和水电站组成,可拦蓄淮河百年一遇的洪水,供给淮北 1150 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使淮河中游全年通航 2000 吨驳船;水电站装机 1 万千瓦,年发电量 5000 万度。蚌埠闸枢纽由节制闸、船闸、水电站、分洪道和公路桥组成,枯水期将淮河水位壅高至 19 米,使淮北 780 万亩农田能自流灌溉;水电站装机 6000 千瓦,年发电量 3000 万度。

(五)淮北湖泊洼地总面积 1720 平方公里,分 3 种情况治理:一是地势较高的地区约 860 平方公里,实行圈圩改种,圩内实施河网化,确保两季丰收。二是最洼的地区,约 360 平方公里,确定为常年蓄水区,发展水产。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地区,约 500 平方公里,作为灌溉、除涝调节蓄水区,可栽芦苇或其他耐水作物。

(六)实现河网化后,拟定发展水稻田 2750 万亩、水浇地 1520 万亩。一般中水年份需灌溉水量 156.5 亿立方米。来水量估算有:当地径流 30 亿立方米,地下水 26.3 亿立方米,河流水 62.6 亿

立方米,可利用的灌溉回归水 7.5 亿立方米。以上合计来水量 126.4 亿立方米,尚缺水约 30 亿立方米,需进一步开发地下水和引汉、引黄、引江来解决。除涝方面,排水模可由河网化前的每平方公里 1.4 立方米每秒,减少到每平方公里 0.3 立方米每秒,从而实现“以蓄为主,尽量少排”的要求,解决除涝问题。

除上述内容外,《规划》对航运、发电、水产和绿化也作了具体规定。《规划》还提出从 1957 年冬至 1959 年 5 月基本实现淮北河网化,1959 年年底要全部完成。

三

省委“水网化、水稻化,把淮北变江南”的水利方针和《淮北水网化的十条规定》一经提出,淮北各县就立即行动起来,纷纷按规定沿着公路挖大沟,沿着大路挖中沟,沿着小路挖小沟,全面开始了河网化工程。

1958 年春至 1960 年春是大干河网化的两年。淮北各地集中力量挖大河,规划的 9 条新河中,除涡浍新河未动工外,8 条新河全部开工。各县自行规划的新河(又称中河网)也陆续开工。由于土方任务太大,完成的土方数量虚报的多而实做的少,大部分新河都挖得深浅不一,宽窄不等,继继续续,未能按规划的断面全线贯通,只有大河网中界洪新河的涡阳段、界南新河的泉南段、符怀新河的怀远段及中河网中的蒙城县蒙怀公路河、濉溪县杨柳运河、怀远县双龙新河等遗留工程较少,能够发挥截水分流、洼地排水的除涝作用和输水灌溉效益。其余新河遗留的土方工程较大,既不能灌也不能排。甚至有的新河在施工时堵塞原有排水沟口,有的新

河打乱水系横穿天然河沟,留下了水害隐患。

阜阳和蚌埠两专区在这一时期都进行了一些标准较高的小河网试点,成为淮北小河网的典型。如濉溪县在卧龙湖挖沟、打塘,建成了淮北第一片小河网,并通过大青沟与浍河沟通,1958年大面积改种水稻获得成功。此外,还有临泉县的单桥乡、宿县的紫芦湖等。总之,凡是建在湖洼地而且有排水出路的,效益都较显著。反之,则事倍功半。如太和县的双浮小河网,由于没有排水出路,虽每平方公里挖土方20万立方米,也只能起到滞蓄涝水的作用。涡阳县的18个重点小河网中,有6处也由于地点选择不当,基本不起作用。许多小河网由于标准高、土方量大,因此采取大兵团作战。如怀远县烟袋湖小河网试点工程,集中了7个公社的2万多民工,挖了1条大沟和8条中沟,做土方300万立方米。还有许多小河网挖了河沟而桥涵配套跟不上,破坏了原有田间交通,给生产带来不便,群众很有意见。

淮河干流上的临淮岗枢纽和蚌埠闸都在1958年开工。经过几年的建设,临淮岗枢纽建筑物基本建成,姜家湖大坝接近完成,邱家湖大坝仅填筑了2~3米,整个工程于1962年4月停建,已建工程未能发挥作用,造成浪费。后于1966年,将深孔节制闸改为城西湖蓄洪区的泄洪闸加以利用;1969年,又将船闸改为城西湖通航使用闸。蚌埠闸枢纽是淮北河网化的重点工程之一,经过紧张施工,建成节制闸和船闸后,于1962年停建。1970年又进行续建,1973年基本完成主体工程,1986年水电站建成发电,发挥了灌溉、航运、发电、公路交通等综合效益。

淮河各支流及大、中新河也兴建了大量涵闸。濉河上兴建了濉溪、符篱集、浍塘沟、八里桥4级节制闸;沱河上兴建了四铺、宿

东、王桥、管龙、沱河 5 级节制闸；颍河上建成阜阳闸和船闸，颍上闸于 1959 年开工后因财力、物力不足而于 1960 年停工，后于 1978 年复工，1981 年建成；涡河上建成蒙城闸和涡阳闸，其中，蒙城闸于 1958 年 2 月动工，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于 7 月建成，由于设计、施工不当，7 月 14 日蓄水后不久即倒塌，后于 1959 年 1 月重建，1960 年 5 月建成；亳县大寺闸于 1958 年 2 月开工，做了部分底部工程，因经费、材料困难而于 1961 年停工，后于 1976 年 11 月复工，1978 年 5 月建成浅孔闸，但遗留深孔闸和船闸未建；浍河上建成南坪、固镇两级控制闸；唐河上建成潘集、余家两级控制闸；濉河上建成胡洼、方店两级控制闸；北沱河上建成余桥、汤桥两级控制闸；其余中、小河流上还兴建了一批节制闸。另外，面上还修建了大量的小型涵闸，但大都工程质量差，设备不配套，难以发挥效益。

从 1959 年开始，我省开始进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淮北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水利建设不得不收缩战线。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在 1960 年水利冬修计划中提出了“以较少劳力，按低标准完成骨干河网，使其发挥效益”和“花钱少、出工少、受益大、当年工程当年受益”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依靠各级水利专业施工队伍，基本完成了已开工的涵闸和抽水站工程；停建了几个尾工较大的节制闸、船闸；而群众施工的河网化工程则基本停了下来。到 1962 年，淮北河网化终因力不能及，在遗留大量尾工的情况下停建了。

1958 年至 1961 年淮北全面实施河网化期间，最高上工人数为：1958 年 380.7 万人，1959 年 309.1 万人，1960 年 156.4 万人，1961 年 55.4 万人。水利统计资料记载：这一期间共治理河道 49

条、1165.4公里,疏浚排水道8条、543公里,开挖排水大沟56条、663公里,增加蓄水库28座、蓄水量6772万立方米,增加机电排灌站87座、装机18489千瓦,圈圩27处、面积19.8万亩,建涵闸553座,其中流量1000立方米每秒的水闸5座、100~1000立方米每秒的水闸45座。1962年与1957年相比较,河、沟、库、塘总蓄水量增加59675万立方米。另据1962年12月省水电厅《淮北河网化调查研究总结》所作的调查分析,共挖河网1.8万公里,做土方7.18亿立方米,其中大、中河道网2966公里,做土方1.85亿立方米;基建土方2.9亿立方米。国家用于河网化工程的投资共达2.28亿元。

四

河网化的实施正值“大跃进”时期,由于工程规模过大、标准过高、急于求成,因而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一是规划设计粗糙。许多工程都是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有的甚至未经规划、设计就盲目施工,完全违背了基本建设的管理程序,由此造成规划设计多变,工程施工返工多、质量差、浪费大等现象。二是在工程计划上片面追求土方数量,不断地提出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1958年阜阳、蚌埠两专区在制订冬修计划时,都是按每工日挖土方20立方米来安排任务的。这样,过多地调用农村劳力,工期拖得很长,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还导致虚报浮夸风盛行。

淮北河网化虽未取得成功,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一是平原地区水利综合治理要尊重客观规律,首先要提高防御一般洪水的能力,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以及工农业生产的正常活动

得到安全保障,然后就要建立和完善河、沟排水系统,使出现频繁、为害深重的涝灾得以缓解。在有了一定的排水基础后,就要相应地发展旱作物灌溉,解决旱的问题。二是对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科学区划,分类指导,在贯彻综合治理的原则下,治理方针和措施、实施方法和步骤,都应当切合当地的实际而不强求一律。三是要讲究质量,注重效益,稳步发展。

新民歌运动

刘延年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是包含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的全面跃进运动。在文化跃进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新民歌运动，又称全民写诗运动。

新民歌运动是当时全国“大跃进”形势下的产物，同时又是与毛泽东的亲自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在195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的人员说：印了一些诗（指会议期间印发的一些古诗），尽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各位同志负点责，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阶层的人，青年、小孩子都有很多民歌，搞几个试点办，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10天搜集。毛泽东还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第三个东西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成千万首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动，比看李、杜的诗舒服一些。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指出：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

4月8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收集和编选民歌的通知，对民歌

的收集范围作了规定，即“一、解放以前的民歌；二、解放以来的民歌；三、在当前工农业生产的跃进中的新民歌。由于时间关系，目前可着重收集生产跃进以来的民歌。”

从此，像全国一样，一个大规模群众性的诗歌收集和创作运动在安徽开展起来。

—

省委通知发出后，各地、市、县委十分重视，立即组织基层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发动群众收集和创作民歌。到5月份，全省已经逐渐形成新民歌创作的高潮。各地干部在布置生产任务和进行形势宣传时，也与新民歌的创作结合起来，把各项工作编成诗歌，对群众进行宣传；同时，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创作。安徽诗歌之乡巢县司集乡的干部在一次会议上即创作了30多首诗歌。到5月底，全省已收集民歌2万多首，由安徽省群众艺术馆负责编选并出版《大跃进民歌》。地方各级党委也把在采风中收集来的民歌进行遍选并出版。

安徽的新民歌是与当时全省“大跃进”运动的内容和进程紧密相连的，它的内容包括歌唱全省水利化和淮北河网化、除“四害”、总路线、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办教育、技术革命、新生活新风俗等各个方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安徽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要求全省组织宣传。短短10天之内，全省即出动400多万人的宣传大军。在宣传过程中，各地都通过新民歌来宣传总路线。

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街道到田间地头、从报纸广播到板壁墙头，到处都是宣传总路线的诗歌谣曲。为了配合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安徽日报》于6月5日发出《征集反映总路线新民歌的启事》，要求各地提供帮助和支持，不论是群众创作的或唱的、编的，凡是歌唱总路线、歌唱群众革命干劲、反映“大跃进”形势、歌唱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都可以寄来。

7月5日，省委又发出《关于继续收集民歌和收集革命英雄故事传说的通知》，对革命英雄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收集作了专门的规定。

在新民歌运动中，全省各地还开展了墙头诗和社会主义歌唱运动。一些优秀的民歌一经写上墙头，立即百里争传，万口传唱。8月初，全国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现场会议在安徽省诗歌之乡巢县司集乡召开。前来参观的有中央文化部和豫、鄂、赣、苏四省文化局的负责人，也有贺绿汀、吕骥等全国知名的音乐家。现场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但看到了这个乡在百天大旱后放出的中稻田产3.4万斤的大“卫星”，而且还感受到这个“人人是歌手，个个是诗人，诗画满墙头，歌声遍山野”的文化卫星之乡“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纷纷发表文章，畅谈在司集乡“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据全省38个县和3个市的不完全统计，到9月份，已创作民歌近2400万首，其中阜阳一个县就创作近350万首。省群众艺术馆编辑的民歌选也已出版了7集。各地在大规模收集民歌的同时，也编选了大量的民歌选本，如《广德民间诗歌选》、《临泉民歌选》等，仅阜阳、肥东两县就编辑了3955集。各地群众不但写诗、唱歌，而且还创作了电影、剧本、舞台剧等作品。

9月19日,《安徽日报》发表社论《开一代诗风的新民歌》,指出:我省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和生产“大跃进”一样,正以汹涌澎湃的威势,奔腾前进。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新民歌将要革新一代诗风的历史使命。这些民歌是劳动群众的劳动和斗争的直接反映,是鼓舞干劲促进生产的战鼓,是进行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群众对自己的美好生活、远大理想和新道德面貌的赞颂。这些民歌已经使我们呼吸到未来共产主义文艺的芬芳,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诗歌的宽广道路。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是当前文化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地文化艺术部门必须认真地领导这一创作运动。社论号召各地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做到“全民写诗,全民采诗”,全体文艺工作者都要参加这一运动,出版社也要跟上。社论预言:“群众性的诗歌创作运动,将会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且将不限于诗歌的创作;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优秀的民间诗歌和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群众中的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将会成批的涌现;我们的文艺园地,将会万紫千红,大放异彩。”

到12月份,全省的新民歌创作已达3亿多首。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这些民歌作品,绝大多数都是顺口溜,等于分行排列的口语,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针对这种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于12月13日在《安徽日报》发表《进一步发展新民歌运动》的文章,对民歌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体裁以及民歌创作的形式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二

如前所述,安徽的新民歌创作,从它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包括

了当时“大跃进”的各个方面，并与整个“大跃进”的进程紧密相连，以“艺术”的方式反映了安徽“大跃进”的面貌。

早在 1957 年冬和 1958 年春季的大办农田水利、积肥和除“四害”运动中，群众就开始了新民歌的创作。此时的新民歌基本上还是民间自发的创作，群众用它来歌颂新的劳动和生活，鼓舞自己的干劲和热情：

淮北平原好风光

淮北平原好风光，水利大军兴修忙。

日头落山是平地，月亮上山成沟塘。

打麻雀

到处撒下天罗地网，向敌人展开了全面围剿，

不怕麻雀飞得高，上天追它到九重云霄。

人人心向高级社

千条河水向海洋，葵花朵朵向太阳，

人人心向高级社，家家户户喜洋洋。

4 月以后，随着省委关于收集和编选新民歌通知的发出，安徽的新民歌运动正式开始，反映“大跃进”运动的作品开始在全省各地的报刊上大量出现。《安徽日报》于 4 月 17 日开辟《歌唱大跃进》专栏，刊登各地创作的新民歌作品。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新民歌的内容主要包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全省水利化和淮北河网化、教育革命、大办文化、移风易俗和农村风光等各个方面，例如：

人人爱唱跃进歌

人人爱唱跃进歌，千人唱来万人和，
歌唱农村气象新，歌唱农村喜事多。

神农吓一跳

栽秧山歌喊得高，冲破白云上九霄。
立夏早秧栽完了，要叫神农吓一跳。

四月忙

四月雨后天乍晴，家家没有看门人。
三岁小孩把牛放，八十公公忙春耕。

淮北平原好风光

淮北平原好风光，大地天天在变样，
向着江南大跃进，灾区变成鱼米乡。

如今妇女称英雄

从前妇女守闺门，如今妇女称英雄，
积肥除草般般会，抛秧撒种件件能。

文化革命大展开

文化革命大展开，文盲帽子再不戴，
能文能武好社员，群众智慧能填海。

到了6月份，随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宣传总路线一时间又成为

全省的中心工作。安徽新民歌的创作也加进了歌唱总路线的内容,成为农村宣传总路线的重要工具。总路线“像太阳”、“是明珠”、“是灯塔”、“唱歌要唱总路线”的歌声响彻江淮大地,人们开口闭口都是总路线:

干劲能移山

雨过松柏格外青,月到十五分外明。
建设有了总路线,万盏明灯照前程。

文化好比千里马

文化好比千里马,跃进就要骑上它,
建设工地作课堂,工人立志当专家。

六亿人民办工业

天上星星数不尽,地下工厂数不清。
六亿人民办工业,工厂赛过天上星。

新教育方针颂

上课是学生,下课当工人。
学习又劳动,能文又能武。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手脑并用,全面发展,
光文不武,不值一钱,
光武不文,提高很难,
文武全才,又红又专。

在有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群众的民歌创作也很丰富，他们还把那首历史上有名的民歌谱上了新词：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如今变了样。

过去十年九年荒，如今粮食堆满仓。

过去荒年卖儿女，如今家家卖余粮。

过去流浪在他乡，如今生活过得强。

繁昌县横山镇一位 82 岁的老奶奶参加总路线宣传队，化上装，挑着花篮，在街上自编自唱：

我今年龄八十多，自小没有唱过歌；

今天宣传总路线，也要唱他几稻箩。

随着安徽农业高产“卫星”的普遍升天，新民歌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就是以极其夸张的文字反映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农业战线上放“卫星”的情况：

三万六、四万三

三万六、四万三，颗颗卫星上了天，

敲开顽固脑，砸碎铁算盘，

胜似百花齐争艳，奇迹在人间。

稻堆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1958年夏季，全省范围内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大旱，全省人民投入抗旱斗争之中，其间出现了大量的抗旱民歌，非常著名的有：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千万蛟龙接上天

千万蛟龙接上天，牛郎织女笑开颜，
如今车千天河水，不等七夕就团圆。

到了8月以后，全省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作品也多了起来：

十唱人民公社

一唱人民公社好，光明幸福路一条，
跟着人民公社走，共产主义早来到……

一寸光阴一寸钢

一寸光阴一寸钢，追星赶月日夜忙，
土洋并举炼钢铁，赶得英国直喊娘。

各地群众在新民歌创作中，还创作了新壁画、新诗画的艺术形式，把诗与画结合起来，增强宣传效果。阜阳县王人乡的新诗画创作在全省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幅《四大金刚拔萝卜》的诗画，画的是4个神仙憋足了劲儿来拔一棵大萝卜，拔了半年，才拔出萝卜背儿：

一个萝卜不算大，四大金刚把它拔，
拔来拔去拔不动，一年才拔大半拉。

在安徽的新民歌运动中，还有一支歌唱队伍颇为引人注目，这

就是安徽省文艺工作团组成的“大跃进山歌联唱”团。1958年夏天,安徽省遇到罕见的大旱天气,“大跃进山歌联唱”团的演员们就到田间地头进行演出,他们演唱的节目由6首歌曲组成,以富有诗意的“唱得长江水倒流”为序曲,然后引出4首表达和歌唱“大跃进”、歌唱美好生活的民歌,最后以“唱红旗”结束。“大跃进山歌联唱”团的演出不需要特定的舞台,也不组成整齐的队伍,也没有指挥,只需要简单布置一个以农村为背景的场景就行了:两边是山坡,演员站在台上就如同站在田野中一样,有的站立,有的坐卧,十分自然,又富于生活气息,深得群众的欢迎。此外,还有省艺术专科学校的民乐合奏“早稻卫星上了天”、芜湖专区的“抗旱联唱”、安庆专区的“歌唱人民公社”、蚌埠市的“十对花”、芜湖市的“誓把芜湖建成钢铁城”等诗歌表达形式。

安徽省的新民歌创作,主要集中在1958年到1959年的“大跃进”高潮中。1960年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困难局面的出现,特别是农村严重困难的出现,新民歌的创作也就渐入低潮,波澜不兴了。

三

作为“大跃进”特定时代产物的新民歌运动——全民写诗运动,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年,人民群众第一次走上文艺创作的舞台,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人。新民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安徽人民的精神面貌。人们用民歌来抒发自己劳动和创造的热情,歌颂自己新的生活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新民歌运动是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发动起来的,是文化领域“大跃进”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它也必然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影响和印痕。认真总结安徽新民歌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搞好和繁荣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新民歌运动是在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特定形势下发动起来的,新民歌运动紧紧地跟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以十分形象生动的方式深入传达到群众中去,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起到了强烈的宣传效果。新民歌的内容就是“大跃进”的内容,它从政治、经济到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忠实地贯彻和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成为鼓舞人民群众生产和斗争的号角和战鼓。“做什么,唱什么;做什么,编什么”。就像一首民歌中唱的:“唱罢土改唱合作,如今唱的跃进歌”,新民歌就是宣传之歌、“大跃进”之歌。

其次,新民歌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安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劳动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政治上翻了身,随着“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他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此,安徽人民的精神面貌在共和国初期的50年代是积极、乐观、向上的。新民歌的许多作品都鲜明形象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美好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美好前景的向往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人民群众通过它来歌颂党和毛泽东,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通过新民歌,人民群众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人人爱唱跃进歌,千人唱来万人和”,“跃进红花心里开,张口花香喷出来;山南海北齐歌唱,唱出一个春天开”。这是当时很有名的民歌,明朗、乐观、朴素、健康,反映出了不同于传统民歌、也不同于文人作品的另外一番风貌,这才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歌、自己的心声。同

时,新的时代和生活也使翻身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焕发出一种改天换地的热情,激发起他们向大自然进军的自豪感,“谁说凡人难上天,咱们力量大无边。如今天地都归社,管天管地管神仙。”与当时闻名全国的那首《我来了》一样,这首诗也反映了安徽人民的这种豪情。

第三,作为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新民歌运动成为广大农村的文化普及运动。通过新民歌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知识,扩大了他们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建国初期,由于教育尚未普及,广大农民群众大多是不识字的文盲,懂得的文化知识很少,虽然进行了扫盲运动,但“回生复盲”的现象还很严重。通过新民歌的创作,农民学到的文化知识得到实际的运用,从而巩固了他们学到的知识。

第四,新民歌运动促进了建国前安徽民歌的收集和整理。安徽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包括《说凤阳、道凤阳》在内的许多著名民歌,这些民歌在历史上由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收集,大多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通过这次收集活动,许多优秀的民歌得到了收集和整理,如在安徽省文化局编的《安徽民歌选集》中就收集了建国以前的民歌共68首,其中还包括捻军歌谣等珍贵的作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时期,安徽大别山区等革命根据地也产生过很多红色歌谣,通过收集整理,这些革命歌谣被编辑成《革命歌谣选集》出版。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歌谣也得到了及时的收集。

但是,作为全民“大跃进”运动的产物,新民歌运动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从主观意志出发,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提倡和推动文艺创作活动,违反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作为一种通俗的民间文艺形式,

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民歌作品,但那已经是经过长期的流传、磨练,确实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而其中大量的作品却被历史淘汰了。新民歌运动的初衷,是要为新诗的发展寻找一条道路,就是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的新诗来。由于领袖的提倡和推动,一时间各地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民歌收集和创作运动。新民歌创作不仅成为文艺工作者的中心工作,也成了全国人民乃至全党的一件大事。“人人是歌手,个个是诗人”、“诗画满墙,歌声遍野”、“李白杜甫也寻常,作家诗人田头见”,这曾是多么壮观的景象!然而,“大跃进”时期创作的作品,大部分只能算作概念化的宣传口号、顺口溜,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何况许多编辑出版的作品都经过文化工作者的修饰,已失去民歌的原生意味。五谷不熟,不如莠稗。新民歌运动开始一年后,毛泽东就对周扬等人编的《红旗歌谣》表示不满,认为“水份太多”,并对周扬说:“还是旧的民歌好。”从安徽新民歌运动的创作来看,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在“大跃进”运动中,新民歌曾被看作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特别是其中大胆的想法、极度的夸张,成为新民歌的主要标志、主要创作和表现手法。然而,其实质是以当时所能理解的共产主义世界为理想、以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内容,充满了浓厚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色彩,带有严重的“浮夸”作风,与工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同声同气,殊途同归。新民歌的浪漫主义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浪漫主义,它的现实主义也只能是反映“大跃进”严重浮夸作风的现实主义。“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一个萝卜不算大,四大金刚来拔它”,真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太现实了,不能写诗”;然而太浪漫了,

一味“浮夸”，也不是诗。当时巢湖有一首《端起巢湖当水瓢》的民歌，连新民歌运动的提倡者毛泽东看了都感到太夸张了，很不满意。新民歌中的大量作品是反映农业“大丰收”、放“卫星”的，而一年后安徽农村就不是什么“一棒玉米万斤重”、“每亩都收万担粮”（凤阳民歌），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能够写出什么好的“浪漫”作品呢？

第三，新民歌实际上都是政治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1957年冬即开始出现的新民歌，首先是作为兴修水利的宣传品出现的。用新民歌歌颂和推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鼓舞人民群众劳动和创造的热情，成为“大跃进”运动中我国文化战线上的最耀眼的景观。新民歌就是概念化的宣传诗、鼓动诗、标语诗、口号诗，它成了宣传鼓动“大跃进”运动的工具。有一首《想娘》的民歌这样写道：“久不见娘心想娘，回家见娘也平常。睡到半夜心发急，明天社里要挑塘。”本来是朴素真挚的人间亲情，却因硬加进了“时事”内容而搞得不伦不类。还有一首民歌写一对新婚夫妻晚上睡不好觉，商讨队里生产的事儿，第二天天一亮就起身上工去了。“老歌唱的小郎哥，新歌唱的跃进歌”，离开了“大跃进”的具体内容和政治色彩，新民歌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也正因此，新民歌也随着“大跃进”运动的一霎起落而兴灭。

一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新民歌运动——全民写诗运动，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它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像经济建设一样，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尊重它本身的规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地把工作做好。

教育“大跃进”

陶有浩

建国初期,安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虽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教育基础仍然薄弱,没有大的改观。到1957年,全省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国同级学校在校学生数的比重还比较小,高等学校为1.96%、中等师范学校为7.39%、普通高中为2.53%、初中为2.41%、小学为4.38%。以安徽人口约占全国5%的比例衡量,除中师、小学超过或接近5%外,其余均明显偏少,有些比重数额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属倒数前几名。这就要求安徽教育战线加大发展力度,扩大规模,与社会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满足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对建设和管理人才的需求,更好地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

1958年3月,国家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大跃进”的口号。4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批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某些忽视政治、脱离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八九月间联合制发《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两个文件。作为教育“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两个文件对教育的体制、方针政策、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等作了规定。

1958年5月至8月,中共安徽省委连续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作出《关于发展我省教育事业的决议(草案)》、《关于加强党对学校领导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的决议(草案)》3个文件,对安徽的教育“大跃进”作出全面部署。

这样,从1958年春城乡组织1007万人入学扫除文盲开始,安徽教育方面的“大跃进”逐步发展,并于当年下半年进入高潮。

一、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

安徽教育“大跃进”首先突出表现在各级各类教育规模的迅猛发展上。在历时3年的“大跃进”历程中,出现了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在1958年下半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省委文件的精神,全党全民大办教育,各级各类教育超常发展,办学规模向前跨了一大步。1959年执行巩固提高、适当发展的方针,在上一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分别按照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任务和条件,该整顿的着重整顿巩固,该发展的继续发展,有退有进。高等教育着眼于扩大本科培养规模,适当增设本科院校;中等技术教育鉴于很多新建学校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着重进行整顿,压缩规模;中师教育主要是稳定布局,扩大招生;中学教育继续发展;小学教育适当调整设置过密的校点,改善办学条件;幼儿教育大力调减,对上年园点五去其三。

1960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口号下,安徽出现了大办教育的第二个高潮。这一阶段的奋斗目标是:“积极发展数量,争取在二三年内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千方百计提高质量,力争全国第一。”要求全日制学校的工作安排,应该是一主两辅三结合,即以教学为主,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为辅;以教学为中心,把教学、

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者结合起来。省委、省人委连续召开全省中、小学跃进大会和全省文教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推动运动的发展。当年,全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达到的规模是:(一)全日制学校计 43423 所、学生 456 万人、专任教师 14.6 万人,与“大跃进”运动前夕的 1957 年比较,分别增长 98%、46%和 70.1%。其中高等学校达到 44 所、学生 23048 人、专任教师 3936 人,分别增长 78%、167%和 200%;中等专业学校达到 300 所、学生 13.5 万人、专任教师 7289 人,分别增长 285%、276%和 238%;普通中学达到 644 所、学生 35.7 万人,专任教师 14550 人,分别增长 189%、134%和 142%;小学 22191 所、学生 319 万人、专任教师 9.2 万人,分别增长 5%、13%和 23%;幼儿园 2 万所、入园幼儿 84.6 万人、专任教师 2.8 万人,分别增长 42 倍、30.5 倍和 26.4 倍。(二)半耕半读学校有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两类,计 556 所,均属“大跃进”运动中所建,在校学生 42820 人、专任教师 1649 人。(三)业余教育由于遭受三年严重困难的影响而严重萎缩,入学人数由前两年的 1142 万人和 827 万人骤减至 540 万人,其中接受高中教育的 6562 人、接受初中教育的 48 万人、接受高小教育的 487 万人。扫盲和大学层次教育全告停顿。

经过 3 年大发展,安徽教育事业原本落后的状况初见改观,高等教育的进步尤较明显。1960 年,全省高校学生数占全国高校学生数的比重,已由 1957 年的 1.96% 上升至 2.4%;全省每个地区都有 1 所师范专科学校,大部分地区设有农业专科学校,有的市设有工业专科学校和医学专科学校。省会合肥设有工、农、医、师、财经、体育、艺术各类本、专科院校计 19 所,它们是: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交通学院、安徽机械学院、安徽纺织工业学院、安徽

建筑工业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农业专科学校、安徽水产专科学校、安徽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安徽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合肥医学专科学校、合肥师范学院、安徽教育学院、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安徽财贸学院、安徽体育学院、安徽艺术学院，在校学生计 15953 人。全省 43% 的高等学校、69.2% 的在校大学生集中在合肥。合肥已经成为安徽省的文化教育中心。

然而，在教育事业“大跃进”的过程中，由于盲目发展，只求数量增加，不顾实际可能，带来了师资、经费、校舍、设备等种种困难，超越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违反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使教育事业不能巩固，教育质量难以达到应有的水准。如普通高校教师队伍，1957 年全省为 1310 人，其中正、副教授和讲师占 32%，差不多每 3 个人中就有一位教授或讲师。至 1960 年，全省教师数增至 3936 人，其中正、副教授和讲师占的比重降至 13.6%，即每 7 个多人中才有一位教授或讲师。师资队伍的文化业务水平急剧下降。中等技术学校的问题更为突出。1958 年各地采用“戴帽子”、“换牌子”、建新校等办法，一年时间学校猛增至 343 所，为上一年 13.7 倍。由于仓促上马，师资、经费、设备都很缺乏，有的学校没有房子，只好借用其他单位的厂房、仓库，甚至租用旅馆房间办学。第二年大批学校又纷纷下马，一年内就撤掉一多半，造成很大的浪费。全省教育事业经费支出，从 1958 年到 1960 年，3 年间分别为 9465.1 万元、11212.7 万元、13857.7 万元，比 1957 年的 8120 万元分别增长 16.57%、38.19% 和 70.66%；教育投入和支出分别占当年省财政收入的 11.98%、10.06%、10.76% 和 8.75%、7.77%、7.95%。财政投入对教育事业虽有所倾斜，但这种百分之十几、几十的增长幅度仍远远滞后于教育事业的成倍增

长。学校经费不足、收不敷出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困扰办学的难中之难。但是,这一时期所实行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依靠群众兴办学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几个“并举”的办法和经验,对于解放思想、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在教育“大跃进”中兴办的学校,有些坚持了下来,越办越好。如1958年创办的安徽大学,后来成为安徽高等教育的重镇,1978年被定为省重点高校,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全国百所“211”工程项目学校行列。

二、教学改革全面开展

为了切实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力争尽快达到国家先进水平,安徽各级学校在党委领导下采取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开展了群众性的教育改革。

一是改革学制。高等学校着眼于教学、科研、劳动统筹发展,其学习年限,本科一般为5年,前4年学完各门课程,最后一年进行科学研究或集体下放劳动;专科一般为3年。普通中小学侧重缩短学制,推进普及,自1958年开始进行多种项目的学制改革试验:(一)中小学七年一贯制,合肥市有6所中学进行试验。(二)中小学八年一贯制,合肥市、砀山县有8所学校进行试验。(三)中学四年一贯制,芜湖、安庆、阜阳等地区在个别学校中进行试验。(四)中学五年一贯制,芜湖市在1所学校试验。(五)高中二年制普通科,在芜湖市四中1个班试行。(六)高中二年制文理分科,屯溪高中、淮南一中在高中一年级开始试验。(七)高中三年制文理分科,合肥一中、淮南一中、屯溪高中等校进行试验。

从试验的初步情况看,适当缩短学习年限,在改革教材教法和提高师资水平的条件下,是完全可能的。但如学制过短、时间过紧,又会造成教学时间过度紧张、削弱基础知识或加快教学进度,难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情况。为此,从1959年秋季起,全省缩小了学制改革试验面,最后仅在桐城中学、淮南一中、芜湖一中、六安中学4所完全中学进行“五年一贯制”试验;在蚌埠六中、潭渡初中两所初级中学进行“三、二分阶段制”试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革学制的试验全部停止。

二是生产劳动“入课”。各级全日制学校都把生产劳动列入正式课程。高等学校按照8:3:1安排全年教学、生产劳动和休假的时间(即全年教学8个月、生产劳动3个月、休假1个月)。1958年10月,刘少奇视察合肥工业大学时,肯定了这样的时间安排,他说:“你们学校现在应该以读书为主,一部分时间劳动。现在大学还没有普及,还不多,现在大学以读书为主,不要降低质量。生产劳动如果妨碍教学质量,可以减少劳动。”高校学生的劳动,以结合专业生产为主,采取集体劳动、分散劳动、分月劳动等方式进行。中生产劳动课,每周12小时。小学叫手工劳动课,一至四年级每周1课时。省教育厅要求生产劳动课的教学要在实际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把工厂、农场作课堂进行教学”,既要学生产知识,又要学生产技能,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师范学校自1958年秋季起,将原设的“生产知识”课和生产劳动实践合并起来,统称“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全年劳动时间大体为6~8个月,学校废除学期制,改行“学段制”,每学年分为3个学段,各个学段的起讫日期,根据当地农事情况确定,各学段的时间长短不尽相同。

三是加强马列主义政治课教学。高等学校结合革命实践,把马列主义的政治课教学放在首位,每周由4小时增至8小时。安徽师范学院中文、历史等系开设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文系并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新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当代文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现代作家与作品等课程;历史系也增开了毛泽东著作研究、资产阶级学术批判等课程,帮助学生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学各年级已于1957年春恢复设置政治课,以合作化问题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1958年秋改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学生,每周课堂教学、课外讨论各2课时。1959年4月起,中学政治课分为形势任务课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课两部分。形势任务课的内容,以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中心;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课包括革命故事、社会发展简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常识、哲学常识5门课程,原则上每学年开1门。小学从1957年起,各年级每周安排周会课1节,用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为了加强政治课教师队伍的建设,省委宣传部举办了全省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人员讲习会,地、市、县委党校分别对中小学政治教师进行轮训,有效地提高了各级学校政治课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1959年4月,省委宣传部下发了《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政治课的初步意见》,就统一和推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措施,要求学校党委直接抓政治理论教育,并有一名书记分管;“形势任务”课主要由学校党组织负责人讲授,其他政治课应配备专职教师。这个《初步意见》经中共中央宣传部认可,批转全国参考执行。

四是改进专业课教学。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对专业课

教学的改革都很重视,进展较为显著。总的趋势是:由理论与实际脱节转向理论与实际结合,由注入式教学转向启发式,由传统教学手段转向现代教学手段。专业教学计划一般由系科自行制定,教材由师生自行组编。合肥工业大学采矿系、矿建系还将其拟定的所属专业教学计划初步方案提交给在淮南、淮北煤矿现场参加生产劳动的师生讨论,以更好地解决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如何为生产服务,专业课如何紧密结合生产等问题。安徽师范学院调整课程设置,改植物学为经济植物学,着重讲解工业植物、食用植物、药用植物、森林植物等知识;把农业基础知识课改为植物栽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家畜饲养4门课(课时由120小时增至500小时);中文、历史、艺术等科还注重传授本地区劳动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生活,增加安徽地方史、安徽地理、民间文学、黄梅戏等教学内容,使理论与生产实际、社会实际的结合更加密切。安徽医学院在坚持不削弱基础课的前提下,把基础课中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胶体化学、物理化学5科合并为基础化学,系统内科与临床内科合并,系统外科与临床外科合并,以减少内容重复。现场教学被普遍采用,经过精心组织,都能收到良好效果。合肥工业大学采煤班学生在淮南新庄孜煤矿考察中,创造了“发讲义、互教互学、教师答疑”的教学方法,结合现场生产实际,对学生设计的《第二水平水力采煤方案》进行了讨论研究和补充修改,当即被矿上采纳实施,直接支援了经济建设。由于这种教学方法实行了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三结合,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就较为丰富、深刻。

在这次教学改革运动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事情超过了应有的尺度,造成不良后果。由于简单地提倡“教育也要大搞群众运动”,有些高等学校随意调整专业设

置、教学计划,大搞“单科独进”,大砍大并基础课程,严重削弱了基础理论的教学。在发动师生自编教材的过程中,由于不恰当地批判教学工作中“厚古薄今”的倾向,教材内容中古代部分的比重被大量压缩。如讲历史以现代部分为重点,甚至先从近代部分讲起,最后讲古代。建立所谓新的“讲授体系”,打乱了教材的科学体系。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面,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现场教学,忽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大办民兵师、大办粮食等政治运动过于频繁,致使学校的教学秩序难以稳定下来,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而在教育教学中采取评比、竞赛等方式,提出一些过高的指标,也造成一个时期内学校师生为单纯应付考试而集中突击学习,违反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影响了教育质量稳步的全面的提高。

三、校办工厂普遍兴起

教育“大跃进”开始后,安徽各级学校在勤工俭学的基础上,进入了大办工厂、农场的新阶段。1958年上半年,全省大、中学校已办起工厂843个、农场125个。小学兴办的小工厂、小农场也很多。在勤工俭学阶段初期,有些学校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侧重于组织服务性劳动,未能完全切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针的要求。针对这一情况,省委提出“三为主”(即以工农业生产为主、以校内为主、以集体为主)原则,并就校办工厂、农场有关事项作出具体部署:(一)把握重点。要求各地结合学校的性质和专业的特点,有重点地举办一些较大的有特色的工厂、农场,其生产水平应争取超过当地工厂、农场的水平。(二)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学校经费结合生产积累,较大工厂所需资金,可由银行贷款或政府投入。(三)生产设备。本着由土到洋、土洋结合的原则,除本校自行设法解决

外,还可以在校际之间开展互助协作,或争取工业部门、有关工厂给予支援。(四)劳动时间。大学、公办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试行全年学习9个月、劳动2个月、休息1个月;或学习8个月、劳动3个月、休息1个月。每周具体安排4~8小时,其余可利用假期进行劳动。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劳动时间应多于普通中学。青年教师劳动时间应与学生相同;年老或体弱的教师,可采取自报公议,减少劳动时间;女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个别照顾。(五)劳动收益分配。本着共产主义精神,分为公共积累、福利金、奖金3部分,以公共积累为主。(六)加强领导。各级党委应把校办工厂列入地方规划,由各级计委统一解决供、产、销问题。学校可根据需要建立生产机构,管理生产工作。

1958年9月,省委在蚌埠召开中等学校现场会,总结交流学校大办工厂、农场,改革教学,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会议期间,省教育厅还在蚌埠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会。现场会推动了全省校办工厂、农场的巩固和发展。蚌埠三中办有一座拥有教学仪器、电机、铸造等12个车间的工厂,开辟有30亩地的农场。学生参加劳动,创造出可观的财富。学校实行吃饭不要钱,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1958年10月17日,刘少奇视察该校时,对学校的做法表示满意,并说:“蚌埠三中搞吃饭不要钱是可以的,国家的经费还要照发。”太和县旧县小学建有小农场,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学农作物栽培、家禽家畜饲养的初步知识和管理技能,开展小型农业科学实验研究,很有特色。学校试种的“金皇后”玉米,亩产超过800斤。当地区党委多次在学校召开现场会,推广技术,并由学校农技组学生作人工授粉示范。学校还为周围农民提供小麦、大豆等多种优良品种和西德长毛兔及白罗克、罗丝鸡良种蛋。

学校于 1960 年出席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并获奖。

四、科学研究初见成效

教育“大跃进”期间,全日制学校的工作安排实行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科学研究受到一定的重视。各高等学校认真贯彻科学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全面安排科研活动。有些学校并建立专门机构(合肥工业大学成立科学工作委员会、安徽医学院设立科学研究处、安徽农学院设置科学研究工作组、安徽大学建立教学科学部),以加强对科学工作的领导。广大科学工作者积极响应向文化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成果。全省 5 所老高校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和试制新产品共达 3606 项。有些项目价值较大,水平较高。如安徽医学院试验中药藜芦提纯获得成功,并制成心纤维颤动电疗机、心脑血管造型快速换片机,获得国家卫生部医学卫生技术革命先锋集体奖;合肥工业大学试验成功吹氧炼钢法、玄武岩铸件,制成 1050 千瓦电动机,在稀有金属的提炼和半导体硅、锗等提纯工作上也都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安徽农学院制造出霜冻报警器和茶叶连续杀青机。1960 年 2 月 23 日上午,邓小平参观合肥工业大学科研成果展览,他就大型管柱法在矿区的推广应用满意地说:“现在城市建筑地下工程用这种方法,你们把它用在矿上,这很好。”对一次爆破成井法,他赞许说:“这快得很,是一种好的爆破方法。”参观结束后,邓小平又说:“不错,你们搞了不少东西。”

在那个年代里,安徽高校科研人员能够拿下成千个项目,这是他们充分发挥锲而不舍、紧咬不放、顽强奋斗的精神拼出来的。当时安徽教育战线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发展数量,争取在二三年内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千方百计提高质量,力争全国第一。”各高等学校

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把大学的牌子挂出去,把学生招进来,把课开起来。在对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项任务的安排上,科研任务靠后一些。在经费缺、设备差、工作秩序不安定的情况下,安徽高校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一时期的科研活动中,由于师生参加劳动过多,一些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被排斥在外,再加上工作中存在的浮夸现象,给科研计划的落实和完成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中学教育脱颖而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徽中学教育事业不仅规模甚小,而且质量偏低,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录取率处于较低的水平。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 10 年的努力,安徽中学教育迎着困难前进,取得了很大进步。1959 年,全省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占全国高中在校学生总数的比重比 10 年前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缩小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取得了全国第二的好成绩,标志着安徽中学教育质量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新华社致电中共安徽省委,认为安徽“在教育大革命大发展中,教育质量是不仅没有降低,而是提高了”,要求认真进行总结。为此,在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领导下,省教育厅于 1959 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间,连续召开全省中学校长会议和中学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5 个学科的教学现场会,对安徽中学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进行总结,认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经验是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积极大胆培养新生力量,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各科教学抓住了教学过程中的 3 个环节:一是加强备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二是加强基本训练,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三是加强课外

辅导,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精讲、多练、勤辅导”。

安徽中学教育这一成绩的取得,从领导、决策方面看,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教育,常抓不懈。建国初期,面对安徽教育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要建设安徽,必须发展教育,“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工厂,不抓过来不对”,“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是要抓教育后代的问题”。省委在谨慎稳步地接管改造旧有教育事业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1952年,组织全省中等学校教职员集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动员,省委宣传部正、副部长桂林栖、陆学斌直接领导掌握,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和风细雨、正面教育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教师队伍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1953年,省政府下发《关于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明确提出“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解决了多头领导和学校师生社会活动负担过重的问题。1954年,省委发出《关于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指示》,强调“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学校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和加强学校中党的工作”。1953年秋,遵照教育部《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的意见》,省委、省政府确定合肥一中、蚌埠一中等10所中学为省属首批重点中学。其后,省属重点中学又于1958年7月和1959年6月相继调整为16所和22所。与此同时,各专、市、县也在所属学校中确定了一批重点办好的中学,从而在全省范围形成了一个“抓重点、带一般”,全面推进中学教育的管理网络。1958年,省委在外汇储备极其微少的情况下,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录音机,分配给中学开展电化教学。1959年,省委又及时研究解决了

重点中学中农村学生的口粮供应问题,并带动地、市、县委给所属学校解决了有关问题,从而稳定了各级重点中学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由于省委、省人委常抓不懈,地、市、县党和政府领导紧步后尘,上下齐努力,全省中学教育的稳步提高就有了扎实的基础。10年耕耘,终于使安徽高考成绩得以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但是,有些地方和学校也有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教学赶进度,搞题海战术,造成学生负担过重,不利于教育质量的切实提高。

六、党切实加强对学校的领导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放松;是实现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为了加强党对各类教育的领导,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各级党委普遍重视抓紧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促进学校的党建工作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实施党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既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也有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因此,在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学生中普遍开展了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通过辩论,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中等学校学生中间,也有领导地组织一些有关教育方针的辩论活动,以提高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各级学校在努力改革政治课教学的同时,对学生普遍进行“三面红旗”的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大炼钢铁等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观点。

(二)加强学校中党员干部的配备,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发展党

的组织

党员干部的来源主要由各级党委统一安排,抽调党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同时根据“德才”标准,从党员教师和干部中择优选拔。由学校抽出参加肃反、审干、整风工作的人员,在工作结束后,要一律回到学校。派进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大都是从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挑选的。各高等学校先后建立、充实了党委会,系主任大都是共产党员,教研室主任一般由党员或左派教师担任。全日制中学都配备了党员校长,大部分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小学配有党员校长的占半数以上。党员校长根据情况参加同级地方党委会,从而更加密切了地方党委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一些大、中、小学教职员(特别是青年教师)被吸收入党;高等学校、中等师范和中等技术学校的一批学生和普通高中的个别优秀学生也被吸进党的组织。

(三)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工作

省委的工作机构除宣传部设有职能部门管理学校工作外,工交部、农工部、财贸部也都有一位副部长兼管教育工作,并增设教育处。各地、市委、宣传部设立学校教育科,县委宣传部有人专管教育工作,区、乡党委有一位委员分工专管学校工作,农业社的文教领导小组把学校工作列入重要事项进行管理,生产队队委会也有专人分工管理教育工作。从省委到生产队委,层层有人抓教育。

在加强党对学校领导的同时,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省委在“大跃进”中提出了“在学校中彻底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红旗”的口号。1958年在全省大、中学校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运动,对一些专家、教授进行了错误的批斗。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又有一批大、中学校的

干部、教师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和伤害,使他们的教学积极性被严重挫伤。

安徽的教育“大跃进”运动是在整个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大背景下,试图突破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和苏联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探索走自己的路,创立适合我省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次尝试。在教育“大跃进”运动中,安徽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中、高等教育事业,无论在教育的规模,还是在教育的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为安徽以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影响,很多事情做过了头,违反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除“四害”运动

刘延年

一、工作部署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不仅面临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科学落后、文化荒芜的局面，而且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也广泛流行，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1952年1月下旬，抗美援朝正在进行之中，美国开始在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进行细菌战，投掷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蜘蛛、蚂蚁、臭虫、跳蚤等带有细菌的昆虫和老鼠、青蛙、烂鱼等疫病媒介物，企图以此来削弱我国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的伟大号召。政务院于1953年成立以周恩来、郭沫若、聂荣臻为正、副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各地人民政府也随之成立相应的机构，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防疫卫生运动。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

1955年，毛泽东在起草《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听到农民反映一些地方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出身农村并对农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毛泽东，当即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在农村爱国卫生运动中必

须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好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号召各地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精神,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全党和政府坚决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当年春夏两季把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每一个地方和单位都要制订出除“四害”讲卫生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而且务必在当年内打下实现长期计划的巩固的基础。在此前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誓师大会,订规划、表决心,向“四害”发起歼灭战。这样,从1953年开始的爱国卫生运动便逐渐发展成为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为中心内容的除“四害”运动。

安徽的除“四害”运动实际上于1955年冬就已经开始了。到1957年底,各地结合生产,先后进行了7次以除“四害”为中心内容的卫生突击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10月底,全省共消灭苍蝇及蛆蛹541万多斤,捕捉老鼠3116万多只,捕捉麻雀及雀蛋2545万多只,还消灭了大量的蚊子和孑孓。同时,各地还进行了疏通沟渠、改良厕所、清除垃圾和杂草等工作,减轻了“四害”的孳生和栖息场所,城乡卫生面貌得到明显的改善。

1958年1月14日,安徽省在合肥市举行除“四害”誓师大会,并成立了省除“四害”总指挥部,由副省长陆学斌任总指挥。参加誓师大会的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军区代表,省暨合肥市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商店、农业社、群众团体的代表共1500多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各级

党委积极领导这一斗争,切实做到书记动手、党员带头、全民动员,使全省男女老少全部投入到歼灭“四害”的斗争中去。省除“四害”总指挥部总指挥陆学斌在会上向全省人民发布了除“四害”总动员令,号召全省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投入除“四害”的战斗。省除“四害”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合肥市除“四害”总指挥傅大章在会上表示了合肥两年内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蟑螂、臭虫等“六害”的决心。

二、冬春大战

誓师大会后,全省人民立即投入以除“四害”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并迅速掀起围剿“四害”的高潮。这一阶段的除“四害”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规模大、声势大、决心大、干劲大。各地认真贯彻省除“四害”誓师大会的精神,做到“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发动群众的面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广。1月20日以后,全省平均每天都有1000多万人参加除“四害”运动。各专、市、县纷纷发出挑战书、应战书和保证书,提出本地区的奋斗目标,表示彻底消灭“四害”的决心。特别是当全省除“四害”誓师大会的精神传达到基层以后,各地干部和群众连夜行动,纷纷组织捕鼠队、捕雀队、灭蝇灭蚊队、挖蛹队等战斗队伍和各种突击小组,不分白天黑夜和严寒天气,对“四害”展开猛攻。颍上县谢桥区在省除“四害”誓师大会后的两天内,即捕鼠1.93万多只、雀9300多只。

其次,各级党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及时指导。各级除“四害”指挥部都是党政主要领导人亲自挂帅,走上前线,“既当指挥员,又

做战斗员”，还派出检查组及时进行检查。运动刚开始时，虽然各地的干劲很大，但没有注意到战略战术的运用，没有根据“四害”的不同情况分配力量，不论男女老少都分配同样的任务。事先也不侦察“敌情”，经常发生扑空的现象。省委了解这一情况后，马上指出：“除四害必须讲究战术”。各地党委立即改进，并纠正了平均分配任务的做法，因而迅速提高了战术和技术，扩大了战果。

第三，各地普遍采取评比的方法，推动运动的发展。各地在运动中利用兴修水利运动中的经验，自上而下地普遍开展评比竞赛，在报纸上定期公布战果，表扬先进，推动后进，促进运动的发展。界首县王烈桥乡原来除“四害”行动迟缓，在全乡开展十查十比之后，一跃成为先进单位，仅在1月20日至21日两天内即捕灭麻雀6988只、老鼠7777只、各种害鸟9974只。

第四，除“四害”和各项工作密切结合，齐头并进。省委从运动一开始即指出“要拿出兴修水利的干劲来开展除四害运动”、“除四害要和各项工作紧密结合，统一安排”。各地严格执行省委的指示精神，合理安排劳力和时间，把各项工作较好地结合起来。有的地方白天兴修水利、积肥，晚上除“四害”，或利用劳动的空闲时间来消灭“四害”。

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14日到2月2日，全省共消灭麻雀2870多万只、老鼠4342万多只、灭蝇104.5万多盒、灭蚊16.1万多盒、挖蝇蛹123.2万多斤、清除垃圾3.67亿多担。半个月消灭的鼠、雀已超过1957年消灭鼠雀总数的5倍。全省3000多万人口平均每人消灭1只老鼠和1只麻雀。

1958年春节临近，安徽省除“四害”总指挥部召开电话会议，紧急部署春节前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以除“四害”为

中心内容的大扫除突击周活动,做到“男女老少齐动员,不让蚊蝇过春节”、“家家户户大扫除,干干净净过春节”。

3月初,省除“四害”总指挥部发出关于开展除“四害”突击月活动的紧急通知。通知发出后,从3月初到4月底,全省平均每天都有1800多万人参加除“四害”运动,最多的时候达2093万多人。根据省总指示,各地在除“四害”运动中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对污水沟塘和污水坑洼作全面清理。蚌埠市从2月底紧急开始对全市8782个污水沟塘和坑洼采取边普查、边插牌、边包干、边突击的办法,进行全面清理。平时被人们称为“龙须沟”的西市区纬四路大沟,过去每当夏天都是蚊蝇成团蛆成堆,通过这次清理,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合肥市在突击月中也填平了20个大污水塘、疏通了3700多条污水沟、清除了217万多担垃圾。(二)在淮北地区,普遍建立了公共厕所,取消了私人露天厕所和庭院内的污水坑及粪池,并修建了猪圈、羊圈和耕畜圈栏。村内的粪坑一般都迁至村外,原来的厕所和粪坑附近大都挖有二三尺深,填上了新土,并用夯或石碾子打结压实。仅萧县一地就取消庭院内的污水池和粪坑9万多个,新建男女公共厕所1.5万多个,修建牲畜圈栏15万多处。淮南市的很多地方结合积肥拆旧厕、盖新厕。厕所周围4~5尺内的肥土都被挖来作了肥料,基本上消灭了蝇蛹。(三)大扫除、大搬家、大洗刷和大泥刷。如阜阳地区各地在春节大扫除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大扫除,床铺、家具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进行了大搬家、大洗刷,屋里屋外都普遍泥刷了一遍。这样不但清洁卫生,而且彻底消灭了室内的过冬蚊蝇和墙缝内的臭虫和白蛉子。(四)用“六六六”粉烟熏剂熏杀蚊蝇。芜湖、安庆、合肥、蚌埠、马鞍山等专、市和一部分县普遍使用“六六六”熏了房屋

和下水道。(五)发动男女老少使用各种工具捕打蚊蝇,做到随发现随捕打,发现一个,捕打一个。在芜湖市的街道、公园和院落,每到傍晚,到处都是捕捉蚊蝇的群众。

3月19日,中共芜湖市委常委召开会议,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全市人民总动员,苦战40昼夜,将原来拟定的一年消灭“四害”的计划改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完成,争取在40天内把芜湖变成“四无”城市。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会议决定采取如下几条措施:第一,7天内,每人捕打残余蚊蝇1000只;第二,集中500名射击手反复清剿残余麻雀,10天内歼灭干净;第三,组织15万大军直捣蚊蝇老巢,扫除全市垃圾,疏通明沟暗渠,改良厕所,填平污水塘;第四,家家户户千方百计地在一个月内在把残余老鼠消灭干净。

全省各地在运动中还涌现出许多除“四害”能手。蚌埠市51岁的搬运工人李怀勤,从30来岁开始,已经有20年的捕鼠历史。他对捕鼠很有经验,看到一个鼠洞,能马上判断出里面有没有老鼠,有多少,是哪种老鼠。几年来他一直利用空余时间来挖捕老鼠。冬天到了,老鼠就跑到草堆下面或农民的家里过冬。李怀勤就想出几种办法来对付它们:一是翻草堆。先在草堆边上挖几个假洞,受到惊吓的老鼠见洞就钻,结果中了圈套,就被逮住了。他曾用这种办法一天灭鼠900多只。二是灌水。发现鼠洞后,一桶水下去,老鼠憋不住,只好束手被擒。从1957年到1958年春,他一人灭鼠4万多只,平均每天灭鼠37只。

根据各地统计,在3月份的突击月内,全省共消灭蚊子301.32万盒、苍蝇524.18万多盒、挖蝇蛹419.77万多斤、处理污水沟塘389.95万多个、修建厕所181.96万多处、清除垃圾103872万

多担。共消灭麻雀 3961 万多只、老鼠 6526 万多只，捣毁雀窝 2490 多万个、堵塞鼠洞 5480 多万个。继 3 月 13 日界首实现“四无”县之后，又有萧县、砀山、临泉、太和、亳县、全椒、蒙城、颍上、凤阳、和县等 11 个县成为“四无”县。全省沿铁路、公路的村庄已基本上消灭了麻雀。

三、夏季高潮 消灭蚊蝇

随着夏季的到来，又到了蚊蝇繁殖和活动的高峰期。为了巩固和发展春季除“四害”的成果，省除“四害”总指挥部于 4 月 8 日发出《关于彻底消灭蚊蝇的紧急通知》。《通知》提出 5 条具体要求：（一）要迅速组织广大群众捕打尚未消灭的成蚊成蝇，做到人人有工具、人人动手打，随时发现随时打、发现一个打一个，在哪里发现就把蚊蝇消灭在哪里。（二）有的房屋和阴暗角落，有条件用药剂进行烟熏而又未熏过的，要进行一次烟熏。（三）对没有处理好的蚊蝇孳生场所，最近要做彻底处理。特别是对城镇内的牲畜皮肉血骨加工业和酱坊、酒坊、粉坊等地，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使其成为蚊蝇孳生地。（四）沟边要经常做到无杂草，城镇的太平缸要加盖，勤换水，以免孳生子子。如水塘里发现有子子，应组织群众打捞，将其消灭。提倡在水塘内、较大的蓄水沟内和稻田里养鱼吞食子子。（五）加强粪便管理。无论公共厕所还是私人厕所都要有专人负责管理，粪便要做到日产日清，保证厕所无蛆、无蝇、无垃圾。可用有毒的野生植物如博罗回、闹羊草等放在粪池、粪缸里灭蛆。

根据省除“四害”总指挥部的《通知》，《安徽日报》于 4 月 20 日

发表社论《不让蚊蝇过夏》，要求各地要在突击月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乘风破浪，跟踪追击，继续开展以消灭蚊蝇为中心内容的除“四害”突击斗争，在夏季到来以前，把蚊蝇彻底消灭掉。在斗争中，要充分发挥老年人、少年儿童和妇女灭蝇。在时间安排上，应尽量利用早晨、傍晚、饭前饭后和生产空隙。并且要大力推广毒草和网兜捕蝇。

阜阳专区在省总通知后，从4月19日到22日的4天时间内紧急动员起来，共捕蝇20697斤、挖蛹16871斤、灭蚊2580斤。亳县、涡阳等县提出了“人人有蝇拍，蝇拍不离手”的口号。涡阳县城关镇1.1万多人，就有蝇拍1.2万多把，不仅人人有蝇拍，而且公共厕所、食堂等处都挂有蝇拍，全镇两天内即捕打成蝇3258盒。

合肥市群众在消灭蚊蝇的大战中发明了用网兜捕蚊的方法，即把用破蚊帐或洋袜子制成的网兜绑在木棍上，当傍晚蚊子在空中成群活动的时候，用网兜在空中上下、左右、前后挥舞，套取蚊子。据说这样一个晚上可捕蚊三四千只。

各地群众在发明新工具捕灭蚊蝇的同时，还大力推广用植物灭蚊蝇的方法，他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博罗回、闹羊花、醉鱼草、藜芦、泽漆、马醉木、木藜芦、马蓼草、苦楝树、生半夏、天南星、青蒿、猫耳刺、野葡萄等14种可以杀灭蝇蛆的野生植物。办法是先将粪缸内的粪便加水稀释，再把捣碎的植物放入粪缸里，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硷或其他毒素来杀灭蝇蛆，又不影响粪肥的肥力。

此外，开水和鱼类也被用来消灭蚊蝇的孑孓。办法是将烧开的水，按一定的比例倒入粪缸，烫死蚊蝇的孑孓；鱼类有鲫鱼、罗飞鱼等。安徽还专门从上海引进一批鱼苗来消灭蚊蝇的孑孓。

5月初，安徽省对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进行了第一次检查和

评比。根据省除“四害”讲卫生评比条件和奖励施行办法，最后一致评定阜阳、蚌埠两个专区为除“四害”的先进专区，界首、太和、亳县、阜阳、萧县、全椒、肥东、舒城、寿县、和县、屯溪市、铜陵、潜山等13个县、市为各专区的先进县、市。检查组还对124个比较先进的基层单位进行了表扬。通过检查，到4月20日，全省共消灭麻雀12227万多只、老鼠19626万多只，蚊子和蝇子更是不计其数。省除“四害”总指挥部指出，当前除“四害”的重点是消灭蚊子和蝇子。

安徽省除“四害”讲卫生评比大会以后，一场以消灭蚊蝇为中心的夏季除“四害”大战在江淮大地开展起来。这一时期由于农村进入农忙季节，除“四害”主要在城市中开展，而尤以合肥、芜湖、安庆等城市开展得最有声势。

6月16日，合肥市除“四害”总指挥部召开全市和省直各机关、工厂企业、大中学校、居民委员会及郊区农业社负责人会议。市除“四害”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潘毅向全市人民发布除“六害”（“四害”之外另加蟑螂和臭虫）攻势动员令，要求全市人民在除“六害”斗争中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根据统一领导、条条保证、划片包干、单位负责、人人动手、户户清洁的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向以蚊蝇为主的“六害”展开全面进攻。指挥部要求在消灭“六害”的同时，必须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做到“六要”（要执行门前大打扫、要每天刷洗痰盂、要推广使用公筷、要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习惯、要室内外干净、要食具干净）、“八不”（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倒垃圾，不乱泼污水，不乱扔废纸、果皮，不放猪乱跑，不喝生水，不吃腐烂食物）。

6月11日，芜湖市除“四害”总指挥部向全市人民发出向蚊蝇

展开夏季总进攻的动员令。随后全市每天都有 10 万大军手持蝇拍,日夜挥舞。7 月 2 日,市总又在新芜区红墙院居民委员会召开现场会,号召全市学习新芜区坚持四无四净、巩固红旗的经验。会后,全市群众提出口号:“蚊蝇场所是战场,工具是刀枪,大家齐动手,人人上战场。”除动员群众参加斗争外,市里还发动市红十字会会员组织宣传队,沿街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宣传活。团市委和市教育局等单位还组织中、小学的少先队员在全市开展“红领巾卫生监督岗活动”,每个公共汽车站都有红领巾宣传员,街道两旁的树下也有少先队员站岗。每天在街头活动的少先队员有 1000 多人。此外,该市还组织突击力量围攻山头蚊蝇老巢。6 月 22 日这一天,5500 多名干部、学生和居民向赭山、范罗山、铁山、小官山等蚊蝇老巢发动全面猛攻,仅在赭山一处的一小时内就消灭蚊子 1000 多斤。

安庆市也在 6 月份向蚊蝇发起总攻。他们在 7 天内出动了 12.7 万多人消灭蚊蝇,还组织了除“四害”大队 72 个、中队 119 个、小队 314 个、突击队 68 个。半年里,全市共消灭老鼠 91.7 万多只、麻雀 11.2 万只、苍蝇 4700 多斤、蚊子 9300 多斤。此外,还疏通污水沟渠 42630 多条,达 1000 华里,填平洼地 74370 多平方公尺,清除垃圾 277 万多担。这个市还创造了室内室外的全民性的熏烟灭蚊方法。具体做法是先把全市的杂草进行清除,然后在全市按 15~20 公尺的距离设置烟点,街道上按 50~100 公尺的距离设置烟点。每堆燃料按 50~100 公斤分层堆放:下面干草、中间半干草、上面青草。每堆撒有 2 两“六六六”药粉。点火的时间安排在下午六七点钟或凌晨三四点钟,因为这时气压低,烟会沿着地面飘散。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各个工厂、学

校、商店、机关全面出动，将预先设置在大街、小巷、广场、公园、庭院的约四五千个草堆一齐点燃起来。顷刻间，浓烟滚滚，弥漫全城。蚊子被熏得东逃西窜，无处藏身，纷纷坠地而死。室外熏烟一小时后，不少蚊子逃入室内。这时，家家户户又把门窗一齐关闭，再进行室内熏烟。为了全面检查这次烟熏的效果，市除“四害”总指挥部还组织了 3600 多人的检查队挨家挨户进行了检查，得到的结果是：居民 93% 无蚊、89.3% 无蝇，机关 90.1% 无蚊、85.6% 无蝇。

入秋以后，“钢铁元帅”升帐，全省加入到大办钢铁的运动中去。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指出虽然许多地方的“四害”已经消灭，但对除“四害”不能放松，要在经常努力的基础上，一年搞几次突击，如过节过年时，要把经常性和突击性结合起来，把“四害”彻底消灭。根据决定的精神，安徽的除“四害”运动也转入以突击为主。9月12日晚，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布置以消灭蚊蝇为主要内容的除“四害”讲卫生大突击运动迎接国庆，各地市迅速行动起来，有的地方甚至连夜开始行动。蚌埠、合肥、安庆等地方连续数日，每天都出动 20 万左右的除“四害”大军消灭“四害”。12月22日，省委再次发出《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在元旦前夕开展一次除“四害”讲卫生的大突击运动，以消灭老鼠和蚊蝇，迎接春节的到来。

到 1959 年，虽然突击性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在节假日期间还在搞，但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除“四害”运动总的来说已经进入尾声，1960 年后就不再进行了。

高丰社早稻放“卫星”纪实

刘延年

1958年8月10日，枞阳县钱桥区石马乡高丰圩社的石马乡党委和高丰社党支部集体试验田里放出早稻亩产16227斤13两的特大高产“卫星”。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全国，远扬海外。《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消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专题纪录片。苏联、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纷纷来电来函表示祝贺，有的还要求来中国推销农业机械。

—

高丰圩的早稻“卫星”，是安徽农业放“卫星”运动中比较大的一颗，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58年6月上旬，中共安徽省委派检查组到枞阳县视察。一行人沿着白荡湖北上，检查早稻生长情况。当他们来到白荡湖后梢——唐圩（放“卫星”后改名为高丰圩）时，钱桥区委、石马乡党委负责同志向省领导介绍了这里的农业生产情况。这里在开垦前，蒿草丛生，水鸟出没。蒿草腐烂，鸟粪堆积，使这里的土壤非常肥沃，再加上水源充足，非常适宜水稻生长。检查组领导看到有一块田里的稻棵长得特别茁壮，就说：我们到处寻找早稻王，原来就在

这里。随即吩咐县、乡、社干部派专人精心管理,作为示范田,收割时要来监打监收,看看一亩地里究竟能收多少稻子。

对于省委检查组的指示,乡、社干部心领神会。检查人员离开后,乡、社干部开始反复讨论,一致认为这块早稻田的稻子虽然长得很好,其产量最多也不过就是千斤上下,这样的产量是不能一鸣惊人的。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想出并棵移栽的办法,就是在稻子即将成熟时,将长得好的稻子移栽到一块田里,以提高稻子的单位产量。这个办法得到多数干部的赞成。于是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社里的青年突击队去完成,并要求突击队精心组织,细心操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青年突击队顺利地完成了水稻的移栽工作。但是,水稻移栽后,由于稻棵太密,难以通风,容易倒伏,影响粮食产量。于是,他们又在稻棵中间用竹竿搭起架子。

省委检查组一行回到省里后,开始大力宣传高丰圩早稻丰收在望的景象,为其大放高产“卫星”作舆论准备。同时,邀请和组织省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新闻记者以及所谓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观潮派”、“怀疑派”和“秋后算账派”前来参观。高丰圩农业社至钱桥本来没有公路,为了便于参观人员的通行,当地连夜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社、乡还组织专门的班子接待前来参观的人员。一时间,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共候早稻“卫星”升空的壮观景象。

二
经过一番宣传和准备工作后,高丰社决定于8月7日开始试验田早稻的收割。

收割时,为了显示全过程的真实,高丰社特地邀请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来监收。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刘靖基为正、副团长的上海各界人士安徽省农业生产参观团 50 多人,四川、贵州水稻参观团一行 37 人,政协安徽省农业参观团第六参观团一行 91 人,《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劳动报》、《新民晚报》、《农民日报》、广播电台和上海科技电影制片厂的编辑、编导、摄影师等应邀前来。省委、安庆地委和枞阳县委的领导也参加了监收监打。

在稻子收割以前,由各参观团选出的代表组成了丈量、监收监打、监运和过秤 4 个小组,每个小组有 10 人左右。丈量小组在收割前认真丈量了土地,收割后又认真复量了一次,证明这块田确实是 1 亩 4 厘 2 毫,没有误差。

在丈量完土地以后,上午 11 时开镰收割。全社共组织了 300 多人,边收、边打、边运,直到下午 6 时半才把这块田里的稻子全部割完,初打一遍,至 8 日上午又打一遍。为了便于在过秤的过程中作假,临时搭起的粮仓留有前后两个门,粮食过秤后,从前门送入粮仓,然后又从后门挑出,重新过秤。如此循环往复,一担粮食要被秤过许多次,有的达到七八次之多。等过秤完毕,粮食产量已经达到 16227 斤 13 两(当时秤为 16 两制)。

一颗新的粮食大“卫星”就这样放出来了。这颗“卫星”与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 15361 斤相比,超出 866 斤 13 两;与 8 月初舒城千人桥乡千人桥社槐树队创造的 12727 斤相比,超出 3500 斤 13 两。

稻子割完后,为使收割过程不致露出破绽和疑点,高丰圩农业社又安排将稻茬连夜翻耕,不留痕迹。

“卫星”发射升空后，社里随即开了一个庆祝会。在庆祝会上，各参观团的负责人和省委领导发表了讲话，一致祝贺枞阳县放了一个早稻特大“卫星”。各代表团向高丰社献了彩旗。上海市各界人士安徽省农业生产参观团的副团长还在会上朗诵了他现场作的一首诗，歌颂枞阳的早稻“卫星”升天：

高丰圩上，白荡湖边，
又有一颗大“卫星”飞上了天，
亩产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七斤十三两，
“算账派”只好认输道歉，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让帝国主义发抖吧！
我们的力量一天大似一天，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都拍手笑开颜，
他们说：东方的巨人创造了奇迹，
要幸福只有走社会主义那一边。

最后石马乡党委书记讲话，表示决不骄傲自满，一定要再争取双季晚稻的更大丰收。

省委、省人委于当天给高丰社发来祝贺电报：“你社放出早稻亩产 16227 斤的大卫星，创造了全省早稻更高的新纪录。捷报传来，人心振奋。你们这一重大成就，对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我省农业生产加速大跃进，将发生深远的影响。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希望在此胜利基础上，继续前进，加强对中晚稻和其他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创造更多更大的丰产成绩。”

三

高丰社水稻放“卫星”在当时被作为全省农业“大跃进”中的一个典型、一个人间奇迹，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驻高丰圩社的干部胡庆舟也被中央农业部调到北京试种高产试验田。历时3年，他一事无成，最后仍返回到石马乡。

高丰社的“卫星”迷惑了不少人。当时到高丰社参观的新华社记者与《安徽日报》记者合写了一篇报道《高丰社早稻卫星目击记》，记载了他们在高丰社早稻丰产田里看到的情况。他们看到，因为分蘖多、发棵大，已经很难一棵一棵地分清稻秆了。稻秆与地面成40多度的角，一顺斜地躺着。一个社员向他们介绍说：“这块稻子在成熟以前，每棵都是笔直地立着，约有中等身材的人一人高，从抽穗灌浆后，才被压弯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看到上海等地的科学家想到田里取些全棵水稻进行科学研究，因为稻子太密而进不去。他们觉得，这样的稻子，别说放个鸡蛋，就是放个大西瓜在上面，也掉不下去。他们说，如果全枞阳、全中国的稻子都长成这个样子，那么能收多少稻子呢？账是越算越大了，但这是多么有重大意义的一笔账啊！

上海市各界人士安徽省农业生产参观团团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写文章说，每亩万斤的产量，国际文献上还没有见过。他们在高丰圩取回一些标本作了分析，第一块田产稻谷10142斤，测出草秆干重约合6000斤，加上谷产去水，每亩总产干物质约在1.4~1.5万斤左右。以每个分蘖3个叶子来测定，估计每亩“叶面积”总数约合到26亩多，设想生

长旺期为 90 天，“净光合率”每平方公尺叶面积每天计 5 克，每亩累积 1.5 万斤的干物质是完全可以获得的。第二块田产量更高，达到 16227 斤 13 两，他们也取了样，叶面积还没有测定，初步估计，比第一块还要高，总干物质要在 2 万斤以上。殷宏章说，这样的高产有着重大意义，为人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带头作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已经决定把作物高产生理基础划为最重要的研究任务，计划总结高产经验，开发高产试验田，作一系列有系统的研究，在植物生理学中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配合生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更为令人感慨的是，一些敢于坚持真理，揭露高丰圩放“卫星”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同志，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和打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1958—1960 年的马钢建设

刘延年

坐落在长江边上的马鞍山钢铁公司，是安徽的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从解放初期只有 87 户人家、几座小高炉和小手工作坊的金家庄，发展到现在拥有炼铁、炼钢、耐火、铁合金以及其他辅助设施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马钢走过了一条辉煌的创业路。而从 1958 年到 1960 年，正是马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马鞍山位于长江南岸，这里矿产资源丰富，附近又有石灰石、白云石等丰富的辅助材料，具有成为一个钢铁基地的许多有利条件。1953 年 2 月，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局正式批准马鞍山炼铁厂的计划任务书，6 月 1 日，马鞍山高炉改建工程破土奠基，揭开了马钢早期建设的序幕。到 1954 年初，马鞍山铁厂的生产已经基本正常，形成了年产生铁 20 万吨的生产能力。

1957 年 2 月和 1958 年 2 月，马鞍山铁厂分别编制出《关于在马鞍山建立钢铁联合企业的意见》和《关于马鞍山整体规划分段建设成为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意见》，为马鞍山铁厂的进一步发展绘制了宏伟的蓝图。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马鞍山铁厂开始迅速向钢

铁联合企业转变。8月1日,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正式成立马鞍山钢铁公司,隶属省冶金厅领导。同时,马鞍山铁厂建设公司并入由马钢公司的冶金机械安装总公司第九工程公司马鞍山办事处、冶金部电装四公司南京工程处和鞍山筑炉公司南京工程处等施工单位合并组成的马鞍山钢铁公司基建系统,成立马鞍山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此时,马鞍山钢铁公司下设15个处室、12个厂矿、9个基建工程处,职工6万多人。9月20日,毛泽东来马钢视察,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马钢发展项目始终列不上国家计划的情况,希望毛泽东给予关心和支持。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0月27日,冶金工业部向华东经济协作区和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关于马鞍山钢铁公司建设成为华东地区大型钢铁基地的报告》。1959年10月27日,冶金部又以(59)冶发字第911号电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国家经委,具体提出《关于马鞍山钢铁公司建设成为华东地区年产铁450万吨、钢30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报告》,同时电告华东经济协作区和中共安徽省委。虽然这一规划当时未被批准实施,但它为马钢的发展描绘了蓝图,对马钢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马钢公司也在努力形成采矿、炼铁、炼钢、轧钢的基本框架,增加了一个个填平补齐新项目。

二

1958年8月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民跃进”的口号,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高潮,马钢的建设也进入跃进时期。从第三季度开始,马鞍山全市15万人(包括由省里调来马鞍山的邻县农民)响应“全民大办钢铁”的口号,掀起了土法炼铁的

高潮。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坐阵指挥，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经常来检查工作。在土法炼铁中，每天有7万多工人、农民上山采矿、建小高炉、炼铁、炼土焦、搞装卸运输。马鞍山一下子就有41座8~28立方米的土高炉上马；桃冲矿区上了50座土焦炉群。马钢公司的人数也一下子猛增至7万多，仅桃冲矿一个矿就达2.6万人。8月初，一座日产3.043吨生铁小高炉建成投产。这座小高炉是在3位老工人的带领下由33位农民建造起来的，创造了连续38天出产灰口生铁350吨78公斤的长寿高产纪录。这个小高炉“卫星”出现后，合肥、南京、镇江和芜湖专区等地先后派人来参观学习。马鞍山的设计部门为了满足各地学习的需要，还把这座高炉的成套图纸绘制出来，向各地推广。

作为安徽新建的钢铁基地，马钢公司在搞土法炼铁的同时，根据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中型炼铁高炉的建设。在省委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国15个省市、20多个大中城市的数以百计的厂矿、企业和交通部门，都向马钢伸出了援助之手，纷纷突击赶制和运输设备、器材，支援马钢的钢铁元帅上马。

1958年9月8日，新建5座高炉中的210立方米日产生铁300多吨的五号高炉出铁。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第一座现代化中型高炉，也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高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副省长余亚农率领安徽省各界人民慰问钢铁战士代表团第一团参加了典礼大会。李任之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决响应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今年生产钢1070万吨的伟大号召，保证以更快的速度建成另外4座中型高炉和马钢的全部建设工程，争取生产更多的钢铁支援解放台湾。1959年2月27日，一号中型高炉胜利出铁。至此，马

钢于1958年年初开始兴建的5座中型高炉全部出铁。这5座高炉总有效容积为1170立方米,投产后可日产生铁千吨以上,为马钢建成中型钢铁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3月9日1时30分,马钢1.5吨电炉炼出第一炉电炉钢,马钢从此有了自己的铸钢件,结束了安徽有铁无钢的历史。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马钢根据“既抓铁,又抓钢,铁钢一齐上”的方针,从1958年6月中旬开始到8月初,有5个转炉炼钢车间破土动工兴建,还有1个较大的转炉炼钢车间也在抓紧筹建。这6个转炉车间,分布在高炉群中,可以把高炉炼出的铁水趁热炼成钢。转炉最大的可年产钢100万吨,最小的也能达到10万吨,投产后可使该公司钢的年产量增加200万吨。为保证这6个转炉车间的建设提前完成,中共马鞍山市委除抽调大批领导干部加强转炉炼钢车间的领导外,还成立了马鞍山市冶金工业指挥部,进一步加强领导。在马钢的各个转炉炼钢车间工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建设者们高举“钢铁元帅”的大旗,紧张劳动。市委书记魏安民等经常深入工地,在一线工地参加劳动。马鞍山市数以千计的机关干部和家属也和建筑工人一起战斗在各个转炉炼钢车间的工地上。8月9日晚8时14分,马钢转炉炼钢车间年产10万吨钢的第二号转炉流出第一炉钢水。这个转炉的胜利出钢,标志着马钢公司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8年9月20日,在马钢大办钢铁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来到马钢进行视察。在听了有关马钢发展的情况后,毛泽东说:“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1959年10月,毛泽东来安徽视察时,又一次视察了马钢,对马钢的发展表示满意并寄予厚望。

三

在“大跃进”的3年里,作为安徽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马钢在轧钢、烧结、耐火材料、炼焦等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轧钢方面,1958年起,先后投建了215毫米轧机、250毫米轧机和500/300毫米轧机各1台,年设计能力达10.92万吨。1958年12月19日,215毫米轧机轧出了第一根合格钢材,从此结束了“有铁无钢,有钢无材”的局面,初步形成了从采矿、炼铁、炼钢到轧钢的配套成龙的钢铁生产联合企业。

烧结方面,原先一直是马鞍山铁厂炼铁工艺中的“空白”,长期以来靠“吃生矿”或外援为计。1957年7月开始动工修建第一烧结厂,经过一年的奋战,竖起了80米高的烟囱,安装了4台18平方米烧结机。1958年6月1日,第一台2号烧结机投产;11月,1号烧结机投产;次年6月,3号烧结机投产。从此,马钢的冶炼原料由“生食”变为“熟食”。

耐火材料方面,高炉投产后所需的各种耐火材料都是从上海、青岛、山西阳泉和河北马家沟等地长途购运而来。为了解决高炉急需,在当时生铁库空地上,土法上马,建起了一座10吨小土窑,于1958年9月24日试产了第一炉耐火砖。1958年7月,冶金部在重庆召开“全国耐火促进会”,要求各地自力更生解决耐火材料。为此,马钢在上海耐火材料厂的支持下,当年建成100立方米矩形倒焰窑4座,分两批投产。1959年又建成100~150立方米矩形倒焰窑8座,日产能力为38.722吨,为马钢生产提供了耐火材料。

焦化方面,1958年以前炼钢材料焦炭全部外购。“大办钢铁”

开始后,外部供应中断。为了解决生产急需,马钢陆续建立了3个土法焦炉群。但土法炼焦的生产方式落后,产量低、质量差、浪费大,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炼钢的需要。1958年5月,马钢动工兴建一座年产45万吨的58I型65孔双联下喷复热式焦炉。1960年6月6日,复热式焦炉炼出了第一炉冶金焦。接着,另一座同类型复热式焦炉建成投产,从根本上改变了马钢焦炭短缺的困难局面。

矿山建设方面,马钢已具备纵深开采的条件。钢铁生产的形势客观上要求矿山建设与之同步发展。1958年4月3日,冶金工业部3号文件批准凹山扩建为150万吨规模,同意姑山(含钟山)扩建为80~100万吨规模、桃冲扩建为60万吨规模。到1959年,实际开采能力实现310.2261万吨,1969年达到416.45万吨。

科研方面,这个时期,马钢有了自己的科研、培训基地。1959年夏,马钢中心试验室成立,除完成大量生产检验任务外,还担负了一些科研试验研究项目。

另外,马钢在铁合金、制氧、教育、医疗卫生和职工住宅建设等方面,3年间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经过3年的努力,到1960年年底,马钢的建设和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这期间,马钢共完成国家投资2.30亿元,建成了一大批重要项目和骨干工程。主要包括17座中小型炼铁炉、2座65孔复热式焦炉、4台18立方米烧结机、3座1.5~5吨炼钢电炉、28座2~8吨炼钢转炉、3套小型轧钢机、5座铁合金电炉、185台金属切削机及锻压设备等。从此,马钢跨入了全国重点钢铁联合企业的行列。

在“大跃进”期间,马钢抓住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机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原来的一个小铁厂建设成为安徽省的工业重镇,同

时,也为安徽冶金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当然,由于受到“大跃进”中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的影响,大搞全民炼钢、全党炼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在建设项目上全面开花,违反经济建设规律和基本建设程序,许多项目一哄而上,草草上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造成比例失调,许多工程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不得不半途而废,草草下马。如当时建成的19座小型转炉与部分小电炉、小轧机等投产不久即告报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其次,在全民炼钢的高潮中,马钢以“大会战”的方式,组织职工夜以继日地参加劳动,再加上大批未经任何培训的农民进入马钢,管理跟不上,生产大起大落,产品质量迅速下降,当时,马钢70%的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全国同类企业的下游,企业连续几年亏损,成为马钢以后发展的严重障碍。但是,在三年“大跃进”中,马钢人在省委的领导和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艰苦创业,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将马钢初步建成安徽现代工业城市和钢铁基地,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大跃进”中的马钢的建设和所取得的成就,是马钢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安徽现代工业战线的重要篇章。

淠史杭灌区建设纪实

孙道清 金 申

1958年动工兴建的淠史杭灌区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灌区。在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建成了“蓄引提”结合、“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实灌面积达到830万亩,成为安徽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发电、航运、水产养殖和城市供水等方面的综合利用效益也十分显著。

淠史杭灌区是淠河、史河、杭埠河3个相互联系灌区的合称。位于安徽省中、西部丘陵地带,纵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灌区内有六安、巢湖两个专区和合肥市所属的11个县(市、区),总面积为13130平方公里。灌区地处亚热带北缘,江淮分水岭把灌区分成两大区域:北部为淮河流域,面积7900平方公里,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南北流向的史、沔、汲、淠、东淝等河流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并注入淮河干流;南部为长江流域,面积5000多平方公里,源于大别山区的丰乐河和杭埠河,由西向东横贯中部;源于江淮分水岭的南淝河和派河从西北向东南流,诸水呈扇状汇入巢湖。灌溉区内还有城东湖、城西湖和瓦埠湖,均为淮河中游的蓄洪区。其中城西湖是最大的蓄洪区。淮河和瓦埠诸湖则是淠河灌区的补给水源。

灌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无霜期长,土质良好,多年平均降水

850~1250毫米。因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又具有我国东南部季风气候区的特征,降雨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匀,水旱灾害频繁。据史书记载:自1383年(明洪武十五年)至1949年的566年间,水旱灾害达357次,其中旱灾153次。沿河易涝,丘陵常旱,水来一线,旱来成片。1434年大旱,“庐、凤等五府饥,霍丘蝗飞蔽天”。1932年豫皖大旱,“瓦埠湖干涸,可通行车辆”。解放前到处有“晒死鸡”、“砸蛋场”、“痲病套子”、“死人堰”这类充满血泪的村名和地名。叙述灾害给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民歌、民谣更难以计数。新中国成立后,对灌区范围内的降水和水旱灾害有了较详细的记载:40年间,局部灾害年年不断,最严重的旱年有5年。

为了战胜干旱,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艰辛劳作,兴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春秋的芍陂(即今安丰塘)和大业陂、西汉的七门堰、明代的蔡公塘等,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大旱来临,也只救得一时一地而已。况且,盛时兴、战乱衰、贤者修建、霸者侵袭,到1949年,一个个都已破败不堪。解放后,灌区灌溉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58年已有了大量塘坝蓄水工程。但抗旱能力仍很低,20~30天不雨就出现旱情,正常年景也只能满足灌溉需水的40%。1949~1958年的9年间,平均每年因旱灾减产甚至失收的农田超过200万亩。1958年5月起,出现了110天不雨的大旱,灌区40%的人口投入紧张的抗旱斗争。虽竭尽全力,受旱面积仍超过500万亩,其中152万亩耕地无法下种。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灌区人民迫切要求改变受自然支配的命运。

二

1950年,伟大的治淮工程开始。大别山区水库群——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龙河口等水库先后竣工。5座大型水库和水库至渠首区间的多年平均来水量,加上灌区范围内的地表径流,总来水量达到110亿立方米,为建设灌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安徽省提出“三年实现淮北河网化,全省水利化”的口号,包括河网化、临淮岗水库、淠史杭灌区工程在内的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建设。6月,六安地委筹建淠史杭灌区工程领导班子。7月下旬,施工领导机构成立。六安地委第一副书记兼行署专员赵子厚任灌溉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指挥。指挥部及政治部科室一级负责人均从地委、行署调任。指挥部搞规划设计的主要技术骨干从淮委和省水电厅调派。地、县两级指挥部为常设机构。具体工程项目的施工组织属临时机构。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水利连;大队、公社成立水利营、团;集中几个团施工的重点工程成立指挥所。指挥所指挥通常由县委副书记或常委一级干部担任。

1958年8月19日,在淠河灌区横排头枢纽开挖了第一锹土。12月,六安地区70万人投入了灌区建设。工程开工后,指挥部提出“一年通水,两年完成,三年扫尾”的战斗口号。为实现这一目标,施工力量首先集中于任务最艰巨的“钉子工程”。率先开工的樊通桥、五里墩、平岗等20多处灌区最深的切岭、最高的填方工程,每处民工都在万人左右,多的达三四万人。在计划安排上,则采取能缓建的暂缓;必不可少的建筑物则降低设计标准,待有条件

时改建、续建和加固；渠道土方工程则先小断面通水，以后逐步扩大，最后按设计标准断面完成。但是，先通水后完善，使一些建筑物需改建、加固，增加了投资；小断面通水，特别是深切岭段，土方反复搬运几次，加大了工作量，付出了更多代价；要求“两年完成”，因时间紧迫，动用民力过急，摊子铺得过大，也造成巨大损失。

工程的兴建需要大批的技术人才。工程创建时，指挥部仅有工程师 7 人、技术员 20 多人。来自淮委设计院的指挥部副指挥吴琳和工务办公室主任黄昌栋全面负责技术工作。规划、设计、机电、施工及工程管理的领导工作由其余 5 位工程师担任。灌区各县的技术骨干，在创建初期基本上都是一些具有中专学历的技术员。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才分配来一批大学毕业生。他们后来都成为灌区建设与管理的骨干力量。

1958 年，六安地区只有一个 53 人的测量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专区、县纷纷办起了短期培训班或初级技校，培养能测量渠道、放样和计算的技术骨干。仅 3 个多月时间，测量队就扩大到 1554 人。这些人学以致用，边学边干，当时被称为“农民技术员”，后来的有的成了“土专家”。

工程全面动工后，建筑材料奇缺。工程指挥部党委决心以“土”代“洋”，走自力更生之路。当时，淝河、史河、杭埠河 3 大灌区的渠首和 20 多座其他建筑物、20 多处深切岭同时动工，最缺少的是水泥和炸药。没有黄色炸药就用黑色炸药代替，指挥部通知各县动员半劳力生产黑色炸药。一时间，老弱妇孺拎着篮子、端着盆都来参加，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制药大军。高标号的水泥紧缺，就用土制水泥代替，在寿县八公山和霍邱四平都办起了水泥厂。仅八公山水泥厂人数多时就达到 4087 人。两厂烧结的水泥，再由

各县组织群众用磨子磨、碾子碾,进行再加工。自产水泥标号很低,也不稳定。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指挥部规定了使用方法。几年以后,水泥供应较充裕,过去使用较低标号水泥的建筑物多数经过加固,至今仍在使⽤。溧史杭工程的兴建,土水泥功不可没。

开工第二年,遇上了特大干旱,土地龟裂,旱情严重。7月末,溧、史两灌区先后引水灌溉。渠水到处,正为干旱忧心如焚的群众奔走相告,方圆十数里内上堤看水者不绝于道,连夜举火开沟引水灌田者甚众。这一年灌田97万亩。1959年10月,水电部决定支持溧史杭工程建设,当年投资4500万元。

因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年代,浮夸、平调、强迫命令之风在水利建设中亦颇盛行。初期,不适当的工程布局,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大灾之年动用民力过急,也损害了群众的利益。1960年冬,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灌区各级领导开始重视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使灌区建设进入了正常发展的阶段。

三

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是溧史杭灌区得以顺利建成的基本原因之一。溧史杭灌区规划,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不断总结修正的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50年代初规划佛子岭、响洪甸水库的灌溉范围时,只着眼于本流域下游的平畈区。由于丘陵区经常出现严重干旱,根据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产生了根据地形特点“引水上岗”和切开分水岭,调大别山区的水资源,实行区域内统筹规划水土资源的新思路。经过各级领导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认真总结,确定了溧史杭灌区总体规划的思想是:充分利用当地

径流,扩大灌溉面积,建立一个蓄、引、提并举,渠、库、塘、站联合运用的大、中、小型工程结合的“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以灌溉为主,兼有发电、航运、水产养殖和城市供水等综合利用效益。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水资源,灌区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实行跨流域引水和配水。北流入淮的淠河水不仅向东引入东淝河,而且还有3条干渠穿过江淮分水岭;史河之水引至沔河、汲河上游,循史、沔、汲、淠等自然河道的分水岭居高临下自流灌溉;龙河口水库水分两路,一路北上过丰乐河入六安,与淠河总干渠相通,一路东行,深入巢湖地区境内。

规划还强调在灌区内普遍整修和改造塘坝,增修中、小型水库以蓄当地径流。同时考虑到各种水源工程的联合运用,以发挥中、小型水库和塘坝对上游水库泄水的反调节作用。统筹安排当地径流和外来水源,使大、中、小工程有机结合,有利于充分利用水资源,扩大易旱丘陵地区的灌溉面积,减少各级渠道及建筑物的工程规模。

由于淠史杭灌区总体规划和设计科学、合理,曾获得安徽省1986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四

淠史杭灌区工程由水源工程、渠首枢纽工程、渠道和各种水工建筑物组成的。

水源工程除大别山区5大水库外,还有23座中型水库、1000多座小型水库及20多处塘坝。安丰塘、众兴水库蓄水库容近1亿立方米。此外,干渠下游还建了39座提水站。遇到旱年,可以抽

调淮河、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和巢湖之水补给灌溉。几种水源合为一体,为灌溉供水提供了保证。

渠首枢纽工程共有 3 处:一是位于六安市苏家埠附近的淠河灌区横排头渠首枢纽工程。建有进水闸、冲砂闸、溢流坝和可通航百吨位船只的船闸等。灌区控制面积 7750 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积为 660 万亩,其中自流灌溉 431 万亩、提水灌溉 229 万亩。二是地处金寨县境内的史河灌区红石嘴渠首枢纽工程。分设向皖、豫两省史河和梅山两大灌区输水的进水闸及冲砂闸、溢流坝等。安徽省境内灌区控制面积 3526 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积 285 万亩,相当于史河灌区内耕地总面积的 92%。近期灌溉面积 273 万亩,其中自流灌溉面积 256.4 万亩、提水灌溉面积 16.6 万亩。三是位于舒城县境内的杭埠河灌区渠首枢纽——龙河口水库。它既是水源工程,又是渠首枢纽。舒庐干渠和杭北干渠从水库的牛角冲和梅岭进水闸引水,灌区控制面积 1854 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积 155 万亩。

横排头渠首枢纽是淠史杭工程中最大的水工建筑物,工程量巨大,仅土方就有 177.7 万立方米。建在沙层上的 500 米长的溢流坝拦腰截断淠河,要与洪水争时间,抢在灌溉放水之前完成施工任务,工程十分艰巨。修筑土坝开始,又恰逢久旱无雨,酷热难当,仅 3 个月时间,净高 7.5 米、长 600 多米的大坝就如期完成。开工不到一年时间,渠首放水抗旱,当年就灌田 77 万亩。

灌区的渠系,以控制灌溉面积的大小划分为七级固定渠道。灌溉规模为 200 多万亩的总干渠 2 条,总长 145 公里;30~200 万亩的干渠道 11 条,总长 840 公里;10~30 万亩的分干渠道 9 条,总长 400 公里;1~10 万亩的支渠 326 条,总长 3345 公里;0.5~1

万亩的农渠共 1 万多条,总长 2 万多公里。挖渠道时,按设计走向,逢岗切岭,遇洼填方。整个工程切深 10 米以上的深切岭 98 处,填高 10 米以上的高填方 48 处。著名的平岗切岭工程,地处史河总干渠的咽喉。勤劳的霍邱人民只用了一个冬春的时间就将 2000 多米长的山岭一劈为二,切岭深达 24 米,底宽 35 米,搬走土石方 342 万立方米,引来梅山水库之水,为建设灌区创造了丰功伟绩。在樊通桥切岭中,民工刘美三创造了“劈土法”,平均每人每天可劈土 50 余方,比用锹挖土工效提高数十倍,大大缩短了工程建设时间。

灌区分干渠以上兴建各类建筑物 3200 多座,支渠以下渠道兴建建筑物 2 万多座。除了涵闸、斗门、跌水外,还有渡槽、倒虹吸、铁路桥、机耕桥、人行便桥等。五里墩大桥为六安至合肥公路跨淠河总干渠的桥梁,宽 20 米,长 106.8 米。196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来灌区视察,为之题词:“沟通三河,横贯皖中。”

灌区还建成机电排灌站 644 处,外水补给站 39 处,总装机 14 万千瓦。

五

宏伟的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效益。1958 年开始灌溉,1981 年起有效灌溉面积超过 800 万亩。要灌有水,无需靠田间蓄水。150 万亩沔水区,现已改种绿肥,灌区绿肥面积一度达到 200 万亩。适应沔水田的高秆品种,也已全被高产矮秆品种代替。数十万亩荒野变成了沃土,100 多万亩旱地变成了水田。有水种稻、无水种杂

粮的 200 多万亩水旱田,现在种的是一麦一稻、一(油)菜一稻,或双季稻。自流灌溉每年节省下来的车水用工以千万计。至 1988 年,3 个灌区累计引水量为 1060 亿立方米,累计灌溉面积 1.8356 亿亩。调查资料表明,因水利条件改善而增产的粮食达到 205 亿斤。至 1988 年,灌区建设总投资 10 亿元。其中国家投资 5 亿元,群众自筹 5 亿元。仅增产粮食一项,其价值已超过总投资的 5 倍。1982 年,霍邱、寿县、六安、肥西、庐江、长丰等 6 县被国家确定为商品粮基地县。近 10 年,全灌区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 15 亿公斤。

除灌溉外,淠史杭工程其他综合利用效益也十分显著。渠道上利用水位落差已建水电站 42 座,装机 13456 千瓦。发电量大部分已并入电网。1959 年,渠道内出现第一批船只。1970 年,从横排头渠首到长丰县双墩集全长 142 公里的航道已可通行 100 吨级船只,使大别山区的水运与淮南铁路相衔接。现在仅六安市在渠道内就有机动船只 500 艘,总计 1.8 万吨。其他干渠也已实现区间通航。从淠河总干渠经瓦埠湖入淮河的淮淠航道,正在按五级航道标准建设。灌区内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有 60 万亩。近 10 年,库塘养鱼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淠河总干渠穿过皖西的六安市区,为全市用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淠河总干渠之水还进入董铺水库,直接向合肥自来水厂供水。现在城镇工业及生活用水,还不到灌区总供水量的百分之一,潜力很大,这对灌区范围内的城市、工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跃进中的水利之花

——花凉亭水库建设纪实

丁先

花凉亭水库位于太湖县境内大别山南麓皖河支流长河的岔路乡花凉亭,距太湖县城5公里,是一座具有防洪、灌溉、发电、养殖等综合性功能的大型水库。水库枢纽设施主要有拦河大坝、发电隧洞、发电厂房、泄洪隧洞、溢洪道5项工程组成。水库控制面积1870平方公里,占长河流域面积的73%,占皖河山区面积的42%。水库总库容为23.98亿立方米,现有防洪标准核定为可防最大洪水。

花凉亭水库是安徽省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上马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大跃进”时期开工,以后复工续建,规模较大、质量较好、效益明显的水库工程的代表。

建国初期,与大规模治理淮河相呼应,安徽省长江流域也开始进行治理和开发。1951年,安徽省和安庆专区水利部门开始着手皖河流域开发水资源和防洪规划调查。调查中发现,皖河流域以农业生产为主,粮食生产多种植水稻,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流域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型,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6.0℃,

平均无霜期 240 天左右,雨量丰沛,年平均降雨量在 1400~1500 毫米之间;降雨受季风影响明显,年际差异较大,年内分配不均,丰水年与枯水年的年降雨量相差 1~3 倍,年降雨多集中在 5~6 月份,7~9 月份较少;受地形和水利条件限制,高塋耕地长期缺水易旱,而太湖北部山区洪水经花凉亭注入长河,丰水年又造成沿岸耕地内涝。为了兴利除害,科学开发长河上游水资源,引入下游丘陵区灌溉农田,当时提出了兴建花凉亭水库的设想。

1954 年 4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水利厅在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后,编制了《皖河全流域查勘报告》,正式提出兴建花凉亭水库。1956 年,为编制《巢滁皖流域规划》,治淮委员会巢滁皖流域规划组派勘测队实地选定花凉亭水库坝轴线。同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与安徽省人民政府水利厅负责人陪同苏联专家布可夫查勘了花凉亭水库坝址。1957 年 7 月至 1958 年 8 月,治淮委员会地质勘测队、南京大学生实习队、安徽省水电厅地质勘探队对皖河兴建水库的坝址地质等进行勘探和复测,最后拟定了兴建水库的三条坝轴线,经过比较,以下坝轴线花凉亭位置为最佳。

二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在大办水利的形势下,安徽省提出了“三年实现淮北河网化、全省水利化”的口号,安徽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个大干快上、遍地开花、高速发展的局面。花凉亭水库建设作为这一时期重要工程项目也快速地向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分头进行。7 月,为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早日发挥效益,在各项设计文件尚未编制完成的情况下,中共安徽省委决定上马兴建花凉亭水

库,8月批准施工方案,组建花凉亭工程局。施工力量由治淮委员会第六建筑工程队和工程总队第三、五等支队合并而成,属安徽省建筑厅领导(1959年下半年改属安徽省水电厅领导)。工地设有指挥所,有职工1000余人。施工总方案计划原为1年拦洪、2年发电。8月15日,在边勘测、边设计、边筹备的情况下,正式动工兴建花凉亭水库。最早开工的工程项目是开挖兼作导流的引水发电隧洞。发电隧洞开挖建设,由于岩石坚硬和施工机械设备不足,进展缓慢,领导心里很着急,找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决定在左岸台地上开一条5年一遇洪水标准的引河,引河流量为185立方米每秒,以代替发电隧洞在枯水期的导流任务。引河工程于1958年9月初开工,下旬完工。

1958年10月,拦河大坝开工。为使工程早日建成,整个工地提出“一切为了大坝上升”的口号,实施人海战术,最高上工人数多达3万人。坝料运输和坝身填筑大搞技术革新,自制木斗车、木轨车、柴油机车等,并用采砂船采砂,修复和配备宽皮带机,解决坝面升高和上坝运输困难,上下游运土路线多处并进、土洋并举,使运输功效大为提高,大坝日回填土石方量最多曾达1万立方米。在施工中注意保证质量,改进碾压工具和方法,自制羊足碾,采用薄层碾压,坝体取样检查,合格率达96%。大坝施工,因心墙钢板桩截水墙打桩难打到规定深度,采用粘土水平铺盖及心墙方案,进行小断面施工,上游坡按设计断面填筑,下游坡采用临时断面。10月中旬,遭受洪水袭击,大坝施工围堰破溢。1959年2月又遭意外洪水,当时发电隧洞尚未打通,无法进行导流,打乱了整个施工计划,误工2个多月。保护大坝施工导流的引河于1959年3月下旬动工,5月基本完成。在4~6月间,曾安全行洪10余次,从而

使大坝填筑得以顺利进行。1959年9月,大坝抢筑到72米高程,发电隧洞初步打通,及时进行引河正式合笼,转入隧洞导流。引河合笼以块石断流,上游抛土闭气。1960年4月,引河段坝体填筑到与河槽段坝体相平,开始全坝段均衡填筑,10月起拦河坝开始全面填筑。

1962年,拦河坝心墙筑到86米高程,上游坝体达91米,上游面块石护坡达85~88米高程,下游坡脚排水体已筑到46米高程。此时,安徽贯彻执行“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调整基建重点。花凉亭水库工程遂停工缓建,转向花凉亭灌区建设,开始兴建西灌区,由花凉亭水电站工程指挥部承担灌区施工任务。省里要求尽快以小流量通水,使太湖县江塘、徐桥地区灌溉受益。

至1962年停工,发电隧洞完成了检修平台浇筑及闸门安装。溢洪道左半部约30米宽,基本开挖至88米高程。发电厂房完成基础混凝土及行车柱混凝土浇筑任务,大坝填筑到高程86米左右。整个工程与1960年2月省计划委员会批准的设计任务书设计水库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相比,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水库成为半拉子工程。在缓建阶段,水库工程仅做了完善保坝断面的零星维护及拓宽部分溢流道工作,以确保汛期大坝安全。

三

1970年9月,为满足花凉亭下游灌区发展灌溉用水需要,安徽省革委会正式批准花凉亭水库复工建设,并确定工程指挥部归

安庆专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业务归属省水利电力局管理。复工续建时,编制了《花凉亭水电站修正设计》,明确水库是发电、防洪、灌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防洪标准为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拦河坝为一级水工建筑物,坝顶高程 98.5 米,心墙顶高 96.5 米,坝顶宽 8 米,最大底宽 442.8 米。上下游坝坡均设有两级平台,大坝左岸设计宽约 10 米的上坝公路 1 条。防浪墙顶高程 99.4 米,死水位 74 米,汛限制水位 85.5 米,正常蓄水位 88 米;兴利库容 8.75 亿立方米,设计洪水位 95.58 米,校核洪水位 97.61 米,总库容 23.98 亿立方米。溢洪道根据水工模拟试验采用实用堰,堰顶高程 82.8 米;以鼻坎挑流消能,系 8 孔,总净宽 96 米;设弧形闸门,万年一遇下泄流量为 10320 立方米每秒。发电隧洞考虑在非常时期参加泄洪,出口改为高压弧形闸门控制。同时,按照当时“备战、备荒”的精神,增加了泄洪洞设计项目。泄洪洞布置在右岸,按二级标准建筑物设计,泄洪隧洞全长 480 米,洞径 8 米,进口底槛高程 60 米,出口为挑流消能,有闸门控制。

花凉亭水库工程复工,施工由安徽省水电建筑安装支队、安庆行署水电局工程队和太湖、宿松、望江、怀宁、潜山 5 县民工共同承担。1971 年春,工程指挥部成立民工团,共 7000 余人;太湖、宿松、望江、怀宁、潜山 5 县各设立民工营,主攻大坝填筑和溢洪道等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物由省、行署建筑工程队分别承担。1976 年花凉亭水库拦河坝、溢洪道、发电隧洞、泄洪隧洞 4 项主体工程均按设计要求基本建成,发电厂房已具备装机规模。1980 年冬,省电力局花凉亭水电站开始进行电站一、二号机组安装。1981 年 10 月,一号机组开始投入维护性发电;11 月 26 日,二号机组发电并网;1985 年 8 月,三、四号机组开工安装,1987 年 1 月 20 日并网

投产。

自 1958 年开工至 1988 年,花凉亭水库(电站)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9427.71 万元(包括 1225.64 万元的库区移民经费)。花凉亭水库建成后,可使百年一遇洪峰流量由 10920 立方米每秒削减 77%,成为 2500 立方米每秒;使千年一遇洪峰流量 17270 立方米每秒削减 47%,下降为 9153.1 立方米每秒。自 1960 年至 1988 年,入库流量 2000 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有 21 次,其中超过下游太湖县城防洪能力 4000 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有 6 次,一般削峰能力在 89%—94%。1983 年的削峰能力达 94%,是年最大进库流量为 7784 立方米每秒,而最大下泄流量为 464 立方米每秒,使下游长河两岸 17 万亩农田和 17.8 万人的生命财产免遭洪水威胁。1991 年汛期,花凉亭水库大水,坝上水位高达 84.76 米,溢洪道首次溢洪,通过溢洪道、泄洪洞、发电尾水排放、出库流量共为 1084 立方米每秒。据估算,仅截至 1983 年,防洪减灾效益就已达 6.8 亿元。1981 至 1988 年,累计发电 3.83 亿千瓦时,主要供应安庆、铜陵两工业城市和太湖、贵池等 5 县县城工业及农村排灌用电。利用花凉亭灌区渠首枢纽和干渠水位落差发展小水电,装机 4 台共 960 千瓦,平均年收入 16 万元。

依靠花凉亭水库供水的花凉亭灌区,设计面积 103.3 万亩,灌溉设计流量 70 立方米每秒,在干旱年份水库能向灌区供水 6.6 亿立方米。灌区自 1964 年开始受益,1971 年扩建,至 1988 年实灌面积已达 63.5 万亩。1978 年灌区遭遇 30 年一遇的旱灾,从 6 月 15 日至 10 月 13 日,130 天未下透雨,全年从水库引水 4.1 亿立方米,实灌面积达 50 万亩,使大旱之年夺得了农业丰收。据 1984 年对灌区 4 县的典型调查,每年每亩因灌溉净增粮食平均为 90 公

斤。从1966年至1988年,灌区从水库累计引进水量87.6亿立方米,累计灌溉农田999.7万亩。

水库蓄水以后,正常蓄水面积约为78.2平方公里,最大水面宽约4公里。坝址到寺前、黄镇、牛镇各区均可通航。花凉亭到岳西县店前55公里可通排。1978年后,随着经济的繁荣,水上运输业有很大发展,共有大小船只130艘、780吨位,年货运量19万吨。花凉亭水库在正常水位下,可养殖水面约11.7万亩,仅1974~1987年,共捕鱼650余万公斤,折合人民币1000余万元。

在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年代,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安徽水利建设走过曲折的道路,出现过失误,但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花凉亭水库建设最终成功是一个例子。从1958年到1961年,花凉亭水库的建设者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建筑物资器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积极创造条件,既保工程进度,又保工程质量,为后来复工续建,发挥效益奠定了基础,成为当时开工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之花。

文化“卫星”——司集乡

刘延年

从合肥往东 50 里，就是位于黄麓山北麓的巢县司集乡。如果你是 42 年前的仲夏时节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诗歌的海洋里了。你会看到两边的村庄、每家的墙上、村口的土坊上都写满了诗歌、画满了图画，甚至连路两边都用石子铺成了诗句。这里人人是歌手，个个是诗人，诗画满墙头，歌声遍山野。这就是“大跃进”运动中安徽的文化“卫星”之乡——司集乡。它不但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当年全国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现场会就在这里召开过。

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1958 年 8 月初，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率领江苏、河南、江西和湖北 4 省文化局长来司集乡参观考察。参观结束后，钱俊瑞写下一首诗来概括司集乡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政治来挂帅，生产大解放。

工农知识化，生产大高涨。

人人学科学，技术个个强。

人人看电影，每月两三场。

人人能唱歌，歌声满城乡。

人人能舞蹈，男女喜洋洋。

人人能创作，诗歌是海洋。

人人能画画，处处是画廊。

人人能表演，百花齐开放。

文化大普及，红旗天下扬。

这首诗比较生动地描述了作为安徽文化“卫星”之乡的司集乡在文化“大跃进”中的面貌。这个2.1万多人的乡，不仅是诗与画的海洋，而且人人能歌善舞；这里的歌手和舞蹈家到过合肥，也到过北京；这里的演员不但善于演戏，而且剧目繁多，不管你是皖南、皖西、凤阳或是淮北人，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家乡戏。

作为安徽省文化“大跃进”的一面红旗，首先，司集乡坚持书记挂帅、全党动手，把它作为全面发动群众的关键。乡党委认为，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满足群众的文化需要，这是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要求每一个干部都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宣传鼓动，使文化工作作为政治和生产服务，并反过来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为把群众的文化工作和政治思想领导结合起来，乡党委规定，社队干部要进行严格的“四包”，即包政治思想、包文化技术、包改变落后村、包完成各项任务。干部回报工作时，文化活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乡党委书记下去检查工作时，也检查群众的文化活动情况。这样，既做到文化工作为生产、政治服务，与生产一齐进步，也促进了全乡文化工作的蓬勃发展。其次，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支持群众的文化要求，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这个乡的文化活动之所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主要是乡党委发动了群众，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乡里的“大跃进”展览馆虽起于书记的倡导，但却是群众的集体创作与贡献；“爱国日”制度的内容丰富充实，是联合社社员坚持几年的结果；诗歌上墙，大搞跃进坊也是个别社与生产队搞了以后才推广的。第三，坚持文化工作为生产、

政治服务,绝不能脱离生产任务和政治任务提什么别的任务。党的中心工作就是文化方面的中心工作,文化工作根据当时的中心工作来开展活动。每当一个政治任务或中心工作到来时,乡里就立即发动大家动手来做宣传工作。宣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最普遍采用的是诗歌这一形式。

作为全省文化跃进的一个典型,司集乡党委非常注意抓好文化革命运动的宣传工作。年初,乡党委提出“苦干一年,实现万斤山芋千斤粮,120斤皮棉400斤麻,荒山栽满树,四害消灭光,人人都识字,实现文化乡”的口号。干部群众很快就把它写成标语,编成秧歌、快板、顺口溜到处宣传,使这一口号深入人心。坊集乡连78岁的老奶奶和七八岁的孩子都会唱“万斤山芋千斤量,120斤皮棉捺满仓”。全乡开展了一个“千人编,万人唱”的歌唱运动,从乡党委书记到全体干部,从老人到孩子,大家都在编、都在唱。乡党委书记到赵家埠检查工作,随口就把沿途所见编成顺口溜:“提起赵家埠,以往真不照,通过大跃进,一片新面貌,干部决心下,社员干劲大,起早又带晚,积肥四十万(担),午季连成片,大块丰收田,亩产四百斤,丰收在眼前。一进跃进门,民校在中心,村旁道路报,宣传大跃进。”

随着“大跃进”的进展,乡党委决定大办广播,用广播来宣传政治形势、安排生产劳动、表扬先进人物。小队干部下田,个个都带广播筒,他们在哪里生产,就在哪里宣传。平时只要一有紧急任务,广播一响,要生产,马上拿锄背耙;要开会,马上三五成群,涌向会场。哪里有成绩,就在哪里就地加工,进行表扬。大树、高坡、田头,甚至过去的神台,也都成了临时的广播台。除广播外,村村都有跃进坊。跃进坊上有时事政策宣传、农业先进技术介绍和批评

表扬,形式多样。群众说:“跃进坊,真不瓢,有批评,有表扬,歌唱大跃进,宣传党的好主张。”乡社还办有油印小报,每隔5天出刊一次。乡里出的是“大跃进快报”,各社出的有“生产鼓动报”、“战斗包”、“前进报”、“捷报”等。这些小报,着重交流经验,指导生产和表扬先进。各个生产小队的读报组除了订《巢县报》,还能按期读到乡社的油印小报。

大字报也是乡里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党委到小队长的住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见到各种形式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群众的家里边。乡里有一位妇女,因为孩子小,需要照顾,对集体劳动不是那么热心,就被贴了一张大字报:

懒蚂蝗

我队有一个懒蚂蝗,大天四亮不起床。早上怕露水,中午怕太阳;人人生产打突击,她在家里抱儿郎;你要动员她干活,她翘起鼻子不答腔;东劝西说开了口,眼睛一翻又装佯:“我家小宝要照顾,要有好歹谁承当。”明明宝宝有人带,撒谎偷懒太荒唐;如果坚持不改正,大字报要贴四方。

社会主义歌唱运动会是司集乡文化跃进中一个突出的内容。这里人人是作家,也是歌手。白天在田里干活,他们随干随唱。傍晚收工了,又一路歌声回到家里。晚饭后,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又纷纷来到土台子装点的舞台上开始歌唱。这样的歌唱会每隔两三天就举行一次。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可以登台一展歌喉。在一个晚会上,首先20多个姑娘上台了,她们用“丫头调”唱起了“幸福歌”:

姑娘喜唱丫头调，唱遍巢湖和滁河。

唱得黄山点点头，唱得太阳不下坡。

姑娘喜欢唱山歌，出口就唱幸福歌。

歌唱共产党领导好，歌唱毛主席恩情多。

不单姑娘、小伙子爱唱，连老头子、老太太也组织了“老黄忠队”、“老奶奶队”，还有家庭合唱队和儿童合唱队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王长荣上台唱道：

莫笑我牙齿不关风，唱歌要唱东方红。

而64岁的疏寿祥唱的是：

叫我唱歌我就唱，肚里山歌几箩箩。

如今世道我不唱，留着精神干什么？

全乡2.1万多人，参加歌唱运动的就有1.5万多人，能够创作兼歌唱的有1.3万多人。中年妇女梁英芝随口能唱80多个曲子，青年女歌手胡吉英、江道英、吴华芝能唱100多首。他们不但能编唱歌曲，还能编演戏曲，且曲目繁多。他们还把生产劳动的动作编成舞蹈，把劳动艺术化。比如在剥麻时，就根据剥麻的动作，编成了剥麻舞。据说这样能提高人们的剥麻速度。乡里还出现了作曲家。

下面是1958年初司集乡文化活动基本情况一览表，可以看出当年这个乡文化活动的一些情况——

关于文化教育：

小学教育已经普及
青壮年文盲扫除 80%
民办小学 8 所
成人民校 155 所
民办中学 4 所
干部红专学校 2 所
“大跃进”展览馆 3 个
医疗所 3 个

关于文化活动：

民办文化站 8 个
民办俱乐部 35 个
男子篮球队 33 个
女子篮球队 14 个
民办图书馆 16 个
科技讲演座 35 处
米丘林小组 35 个
气象预备台 8 处

关于文艺活动：

文艺创作组 267 个
定期文艺刊物 8 个
已创作民歌 21 万首
壁画 4.5 万幅
农民业余剧团 35 个
电影放映队 1 个
业余舞蹈队 126 个
老奶奶合唱队 25 个
千人大合唱队 1 个

关于宣传鼓动的：

有线广播 1 座
时政宣传队 56 个
定期油印报纸 16 个
幻灯放映组 4 个
土广播站 25 处
田间广播站 86 处
生产鼓动牌 267 个
跃进门 85 个
大字报 167 处
黑板报 223 处

二、“望风采柳”、“照风挂牌”的诗歌创作

1958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号召创作和收集新民歌时，群众对这一新生事物并没有真正理解。乡党委书记徐守勤为了鼓舞群众进行创作，自己先创作了一首：

好的我就学，快的我就追；

人骑快马，我驾火车；

别人跑步走，我就插翅飞。

接着又作了一首关于破除迷信的诗：

诗满墙头歌连片，人人入学把书念。

坚决冲破文化关，作家诗人田头见。

群众看到原来这就是诗，与通常的开口说话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是五、七言组成的句子罢了，也就跟着写起诗来。在乡党委书记的带动下，到5月份，全乡形成诗歌创作的高潮。在诗的题材方面，是根据劳动和生活的情况，见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什么活动就写什么。他们把这种创作方法叫做“望风采柳”和“照风挂牌”。乡里又把诗歌当作政治鼓动的工具，劳动之中出诗歌，政治任务越大，劳动越紧张，诗作得也就越多，歌唱得也就越欢。这个乡夏天100多天没下雨，但诗歌却创作了20多万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抗旱中创作的。为了鼓舞人们抗旱的干劲，干部开会和下乡检查工作，都要随时随地进行创作；群众在田间劳动，也你一句我一句地“凑”起诗来。全乡267个小队变成了267个诗歌创作小组，他们不仅是劳动的能手，还要在劳动中进行歌唱比赛，完成大量的诗歌创作。5月份，乡里的坊集社组织青、老年歌咏比赛，一个晚上就唱出300多首歌。如描写抗旱的一首：“车不能车用桶挑，桶不能挑用瓢舀。舀也舀不到地下挖，滴水也要润禾苗。”虽然

诗味不足,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当年旱情的严重和群众抗旱夺丰收的热情。抗旱期间,他们曾在一个晚上把一条 13 华里长的干沟挖成一条小河,然后就写下这首诗来表示祝贺:

天河一夜变成河,天上王母好害羞。

开河比我撒河快,如今老身甘认输。

群众的干劲已经胜过神的力量了。

8月初,他们把百里外的巢湖水开渠引上了黄麓山,于是有诗:

黄山三百六十洼,巢湖三百六十岔,

一山一水百里远,如今两家变一家。

下面是歌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

走路要走阳光道,唱歌要唱四十条。

要唱远景和幸福,要唱庄稼比产量。

要唱陈规改革掉,高产作物更搞好。

唱得庄稼呼呼长,唱得老头子点头笑。

歌唱积肥的:

村村肥泥堆连堆,堆个懒龙飞上天。

遇到社员一声吼,吓得老龙滚下田。

懒龙摇身猛一变,变做庄稼戳破天。

秋后粮食堆满仓,懒龙堆子又还原。

宣传选种的:

午收季节到,选种最重要,

种子年年选,产量节节高。

表现群众冲天干劲的:

青年干劲大，万箭一齐发，
触天天即破，碰地地即塌，
江河要驯服，大山要搬家，
诸神都让位，由我来当家。

歌唱当地风光的：

远望黄山青连天，近望黄山不见边。
微风吹得山头笑，笑得平地米粮川。

一个68岁的老大爷唱的是：

我像张果老站云头，白胡苍苍来唱歌。
有人问我唱什么，日子越唱越快活。

在新民歌创作的运动中，司集乡还组织了男女老少各种合唱团，如“老黄忠合唱团”、“穆桂英合唱团”、“少年罗成合唱团”等。乡里还涌现出了许多创作高手。石桥社社主任张春政5个月创作了900多首诗歌，他还计划在1958年全年创作1500到2000首。其他乡社干部和群众也人人都有一个惊人的创作计划，全乡的奋斗目标年产100万首诗歌。“作家千千万，李杜也平常”、“三岁儿童成歌手，八十老妈妈舞蹈忙”，这就是这个诗歌之乡的真实写照。用当时的话说，整个司集乡人民的精神生活已经诗化、艺术化了。

三、一个奶奶合唱队

在司集乡文化“大跃进”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就是坊集乡在“红五月”歌咏活动中组织起来的奶奶合唱队。

5月初，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县人民要“人人唱歌，个个创作”。坊集社在乡党委的督促和指导下，由俱乐部出面，当即组织了9个生产队的歌唱队，于“五一”节晚上进行诗歌创作竞赛。这个社有18位老大娘，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爱唱歌，都是唱歌能手。

晚上,文化站的同志有意识地把她们邀请过来,让她们听听年轻人的歌声。也有些老大娘是听到歌声,挤进会场看热闹的。竞赛会上,小伙子们“望风采柳”、“自编自唱”的热闹场面使她们十分激动。她们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光,嗓子痒痒的,也想上去和年轻人一较高低。65岁的孙大娘站起来说:“这样唱歌,我们也会。”小伙子们向她挑战,欢迎她也来唱一首。不甘示弱的老大娘走上台去,开口成诗:

叫我唱来我就唱,多年不唱心发慌。

秧歌不唱别的事,秧歌歌唱共产党。

其他的老大娘也受到邀请。在竞赛会气氛的感染下,她们一改平常的拘谨,走上台去,自编自唱起来。老奶奶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党支部书记的表扬和支持。会后,文化站的同志就找到她们进行组织,成立了一支35人的奶奶合唱队。像这样的奶奶合唱队,全乡共有25个,其中仅坊集农业社就有好几个。

一次,乡里举行8000人的歌唱会。作为歌咏队的一员,奶奶歌唱队也走上舞台。她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已经78岁,最小的也有56岁了。她们唱的民歌是:

叫我唱来我就唱,心里喜欢自来腔。

感谢共产党好领导,感谢毛主席好主张。

今年生产大跃进,干部群众干劲强。

你唱我唱都来唱,唱得粮食堆满仓。

奶奶合唱队与青年合唱队一样,哪里开会,哪里有新的任务,哪里就有她们的歌声。1958年夏天粮食预交预售时,奶奶合唱队也排着整齐的队伍,每人担起三五斗粮食,跟着坊集社的送粮大军,边走边唱:

毛主席来共产党，领导人民力量强。

支援国家大建设，出售余粮交公粮。

坊集社的奶奶合唱队在全乡都是出了名的。她们经常被乡里、区里邀请去唱歌，在邻村邻社也经常能看到她们的身影。乡里只要一开大会，或附近的俱乐部举行文艺活动，都要请她们去唱一唱。平常在社里，不管是上工放工的途中，还是中间休息，田间地头到处是歌声，而这其中总有奶奶合唱队的大合唱。她们跟年轻人比生产，争唱歌，被年轻人称为“老将黄忠不服老”。坊集社在开展歌唱活动以前，生产和文化工作在乡里被评为三等社，而在普遍开展歌唱运动，特别是奶奶合唱队参加歌咏大军以后，社里的工作一跃进入二等社的行列。这不，她们又和年轻人比试起来了：

田间地头争着唱，唱歌干活精神旺。

男女老少齐唱歌，秧歌越唱越快活。

唱得庄稼点头笑，唱得今年丰收到。

界首除“四害”

刘延年

一

在1958年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安徽省的先进地区是阜阳，阜阳地区的先进县是界首。

自《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下发以后，界首县即开始了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当1958年1月14日安徽省除“四害”誓师大会召开的时候，界首县正召开县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县委把消灭“四害”的时间由原定的5年缩短到2年，再缩短到1年，最后改为5个月，在当年上半年完成任务。县委书记郝如意亲自担任除“四害”总指挥。会上，每个代表都向党作出保证，表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的决心。会议决定，各乡社分别成立作战指挥部，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指挥。同时，采取层层分片包干的办法，县委委员包乡、乡干部包社、社干部包队、队干部包片、党团员包户、机关包所在地，建立严格的除“四害”责任制，把工作落到实处。会上，界首县向全省各县发出除“四害”挑战书，全体县委委员和县除“四害”指挥部的全体同志都签了名。

会议结束后，各乡镇党代表连夜回乡召开会议，组织战斗队伍，并利用有线广播等宣传工具，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各乡镇还普遍组织了群众性的除“四害”示威游行。游行的队伍高喊着

“消灭四害，人人动手。四害不除，绝不罢休！”“向四害大进军，不让四害过春节”的战斗口号，场面十分壮观。

为了提高群众消灭“四害”的决心，界首县还通过群众性的控诉“四害”罪恶的活动，使人人了解到“四害”的危害，以及铲除“四害”的必要性。该县王烈桥乡、肖楼乡和城关等地在过去都有过老人小孩被老鼠咬伤咬死的情况。1932年，界首一带普遍流行霍乱，老百姓称之为“大家瘟”。肖楼乡的靳砦只有几十户人家，数日内死去93人，有数户人家全部死光；韩湾乡房庄一个庄死了100多人。通过控诉和教育活动，群众增强了铲除“四害”的决心和信心，表示一定要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投身到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中去。大家说：“四害是害人精，一定要让它断子绝孙。”

从1月14日开始，界首县平均每天投入除“四害”的人数有20多万，最多的时候达23万，约占全县人口总数的80%。这些人分别组成捕鼠队、捕雀队、灭蚊蝇队、挖蛹队和各种突击小组，用各种工具消灭“四害”。在室内、屋顶、田野、树林、草堆等各个角落，都有除“四害”的侦察兵、突击手、狙击手、神枪手，密布下天罗地网，形成使“四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强大攻势。在最紧张的时刻，县里的党政领导和全县人民一起，曾连续突击围剿了15个整夜，而白天仍照常工作和生产。为了减少除“四害”运动和农业生产的矛盾，群众想出“忙里偷闲”的办法，即白天忙生产，夜晚除“四害”，除“四害”和各项生产紧密结合。劳动力不够，就把老、幼组织起来，因人分工，各尽其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本着这种精神，亮集乡邢寨村经过6天4夜的突击，即实现了“四无”；肖楼乡的肖竹园村经过4天4夜的突击，也做到了“四无”，并从根本上改

变了原来的不讲卫生的习惯。

经过群众性的大规模围剿，“四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剩下的老鼠和麻雀也都变得狡猾起来。许多老鼠把家从墙洞搬到山芋地里或草堆、草垛下面，有的甚至往湖野里搬。平时放的鼠夹、鼠弓和吊坯也不上钩了。麻雀见人就飞，夜不归巢。县里根据老鼠和麻雀活动的规律，针对其新的活动特点，变换了战术，采取伪装、埋伏、偷袭、佯攻和伏击相结合等办法来对付它们。全县乡乡社社搞联防，组织少年儿童侦察小组和盯梢小组，紧紧盯住“四害”不放松。陶庙乡采取诱剿麻雀的办法，发动儿童把麻雀赶到树林或竹园内，由神枪手伏击，一个晚上擒获麻雀30只。光武乡以63个神枪手为核心，成立18个捕雀战斗队，划片包干，利用早晚突击消灭麻雀。这个乡的大同一社官王庄剩下最后一只麻雀，已经变得非常狡猾，常常飞得无影无踪。但突击队员们并没有对它放松，他们组织了4个少年儿童对它轮流盯梢。一天黄昏，根据“小侦察员”的报告，突击队员分几队包围了这只麻雀，还有20多个民工跟着助阵。麻雀走投无路，一头栽到水塘边的大沟里去了。大家马上行动起来搜索，结果在一个4尺多深的蟹洞里把它活捉了。

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3月7日，全县共捕捉麻雀70.6万多只，老鼠176.4万多只，捣毁雀窝25万多个，堵塞鼠洞200多万处。按全县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消灭的老鼠和麻雀达7只。同时消灭蚊子1.75万多盒、苍蝇6.29万多盒，挖蛆蛹6.21万多斤。

经过2个月的日夜奋战，界首县宣布于3月13日提前2个月基本消灭“四害”，成为“四无”县。县里召开庆祝大会，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给界首县委和县人委发来贺电，对界首县提前完成除“四害”任务表示祝贺。《安徽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

学习界首,加快脚步,迎头赶上,提前实现“四无”县、市。

在除“四害”的过程中,界首县还发明了把捕捉的麻雀和老鼠作为肥料给庄稼施肥,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办法。他们用老鼠、麻雀的肉作山芋基肥,培育山芋高额丰产田。芦村乡党委培养的4亩3分丰产田共施鼠雀4万多只,据说庄稼都获得了很好的收成。

实现“四无”县后,县委又提出“再接再厉巩固四无,大干苦干实现八无县”的目标。但到4月下旬和5月初,由于生产和水利任务很重,特别是在防治小麦锈病时,对除“四害”、巩固“四五”出现了松劲思想。县委根据这一情况并针对一些地方在消灭“四害”后的骄傲自满和松懈情绪,立即进行思想教育,进一步健全除“四害”的领导组织,推广除“四害”经验,使运动趋于正常。

入夏以后,进入农忙季节,同时蚊蝇大量孳生繁育。为了使除“四害”和农业生产两不误,县里采取了统一安排劳动力,指定专人负责的办法,使除“四害”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如积肥时结合铲除蚊蝇孳生地、田间管理结合除杂草、农药杀灭害虫结合灭蚊蝇、稻改结合灭子等。火攻也是他们消灭蚊子的重要方法。每到傍晚,他们就在村外和田野点燃起千盏红灯、万堆烟火,引蚊来投。群众编了一首民歌来颂扬这一方法:

火攻蚊子真方便,不用药物不用钱,
诸葛用火烧曹操,我们用火把蚊歼,
村边田头万堆火,蚊子投火丧黄泉。

另外,他们还发动看门的老年人管鼠具、堵鼠洞,儿童、学生与老年划片包干扑打苍蝇;组织射击手利用早晚麻雀归村时间集中捕杀,其余时间参加生产;把牛房猪圈包给饲养员,厕所包给积肥队。全县还利用清明、五一、端午、七一、八一等节日和夏收秋种的

空隙，组织为时不定或3天或5天或1周的大规模的突击活动。到9月份，6个多月的时间已举行17次突击，平均每10多天就举行一次。随着这些活动广泛深入的开展，全县已经很难找到“四害”的踪迹了。光武乡大李社基本找不到苍蝇，在六七月份举行的卫生检查中，平均每人两小时才能捉苍蝇0.25只；亮集乡三改一社10个村7月份检查，只发现1个污水塘和1块稻田里有孑孓。

经过夏季的严重考验，界首不但巩固了已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消灭了臭虫、虱子、跳蚤、白蛉子等害虫，出现了“麻雀不再叫，老鼠不再盗，吃饭无蝇扰，睡觉无蚊咬”的新气象。群众的发病率也明显下降，从4月至8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县总发病率减少48%。其中疟疾减少84%、痢疾减少28.6%、乙型脑炎减少42.4%，过去流行最严重的黑热病已经基本消灭。

在巩固“四无”的过程中，界首县委进一步加强了领导。除县委书记继续亲自挂帅外，又确定一位副书记和宣传部长具体负责领导。乡社也由各级党委负责人领导，把除“四害”工作列入整个工作日程之中，成为经常性工作的一部分。为了保持运动的经常化，该县还建立层层包干的制度，负责督促检查。每个生产队固定3~5名半劳动力负责垃圾、粪便、污水的管理。农村实行每天一次打扫，城镇实行每天早晚两次打扫。环境卫生实行划分清扫责任制，居民每逢初一、十一、二十一大扫除，机关每逢星期日大扫除，并建立了检查和评比制度。

注重培养典型，以点带面，促进全县除“四害”运动的开展，也是界首县除“四害”的成果得以巩固和运动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界首县非常重视培养典型，县里经常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和工作方法。界首镇、光武乡两地的粪便管理得好，经检验粪

便达到无害化,而含氮量却增加了 16 倍,县委就组织全县乡社干部到这两个地方参观。与此同时,县委还注意研究敌情,根据敌情变化组织力量,适时采取措施消灭“敌人”。该县从基本实现“四无”到夏末,曾连续出现过 6 批蛹化苍蝇。由于掌握敌情,适时组织力量,出来一批消灭一批,并严格控制了蝇蛹孳生地,因此,大大减轻了苍蝇的繁殖。

二

解放前,界首有这样几句谚语:“界首四荒,水旱黄汤,没吃逃荒,死在外乡”,“大病缠身,寸步难行,要想吃药,无有分文”。解放后,经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努力,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水平和公共卫生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讲卫生的习惯并没有彻底改变。随着这次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展开,在歼灭“四害”的同时,全县在公共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力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长期以来不讲卫生的习惯。

随着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界首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当时曾被总结为十大变化。

第一,厕所的变化。界首农村和淮北广大农村一样,1957 年冬之前,大多数人家都没有厕所,好多人家只在庭院内挖一个粪池子。大小便不是在粪池里解,就是在房屋后面或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巷口里解,一到夏秋之际,这些地方往往是苍蝇成排、蛆成团。现在不但有厕所,而且普遍取消了私人厕所,盖了公共厕所。公共厕所根据村庄的大小和户数的多少,有的村 1~2 个,有的村 3~5 个,全县计修建厕所 7427 个。已盖的厕所,作到了有屋、有门、有

缸、有盖，既清洁，又能多积肥。随着公共厕所的建立，全县已取消私人厕所和庭院内的粪池 6.2 万多个。门前的粪堆，一般都移到了村外。

第二，猪圈、羊圈和鸡笼、鸭笼的变化。过去猪羊无圈是普遍现象，一部分鸡鸭根本没有圈笼。因此，村里村外、家前屋后，到处是猪羊的屎尿，阴天下雨时，人们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除“四害”后，猪羊普遍有圈，鸡鸭普遍有笼有窝。许多地方还盖了公共猪圈羊圈，实行集体圈，分户饲养，全县共修建牲畜圈栏 14263 处。猪屎羊屎遍地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第三，房屋和室内卫生情况的变化。过去是绝大多数的房屋从来没有打扫过，许多房屋从盖好后就没有洗刷过。屋内蛛网密布，屋顶上黑色吊灰短的有半尺左右，长的有一尺多长。这次运动中，室内外普遍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床铺、家具、盆盆罐罐普遍进行了大搬家、大洗刷。全县有 49 万多间房屋，里里外外泥刷了一遍。许多人家还扎了顶蓬、漆染了门窗。可以说普遍做到了四面净、六面光，里里外外亮堂堂。

第四，污水沟和污水、污物处理方面的变化。过去集镇的街道两旁和农村中的屋前屋后，有许多污水沟和污水坑洼。许多阴沟不通，污水污泥有一尺多厚，有的稍一翻动，则臭气熏天。好多地方污水、污物随便乱倒。经过这次运动，全县计清理污水沟 1.44 万多条，填平污水坑洼 2.39 万多个，清除陈年古代的垃圾 375 万多担。大多数村庄做到了水沟畅通，即使阴雨天也不致贮存积水。杨小寨等地，家家户户都有用土坯做的垃圾箱，群众称之为“小型颗粒肥料厂”。

第五，村庄内道路的变化。过去村庄内的道路，差不多都是羊

肠小路，低洼不平，下雨之后，很多泥泞，加上粪便、污水，往往连下脚的空都没有。现在绝大多数村庄都铺成了鱼脊似的“卫生路”，路宽能拉车，雨后能穿花鞋走路。肖竹园等地还用砂礞铺路，又坚固，又平整。

第六，水井的变化。过去吃水井无栏无盖，也没有井台，经常有脏的东西掉到井里去。现在是绝大多数村庄的水井有栏又有盖，大多数水井四周还筑了井台。特别是配备了公共水桶之后，解决了过去许多水桶带下脏东西的问题。在卫生模范村杨小寨，在保持水井清洁方面做得更周密，水井上安装了手摇吸水机，井上不但有井盖，还有亭子式的井棚，远远望去，就像公园中的凉亭。

第七，厨房和锅灶的变化。过去厨房和锅灶一般是与住房连在一起的。锅灶无烟囱，烧锅的烟完全熏在屋里。现在许多地方已把厨房和住房分开，并支起了“牛尾灶”。

第八，树木的变化。过去许多村庄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现在是村村搞绿化，人人动手把树栽。全县在除“四害”中共植树1217万多棵，许多村庄已经实现了绿化。杨小寨的居民称颂他们的绿化是：“一桑二杨三榆树，四桃五杏树，道路两旁是柳树，家家门口还有一棵葡萄树。”

第九，个人卫生习惯的变化。大家过去一般都不注意个人卫生，衣服不洗，被子不晒，有的人单衣服穿坏了也不洗一次，被子十几年都不拆洗。不洗澡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别是妇女更是从来都没有洗过澡。经过这次运动，不但家家拆洗了被子，人人洗了衣服，而且普遍养成了五条卫生习惯：一、不喝生水；二、被子勤拆勤晒，衣服勤洗勤换；三、吐痰入盂；四、刷牙漱口；五、常洗澡。肖楼乡的肖竹园38户人家，已有60人开始刷牙，70人备有口罩，凡10

岁以上的都做到了各人用各人的洗脸毛巾。到9月份,全县已有107个村庄的青壮年坚持每天刷牙,人人备有洗脸毛巾,三天一洗衣,七天一晒被,常剪指甲,不喝生水,而且不少村庄做到户户有痰盂。由于人人爱清洁、讲卫生,疾病明显减少。如坚持六年如一日的卫生模范村杨小寨,1952年127人中,有120人生过病,其中生过传染病的42人,而1957年仅有3人得过流行性感冒,近年来没有一个人得传染病。

第十,人们思想面貌的变化。过去很多人认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有的说“庄稼人,泥里转,粪里滚,咋能讲卫生”、“生病是命里注定的,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经过这次运动,人们已经养成了爱清洁、讲卫生的习惯。比清洁、比卫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评比的重要内容。谁最清洁、最讲卫生,就向谁学习,就评谁为模范,就受到人们的尊敬。许多老年人的迷信思想,也在这次运动中得到了改变。桑树乡迎春社有个郭老大娘,1949年发现自己家里有一个白老鼠,即称之为“白大仙”。在她看来,这几年来的好日子都是“白大仙”保佑的,每逢过年过节就烧香祷告,对白老鼠的住处百般保护,不敢触动。这次除“四害”运动中,一开始她很不高兴,生产队长把两个老鼠夹子放到她屋里,都被她有意打落了,还说“这是有意害我这老婆子。”后来队里的干部多次到她家里谈心:现在你是社里的五保户,有吃有穿,社里又给你盖上了新房子,到底是“白大仙”保护你,还是共产党给你的好处?她被感动得流了泪,随即自己放了两个老鼠夹子,一夜捉了3只老鼠,其中一只便是“白大仙”。于是,附近的乡社都流传着郭大娘捉“仙”的故事。

当时有一首新民歌,反映了界首县除“四害”运动后全县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卫生习惯的巨大变化:

村村庄庄大变样，处处都是新气象。
粉的白墙黑门窗，四面净来六面光。
沟沟相通无积水，“卫生大路”通全庄。
村旁路旁栽满树，松柏桃李和槐杨。
水井有栏又有盖，公共厕所在村旁。
猪羊有圈牛有栏，鸡鸭有笼不乱放。
走到哪里都好看，人人心情最舒畅。
个个忙着大跃进，生产有劲多打粮。

大事记

大事记

1956年

1月3日~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安徽。5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6日，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视察肥西县肥光农业生产合作社。

1月14日，安徽省举行除“四害”誓师大会，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作动员。随后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以除“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召开，根据《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新讨论修订安徽省经济发展规划。其中，对工业成绩提出的目标是从1958年开始，用5~7年时间，即到1962年或1964年，全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73.6亿元，超过原定同年预计达到的71亿元的计划。在农业方面，要求到1962年或196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上粮产量的247.24亿斤提高到516亿斤，平均年增产1962年，更多一点时间达到685亿斤。会议还对安徽1958年春兴修水利提出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连同已完成的土石方，累计共达24亿土石方的要求。要求行成或涌起的浮夸风进一步发扬起来。

1月30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政府《通知》关于办理初級完小毕业班生的报告》，提出“初級农校”、“初級师范学校”是

使大坝筑成得以顺利进行。1959年9月,大坝开挖到72米高程,发电隧洞初步打通,同时进行引河正式合龙,转入隧洞导流。引河合龙以块石断面,上游抛土闭气。1960年4月,引河砂坝体筑成引与河槽段坝体相平,开始全坝段的高填筑,10月起拦河坝开始全面筑成。

大事记

1961年,坝料填心填筑到86米高程,上游坝体达91米,上游面块石护坡达85—88米高程,下游坡脚排水体已筑到46米高程。此时,安徽贯彻执行“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调整基建重点,花凉亭水库工程暂停续建,转向重点支援区建设,开始兴建西震区,由花凉亭水电站工程指挥部兼指挥部施工任务。省里要求库坝以小流量河水,使太湖县江桥、林桥等地居民受益。

至1962年停工,发电隧洞完成了核算平台浇筑及闸门安装,隧洞洞左半部的36米宽,基本开挖至59米高程,发电厂房完成基础混凝土及行车柱混凝土浇筑任务,大坝填筑到高程86米左右。整个工程与1960年2月省计划委员会批准的设计任务书设计标准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相比,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水库成为半拉子工程。在续建阶段,水库工程仅做了完修和上下游的零星维护及拓宽部分溢流道工作,以确保汛期大坝安全。

三

1970年4月,为适应皖东地区发展灌溉用水需要,安徽省革委会决定重新开工续建,并确定工程指挥部的

大事记

1958年

1月5日~7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安徽。5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6日,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视察肥西县肥光农业生产合作社。

1月14日 安徽省举行除“四害”誓师大会,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作动员。随后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以除“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1月28日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召开,根据《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新讨论修订安徽省经济发展规划。其中,对工业战线提出的目标是从1958年开始,用5~7年时间,即到1962年或1964年,全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73.6亿元,超过农业同年预计达到的71亿元的计划。在农业方面,要求到1962年或196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上报产量的247.24亿斤提高到510亿斤,平均单产到196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达到685.5斤。会议还对安徽1958年春兴修水利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连同已完成的土石方,累计完成24亿土石方的任务。由水利战线刮起的浮夸风进一步发展起来。

1月30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办理初级农业学校问题的报告》,指出:“初级农校是一项新型教育事业,是

教育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发展农业生产和改进教育事业,都有很大意义。”要求一般县试办 1 所,或几县联办 1 所。本年,全省共兴办初级农林学校 78 所。

2月16日 共青团安徽省委给全省青年职工一封信,号召全省青年职工要在工业生产“大跃进”中成为急先锋。

3月1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宣传运动,来一个思想“大跃进”,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实现。随后,省委宣传部于3月5日印发《鼓足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提纲)》和《全力争取工业生产大跃进,使地方工业产值在5至7年内超过农业产值(宣传提纲)》的通知,供各地宣传使用。

3月9日 马鞍山铁厂炼出安徽第一炉电炉钢,结束了安徽有铁无钢的历史。

3月1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反浪费、反保守动员大会。1.47万多人参加会议,分19个会场进行。会后,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在全省形成高潮。

3月15日 国营安徽省第三纺织印染厂筹备处在蚌埠成立。1959年4月15日改为安徽省蚌埠纺织厂。1965年12月建成投产。

3月16日 中共安徽省委在蚌埠召开驻蚌机关干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作报告,提出“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全面规划,全面治理,小型为主,大中支持,以蓄为主,尽量少排,水网化,水稻化,把淮北变江南”的淮北平原区治水方针和根本办法。同时,曾希圣还宣布了省委和淮河委员会共同制定的《淮北水网化的十条

规定》。从此，淮北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运动，采取边规划，边施工的办法，仓促地将大部分耕地改种水稻。至1960年下半年，工程被迫停办。

3月 安徽省直机关实行整编下放。共5000余名干部下放，占干部总数的40%。

3月 安徽省在大中学校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这一运动中，一批教授、教师受到了批判。

4月1日 裕溪口煤码头竣工投产。该码头于1955年12月20日开工建设，投产后可停靠3000吨级的驳船，年吞吐量250万吨，是全国内河第一座机械化煤码头。

4月3日至5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召开有各地、市委和部分县委宣传部长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中党的宣传文教工作的任务。会上，亳县、萧县、肥东等10个县联合向全省各兄弟县发起关于宣传文教工作“大跃进”的倡议。提出乡乡有中心俱乐部（包括业余剧团、歌咏队、创作组等）、社社有俱乐部。

4月8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广泛收集新民歌的通知。

4月15日 安徽丝绸厂建立。1959年4月定名为地方国营安徽丝绸厂。

4月18日 安徽省计划委员会批准兴建铜官山市苎麻纺织厂，这是安徽省建设的第一家苎麻纺织企业。

4月18日 滁县铜矿破土兴建。1960年4月建成，1978年改为安徽琅琊山铜矿。

4月24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视察马鞍山铁厂，听取了有关马鞍山铁厂生产发展的汇报，并就生产建设、技术

革新、依靠群众等问题作了指示。当天,到达芜湖,视察了芜湖造船厂。25日抵合肥,参观了省博物馆等。后由曾希圣、黄岩陪同视察六安山区和佛子岭水库。29日离开安徽。

4月 淮北矿务局成立。

4月 芜湖钢铁厂开始兴建。1962年3月被迫下马,1966年复建。现已成为中型钢铁冶炼和加工企业,安徽省生铁铸造的重要基地。

5月17日 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编制出《安徽省1958~1962年地方工业发展规划纲要(草稿)》,要求在今后5年内,地方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递增50%的速度向前跃进。

5月24日 宣城纺织厂动工兴建。

5月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开发淮北煤田。

5月 合肥纺织机械厂开始兴建,当年建成投产。

5月至8月 中共安徽省委连续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3项决议:一、《关于发展我省教育事业的决议(草案)》;二、《关于加强党对学校领导的决议(草案)》;三、《关于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的决议(草案)》。

5月 合肥广播器材厂建立。12月,中共安徽省委用15万元党费,在合肥广播器材厂基础上筹建安徽科学器材厂。另从合肥模型厂调进部分人员和设备筹建合肥无线电厂(即后来的合肥无线电一厂)。安徽的地方国营电子工业由此诞生。

6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宣传运动的通知》,要求通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把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插到全省每个单位和每个角落,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全面超额完成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指标。

6月9日至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提出：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上年翻一番；工业总产值争取实现30~35亿元，3年内达到150亿元。强调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要不断批判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右倾保守思想。这次会议使党内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全省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会后，省委提出了“苦干三年，改变安徽面貌”的口号，促使全省地、市、县层层制订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生产高指标。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带来了高估产，安徽一些地方虚报高产，竟放“卫星”，报刊舆论大加鼓吹。

6月28日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兴建省委机关钢铁厂。后建有炼铁、炼钢和轧钢等车间，1961年并入合肥钢铁厂（即今合钢公司第三钢铁厂的前身）。

6月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设立冶金工业局。11月撤销，设立安徽省冶金工业厅。

6月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设立安徽省煤炭工业管理局。9月改为安徽省煤炭工业局，11月改为安徽省煤炭工业厅。

6月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设立轻工业厅。

6月 安徽省林业厅召开全省国营林场会议，全省各地开始大办国营林场。到1960年，全省国营林场达到128个，经营面积增加到945.6万亩，职工14527人。在这个时期新建的林场，大部分采取“一平二调”的做法，无偿占用集体所有的林木、山场、农田、耕畜、农具和房屋财产。

7月1日 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编制出《第二个五年安徽省国民经济计划建议数字简表》。建议到1962年，工业总产值计划为

305.78 亿元,电力 180 亿度,生铁 1100 万吨,钢 800 万吨,化肥 380 万吨,水泥 400 万吨,粮食 1000 亿斤,棉花 900 万担;5 年内投资额需要 113.16 亿元。

7 月 1 日 安徽省钢厂转炉炼钢车间投产。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指示,安徽省钢厂于 5 月动工兴建年产 1.5 万吨钢的 1 吨示范性转炉,7 月 1 日建成投产。11 时 20 分,全省冶金行业第一炉转炉钢炼成。

7 月 8 日 芜湖天锦丝绸厂动工兴建。次年投产。主要生产真丝绸及真丝人造丝交织物。1961 年至 1965 年曾并入芜湖纺织厂,1965 年 7 月划出,改为芜湖丝绸厂。

7 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于 7 月上旬到桐城等地农村视察,对安徽农业生产作了指示,并提出农村公路要拓宽。

7 月 15 日至 29 日 全省交通会议在合肥召开。提出“政治挂帅,以虚带实,大鸣大放,全党全民办交通”的口号。从此,全省交通进入非常规发展时期。

7 月 23 日 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编制出《安徽省 1958~1960 年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规划方案(草案)》和《安徽省 1958~1960 年农业机械需要量初步意见》。《方案》提出,计划到 1960 年全省 70% 的耕地面积使用动力耕作,提水排灌,农副业加工全部使用动力机械。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and 初步电气化。根据农业机械化需要,计划 3 年内新建与扩建一批农业机械厂。

7 月 国务院决定撤消安徽省工业厅,设立安徽省重工业厅。12 月,省重工业厅撤销,分开设立安徽省机械工业厅和安徽省化学工业厅。

7月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安徽省冶金工业指挥部,领导全省大办钢铁运动。

7月 安徽省直属机关开展大办钢铁运动。据统计,至11月底,建炼铁炉212个,产铁9492吨;建炼钢炉313个,产钢1815吨;建炼焦炉443个,产焦3758吨。

7月末 舒城县千人桥社槐树、中心、旗杆3个队在试验田里放出亩产早稻5735.5公斤的“卫星”,其中槐树队的一块试验田达到亩产6363.5公斤。8月初,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放出亩产21537.5公斤的“卫星”,安庆市郊也放出亩产22475.5公斤的“卫星”。在水稻“卫星”的影响下,其他农作物也相继放出各种“卫星”。

8月1日 中共安徽省委政治理论刊物《虚与实》创刊。

8月1日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撤销马鞍山铁厂并成立马鞍山钢铁公司。

8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在佛子岭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决定(草案)》。确定1958年生产生铁120万吨、钢35万吨。要求各级党委把钢铁生产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冶金设备制造任务、解决当前供电及电力工业建设、加速发展煤炭工业及铁矿石生产、加强交通运输、解决工业部门劳动力等决定。会后,全省掀起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

8月15日 花凉亭水库开工兴建。

8月18日 芜湖冶炼厂开工兴建。

8月19日 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开工兴建。该工程是我国最大的人工灌溉工程,还可进行发电、航运、养殖等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8月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声势浩大的促进钢铁元帅上马的宣传报道的通知》，确定抓钢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要求大力宣传大办钢铁。29日，省委、省人委召开安徽省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广播动员大会。此后，全省有50多万农民自带伙食、铺盖无偿支援外地开矿、伐木、炼铁，致使大片山林被毁。

8月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大办人民公社。到10月初，全省已全部实现公社化，原来的1.68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101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721.9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9.9%。公社规模平均为6746户，最大的有4万多户。

8月 中共安徽省委设立基本建设部。1959年6月撤销。

8月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设立安徽省科学工作委员会。1959年2月改为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8月 中共安徽省委批准成立淮北煤矿建设委员会。

8月 淮河蚌埠闸工程开工兴建。该工程给约900万亩土地提供灌溉水源，同时具有航运、发电、公路交通等综合效益。全部工程于1987年完工。

8月 陈村水库开工兴建。水库位于泾县长江支流青弋江上，总库容24.76亿立方米，是以防洪、发电、灌溉为主，结合航运、养殖以及开发旅游资源等综合利用的大型工程。

9月1日 梅山水电站首台1万千瓦机组投产。配套建设的110千伏梅(山)六(安)望(峰岗)输电线同时全压运行。次年5月，4台1万千瓦机组全部投产。

9月2日~9日 全国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现场会议在巢县司集乡召开。

9月8日 马钢公司第5号中型高炉(有效容积210立方米)

建成,次日炼出第一炉铁水。第1至第4号高炉此后相继建成投产。这5座高炉由国内自行设计、制造、安装,于1957年11月开工建设,是当时华东地区最大的高炉,可年产生铁53万多吨。

9月8日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粮食购销管理体制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粮食购销差额包干工作的指示》,决定自1958年起,省对专(市)、县粮食征购和销售实行差额包干办法。

9月上旬 中共安徽省委在蚌埠市召开中等学校现场会,总结交流学校大办工厂、农场,改革教学,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

9月16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达安庆,视察了安庆第一中学。当天,由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到达合肥。17日,毛泽东参观了安徽省博物馆。18日,毛泽东视察了省委机关钢铁厂和安徽省钢铁厂。19日,毛泽东受到合肥20万群众的夹道欢迎。19日下午到达芜湖。20日,毛泽东视察了芜湖造船厂并接见了造船工人、海军和驻厂部队。随后,毛泽东到达马鞍山视察,参观了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指出:“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陪同毛泽东视察安徽的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等。

9月21日至29日 共青团安徽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9月21日至30日 交通部在合肥召开河网化现场会议。河南、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广西、内蒙古、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及交通部直属单位的代表共50人参加了会议。

9月 安徽各级学校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建立民兵组织。中等

以上学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建立民兵师、团，学生按营、连、排编制，实行生活军事化，进行军事训练。

9月 临淮岗水库枢纽工程开工兴建。该工程是淮河中游的控制性工程，利用坝上游全部湖泊进行蓄水，具有防洪、发电、航运、城市供水及渔业等综合功能。1962年夏被迫停工缓建。

9月 合肥工业大学建立。1960年，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

9月 纺织部推广绩溪土法缫丝。绩溪县缫丝厂创制的木制缫机被纺织工业部指定送到北京展览，并绘制图纸、撰写文字材料向全国推广。

10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转发《关于(无为县)响山农业社三年来实行供给制情况的考察报告》，指出供给制对促进生产发展、促进共产主义思想的增长有巨大作用，要求各个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扩大免费供给的范围。由于推行供给制，农民到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也不再分配粮食给农民。

10月16日至22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安徽视察工作。他先后视察了宿县、濉溪县、蚌埠、淮南、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在濉溪时指出：“共产党员要讲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并视察濉溪县河网化的试点卧龙湖，说：“这个地方好，全国都可以学这个地方样子搞。”在淮南时说：“你们这里条件好，煤、焦、电、钢、铁、化工都是人民需要的，你们一定要搞个规划，注意布局……要按人民需要来建设。”在蚌埠，对红旗农场的半工半读很满意。在合肥，视察了农业展览馆和合肥工业大学等。他对合工大的师生说：“你们学校现在还是以读书为主，一部分时间劳动……不要降低生产，

不要降低质量。”在芜湖，视察了皖南大学(今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并题写校名。在马鞍山，视察了马钢公司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告诫大家：“工作越顺利，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吹牛”。

10月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在农村中普遍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0月下旬至12月，全省组织近200万人的宣传大军，在农村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宣传和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在宣传教育中，要求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形成“人人都为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强烈气氛”。

10月23日 蚌埠轧钢厂生产出安徽第一根钢材。该厂于6月23日动工兴建。

11月13日 中共安徽省委通知全省县级以上党委委员干部学习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以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纠正急于使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倾向。

11月26日 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生产、分配、劳动、财务、福利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转发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人民公社1958年收益分配的意见》。省委认为，人民公社应该普遍推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11月 龙河口水库开工兴建。水库位于舒城县龙河镇，属于淠史杭工程的组成部分，是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库。水库总容量7.87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1120平

方公里,设计灌溉能力 151 万亩。1970 年 4 月竣工。

12 月 15 日至 19 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安徽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 5735 人,主要是代表集体。代表条件中规定淮北地区的先进县粮食亩产要达到 800 斤等。

12 月 19 日 马钢第一套轧机建成投产。从此打破了马钢“有钢无材”的局面,使马钢初步形成了从采矿、炼铁、炼钢到轧材配套成龙的钢铁生产联合企业。

12 月 20 日 淮南望峰岗选煤厂建成投产。该厂为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中的一个,1956 年 10 月 3 日动工兴建,设计能力年入洗原煤 100 万吨。

12 月 24 日至 1959 年 1 月 16 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部署整顿、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制定 1959 年工农业生产建设计划。

12 月 2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由南昌抵达合肥。听取曾希圣关于安徽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汇报,还到省委机关钢铁厂视察。

1958 年 池州铅锌冶炼厂开工建设。

1959 年

1 月 20 日至 24 日 中共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讨论通过了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代表省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决定全力整顿好人民公社,制定了比

1958年更高的跃进指标。

1月29日至2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召开报纸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检查宣传报道中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以及虚夸等问题,要求报纸宣传成绩必须符合事实,不能夸大。

1月31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做好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认真实行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检查评比、插标验收的生产管理制度。

1月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煤矿会议,决定大力贯彻“全民办矿”和“大中小型并举”、“土洋结合、以洋为主”的方针。

1月至10月 安徽省企业和机关精简压缩职工。从1月份开始至10月,全省共精简压缩职工42.1万人,其中回农村参加生产的有37.9万人。

2月1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人民公社组织机构和分级管理问题的意见》,要求人民公社设置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设置队务委员会。

2月7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关于〈桐城县闹粮荒问题的真相〉的报告》,认为桐城闹粮荒的真相是“瞒产”,实质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于是在全省开展“反瞒产”,并处理桐城闹粮事件。

2月12日 中共安徽省委通知各地原来农业社的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生产小组)的户数、劳动力、耕地、耕畜、农具不变动。

2月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春季生产广播动员大会。1400万人参加。曾希圣号召全省人民在苦战3年的第二年中,来一个更大更全面的跃进。

3月3日 合肥市第二中学改为安徽省科学技术学校,由中

国科学院安徽分院接管。

3月8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规定：工业产值比1958年增长75%，生铁产量170万吨，钢50万吨，煤炭17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12.2亿元。

3月9日至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省、地、市、县、公社和部分大队、生产队万人以上参加，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的突出矛盾是，去年大丰收后一方面粮棉油的收购任务没有完成，另一方面在全省范围内（除少数地区）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不足的风潮，根子在于没有认识到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单一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根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各计盈亏。会议还规定生产队对生产小组也实行包产，小组还可经营副业，使生产小组也有部分所有权。对过去财务账目的算法、偿还和处理也作了规定。

3月11日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开放粮食市场的通知》，允许进行粮食贸易以调剂余缺。

3月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安徽省公社管理体制的十项规定》。

3月26日 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成立。1965年1月31日改为铜陵有色金属公司。

3月29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

3月至7月 中共安徽省委面对农村出现的问题，采取6项

措施进行纠正。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加速“过渡”等问题,加上很快又受到冲击,许多措施未能贯彻下去。

4月 芜湖东方纸版厂建成投产。设计能力年产纸版5万吨。

4月 蚌埠市邮电局2000门自动电话建成开通。

5月6日 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意见》,指出今后农业中学招生,原则上只招收13~16岁的高小毕业生。

5月23日至7月1日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视察安徽,先后到合肥、六安、淮南、芜湖、马鞍山等地了解钢铁生产、农业和水利建设情况,提出了意见。

5月 安徽中医学院、安徽财贸学院建立。

6月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政治课的初步意见》。《意见》提出今后中等以上学校政治课分为形势任务课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课两部分,加强政治课教学。

6月8日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陆学斌针对1958年“大跃进”中严重的浮夸风现象及其造成的后果,起草了《省委宣传部对当前报纸宣传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报纸宣传的方针是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克服虚夸现象。”7月,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有地、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的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又大声疾呼:“报纸宣传要鼓干劲,更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有的县甚至宣传一、二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违反了客观规律,现在客观规律向我们发脾气了!”

6月12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

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决定立即在全省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企业和城镇居民中组织大批劳动大军下乡支援农业生产。

6月12日 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几项规定(草案)》，规定严格控制机关编制和企业职工人数，节约粮食，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停止建造机关房屋，停止购买小汽车、添置家具等。

6月19日至28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炼铁会议，研究如何提高生铁产量，调整厂矿组织和高炉布局，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

6月3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坚决整顿报刊的通知》，决定整顿报刊、出版社，并规定凡专区、市级的出版物一律取消。

6月下旬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检查工作，发现该县农村“五风”等“左”的问题严重，提出了“两开放三还原”(开放水塘和自由市场，吃饭、房屋、自留地还原)，以纠正“左”的错误。7月7日，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由庐江到无为，张恺帆与之商量，决定停调无为粮食，并通知省卫生厅派医疗队去无为给社员治病。张恺帆因解散无为食堂一事在7月份中央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张恺帆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批判。

7月7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建立安徽纺织工业专科学校。1960年2月升格为安徽纺织工学院。1961年8月撤销，划归省轻工业学校。

7月17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1959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1959年主要工业品产

量指标调整为：钢 23 万吨，生铁 180~208 万吨，煤炭 1500~160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 6.8 亿元。

7 月 17 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中共合肥市委《关于大力恢复与发展小商品生产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小商品生产，以解决市场上小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

7 月 20 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着重研究如何提高教育质量。

7 月 25 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草拟的《关于田间管理工作包到户的奖励办法》。

8 月 1 日至 10 日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对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进行错误的批判斗争。二人因无为问题被打成“反党联盟”。

8 月 27 日至 9 月 21 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会议讨论通过省委《关于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和《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会后在全省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又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坏，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8 月 29 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干部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通知》，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全省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同志。

9 月 合肥蜀山化肥厂建成。该厂即现在合肥化肥厂前身。当时被化工部评为 1959 年小氮肥基建红旗单位。

10月4日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冶金指挥部运输办公室改为安徽省运输指挥部，统一指挥煤炭、矿石、粮食调运，形成了以“钢铁”为中心的大交通格局。

10月8日 巢湖水泥厂1号炉竣工投产。

10月27日至29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后视察了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在合肥，视察了省委机关钢铁厂和合肥蜀山化肥厂。在马鞍山，视察了马钢烧结厂、第一炼钢厂和焦化厂，并看望了生产工人。

11月10日 马鞍山纺织厂开始兴建，翌年4月停建。

11月12日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成立安徽省化肥厂建设指挥部。为加快发展全省化肥工业，支援农业生产，省委决定规划建设100座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化肥厂。

11月22日 合肥蜀山公社建成小化肥厂。该厂为安徽第一座小氮肥厂，设计能力年产合成氨400吨。

11月22日至25日 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宣布成立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选举产生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

11月22日至27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整风整社、增产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超额完成本年度各项任务。

11月23日至3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轻工业会议，讨论轻工业大增产、大跃进问题，力争提前10天到15天超额完成全年计划；提出了1960年轻工业大发展的规划：生产计划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126%。

12月8日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省长黄

岩代表中共安徽省委作关于撤销张恺帆、陆学斌安徽省副省长职务的建议并通过决议；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委政法部负责人分别作的《关于特赦罪犯工作的报告》、《关于摘掉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报告》等。

12月12日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成立安徽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加强对尖端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12月1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加强理论时事学习的通知》，决定省委常委成立学习小组，每星期六下午集体学习研究政治理论和时事。要求省直各部、委、厅、局党组和地、市、县委亦应加强政治理论和时事学习，建立相应的学习组织，健全学习制度。

12月20日至1960年1月9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文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理论工作，特别是研究如何更好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会议总结报告强调坚持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坚持政治挂帅。提出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争取二三年内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力争全国第一。会议还提出：在积极举办全日制中学的同时，要认真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发展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根据工农业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大量发展中等技术学校。

12月29日 马鞍山发电厂完成二期扩建工程，全厂装机容量4.4万千瓦。

12月 淮北矿务局烈山（二矿）、沈庄、袁庄3对矿井建成投产。烈山（二矿）和袁庄矿设计能力年产原煤各45万吨，沈庄矿设计能力年产原煤21万吨。

12月 淮南矿务局原煤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到1414.2277万吨。

1959年 安徽省高考成绩位居全国第二。

1959年 安徽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7年改造全部过渡到国有化。

1960年

1月5日 中共安徽省委财贸部批准建立安徽财政学校。9月,决定安徽财政学校与合肥银行学校合并建立安徽财政金融学校。

1月22日 中共安徽省委转发中共合肥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工效运动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抓起来。随后,在全省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

1月 全省职工学习全国群英会的经验,掀起技术表演赛的热潮。据马鞍山、合肥、淮南、蚌埠、安庆、铜陵等市及铁路、邮电两个行业不完全统计,到元月为止,已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表演赛15158次,参加表演操作的有21万多人次,在表演赛中总结推广了2200多项先进经验。

1月末 安徽省农村贯彻中央庐山会议“反右倾”指示,结合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和反瞒产斗争,把所谓“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撤掉一批敢于说真话、办实事的农村基层干部。结果1959年已经出现的农村粮荒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高征购继续进行,逼迫一些干部、群众继续出售口粮。

2月2日至8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大、中、小学跃进大会。到会的有各级党政部门分管文教工作的负责人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代表等共计1.23

万多人。省长黄岩致大会开幕词,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作题为《为实现我省教育工作的持续跃进而奋斗》的报告。报告要求在最近两三年内要做到每个专区都有一套(工、农、医、师)高等学校;每个公社都有一所全日制初中和农业中学;大力扫除文盲,普及业余教育,大办业余中、高等教育;各学校、各机关和工矿企业部门要大办各级函授教育。这是当时安徽规模最大的一次教育会议。

2月22日至3月2日 安徽省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会议提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决定将安徽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改为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月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木材调拨管理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按照省计划分配的木材和毛竹生产计划进行采伐;生产的木材和毛竹,统一由省计委分配,由省木竹生产指挥部调拨;各需材单位凭省木竹生产指挥部调拨书到指定的贮木场和转运站提货。《通知》下发后,对控制当时乱砍乱伐林木资源和木竹生产、运输混乱的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2月27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春季大生产运动中的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宣传1959年安徽省农业生产的巨大成绩,宣传1960年更大跃进的任务。3月3日,省委宣传部印发了《全面掀起春季大生产新高潮,保证实现今年农业继续全面大跃进》的宣传提纲。

2月 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编制出《安徽省1960~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设想》。

3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安徽省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比1959年更大更全面的跃进计划;要求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一番

多,农业总产值增长 24.4%。

3月20日至4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地、县、社主要负责干部和部分大队、生产队代表共7000多人。会议对人民公社的情况进行检查,主要解决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发展社有经济、穷队变富队等15个问题。

3月 淮南天一袜厂建立。

5月1日 芜湖造船厂试制成功国内第一艘铝质长江水翼客艇。该艇于1959年3月开工试制。

5月14日 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在合肥召开国内各分社社长会议。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党办报问题》的讲话。会后,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各报刊、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研究进一步贯彻全党办报方针问题。

5月16日至22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文教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等方面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共2256人。大会对426个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进行了表彰和奖励,通过了大会代表向全省文教战线职工的倡议书,并选出195名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

6月6日至14日 安徽省召开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重点讨论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的问题,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关系问题。

6月16日至23日 国家科委、轻工业部、商业部联合在黄山召开全国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现场会议,推广安徽省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的经验。

7月16日 中共安徽省委作出下放大批干部加强农业第一线领导的决定。到8月底,全省已经下放84328名干部。1962年,下放干部陆续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7月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设立经济委员会。

8月5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周王公社劳动力安排情况和当前农村劳动力安排意见》。省委在批示中指出:周王公社用于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达到50%以上,违背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要求所有公社有80%的劳动力使用在农业上。

8月 安徽省再次精简职工。到年底全省共精简职工137万人到农业第一线。

8月 合肥粮食学校建立。1968年夏停办,1978年恢复。

9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农村小学超龄生转业余小学学习问题的意见》和《关于从普通中学中挤出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省委决定对农村小学中超过14周岁的学生(约56万人),应动员他们回家生产,转为业余学习。对1958年以来在农村中国家办的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约13万人),实行“半工半读”。本年各地小学戴帽子的初中和新建初中都停止发展;其他中学适当增加劳动时间。

9月6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机关钢铁厂党委《关于贯彻中央保粮保钢指示的情况报告》,要求没有制订增产节约计划的厂矿企业,抓紧在9月上旬制订好。已制订计划的,要抓紧贯彻。全省兴起“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增产节约运动。

9月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颁发《安徽省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暂行规定》。

9月 淮南矿务局李嘴孜矿竣工投产,核定能力年产原煤 35 万吨。

10月2日 中共安徽省委通知各地抓紧时间开展大搞代食品、大搞野生植物原料的“小秋收”运动。随后,省直机关和合肥市抽出 1000 多人去岳西县搞“小秋收”。

10月上旬 安徽省各地以县为单位先后召开了生产组长以上五级干部会议,检查中共中央政治局郑州会议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整顿、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

10月25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小秋收”问题,并指示全省各地迅速开展群众性的“小秋收”运动。

10月28日至11月2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视察安徽,要求农村包产一定要落实,原则上要留有余地,使群众有产可超,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

10月 安徽省各地开始第三批对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据统计,到 1962 年春,全省又将 10329 名右派分子摘掉帽子,还将 3164 名右派分子解除劳教。

10月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财贸轻工办公室主任及轻工业局局长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及轻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精神。会议期间,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到会讲话,指出由于纺织工业铺的摊子太大,原料供应不足,设备效率发挥不足 20%,因此,纱厂要停建一批。会后,全省纺织工业建设过热的势头开始降温。

11月28日至12月12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安排当前的生活问题。会议提出,从 1960

年12月到1961年4月,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坚决处理坏人坏事,把封建残余势力彻底挖掉。随后,全省整风整社大规模展开。

12月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积极采取措施,安排好师生生活,以保证师生身体健康。

12月 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改为安徽教育学院。

12月 安徽建成一批化肥工业企业。到26日,合肥、淮南、安庆、马鞍山、蚌埠等5个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相继建成投产。

1960年 安徽省农村持续“大跃进”。1月末,中共安徽省委制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盲目求快的思想仍占上风。工农业总产值原计划130.3亿元。后上升为169.9亿元,比上年上升71.6%。粮食总产量计划2307.4万吨。持续“大跃进”给安徽农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全省农民遭受到更严重的饥荒袭击。1960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674.5万吨,除了征购、种子、水利粮,农村人口平均口粮严重不足。许多地方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

1960年 安徽纺织工业起伏较大。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共投资8086万元,安装27.74万枚纱锭,兴建六大棉纺织厂,都是5万锭以上的生产能力。由于到处布点,效率下降,投资130多项,只建成36项,导致1962年进行调整,直到1965年才恢复正常生产。

1960年 安徽省中共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155483人。至

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

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安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严重挫折，导致发生罕见的三年经济困难。其间，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艰难，特别是由于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馑蔓延，出现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次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标志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已实质由“大跃进”回到党的正确轨道。在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中共安徽省委为克服农业危机，恢复了农村政策，大胆推行“因队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在调整农村经济的同时，对工业、商业及科技工作进行了改革。改革和调整农村经济关系也进行了调整。1963年，安徽全面落实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省经济建设步入良性及循环，出现了粮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一、经济调整势在必行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违背客观规律，脱离客观实际，导致了“浮夸风”、“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逼命令风”的盛行，造成农业生产全面衰退。1958年，安徽省农业总产值达58.28亿元，1959年为47.75亿元，1960年为

综 述

杨久梅

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安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导致发生罕见的三年经济困难。其间，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艰难，特别是由于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馑蔓延，出现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次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标志着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已实现由“大跃进”到调整的重要转变。在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中共安徽省委为克服农业危机，放宽了农村政策，大胆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在调整农村经济的同时，对工业、商业及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和党内政治关系也进行了调整。1965年，安徽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省经济建设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出现了民主、和谐、发展的社会局面。

一、经济调整势在必行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违背经济规律，脱离客观实际，助长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的盛行，造成农业生产的全面衰退。1958年，安徽省农业总产值为56.28亿元，1959年为47.73亿元，1960年为

42.48 亿元,1961 年降到 1949 年后的最低点,只有 33.5 亿元,平均每年递减 16.1%。同期,粮食产量也连年下降,且下降幅度很大,均在 10%左右。1958 年全省粮食产量 176.9 亿斤,1959 年为 140.2 亿斤,1960 年为 134.9 亿斤。

由于浮夸风盛行,虽然粮食减产,但是虚报产量的问题却很严重。1958 年至 1960 年,安徽实产粮食 452 亿斤,上报产量为 820.9 亿斤,超出实际产量 81.6%。特别是 1959 年开展反右倾、反瞒产斗争,当年收粮只有 140.2 亿斤,上报却高达 350.04 亿斤,超出实际产量 149.7%。

在高估产和虚报产量的前提下,粮食征购量超出农民负担水平就不足为奇了。1958 年至 1960 年,安徽粮食征购量分别为 69.7 亿斤、70.9 亿斤和 49.7 亿斤,各占总产量的 39.4%、50.6% 和 36.9%。1959 年全省有 16 个县粮食征购占到总产量的 60% 以上,宣城县高达 82%。低产量和高征购造成农民口粮紧缺。

在粮食减产的同时,油菜、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也程度不等地下降。1961 年,全省油料产量 7880 万斤,人均 2.6 斤,比 1957 年减少 13.2 斤;棉花产量 3840 万斤,人均 1.2 斤,比 1957 年减少 1.6 斤。

“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造成全省林木的过量砍伐。到 1959 年,全省森林有林地减少 600 万亩,疏林地增加 258 万亩,木材蓄积量由 8693 万立方米下降到 4028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下降 2.3%,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另外,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家庭畜牧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受到限制。1961 年,全省大牲畜存栏量只有 170.1 万头,比 1949 年还少 46 万头。畜牧业产值只有 2.97 亿元,比

1957年下降67%，只相当于1949年的一半。

农村经济的萧条，直接导致人民群众生活困难。1958年冬，乡村农民开始吃野菜、树叶、树皮，个别地方已有人饿死。1960年，安徽粮荒严重，除去征购、种子和水利粮，农村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全省城乡有2900万人处于饥饿线上。广大农村田园荒芜，人们背井离乡乞讨为生。由于饥饿及营养不足，全省城乡普遍发生浮肿病，出现低出生率、高死亡率情况，死亡人口增加。1960年，全省出生率为11.35‰，死亡率高达68‰，为全国平均数的3.5倍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57.23‰，全省总人口3042万人，比上年净减少384万人。净减少的人口中，除自然死亡、迁徙外省外，绝大部分是饥饿所致。

工业经济方面，虽然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加之扩大投入，工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建成一批骨干企业，如淮北煤矿、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铁公司、合肥重型机械厂等，但工业建设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建设规模急剧膨胀，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浪费。1958年至1960年的3年间，全省对钢铁及重工业的投资达17亿元以上，占同期投资总额的60%，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小高炉、小土煤窑等土法上马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在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绝大部分被砍掉。据统计，仅直接投资于钢铁企业的资金，3年内累计损失就达3.1亿元，相当于同期全省对轻纺、食品工业投资总额的1.3倍。而且，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造成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一是工农业比例失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为18.09亿元（其中轻工业13.23亿元，重工业4.86亿元），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猛增到58.7亿元（其中轻工业29.71

亿元,重工业 28.99 亿元),增长 2.2 倍。同期,农业总产值却由 60.92 亿元降到 42.48 亿元,下降 18.4%,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由 22.9:77.1 变为 58.01:41.99。二是工业内部比例失调。1957 年至 1960 年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73.13% 下降到 50.61%,而重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由 26.87% 上升到 49.39%,轻重工业之比由 16.75:6.15 变为 29.36:28.65。

随着农业、轻工业生产的大幅下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增长难以为继。1962 年,安徽钢产量下跌到 2.01 万吨,煤产量下跌到 1395.5 万吨,发电量下跌到 12.53 亿千瓦小时,几乎退到“大跃进”前的水平。

商业方面,受浮夸风和“一大二公”的冲击,各专业公司纷纷取消,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进行了合并,集体商业拆小并大,一批夫妻店、小摊贩、前店后坊等方便群众的商业网点被不适当地取消,造成流通渠道单一,传统的经营特色消失,服务质量低劣,物资供应紧张,部分商品不得不实行凭票限量供应。

“大跃进”期间,一方面,由于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安徽职工工资水平普遍下降。从国有经济部门来看,1957 年人均年工资 528 元,到 1960 年降到 450 元,如果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更低,大大影响了人们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又直接造成生活资料和副食品供应不足,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958 年下半年,一部分生活日用品开始脱销。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肉类、副食品及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全面紧张,物价大幅上涨。国营、集体商业的商品价格上涨 10%~100% 左右,少数农民出售自种的蔬菜,价格上涨 10~20 倍。后来,为了回笼货币,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全省实行高价商品敞开供

应政策,列入高价的商品种类较多,从糖果、糕点、烟、酒、茶叶、部分针棉织品到时钟、照相机等,几乎什么都是高价。

因为物资严重匮乏,1960年5月,全省城市居民、职工开始实行凭票限量供应肉类、副食品。1961年合肥市使用购货券的商品达25种。1962年,全省凭票供应的商品多达64种,连盐、酱油、火柴都要票,布票小到一寸一张,食用油票小到几钱一张,甚至连买一卷线也要“线票”,市场萧条由此可见。

总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安徽经济元气大伤。1961年与1958年相比,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93%,国民收入减少21%。这是安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

二、花大力气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问题

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折腾,安徽农业减产严重,人民生活相当困难。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1960年,全省粮荒严重。为解决粮食危机,省委开始对以前不断加码的粮食征购指标进行压缩,将90亿斤征购包干任务调减为49.7亿斤。次年,全省粮食系统贯彻“少购少销”政策,当年产量为125.8亿斤(后经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审定,实产189亿斤),只安排征购任务26.93亿斤,实际收购32.08亿斤(包括议购、换购),比上年减少35.5%。为了让广大人民休养生息,是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安徽灾区调入粮食7400万斤,同时免去粮食调出任务。

由于粮食减产,粮食征购任务压缩,国家调拨和供应粮食能力更弱。1960年9月,中央在号召精简城镇人口的同时,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从10月份起,全省开始调

低城镇居民口粮标准,除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及儿童以外,普遍调低2~3斤,平均下调10%。同年12月,又进行第二次压缩,儿童一律降低半斤,职员及其他脑力劳动者降到每月25.5斤,居民降到每月24.5斤,全省平均定量水平由原来的31.5斤降至27.41斤。食油供应也大为减少,省会合肥为每人每月3两,其他县市也作了压缩。1962年6月,省辖市及专署所在地城镇每人每月由3两再减为2两,县城由2两减为1.5两。

造成粮食严重短缺的原因除了农业连年减产外,城镇人口过猛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安徽城镇人口比1957年增加190多万,城乡增销粮食20多亿斤。城镇人口过猛增长,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当年,因粮食购销倒差2.8亿斤,不得不挖国家库存17.91亿斤。随后几年都继续挖国家库存。即使这样,城镇粮食供应仍很紧张。1960年,全省开始大批精简下放职工,压缩吃商品粮人口135万人。1961年3月,省委发出《关于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确定全省年内精简职工13.5万人,裁并工业企业1831家。到年底,全省减少城镇人口82.2万人。1962年和1963年,中央要求安徽再减少城镇人口106万人、职工53.7万人。经过努力,到1963年9月,全省完成精简任务。

在采取上述减轻农村供应压力措施的同时,为了缓解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难,安徽不断放宽农村政策,鼓励农民生产自救。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十二条”。在宣传、贯彻“十二条”精神的过程中,全省落实了恢复社员自留地政策,当时全省共划分给社员自留地499.56万亩。1961年1月,全省放开水面,发动群众捕捞,天然水面谁捕谁得;养殖水面,野鱼谁捕谁得,家鱼养殖单位适

当提成。2月,全省放开集市贸易,允许农副产品上市交易。4月,全省又实行奖励经济作物政策,规定:凡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保证社员吃到与附近余粮队同等数量的口粮,按收购数量供应一部分粮食,以鼓励社员种植经济作物。7月,又决定借地给社员耕种。为鼓励社员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安徽对这些农副产品实行包购和奖售政策,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如生猪收购价格最高比1957年调高33.1%。

此外,各地还积极组织生产自救。一方面,大抓积肥、翻土、农作物田间管理,推行扩种、复种、间种、套种、混种等耕植方法,另一方面,开展小秋收和业余生产活动。1960年初,省委发出号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隙地种植农作物,做到寸土不闲,多种多收。”各级党委十分重视,将之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当年春,各机关、工厂、农村社员在山上、河滩、田旁、地角、院地、路旁见缝插针,种植农作物500万亩,其中杂粮、蔬菜200余万亩,瓜35亿棵,蓖麻、向日葵等油料作物250亿棵。一些机关、企业还组织专业队,实行大集体、小集体相结合办法开荒种地,不少单位都建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副食品基地。1961年,合肥市的机关、工厂、学校共建立142个自给性农场、畜牧场,耕地4.5万亩,收获蔬菜1500万斤,杂粮800万斤,油料1.85万斤,养猪2.1万头,鸡、鸭、鹅7.4万只,羊3500头,兔5000只,鱼690万尾,不仅为国家增收作了贡献,而且有效地改善了职工生活。

三、调整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安徽农村政策的调整,是从整风整社纠正“五风”开始的。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展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平二调”等错误。11月28日

至12月12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二条”精神,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会议决定从当年12月到1961年4月在全省开展以贯彻“十二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彻底纠正“五风”,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坚决处理坏人坏事,把封建残余势力彻底挖掉。

为推动整风整社运动的进度,1961年1月10日至15日,全省整风整社汇报会召开。会议指出:搞好整风整社,各级领导要下决心揭盖子;对所有干部进行排队;坚决退赔“一平二调”的财物;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队”,兼顾全面等。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全省各级党委纷纷动员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讲“十二条”,帮助他们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1961年1月,东至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帮助县委整风。会上共收到各种意见5000余条,其中“共产”风1405条、浮夸风1477条、强迫命令风643条、特殊化风579条、生产瞎指挥风1350条。2月间,全县又抽调940多名干部进驻“三类社队”和边缘地区开展整风整社。青阳县揭发出来的“五风”问题涉及干部900多人。庐江、含山分别抽调605名和696名干部赴农村,帮助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到3月27日,全省已派出工作队6万余人,在789个公社、9332个大队开展整风整社。

1961年2月18日至3月4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会上,省委检查了三年来的工作,认识到犯了不少错误:农业减产、不少地方发生疾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等。省委认为产生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五风”严重危害性,民主革命不彻底,严重的官僚主义等。省委在总结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吃饭第一,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以整风整社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力争今年粮食有一个较好的收成。

此后,结合宣传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整风整社不断深入,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退赔是整风整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省委对退赔工作十分重视,决心很大。1960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就解决农村问题作出指示。关于退赔问题,他指出:要下狠心,坚决退赔,要倾家荡产。群众要什么就赔什么,要房子就赔房子,没有房子就把招待所分给群众住,招待所的被子也可以拿出来退赔。以后开会没有被子盖,就采取过去的办法,干部自己背背包,自己盖草棚子。办公桌也可以拿出来赔。总之,要倾家荡产,才能把群众情绪扭转过来。要使干部感到痛苦,否则,“共产”风是克服不了的。此后,退赔工作在全省农村广泛开展,各地成立了退赔委员会,制定了相关政策。如1961年4月17日,中共马鞍山市委批转了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退赔办法的几点意见》。《意见》规定:(一)凡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和开垦的熟荒地,生产队要求退还的一律退还;生产队不要求退还的,必须办理征购或租用手续,按规定付款或交租金。(二)各厂因建设需要而征用的土地,凡未办理征购手续的,应补办征购手续;对于暂可不占或占用过多的土地,应退给生产队耕种,并从占用之日起付给租金。(三)因建设需要征用的房屋,应付足拆迁费;社员私人房屋的拆迁费,凡被大队使用了的应退还给社员,并从社员搬走之日起付给租金;社员私人房屋被无偿拆毁的,由拆毁单位赔偿屋料和工本费,并从拆房之日起付给租金。(四)占用社员、生产队的农具、家具、木料等物的,凡原物

在的,应退还原物,并付给一定的租金、折旧费、修理费;凡原物损坏的,应另买实物退还。(五)凡过去无偿使用生产队劳动力的,由使用单位以同等劳动力帮助生产队进行春耕生产,或付给工资。这份文件使农民一度被剥夺的劳动成果、集体一度被侵占的财产得到赔偿,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整风整社期间,各地均制定了类似的文件。1961年5月,全省已退赔“共产”风中平调社、队财物34267万元,占平调折款的60.2%,其中退还原物的占退赔数的33.5%。

社队的规模,是广大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规模大给组织生产、评工记分带来了不便,还容易造成平均主义。为此,各地对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进行调整。例如,马鞍山市将原来一个郊区公社13个生产大队、102个生产小队调整为8个公社、68个生产大队、642个生产队;徽州专区将原来的46个乡镇划分为205个;巢湖专区将原来的82个公社、1003个生产大队、9693个生产队调整为197个公社、1744个生产大队、24977个生产队。1961年底,全省公社数达到2965个,比1960年底增加了2160个;1962年达到3008个。在此基础上,按照“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坚持包产到队;重申农具、耕地、耕畜、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队;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茬口安排、技术措施、农活安排等由生产队作主。

解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是整风整社的一项重要措施。群众在家还是到食堂吃饭,本来是生活问题。可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普遍推行供给制,食堂被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是否到食堂吃饭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争先恐后办起公共食堂。1958年

底,安徽农村公共食堂达到 24 万余个,在食堂吃饭的有 525 万多农户,占总农户的 72% 以上。1959 年,全省公共食堂发展到 26 万多个,90% 以上的农户在食堂吃饭。

强行办起来的食堂不久就遇到了种种困难。由于管理混乱,常常发生纠纷,加上老弱病人和孕产妇的营养难以保证,特别是由于粮食短缺,食堂伙食越来越差,有的只能是瓜菜代,甚至断炊,许多人吃不饱。因此,不少人要求解散食堂。

1959 年春夏之际,针对食堂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省委开始着手整顿食堂,明确提出:办食堂要坚持自愿原则,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对退出食堂的社员不歧视,按在食堂就餐社员标准发给粮食和柴草;吃饭一律实行饭菜票制,取消以前吃饭不要钱的“共产”做法;提倡多种瓜菜,以补粮食不足,不准干部多吃、多占。同时,省人民委员会于 3 月 11 日发出《关于开放粮食市场的通知》,允许各地恢复粮食交易市场,多余粮食可上市交易。此后不久,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检查工作,向社队干部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据此,无为县 6000 多个公共食堂很快解散了。张恺帆后来因此举受到严厉批判。

1960 年,安徽粮食减产严重,农村食堂普遍揭不开锅。面对严峻形势,1961 年 1 月 2 日,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突击治疗疾病、保护人身健康的紧急通知》,明确宣布关闭食堂,把供应的口粮发到户,让群众自己起伙。安徽各地农村食堂随即全部关闭。

经过整风整社,安徽逐步解决了“共产”风所造成的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仍然存在,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为解决这一问题,扭转当时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局面,根据群众意愿,省委在全省推行了责任田。从 1960 年底到

1961年初进行试验、试点,接着在小范围内推广。1961年三四月份,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到8月中旬,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增加到74.8%,10月中旬又增加到84.4%。

责任田的推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农民口粮初步得到解决,城市供应也有所好转。可惜好景不长,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后,省委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彻底改正。3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要求分期分批地把“责任田”改正过来。到1963年2月,全省农村责任田被基本改完。

1960年,省委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在全省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农业劳动为荣,以支农、为农服务为职责的思想教育运动,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机关中推行“二一一制”,即领导干部中的2/4下去蹲点,1/4巡回跑面,1/4留守机关,实行轮流,一季一换。7月,省委决定抽调干部下乡,当月即从县以上机关抽调2.8万多名(其中省级机关2800名),充实生产队的领导力量。到年底,全省共抽调6.1万多名干部下乡,使全省每个后进队都增加了10名左右的干部,其中至少有一名县级以上干部。在下放干部的同时,全省还从各行业挤出230万劳力充实到农业战线。

进入1961年,全省继续开展了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运动。省委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经常进行督促检查。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纷纷紧缩机构和编制,调整工业布点和生产布局,巩固和扩大节约劳动力的成果。当年,仅工矿企业就节约了30万人充实到农业战线。

在农业调整中,省委还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如增拨钢材、木材、毛竹等物资,组织手工业工人和部分工业企业全力修复、赶制中小农具、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千方百计增加化肥、农药的供应量。1961年,全省用于农业方面的投资共9236万元,发放农贷9526万元,供应农用钢材6.6万吨,生铁6.3万吨,木材10.9万立方米,化肥7.4万吨,小农具5500多万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资金和资料不足的困难。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安徽加快了小化肥厂建设步伐,加大了对农村电力基建的投资。1963年,全省供应农业的氮肥比1962年增长1.55倍,农村用电量比1962年增加42.4%,新增农村输电线43.4公里,增加电动设备1.33万马力。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纠正了过去大兵团作战、平调劳动力的做法,着重建设一批小型水利工程及配套工程。从1963年起,重点建设沿江圩区商品粮高产区,以当时的芜湖专区所属的无为、和县、巢县、当涂、芜湖等县为重点,发展电力排灌,共建机电排灌站2680处,拥有61.9万马力。淮北地区重新规划了各河道的整治工程,全面开展农田排水工程建设,在凤台、怀远、五河等县集中兴建一批电力排灌工程,提高了抗御旱灾的能力。

四、调整工业规模、结构和方向,促进工业健康发展

在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方针的一年里,安徽工业调整主要集中于裁并“大跃进”期间兴办的小炼铁厂、小煤矿和小机械厂,精简下放“大跃进”以来流入城镇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工业结构等方面则进展缓慢,成效不大。1961年,全省基本建设项目仅比上年减少24个,项目投产率只有36.1%;全省基本建设投资额4.32亿元,工业占67.6%,达2.92亿元;农业

仅占 21.3%，为 0.92 亿元。在工业投资额中，重工业又占 62.5%，达 2.7 亿元，轻工业只占 4.6%，为 0.2 亿元。

1961 年 9 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切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能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中共中央指示下发后，安徽及时组织了学习讨论和贯彻。1962 年 2 月，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就工业调整的任务、目标作出原则性规定。之后，工业调整大幅展开。

1962 年 5 月，省委批准省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工业企业调整意见的报告》。8 月 6 日，省人委批准省计委《关于工业企业调整方案的报告》，确定工业调整的五项原则：凡是生产需要的企业，要积极加以充实；凡是市场需要、有原料、有销路又不影响原材料外调的企业，要挖掘潜力积极增产；中央企业一般根据主管部门意见调整；重工业企业要根据中央安排的任务，坚决压缩；城市街道和农村人民公社办的企业，除极少数有正常生产条件、产品有销路、质量好的企业交由当地工业部门管理外，其余一律停办。按照这些规定，当年全省共确定关、停、并、转、改（改为附属单位）企业 1147 个，占原企业数的 51.6%。

1963 年 5 月 8 日，省人委批准省计委《关于进一步调整工业企业的报告》，确定在 1962 年实际调整的基础上再减少 254 家企业。

在这两年精简企业过程中，冶金工业被确定为重点，共关、停、

并、转县以上钢铁工业企业 46 个,由调整前的 59 个压缩到 13 个。仅马钢公司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就关停了 4 个矿场、2 台烧结机、13 座中小型炼铁炉、27 座小转炉和电炉,合并了 4 个生产厂。全省地方小高炉全部关闭。钢铁生产由原来的 11 个点集中到马鞍山、合肥、芜湖、淮南 4 个点。有色金属企业仅保留铜陵有色金属公司、芜湖冶炼厂、滁县铜矿等 5 家。其他工业行业同样进行了精简,纺织厂由 14 个减为 6 个,针织厂由 36 个减为 6 个,丝绸厂由 8 个减为 4 个,卷烟厂由 14 个减为 8 个,肥皂厂由 20 个减为 11 个。1963 年底,全省精简企业任务完成,实际减少全民所有制企业 383 个,保留 1653 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减少近千个,社队企业减少 3/4,只保留 833 个。

从 1961 年起,安徽开始着手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1962 年,全省大中型建设项目比上年减少 587 个,减幅在 50% 以上;投资额比上年减少 1.3 亿元,减幅为 45%。1963 年至 1965 年,基建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继续减少。据统计,1953 年至 1957 年,全省基建投资额为 13.13 亿元(年均 2.63 亿元),新增固定资产 10.5 亿元;1958 年至 1962 年分别为 35.61 亿元(年均 7.12 亿元)和 23.3 亿元;1963 年至 1965 年分别为 10.75 亿元(年均 3.58 亿元)和 10.1 亿元。

在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同时,安徽加大了对农业、轻工业及支农行业的投资比重。农业及围绕农业的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 1953 年至 1957 年为 36.5%,1958 年至 1962 年为 19.2%,1963 年至 1965 年为 23.44%。各地兴建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和小化肥厂。以 1964 年为例,全省用于支援农田水利、电灌、机灌和化学肥料等工程的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为 62%。建设的大中型

水利电灌工程主要有淠史杭灌溉工程、牯牛背水库和灌区工程、黄栗树水库灌溉工程以及开成、湖陇、马桥、新中、宣城、大英、曹老集、三卜湖等地的电力排灌工程,共 200 个项目;建设的化肥工业项目有铜官山化肥厂及合肥江淮、六安、安庆、蚌埠、怀远小化肥厂的碳化工程和扩建工程。调整期间,基建投资效益有了明显提高。1963 年至 1965 年全省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平均达到 94.4%,为建国以来历史最好时期(1949 年至 1952 年为 72.7%,1953 年至 1957 年为 80.2%,1958 年至 1962 年为 65.4%)。

在工业调整过程中,安徽加强了恢复与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工作。1961 年,全省轻工业和手工业会议提出“依靠全党,发动群众,上下一齐动手,增产日用工业品,供应人民需要”的号召。会后,各专、市、县层层传达会议精神,召开各种专业会议进行部署。省轻工业厅对轻工企业的结构和布局作了重大调整,关闭了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小企业,决定充实、改造、兴建一批塑料厂、搪瓷厂。1962 年,根据市场需求和原料供应情况,全省确立了棉纱、棉布、丝绸、机制纸、胶鞋、皮鞋、肥皂、玻璃器皿、搪瓷品等 32 种产品为重点产品,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安庆针织厂等一批工厂为重点企业。在安排生产时,要优先确保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原材料需要。如棉花主要供应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棉线主要供应安庆针织厂和淮南天一袜厂。1963 年起,轻工企业开展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通过建立健全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改良技术,改进产品规格式样,增加花色品种,试制新产品,促进了生产的好转,多数企业扭亏为盈。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1961 年 11 月,省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意见,要求对手工业所有制进行调整,缩小企业上缴比例,实行计件工资,组织手工业者归队。据此,“大跃进”期间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全部退为集体所有制,恢复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组,部分并社、并组后转为联社统负盈亏的合作工厂(大集体工厂),重新划小了核算单位。经过两年努力,1963年全省恢复合作社、组 3088 个,保留 167 个合作工厂和个别升级为国营工厂的企业。在管理体制上,1961 年 10 月,恢复成立安徽省手工业管理局,重新确立管理范围。随后,各专、市、县也相继恢复了手工业管理局。一些农村社、队分别建立手工业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小组。各地组建了一批专业的手工业厂、社,广大农村还组织了亦工亦农的手工业小组,还有一些家庭利用农闲积极开展手工编织。各级手工业管理机构和生产单位,通过组织老手工业工人按行业归队、鼓励有经验的技工带徒、恢复传统名牌产品的生产、改革收益分配办法等措施,促进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4 年,全省手工业系统坚持自力更生,以小型为主,开展群众性的小建议、小革新、小创造、小发明活动,实现技术革新项目 4700 多项,其中设备革新项目 1600 多项。

总之,经过努力,到 1965 年,安徽手工业生产稳步发展,已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城乡人民日用手工业品增加,剪刀、铁锅等产品不但满足省内需要,还行销省外。全省有绣花被面、玉雕、徽墨、花漆筷、歙砚、羽毛扇、舒席、纽扣、面包篮等 29 种传统手工艺品出口到英国、法国、加拿大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

整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是工业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1961 年 12 月,安徽省开始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等部分国营企业作贯彻《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

试点。主要做法是：以提高企业效益、扩大品种、降低消耗为中心，整顿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以厂长为核心的各级行政负责制，形成以总工程师为核心的三级技术责任制，建立职工岗位责任制。加强制度管理，制定工艺操作规程，填平补齐，更新设备，严格质量监督，执行国家和部颁标准，建立健全经济核算制度，严格财务和物资管理。1962年4月，试点企业增加到449家。5月，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颁发《关于试行工业七十条的报告》，要求全民所有制企业都要执行“工业七十条”。随后全省广泛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1963年8月，安徽省先后组织轻工、化工、纺织、手工、冶金、机械6个行业、79家企业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600多人，分3批赴上海学习工业生产管理经验，学到先进经验3800多条，其中的80%得到及时推广。此外，各企业还自行组织“取经团”到北京、天津、南京、常州、徐州等地取经。通过学习推广外地经验，企业增盈效果明显。当年，全省有44个重点产品消灭三类品，扭转了亏损现象。

1964年至1965年，安徽工业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整顿企业秩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整体素质。为此，全省公交系统开展了争创“五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好、完成国家计划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干部思想作风好）、“五好班组”（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学习文化技术好、小组管理好、互助协作好）、做“五好工人”（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学习文化技术好、团结互助好、遵守纪律好）活动。各企业竞相对管理体制、制度、方法、劳动组织进行改革，开展技术革新竞赛。同时，积极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等活动，促进企业领导作风和职工精神面貌的转

变,推动企业生产。最为典型的是马鞍山钢铁公司。1964年,马钢公司针对不少厂矿管理混乱、生产环境差的状况,在1963年精简管理人员23%、工人74%的基础上,再次对管理层进行精简,当时共减少处室13个、人员50.7%;减少科室一半、人员34.7%。继之,又在全公司开展了以搞好设备维护管理工作为中心内容的“三清”(厂区环境清、车间内部清、设备本体清)、“五不漏”(机械设备不漏水、不漏油、不漏汽、不漏风、不漏电)、“一条线规格化”(工具用具分类归队,对号入座;物件摆放五五成垛、成方、成行;原料、燃料堆放成方;悬挂物件整齐划一、一尘不染)文明生产活动,促进生产经营状况的好转。当年,马钢实现扭亏为盈,甩掉连续5年亏损的帽子,被誉为“江南一枝花”。

五、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调整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安徽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战线也进行了调整。

科技工作方面。1961年,安徽贯彻《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对科研机构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加强农业科研机构,对一部分科研条件、力量比较薄弱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科研部门进行压缩。1965年底,全省只保留县以上自然科学研究机构53个、科研人员958人。

在调整科研机构的同时,加强了科研工作为农业服务方针的贯彻。1961年5月,省委批转省科委《关于1961~1962年科技工作的意见及发展计划》,明确提出科技工作必须坚决贯彻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农业服务的方针。为发挥科技工作支援经济建设的作用,号召科技人员深入基层调研,围绕工农业生产中出现的 key 问题开展试验性研究。在这方面,农业科研机构起了带头作用

用,成绩显著。1961年,省农科院作物所与畜牧所合作,在肥西县园林公社建立综合性研究基地。接着,省农科院所属的棉花、茶叶、烟草、蚕桑等专业研究所和各专区农科院也分别建立固定的研究基地。调整期间,仅在淠史杭灌区就建有基地14处、样板田2297亩。农业科技人员积极开展培育农作物新品种的科研活动,先后培育出抗锈能力强、茎秆轻短、不易倒伏、早熟、产量高的“安徽9号”、“安徽10号”小麦新品种,培育出植株高大、分枝多、荚长粒多、不易感染病毒的“大角早”油菜新品种。在改良土壤、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方面也取得进展。

1963年10月,国务院颁发《发明奖励条例》和《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安徽加大了普及、宣传科技知识工作力度,在工农业生产中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积极推广新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12月,全省召开科技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安徽省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332个科研项目、952个课题,内容涉及到农业、工业、医学三个方面。在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5月,全省有9个科研项目参加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

教育工作方面。按照从当时的经济实力出发、适当照顾今后发展需要的原则,对各类公办学校的规模、结构进行压缩和调整,使之趋于合理,为提高教学质量打下一定的基础。1963年,全省高等院校由1960年的44所调整为14所,中等专业学校由300所调整为70所。同时,相应地减少了大专院校的招生数,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模也作了大幅调整。

在压缩教育规模、调整教育结构的基础上,全省逐步端正教育工作方向。各地大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1957年以来在历

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教师进行甄别平反,加强对教师的团结教育,积极慎重地吸收先进教师入党。关心教师的生
活,当时尽管国家物资紧张,仍设法尽量保证对教师的供应。积极
为教师创造专心从教的条件,尽量减少教师的兼职和行政事务,按
照教师的专长和爱好对部分教师的工作进行调整,使他们能各展
所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经常下基层,对各校按照计划教
学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注意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加以推广。为规
范学生行为,稳定教学秩序,省教育厅制定了中、小学学籍管理办
法和中、小学学生守则,各类学校也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严格
执行,确保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到实处。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发展半工(农)半读教
育。6月,国家主席刘少奇来安徽视察,进一步倡导推行两种劳动
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从下半年起,安徽各地积极兴办了大批耕
读小学、农业中学。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系统还试办了一批半
工半读学校,一些全日制的中专和技校也改为半工(农)半读。在
高等教育方面,1965年1月,安徽劳动大学成立。这是全省第一
所半农半读大学。另外,各高校还在部分系和专业中实行半工
(农)半读。截至1965年底,全省各类耕读、工读学校达6.3万多
所,在校生165万多人。至此,全省初步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的半工(农)半读体系。

文化工作方面。对“大跃进”期间遍地开花、多如牛毛的文化
(文艺)机构、组织、团体,特别是县以及县以下的各种剧团、文联组
织、艺校等进行撤并,解散了人民公社及大队办的大部分文化馆
(站)、图书馆及各种报刊。群众自办的名目繁多的诗歌创作队、歌
舞队、文工队等业余文艺组织也相继停止演练活动。恢复党的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工作方针，为繁荣文艺创造良好的环境。当时，文化界活动比较频繁，不仅举办全省性的摄影艺术展、美术作品展、漫画创作展、诗歌创作交流会，而且经常邀请各地剧团、演出队来合肥公演。省泗州戏剧团、梆剧团、坠子戏剧团、徽剧团排演了一批传统剧目。省徽剧团大力开展徽剧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传授工作，大量收集不同流派的剧目、剧本、唱腔、锣鼓、脸谱等珍贵资料。仅1961年就收集到徽剧剧目1700多个、本戏35本、折子戏700多出（其中《战玉章》、《花招瑶台》、《须弥大会》、《彼离访婿》、《麟骨床》等都是稀有剧本）、唱腔350种、曲牌近600个、脸谱80多种，传授徽剧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代表剧目70多个。现代戏的创作也很活跃，从1963年起，每年都要举办大型的现代戏观摩演出。1963年底，安徽省文联召开二届二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在生产斗争实践中改造思想，让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会后，全省文化部门进行广泛动员，开展文化下乡下厂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批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卫生工作方面。1961年起，安徽对卫生机构、中小药厂和卫生学校进行合并或撤销，对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录用的非卫生技术人员进行清退。1962年，全省医疗机构数降至9984个（其中医院294个），医院、卫生院床位数降至24928个，卫生机构职工降至70989人。中等卫校只保留合肥、芜湖、蚌埠、安庆、淮南、阜阳、六安、巢县、屯溪等9所卫校和芜湖中医学校以及安医、蚌医附设护士学校，余皆撤销。1963年又撤销巢县卫校，将安医附设护校并入合肥卫校。对设备差、技术力量薄弱的大批中、西医药企业进行合并、转产。到1964年底，全省仅保留合肥制药厂、芜湖制药厂、蚌埠制药厂、六安朝阳化工厂4家西药厂和淮南、合肥、安庆、

芜湖张恒春、屯溪新安江、安庆余良卿 6 家中药厂。加强对民间行医卖药和药品生产的管理,销毁流入市场的伪劣药品。

1961 年 10 月,全省召开医院工作会议,提出整顿医疗作风。会后,一些医院实行了主治医师季度值班和科主任定期参加门诊制度、医师查病房制度;大多数医院建立健全了隔离消毒、会诊转诊、病案讨论、术前术后讨论、死亡讨论、处方和业务学习制度。医疗行风为之一新。

调整期间,安徽加大了对县医院及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1963 年,省卫生厅确定金寨、霍山、舒城、岳西、泾县、歙县、全椒、凤阳、宿县、凤台 10 所县医院为县级重点建设医院。次年,又确定无为、太湖、太和、祁门、萧县县医院为重点扶持对象。对这些医院,省里从财力、设备、技术骨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从而大大改变了各家医院医疗技术水平低、设备条件差的状况。

在以国家举办卫生事业为主体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生产、便利群众就医的原则,采取小型、简易、灵活、分散的方式,筹办多种农村医疗机构,主要有公社和大队集体举办的医院、卫生所、保健室、联合诊所和个人诊所,基本达到区和公社有卫生院,生产大队或管理区有卫生所、保健室或医疗点,生产小队有保健员、保育员、助产员。1963 年,全省农村医疗机构达 7000 多个,占医疗机构总数的 75%。

1963 年,鉴于部分地区发生副伤寒疫情,全省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以改水改厕为重点的消灭疾病媒介活动。拆除城镇中的露天厕所,修建公共厕所,成立清洁队,分段、定点收集垃圾,对饮水水源进行检测和消毒。是年,安庆市拆除、改建露天厕所 2178 个,建公共厕所 150 个;徽州专区各县城发动 20 万人整顿市容,使一

些古老城镇市容大为改观。在农村,继续开展以改良饮水、管好粪便为中心内容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积极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寄生虫病,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也做出新的成绩。

六、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加速甄别平反和右派摘帽工作

“大跃进”运动期间,安徽“五风”盛行,破坏了党政、党群和党内正常关系,大批干部和善良的群众受到伤害。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从3月份起,安徽省、地(市)、县各级领导人纷纷下基层进行调研,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如何改善党政、党群和党内各种关系。

1961年7月,省委召开全省干部训练工作会议。会议号召全体干部要努力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切实纠正一些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进一步改进干部工作作风。会议确定:在两三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级各部门的主要干部以及部分专业技术干部普遍轮训一遍。11月24日,省委下发《关于轮训干部的计划》,要求在1963年底以前将全省13.8万名党员干部分期分批轮训完毕。1962年10月,全省组织部门首批训练了91000名干部。1962年12月至次年3月,省委分别在合肥、蚌埠、芜湖举办了两期农村区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训练班,训练基层干部5600多名。各地还抽调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集中进行短期训练。此外,各级党校1963年又轮训干部33157人。到年底,基本完成了省委轮训干部的计划。

调整期间,安徽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一是对党员发展数量严加控制。1962年7月,省委组织部发出《关于暂时停止接收党员的通知》,指出:由于1958年以来,接受新党员单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决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般均暂时停止接收党员,以便集中精力巩固党的组织”。根据《通知》精神,1962年至1965年间,全省各地抓紧进行了党组织的巩固和现有党员教育工作,一般很少发展新党员。1963年和1964年,全省总共只发展党员150人。

二是对党员开展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为了普遍提高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增强党员的优良传统意识,1961年4月27日,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意见的报告》。从1961年冬季开始,全省74个县、市党的组织,根据省委的要求和部署,较系统地对党员进行了一次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的训练教育。至1962年7月,全省70%以上的党员接受了教育训练。通过训练,党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有所变化,政策观念、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进一步增强,为克服困难、迅速扭转全省经济形势创造了条件。

此后,随着形势发展,安徽各级党组织还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进行大规模的学习教育运动,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党员重新登记工作。

1961年8月,安徽开始对1957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重点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各级党委向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道歉,并承担自己的责任。由于一些同志认识不足,执行不力,这一阶段的甄别平反工作进展缓慢。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与会的安徽代表对曾希圣压制民主的作风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会议决定对安徽省委实施改组:将曾希圣调离安徽,任命李葆华为省委第一书记,并派刘季平、李丰平来安徽工作,任书记处书记。

2月28日,省委下发《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扭转安徽的局面,必须首先从上到下地改变安徽党的作风,而改变作风的关键又在于恢复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省委必须带头建立党委的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省委常委会或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并按照党章的规定,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会议”。此后,省委抓了三个环节的工作:一是从发扬民主着手,加强民主集中制;二是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着手,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三是分清大是大非,搞好甄别工作。

为了进一步研究甄别平反工作,6月18日省委召开地、市监委书记会议。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4月27日发出的《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精神,根据“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的指示,会议确定全省甄别工作的范围是:平时案件;1957年以后处理的反、坏分子案件,特别是错误批判李世农后复查定性上升的反、坏分子案件;1960年的“新三反”案件;1961年的整风整社案件;反右倾案件等。同时,规定了甄别的政策界限,主要是:对农业“三改”提出不同意见的、对领导的缺点错误提出善意批评的、如实向上反映情况的、对1957年春政法部门开展反右派提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案件时对案件性质和量刑提出不同意见的、与某些受到

批评斗争的同志有些正常往来或对他们有过一些好评的、强调报刊宣传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的、对理论问题提出探讨性意见的、对反瞒产提出不同意见的,都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正确的言行还要肯定其正确性。此后,省委先后召开了第五、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全体会议,对李世农、张恺帆、陆学斌、杨效椿、魏心一、刘秀山等重大案件进行了讨论,并印发了省委关于李世农、张恺帆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共中央监委的批复,撤销了原来的错误决议,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待遇,因上述案件被无辜株连的大批错案同时得到平反。

由于省委重视,措施得当,全省甄别平反工作进展顺利。1962年10月,全省甄别干部443273人。1963年7月,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99%的案件得到甄别,其中全错全平的占60%,部分错部分平的占21%,不错不平的占19%。

安徽右派分子摘帽工作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分批进行的。1959年10月,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摘掉切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首批摘掉240名右派分子的帽子。1960年春,在全省范围内又摘掉2250名右派分子的帽子。1960年9月全国第一次改右工作会议后,全省加快了右派分子摘帽和甄别平反工作进度。从10月至1962年春,就摘掉了10329名右派分子的帽子。1963年和1964年,全省又分别摘掉854名和741名右派分子的帽子。至此,全省共有14414名右派分子被摘掉帽子,占右派分子总数的45.8%。

七、国民经济调整促进了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

由于采取了富有成效的调整措施,经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到1965年,安徽国民经济明显恢复,形势全面好转,

主要表现在：

农业方面。1965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695405万元，比1957年增长189406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达377361万元，比1957年增长25361万元；全省粮食产量达193.32亿斤；棉花、油料产量分别为2.03亿斤和3.3亿斤；其他农产品如麻类、烟叶、蚕茧、茶叶、水果的产量，多数接近1957年的水平，有的有了一定的增长。生猪存栏数达604.39万头，比1957年增加44.32万头。林业生产出现良好势头，1963年至1965年，全省造林299万亩，平均每年造林99.7万亩。由于坚持造林检查验收制度，造林成活率、保存率较以前提高。全省林地面积增加，森林覆盖率呈上升趋势。

工业方面。经过调整，企业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值不断增加。1965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全省工业总产值达318044万元，比1957年增长164045万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从1957年的30.43%提高到45.74%。调整期间，安徽在对重工业进行压缩的同时，大力发展轻、手工业，新建了一批企业，积极发展日用工业品和小商品，形成了多部门发展轻工业的基本格局，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1965年，三者比例为54.3:27.6:18.1，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商业方面。通过恢复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三条流通渠道、恢复和建立新的经济购销关系、改善服务态度、加强市场管理，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增加了商品购销额。为了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减少商品流转环节、消灭商品不合理损耗，从1962年起，商业部门积极改善管理，帮助企业树立经济核算观念，有效地克服了盲目经营和不计盈亏现象。全省商业工作购销两旺，走出

了困境。1965年,全省商品纯购进总值196204万元,比1957年增长31.65%,纯销售总值239156万元,比1957年增长38.72%。1962年至1965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递增3.7%,1965年达20884万元,比1957年增长28%。市场货源充足,城乡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财政、金融方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安徽财政经济出现较好发展势头。1965年,全省财政收入76426万元,收支平衡,结余17018万元。金融工作,通过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工作六条”),紧缩信贷,控制货币发行量,基本消除通货膨胀。1963年至1965年,省人民银行投放货币1.2亿元,平均每年4000万元,比1960年至1962年每年投入1.4亿元减少71.8%。1965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为3亿元,比1962年末的3.72亿元减少19.36%。由于收入增加,1962年至1965年,全省城镇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增长71.7%,农村增长61.2%。同期,银行贷款增加近2亿元,在优先支援农业、支持短线产品生产、支持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科教文卫事业方面。经过调整,到1965年,全省有高校15所、在校学生19328名,中等学校3432所、在校学生417675名,小学105846所、在校学生4903989名,幼儿园338所、在园幼儿43184名,特殊教育学校5所、在校学生382名。教育质量明显提高。科技队伍日益壮大,围绕工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开展科研工作。调整期间,全省在低产田改造、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育秧技术、新化肥、绿化等项目上进行了新的探索。许多工厂企业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涌现出一批思想素质高、懂技术、善钻研的科技

人员,成功地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和研究。

文化艺术团体及文物事业机构都进行了压缩。文艺创作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重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恢复并进一步发掘徽剧等传统文化遗产。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文化部门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扩大与外省、市的文化交流。专业文艺工作者积极组织戏剧、电影、图书等下乡下厂,为工农兵服务。新闻广播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

卫生工作贯彻执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大力宣传卫生常识,开展以改水改厕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清除垃圾、杂草,疏通水沟,使市容和环境卫生大大改善。积极防治地方病、传染病,增强城乡人民卫生保健意识。医疗工作将重点转向农村,抽调医务人员下乡,送医送药上门,并帮助农村培训卫生员和接生员。各医疗单位由于加强了管理,服务态度、医风医德和医疗质量都有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全省加大了血防工作力度,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率有了下降。1964年,含山县在全省第一个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上述成就表明:经过1961年至1965年长达5年的调整,安徽国民经济已走出困境,走上正常发展轨道。至此,安徽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全面完成,全省人民又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农业的调整

专题资料

推行责任制 扭转农村困局局面

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安徽非常积贫,成为全国最为“大跃进”的省份之一,虽因经济并未严重灾祸,全省农村“饿、病、逃、死”现象十分突出。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以董学恭力倡导的安徽省委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着手组织调查研究灾情,开展整风整社,讨论摆脱经济困难的途径。经过反复思考,特别是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行的包工包产等的经验,加上从土厂实行的评工记分办法中得到启迪,决心从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入手,恢复与发展农村经济,控制和扭转农村困局局面。

农村的困境也使人民群众以不同形式谋求出路。1960年,宿县一位 70 多岁的老农刘洪兰,得到公社允许,带着生病的儿子到山下种黄升开荒。鸡只又五斤荒 16 亩,收回粮食 300 斤,除留下口粮,剩下都交给了 30 斤斤,交给公社 180 斤。他家还欠了养区 20 元债务的 60 元现金。这地当时国家已划为农业队基地,农民得到直交,请刘要求也划归队。1961 年春,县地委便批准划出了这块要求。中共宿县县委为划归队农民划地。1962 年 3 月在全省实行了“三定”生产形式,分定产量,定产,定管理。当时称之为“三定”制,定产,定地,定责任。

农业的调整

江鲲鹏

推行责任田 扭转农村困难局面

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安徽曾非常积极，成为全国最为“大跃进”的省份之一，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灾难，全省农村“饿、病、逃、荒、死”现象十分突出。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以曾希圣为领导的安徽省委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着手组织调查研究灾情，开展整风整社，讨论摆脱经济困难的途径。经过反复思考，特别是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行的包工包产制的经验，加上从工厂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办法中得到启迪，决心从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入手，恢复与发展农村经济，控制和扭转农村困难局面。

农村的困境也促使人民群众以不同形式谋求出路。1960年，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农刘庆兰，得到公社允许，带着生肺病的儿子到山上养病并开荒。刘氏父子开荒16亩，收回粮食3300斤，除留下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外，交给公社1800斤粮食，还交了养猪养鸡所得的60元现金。这与当时困难已达极点的农村形势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农民得到启发，纷纷要求包田耕种。1961年春，其他县农民也提出了这种要求。中共安徽省委尊重并体谅农民的要求，1961年3月在全省实行了这种生产形式。为避开“单干”这个政治字眼，当时称之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

人”责任制,简称“责任田”。1961年8月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70.8%,年底增加到90.1%。

安徽全面推行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极“左”路线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所逼出来的。实行责任田,确实很见效,能够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度增产。1961年10月,安徽省对36个县进行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办法的36个队每亩平均产量284斤,比1960年增产38.9%;而不实行责任田办法的36个队平均亩产270斤,只比上年增产12%。1961年,全省产粮180多亿斤,比1960年增产40%。广大农村摆脱了饥荒,“饿、病、逃、荒、死”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尽管责任田的实施取得较好成效,还是遭到持“左”倾观点的人的强烈反对和非难。在责任田推行过程中,关于责任田是否是单干,会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1962年1月,中央将责任田作为“单干风”否定了,并对安徽省委实施改组。3月20日,省委通过《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对责任田进行全面改正。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三自一包”,改正责任田的进度大大加快了。至此,对调整安徽农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责任田夭折了。

召开石关会议 初步反省工作失误

在整风整社、推行责任田过程中,省委通过反思农业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思想有了触动,对前几年工作中的错误也有所认识。而且,这时中央对国内严重局势认识已很清醒,连续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纠正“五风”,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

1961年5月21日至6月2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销量的九条办法》，并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在不脱产的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61年6月25日至7月18日，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除部署贯彻“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等工作外，主要是听取由曾希圣代表省委对1958年以来安徽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产生原因、经验教训所作的较全面系统的检查和分析。

曾希圣的检查长达5.6万字。他检讨了自己和省委其他领导1958年以来的主要错误：“一是把农村中存在的‘左’估计为右，反右中错斗了人，破坏了民主，堵塞了言路。二是把减产当成增产，因而高征购，粮食安排不落实，发生饥荒和非正常死亡。三是‘大办’搞得过多，如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钢铁，大办交通运输，大办养殖场等等，过多地占用了农村劳动力，因而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四是工效要求过高，不注意劳逸结合，如在水利上曾提出每人每天做三四十方土，因而严重地影响了群众身体健康。五是对已产生的严重问题没有根据个别事例进行全面检查。如非正常死亡问题，不能说一直没有发现，由于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所以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根据个别事例认真的进行普遍检查，全面地加以解决。”

根据上述错误和原因，曾希圣代表省委总结了要彻底纠正错误、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汲取的14点教训：

“第一，不要单纯怕落后，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单纯怕落后是不行的。落后并不可怕，怕的是单纯凭主观愿望办事，因怕落后而蛮干。蛮干必然使工作遭受损失。”

“第二，不要盲目赶风头，要善于辨别风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对于来自‘左’的方面歪风，我们糊里糊涂跟着干了，如五八年水稻高产卫星，我们也搞了，当时听到了，感到很舒服。这个教训告诉我们：要‘一切经过分析’、‘一切经过试验’。特别是对于重大的问题、刚刚出现的东西，更要谨慎从事。”

“第三，不要急于求成，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渐进。”“这几年，由于在许多问题上急于求成，如提出三年实现淮北河网化，一年实现全省工具改革化……这些都超过了实际可能，助长了强迫命令风。”

“第四，不要片面地强调发展工业，要首先抓好农业，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正确处理各方面的比例关系。”

“第五，不要片面追求任务而不顾政策，要把任务和政策很好地统一起来。”“如在粮食收购方面，这两年由于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任务定得高，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购了过头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六，切忌盲目乐观，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只讲成绩，不讲缺点，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错误，致使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第七，不要护短，要如实反映情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来执行。”

“第八，不要对群众有恩赐观点，对群众的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把加强领导和由群众当家作主很好结合起来。”

“第九,不要满足于表面上轰轰烈烈,要脚踏实地,讲究实效。”

“第十,不要忽视农民问题,要经常研究农民问题。这两年我们片面强调工业,错误地认为农业已基本过关,因而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导致农业衰退。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在没有消灭工农差别之前,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农业有所忽视。”

“第十一,不要被框框束缚,发现新问题后,就要寻根找源,实事求是地摸清问题症结所在,对症下药。”

“第十二,不要乱戴帽子,要充分发扬党内党外民主。”

“第十三,要提高理论水平,把不同问题的界限搞清楚,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十四,不要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求甚解,要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

曾希圣讲了14点教训后说:“安徽工作中的问题,首先应该由省委负责,在省委中首先应该由我负责,不能怨天尤人,不能推卸责任。”尤应提出的是,曾希圣在会上特别强调,这些教训是用鲜血换来的,永远不应忘记。他表示要戴罪立功,把“左”的一套彻底纠正过来。在省委这次会议后,各县都召开了四级干部大会,进行批“左”整风,采取“揭盖子”、“撕面子”、“倒底子”、“挖根子”等方法,检查“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揭批“五风”的表现和根源,清除“五风”的影响。由于省委及曾希圣本人的认识所限,石关会议不可能对“左”的错误作全面彻底清理,但省委第一书记代表省委公开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总结教训,无疑有助于以后少犯或不犯同样的错误,有利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

充实和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自“大跃进”以来,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太大和大办钢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占用了过多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致使田间生产和多种经营方面出现了劳动力越来越紧张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1962年中央给安徽省下达了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106万和精简职工53.7万人的任务,重点是把来自农村尤其是1958年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尽可能精简回乡。省委依据中央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强调安徽作为农业省充实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更为迫切。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缩短农业基本战线,减少平时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人数,充分利用农闲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做到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两不误;另一方面,积极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农业。1962年5月,省委召开全体委员会,研究落实中央下达的精简任务。经过思想动员和妥善安排,从1962年8月至1963年9月,全省共精简职工54万人,减少城镇人口85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98万人,从而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增加了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到1965年底,全省农村劳动力比1960年增加208万,除了自然增长因素外,绝大部分是城镇、企业精简回乡的,也有一些是三年困难时期外流他省在1961年搞责任田时回乡的。在一两年时间内农村劳动力增加200万,对恢复农村生产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经济调整期间,安徽的财政经济并不宽裕,为了发展农村生产

力,从1962年起,安徽省执行中共中央规定节约预算支出10%的指标,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不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购买非生产性设备,停建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杜绝用公款请客、送礼;精简会议、文件、报表和刊物等。1962年初,在安排支出预算时,行政经费定额压缩了20%,之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各项行政事业费,一律再压缩10%。与此同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1963年头两个月,全省各地银行发放的支援春耕生产的长、短期贷款就达700多万元,比1962年同期增加4倍多。1960年至1966年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支援农业资金情况见下表:

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支援农业资金简表

年 份	财政信贷支 农资金(万元)	国家财政支 援款(万元)	占国家财政 总支出的%
1960	48343.8	38985.8	22.38%
1961	29794.3	24557.3	29.18%
1962	11585.1	13016.1	33.68%
1963	28597.4	21854.4	42.04%
1964	26963.2	28261.2	44.89%
1965	18534.0	18972.0	32.48%
1966	26279.1	22120.1	31.48%

从上表可以看出,安徽1963年农业投资金额比最低的1962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其后几年基本保持相对稳定。从相对量上看,即从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上看,1962年后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最高的1964年竟达44.89%。这一比例高于同时期的全国水平,是安徽历史上没有过的。由于缩短、缩小了农村基建的战线和规模,使有限的资金能集中使用,进行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购置农

具、耕畜、种籽等,从而明显提高了农业投资效益。

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力,省委和省人委特别强调把发展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首位,号召各行各业从各方面加强对农业的支援,要求工交、商业、金融各部门在制定年度计划和工作任务时,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力求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商业、供销体系。1963年元旦,《安徽日报》发表题为《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争取今年农业丰收》的社论,提出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各项决定,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争取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并且带动其他建设事业的发展,是摆在全省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支援农业大造舆论。不久,省委又召开各有关支农部门负责人会议,逐项检查春耕生产物资的供应情况,要求各部门更好地协调动作,保证完成支援农业任务。会后,各有关厅局亦相应召开会议,采取措施,具体落实对农业的支援。3月,省物资部门召开全省物资交流会,会议的主题是:“把急需物资调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支援春耕大生产”。会上实现总成交额350万元。其中直接支援农业的物资成交额占54%。4月,全省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系统分别召开会议安排当年工作任务,确立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主要体现在增加生产资料供应上。因为在“大跃进”期间农用中小农具损失破坏严重,而国家又放松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使得当时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中小农具不足一件。对农业生产实行倾斜政策后,这一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仅

据 1963 年 1 月至 5 月的统计,全省各行各业为农业提供的主要生产资料,比 1962 年同期有很大增加,并且逐步上升。头 3 个月,化肥增长 6.7%,农业排灌动力机械增长 39.4%,水利启闭机械增长 38.9%。3 月份,大部分支援农业物资都比 2 月份有成倍增长,如化肥增长 1.1 倍、木制农具增长 1.4 倍、农用船只增长 10 倍。进入 4 月份,依然保持这股上升的势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大量增长,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全省还加速进行农村电力基本建设。1964 年,国家和地方对安徽农村电力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超过 1963 年的 2 倍以上,上了 19 个工程项目。全部工程完工后,排涝灌溉受益农田达 94 万多亩。另外,全省各地还兴建了一批小型化肥厂,直接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制定切合实际的治水方针 稳步进行水利建设

“大跃进”时提出的“三年实现淮北河网化,全省水利化”的口号,固然反映了全省广大农民要求改变农村水利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领导机关要求过高、操之过急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随着经济调整政策的贯彻落实,经过对前些年水利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省委、省人委改变了过去贪大、求多的错误做法,确立以“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从而端正了治水方向。在切实可行的治水方针指导下,水利部门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调整了建设布局,根据需要与可能,对在建设工程逐一分析排队,分别轻重缓急,采取续建、缓建、停建等措施,重点建设了一批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工程。从 1963 年起,省委要求重点建设沿江圩区商品粮产区,以当时芜湖专区所属的无为、和县、巢县、当

涂、芜湖等县为重点,大力发展机电排灌,共建机电排灌站 2680 处,拥有 61.9 万马力,使 696 万亩农田受益,占易涝面积的 89%。1965 年,又在沿淮一带的风台、怀远、五河等县集中兴建了一批电机排灌工程,为后来在淮北地区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继续抓好淠史杭等重大水利工程的续建和配套建设。

省委、省人委在抓重点工程的同时,十分重视广大农民在治水中的作用,制定了保护和调动农民治水积极性的政策,即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力争当年收益为主。这“三个为主”与前面所述的“三个为主”相辅相成,使广大农民既能承受水利建设的负担,有助于树立自力更生精神,又对效益看得见、摸得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治水积极性。每年秋收后,省委、省人委都专门召开会议、发出指示,并通过新闻媒体号召广大农民利用冬闲兴修水利。其间,还大力号召人们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动员广大群众投入到确有实效的治水运动中来,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在治水过程中,还纠正了“大跃进”期间“重修轻管”的片面做法,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水利管理,使已建水利工程的效益明显提高。由于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治水方针,全省水利建设出现了稳步前进的良好势态。据统计,1966 年比 1962 年有效灌溉面积增加 461 万亩,旱涝保收面积增加 583 万亩,除涝面积增加 331 万亩。这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采取切实措施 巩固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管理体制

“大跃进”期间,由于刮“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致使农村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制遭到破坏。1961年4月后，省委在由点到面推行责任田的同时，贯彻“农业六十条”，在全省农村恢复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明确宣布不得无偿调拨生产队的人力、物力，对平调的财物进行退赔。可是到1962年，由于强令改正责任田这一反复，又使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出现了紊乱，集体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针对这种状况，1963年初，省委、省人委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农业六十条”，从五个方面努力，大力整顿社队，以理顺农村生产关系：第一，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坚持少扣多分，做好收益分配工作；第二，积极推行各种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合理组织和使劳动力，逐步制定各种定额，认真改进评工记分方法；第三，培训会计人员，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第四，在保证完成农业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集体副业，增加生产队和社员收入；第五，按期民主选举队委会，把那些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遇事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的人选为生产队干部，切实树立老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强调在农业战线上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的各项调整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工作的落脚点真正放到生产队，下定决心，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一个一个地把生产队整顿好、建设好。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必须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首先保证粮食产量逐年有所增加，并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棉、油、麻、茶等经济作物，以及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努力挖掘农业内部潜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积极地、有步骤地推

行农业技术改革,实事求是地调减“三改”面积,如双季稻种植面积由 50 年代末的 648 万亩调减到 366 万亩,后又调减到 166.75 万亩。由于坚持了因地制宜,一年三熟制的改革成果得到了巩固,特别是淮北麦产区一方面继续实行扩大夏收作物比重的方针,一方面大幅度调减了稻改面积,收到增产效果。1963 年底,省委又专门召开全省农村副业工作会议,要求全省农村把发展集体副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上述决策的实施,对于稳定、改善社队领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各方面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村经济调整的成效

责任田的推行、“农业六十条”的贯彻以及增加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资料、资金等措施的实施,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致力于农业生产;一些新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良种的推广,也较大地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水平;新修的水利工程和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再加上 1963 年以后在农村开展的“比、学、赶、帮”活动,比较实在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1964 年 5 月份以后,又因地制宜地开展学大寨运动,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所有这些措施,都较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安徽农村经济走出困境,到 1965 年,多数生产项目的产量、产值,恢复或接近 1957 年的水平,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农村经济调整的物质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粮食总产量逐步恢复和增加

1960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 134.8 亿斤。1961 年实行责任

田,当年实际产量达到 180 亿斤(此数字系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审定)。1962 年,由于强令改正责任田,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全省粮食总产量降至 134.14 亿斤。1963 年为 139.54 亿斤,比上年增长 4%。1964 年为 162.42 亿斤,增幅为 16.14%。1965 年达到 193.32 亿斤,增幅为 19%。虽然粮食总产量仍未达到 1957 年 205.4 亿斤的水平,但调整期间每年的增幅都较大。

二、农业总产值不断增长

“大跃进”期间,全省农业总产值实际上一直是负增长。1962 年后,随着“左”倾冒进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被重新确立,农业总产值实现了逐年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为建国后安徽农村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全国农村经济的平均增产速度。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1962 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为 18.85 亿元,1963 年为 19.82 亿元,1964 年为 23.18 亿元。到 1965 年,农业总产值达到 28.75 亿元,比 1957 年的 28.19 亿元增加 0.56 亿元,

农业总产值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60 年为 28.4%,1961 年为 39.7%,1962 年为 50.05%,1963 年为 53.9%,1964 年为 52.89%,1965 年为 51.21%。这表明,经济调整期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三年困难时期大大提高,在发展速度上也高于同时期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速度,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工业几乎相当。虽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应该逐渐增大,而农业的比重应该逐渐下降,但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这一特殊阶段,对农业的倾斜,使农业得到优先发展,不仅稳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缓解了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局面,而且带动了以农业品为原料的轻纺、食品工业的恢复,促进

了工业的全面发展。

三、畜牧业和经济作物逐步恢复和发展

“大跃进”期间，畜牧业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进入调整阶段后，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畜牧业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1965年与1962年相比，牧业总产值增长47.4%，生猪存栏量增长49.8%；大牲畜存栏量增长18.3%，其中耕牛增长最快，增加31.32万头。畜牧业的增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调整期间，主要经济作物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全省棉花总产量，1962年为37.19万担，1963年为64.55万担，1964年为129.56万担，1965年为203.01万担。1965年与1962年相比，增加4.46倍，年平均递增26%。油料总产量，1962年为149.57万担，1963年为195.87万担，1964年为289.76万担，1965年为330.33万担。蚕茧总产值，1962年为0.87万担，1963年为1.12万担，1964年为1.79万担，1965年为3.51万担。茶叶总产量，1962年为18.97万担，1963年为22.26万担，1964年为24.81万担，1965年为29.45万担。烤烟总产量，1965年比1962年增长153.5%；水果总产量，1965年比1962年增长46.9%；麻类总产量，1965年比1962年增长186.8%。调整期间经济作物的总产量增长很快，一方面，是由于耕种面积有所扩大，使农业种植业的结构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既较好地满足了城市加工、轻工等企业的原料需求和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广大农民生活水平与1957年相比急剧下降,而且发生十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经过几年艰难曲折的调整,农村经济得以复苏,农民生活也随之有所改善。尽管这种改善还没有达到1957年的水平,但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没有了,农村人口逐步增加,到1965年恢复到2897万人,接近1957年的人口数。农民收入也增加了,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每个农业人口的农业产值由1961年的93元增加到1965年的144元,每个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产值由1961年的227元提高到1965年的343元,每个农村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由1962年的1200斤提高到1965年的1588斤。每个农民的纯收入也有所增加,1965年达到49.3元,虽然比1957年的74.56元还相差25.26元,但毕竟已摆脱了困境。

林业的调整

杨久梅

安徽林业实施调整前的状况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提供林副产品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社会效益。安徽属全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大力落实“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使受战争毁坏的林业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到1957年,全省造林总数达253.4万亩,四旁(路旁、水旁、村旁、宅旁)植树2.15亿株。

1958年初,安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运动初期,为大办林业,不切实际地提出“向大地园林化进军”的口号。编制营林生产计划时片面追求高指标,打破了“有多少种、育多少苗,有多少苗、造多少林”和“造什么林、育什么苗、采什么种”的正确原则。1957年,全省国营苗圃和农业社培育的苗木只能造林250万亩,而下达的1958年造林指标却为440万亩,其中国营林场的造林任务由4万亩增加到73万亩,为原计划的18倍。1959年,林业部下达安徽造林计划为2000万亩,省里追加到3000万亩。而1958年育苗只有8.07万亩,仅可造林1000万亩,苗木缺口很大。对此,省林业厅布置各地采取“柳树剃光头,杨树剪发,三桠分棵,竹园分家,杉林扦插,挖野生苗”等办法加以解决。由于栽植过程中不讲技术,栽后管理粗放,苗木存活率很低。据统计,1958年至1960年,

全省各地上报造林面积 8285 万亩,实际造林 2000 万亩,保存面积只有 280 万亩。保存造林面积占上报数的 3.38%,保存率只有 14%。其中 1959 年造林 1733 万亩(包括四旁植树折算面积 582 万亩),为当年造林计划的 57.8%;保存面积为 87.04 万亩,占年度计划的 2.9%,保存率只有 5%。

为完成庞大的造林计划,安徽积极发挥林场在造林中的作用,加大了林场建设力度。1958 年 6 月,省林业厅召开全省国营林场会议,号召大办国营林场。会后,各地掀起办场热潮。1958 年下半年,新建了休宁岭下、歙县许村等 79 个国营林场;次年又新建了滁县常山等 74 个国营林场;1960 年又新建了休宁石田等 8 个林场。至此,全省国营林场达 128 个(其间撤销了一些林地权属不清的林场),经营面积达 945.6 万亩,拥有职工 14527 人。

与此同时,安徽还兴建了一批集体林场。1958 年,巢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林业专业队为基础,建立 47 个社办林场,专事造林工作。场员在场劳动,回社分配。林权归社所有,收益统一分配。同年 11 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第五次林业工作会议,推广巢县经验,兴办社队林场。至 1959 年底,全省共兴建社办林场 757 个、林园(园艺)场 2541 个、果园场 391 个,固定劳力 94702 人。1960 年初,全省召开专区、市林业局长座谈会,强调以发展社办林场为主。各人民公社根据情况,既可以一社办一场,也可以一社办几个场,还可以一社办一个总厂,再办几个分场。推动了社队林场大规模的发展。

林场急剧发展,占用了大批劳力,冲击了农业生产。在筹建林场过程中,各地搞“一平二调”,无偿占用社队所有的林木、山场、农田、耕畜及个人所有的一部分林木、农具、房屋,引起群众的不满。

1958年5月,安徽钢铁生产开始“大跃进”。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全省掀起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为满足大炼钢铁的用材需要,全省设立了139个伐区,供各地采伐队和竹木生产指挥部进行采伐。1958年和1959年,省木材指挥部两次从淮北、江淮地区抽调农民、知青5万人成立国营森林采伐团,深入17个县采伐木材,此举大大鼓舞了人们毁林伐林烧炭的热情。其间,安庆专区组织桐城、怀宁、宿松、望江、枞阳等县13万炼铁民工到岳西山区砍树,历时半年,消耗森林资源200多万立方米。金寨县发动4.6万人伐木烧炭,仅1958年10月至12月就消耗活立木80万立方米。徽州专区各县用于炼钢铁的木炭折合木材52万立方米。歙县为炼钢铁和提取樟脑油,砍去全县70%的杂树和樟树。江淮丘陵和淮北平原地区因原有林木少,就将成片林和四旁树砍尽,使许多村庄变成了“光腩庄”。据统计,1958年至1960年,全省林木总采伐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

不仅如此,乱砍伐还越过省界。1958年秋冬,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当时木材不能满足大办钢铁和其他生产需要的情况,商请福建省委同意后,组建由嘉山、全椒两县2800名农民组成的安徽赴福建采伐团。1959年1月,到达福建沙县,按大队建制建立盖竹、郑府2个采伐场。至1960年春,伐木6万立方米。根据双方协议,五五分成,共运出3万立方米。

在“大跃进”运动初期,采伐队在采伐社队林木时未能征得社队同意,付给合理价款。随着木材生产任务翻番,国营、集体采伐队伍不断壮大,数十万炼钢铁民工进山伐木烧炭,便顾不上林木所有者的权益和山林管护制度。由于当时的口号是“人人扶钢铁元帅上马”,林木所有者只得任人砍伐林木。

过量砍伐,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据 1963 年调查统计,1958 年至 1962 年间,全省林地面积由 50 年代初的 2520 万亩减少到 1920 万亩,减少 23.8%;森林蓄积量由 8693 万立方米减少到 4028 万立方米,减少 53.7%;森林覆盖率由 12.5% 减少到 10.19%,减少 2.32%。森林分布退向深山,许多地方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清理山林权属 纠正“一平二调”

农村人民公社化前后,林木所有权混乱,林权纠纷较多,甚至引发了一些恶性案件。1959 年 6 月 2 日,省林业厅党组向省委上报《关于林木所有权问题处理意见报告》,提出解决林木所有权问题的办法:“原属国有的仍归国家所有,原属乡有的应划给公社所有,原属高级社所有的仍旧归高级社所有(即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大队不便管理的分散的小片山林,也可划归生产队所有。原属社员的零星树木仍归社员所有,尚未处理的天然林和无主林,一律收归国有。”社员私有林木折价入社,作价款归社员所有,林木占有单位要分期偿还。6 月 15 日,省委将报告批转各地。由于受“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影响,报告所提办法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961 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林业十八条”)。据此,安徽对山林权问题再次作了规定:在人民公社化以前划归国有的山林,仍归国家所有;高级合作社时期,划归合作社、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山林和社员个人所有的山林仍归大队、生产队集体所有和个人

所有。同时,按照“谁造谁有”的政策,进一步明确国造国有、社造社有、社员个人栽植的零星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凡是在高级社时期确定归社员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以及社员在屋前屋后、村前村后、路旁水旁、自留地和坟地种植的树木,都归社员个人所有。山林归谁所有,林木产品和收入就归谁支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1962年6月,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山区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中关于林业政策的规定以及“林业十八条”的精神,部署各地在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时,认真做好清理山林权工作,以加速恢复和发展山区林业生产。会后,各专、县成立了山林清理工作队,开展山林权清理工作。清理的原则是:土改前或土改时划归国有的山林以及在高级合作化以前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划归国有的山林,仍归国有;“大跃进”时兴建国营林场无偿平调集体的山林,群众要求归还的,撤销林场归还给原属社队经营;社队在国有山场营造的林木,由国家根据现有林木成活株数,付给造林工本费,林权归国家所有;分散小片的山林划给生产队所有。山林权确定后,划清四至界限,由县人委发给全省统一制发的《山林所有权证》。通过这次山林权属清理工作,全省90%的山林权属纠纷得到解决。

在清理山林权的过程中,林业部门着手纠正1958年至1960年间对山林、财物的“一平二调”,开展退赔工作。凡人民公社和县以上各级政府无偿占用、砍伐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树木,以及生产大队无偿占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树木都进行了清理退赔。有的一次退赔不完,就分期分批退赔,直到退清为止。社

员折价入社的林木款,没有偿还或未还清的,由生产大队负责清理偿还。对国营、集体林场占用集体或个人的耕畜、农具、房屋一律进行退赔,如原物损坏的,折价赔偿。

与此同时,对山林的经营管理也作了调整。具体做法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集体所有的山林,除社队林场经营的山林外,都固定给生产队经营;少数确实不便由生产队经营的,由公社、大队组织人员办社队林场经营;对零星分散的经济林、果木林等,由生产队包给社员个人经营,收益由双方按比例分成。国营林场占用公社的山林、土地,如群众要求退还,就坚决退还,所造幼林由公社或大队经营;如群众不要求退还,可由林场继续经营,适当给公社一些经费作补偿,然后收归国有。已划入少数农户的林场,如果经营得好,农户愿意留场,经地方党委同意,可以统一起来,实行计件工资;如果划入的农户较多,林场经营得不好,农户要求退出的,就退给公社。经过这番调整,全省林业生产秩序逐步好转。

撤并过于庞大的林场 调整林场管理体制

“大跃进”期间,林场过度发展,农村劳力受到挤占,影响了农业生产。各林场管理混乱,造成生产率低下,亏损严重。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突出粮食生产,林场生产发展受到限制。

从1961年起,安徽开始撤并部分林场。当年,撤销了面积在1万亩以下的林场,停建了一批待建林场。1962年,又撤销了霍山单龙寺等34个林场。1963年4月,林业部和安徽省人委商定,将滁县地区老嘉山林场与嘉山县管店、大横山林场合并,成立安徽省老嘉山机械林场,属林业部和安徽省双重领导。下半年,经省人委

批准,将滁县沙河集、皇甫山、长山与定远县的岱山4个林场合并,成立安徽省滁县机械林场,直属省林业厅领导。与此同时,社队林场也进行了精简。1963年后,随着农村形势好转,国营林场和社队林场在调整、巩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至1965年底,全省有国营林场110个,社队林场597个。

为克服各林场生产方针不明、管理混乱、生产不计盈亏等问题,1962年6月,省委在山区工作会议上确立了勤俭办场原则,要求各林场严格执行经济核算制度。次年8月,省人委批转省林业厅《关于整顿巩固社、队林场的意见的报告》,决定在全省开展整顿林场工作。《报告》对林场整顿的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在生产方针方面,要“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多种经营”。在劳力安排和资金投放上,应优先保证完成林业生产任务。要合理解决林粮矛盾,对社、队林场的粮食生产,应按林业生产任务大小和耕地、劳力、畜力、农具等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安排。对有条件的林场,应尽可能做到粮食自给;对不能自给的山场,应由社、队统一安排口粮。

在管理体制方面,《报告》指出:社队林场主要由公社、生产大队经营,对在公社划小后没有下放而交由区委领导的林场,也全部下放给公社或生产大队经营,撤销了生产队兴建的林场,已下放生产队的林场改由专人或组织专业小组经营。对林场的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实行“单独核算,差额补助,盈余上交”的办法,即由公社、生产大队全年一次核定林场的生产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不足部分由社、队补助,盈余部分除去林场扩大再生产和必要的投资积累以及扣留一定比例作奖励外,其余上交社、队。对非因自然灾害完不成收入计划的,由林场负亏,并从逐年减少积累和压缩开支中偿还。

在加强领导方面,《报告》指出:公社和生产大队要确定专人负责,深入实际,解决问题。要充实林场干部,一般规模的林场,可以配备场长、会计和技术员等,规模大的林场,可适当增加管理人员。林场场长应配备相当于大队一级的干部,技术员要选择林业战线上的劳模和积极分子以及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担任。

总之,《报告》为社队林场的整顿提供了政策指导。全省 500 多个社队林场大多数在整顿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国营林场和苗圃从 1964 年开始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省林业厅制定了《安徽省林业事业单位差额预算管理试行规定(草案)》,改活立木、苗木无偿供应为有偿供应,经费由全额预算改为差额预算。各林场的超额收入和节支部分不上交,可自行安排,或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改善职工住房及文化生活,或提成发奖金。减收和超支,国家也不予补助,由林场自负。这一举措,提高了林场生产积极性,绝大多数林场生产发展稳定。

积极造林 妥善处理林粮关系

1961 年后,安徽贯彻落实“林业十八条”精神,大力宣传党的“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屋前屋后或者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的零星果树和竹木永远归社员所有”的林业政策。省林业厅根据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实际需要,对各地造林重点进行了调整。山区主要是抓好封山育林和次生林改造、迹地更新与“火子山”还林工作,大力营造用材林(主要是杉木),积极发展油桐、茶叶、油茶、药材等多种经济林;丘陵地区大力营造速生用材林(如马尾松、杨柳、洋槐等)和木本粮油林(如板栗、油桐等);平原地

区广泛开展四旁植树,尽量种植速生的乡土树种(如杨树、柳树、桑树、楝树、椿树等),以解决农具用材、民用材及烧柴问题;淮南、淮北矿区大面积营造矿柱林;河泊、水库周围和公路、铁路两旁造护堤林、护路林,重要的道路两旁栽植行道树;长江、淮河两岸栽植10~15行堤岸林,既增添江河秀丽景色,又起到挡浪护堤作用。

从1962年春起,安徽连年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1961年12月,省林业会议部署当年冬、次年春造林135万亩、四旁植树1亿株、幼林抚育200万亩、次生林改造和迹地更新34.8万亩的任务。27日,《安徽日报》发表《迅速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的社论,掀起第一个植树造林热潮。在合肥,1962年1月21日至23日,全市出动5.5万人次,栽树45万棵。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省委常委杨明、张世荣、郑锐,省人委、省军区的有关领导人及合肥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参加了植树活动。在滁县,1月22日,出动3100多人,共植树15万多棵。此后,每年冬春季节,安徽都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突击造林运动。1963年全省超计划完成造林60万亩、四旁植树1亿株的任务,当年国营林场经营面积已达440余万亩,国营造林53.7万亩;1964年全省造林106万亩(其中油桐一项就达35万亩)、四旁植树1.077亿株,国营林场经营面积达500万亩。

在每年的植树造林运动中,各级党委都要召开会议,层层部署,发动群众,明确划分造林任务和范围。对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组织社员参加集体造林的,一律根据劳动条件、辛苦程度和技术要求,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按照造林的数量和质量付给社员合理的劳动报酬。为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各地建立了严格的包栽、包活、包管责任制度。

由于政策对路,全省造林初见成效。1961年至1965年,全省造林366万亩,四旁植树4.5亿株,造林保存率有了大幅提高。

“大跃进”期间,由于粮食减产,林农口粮缺口很大。为解决吃饭问题,林区和国营林场出现自发毁林垦荒现象。1961年春,省委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开展造林运动指示》,提出“所有山林地区和国营林场一定要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来发展林业生产”,要求国营林场当年完成林粮间作30万亩、生产粮食1500万斤的任务,以实现粮、油、菜、肉和行政经费自给。从此,林区放弃主业的倾向更加严重。

1962年6月,省委召开全省山区工作会议,贯彻“林业十八条”精神,纠正片面强调粮食自给方针。会议认为,这一方针在粮食严重减产的情况下,对于解决山区的粮食问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不顾山区的特点,笼统地作为一个长远的方针显然是欠妥的。会议提出,山区生产的方针应当是因地制宜,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多种经营。大山区(深山区)林多田少,应以林为主;半山区(浅山区)耕地较多,应林农并举;丘陵地区林少田多,应以农为主,积极发展林业、牧业。对于粮食生产问题,会议强调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宜农则农,宜林则林,能自给多少就自给多少,不要勉强。在搞好林、粮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养牛、养羊、养猪和其他副业生产,增加山区收入。

这次会议明确了山区生产的指导方针。会议关于山区粮食生产问题的意见对实际工作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山区不少地方按照轮垦轮作制度,实行林粮间作、茶粮间作。凡是适宜于间种粮食的用材林、果木林、茶园、桑园,在春夏两季都间种豆类、玉米、蔬菜、马铃薯,秋季则间种小麦、蚕豆、豌豆和油菜、蔬菜等。积极发

展板栗、柿子等木本粮食作物,丰年作为副食,灾年补充口粮。一些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垦荒山,利用“火子地”广种玉米。

切实加强山林管护工作

1961年,伴随清理山林权工作的全面开展,安徽各地逐步建立健全了山林管护责任制。

一是落实“谁有、谁管理、谁受益”原则。国有林中,由国家经营的山林,林价归国家所有;委托公社、大队或生产队代管的小块山林,林副产品收益归管理单位所有,林价国家得七至八成,管理单位得二至三成。社有林中,由公社管理的,林价归公社所有;委托大队或生产队管理的,林副产品收益归管理单位所有,林价按比例分成。

二是严禁乱砍伐。1962年6月,全省山区工作会议提出要“守住护林这条线,把现有森林资源保护起来,停止破坏现象的继续发展,要严禁过量采伐……要严禁毁林开荒”。此后,先后解散了“大跃进”时成立的竹林生产指挥部和林区国营采伐队。1963年,省人委颁发《安徽省木材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队集体所有林木应有计划地进行采伐,保证及时更新还林;烧柴、烧炭尽量利用专作薪炭的林木和抚育采伐中剩余的梢头、枝桠、树桩及病枯木,不得砍用好材;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手工业部门用材,都须纳入国家计划,由森林工业部门组织供应,不得直接到产区收购;手工业部门需要特种用材、森工部门又不能供应、必须自行采购时应经县林业局批准,若需由销区到产区采购需经省林业厅批准,到指定地区、按规定价格收购。

三是加强对木材运输调拨的管理。为加强林区木材外运管理,1961年4月经省人委批准,全省在原有16个木材交易所、15个木材检查站的基础上又设立30个木材管理站、18个木材检查站。根据《安徽省木材管理办法》的规定,木材管理站和木材检查站的职责是负责对运出产区的木材检查管理。凡是没有合法运输证件的,一律不准运出;对外省过境的木材,凭外省证明文件放行;对安徽与邻省接壤的偏僻山区,有少量木材必须流经安徽时,按木材流向习惯放行,或者由两省森工部门协商解决。同时,加大对经运人员的管理。规定:凡从省内产区运往销区或从省内运往省外的木材,其经运人员必须持有省林业厅签发的木材外运许可证,省内调拨的木材必须有森工部门签发的运输证。对于没有上述证件的一切外运木材,铁路、公路、航运、筏运、搬运等运输部门均应拒绝装运,并主动与当地木材管理站、检查站联系将木材扣留,并报请县人委分别情况处理。

四是采伐与营造相结合,随采伐随更新。1961年,省林业厅根据林业部颁发的《国有林主伐试行规程(修订本)》的有关规定,确定国有林、集体林采伐都要实行“以人工更新造林为主,人工促进天然更新(迹地更新)为辅”的方针,谁采谁造,及时更新。并且将迹地更新列入营林计划。1964年,育林基金制度的恢复,进一步推动了迹地更新造林的发展。至1965年,全省迹地更新造林保存面积15.02万亩。

五是加强护林防火工作。1962年,省人委遵照林业部、公安部、农业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烧垦烧荒、烧灰积肥和林副业生产安全用火试行办法》的规定,结合安徽山林火灾严重发生的情况和部分林区安全用火经验,发布了《关于加强护林防火严禁毁坏山林的

布告》，对野外生产用火作了具体规定。1963年5月，国务院颁布《森林保护条例》，省人委贯彻条例精神，整顿和健全了各级护林防火组织，在省、县、社交界的林区新成立一批联防组织，修订和新制定护林防火实施办法。1963年11月，祁(门)黟(县)休(宁)歙(县)太(平)旌(德)六县护林联防委员会成立，划分联防区。从1963年至1965年，全省新成立5个护林联防委员会。同时，各县设立护林指挥部，公社和生产大队成立护林指挥所，生产小队设立护林小组，组成护林网。以祁门县为例，1964年全县有25个公社和157个生产大队成立了造林护林指挥部，733个生产小队成立护林小组，民主选举了3399名护林员。各级护林组织定期开会研究、制定护林措施，交流防火经验。如太平县在冬季山林防火制度中就规定“五不烧”(未经批准不烧、无人看守不烧、不带防火工具不烧、刮风天不烧、不开防火道不烧)、“五禁止”(禁止烧田埂、禁止烧山赶兽、禁止上山玩火、禁止上山烧蜂子、禁止乱抛烟头和柴火)，以杜绝山林的内外火源。由于措施严密，山林火灾大为减少。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的山火多发季节，全省39个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区县，有31个杜绝了火灾。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加强林业科研和培训工作 鼓励木材生产

1960年后，林业科研机构(含学会)先后恢复，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研究林业生产中的突出问题。安徽省林学会在1961年至1965年间，举办了20多次林业学术交流活动。在1962年的学术年会上，《黄山松的定名问题》、《安徽省油茶病害的调查报告》、《桉树引种驯化试验》、《安徽次生林经营管理》、《树木遮荫与

街道绿化》、《葡萄一年多次结果》6 篇论文获得广泛好评,被推荐参加当年的中国林学年会交流。此外,安徽省林科所坚持科研面向林业生产、为林业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选择在林业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调整期间,其重要研究成果有《杉木、马尾松全光育苗技术》、《整地方式与水平保持关系》、《杉木速生丰产规律与技术措施》、《江淮丘陵主要造林树种的研究》、《石质山地造林树种选择》以及《杉木立枯病防治试验》等。推广的技术项目有:《环山带状整地技术》、《石质山地造林技术》、《苦楝抹芽速生丰产技术》、《毛竹丰产技术》等。

为提高林业干部、职工的知识、技术水平,1961 年 5 月和 1962 年 3 月,省林业厅先后在黄山林校和合肥林校举办森工干部培训班,抽调木材产区采伐队正副队长、指导员、指挥所所长、总支书记等基层负责人参加学习。培训内容主要是“十二条”、“工业七十条”、“林业十八条”等中央文件及木材采伐运输、迹地更新、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等业务知识。同时,省林业部门还组织具有中等和高中文化水平的、工作需要不能脱产学习的职工报考省内外高等农林院校函授班或函授大学,选调中等林校教师前往北京林学院、南京林学院、东北林学院、河南农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教育学院、安徽省委党校进行为期半年至 4 年的进修学习。1963 年,安徽省林业干部训练班设立,专司林业干部培训。

在木材生产方面,因贯彻执行调整方针,1961 年后全省森林采伐量大大减少,加上运输条件的限制,销区货源不足,供求矛盾突出。为保障木材供给,安徽省决定从 1963 年起将木材生产计划改为派购任务。1962 年 12 月 6 日,省人委作出《关于 1963 年社队生产木材收购指标和奖售问题的规定》,决定对木材收购实行奖

励政策。省林业厅会同省商业厅、粮食厅联合发布《1963年粮食、工业品奖售和木材收购季度指标及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国家每收购1立方米木材，向林农奖售棉布票1市尺、贸易粮20市斤(票)；每收购7立方米木材，奖售一双布胶鞋(票)。奖售的布票和胶鞋票，全省通用，一年内有效。奖售的粮票县内流通，季度内有效，社队可凭票抵交粮食任务。在实施木材派购和奖售政策后，1963年木材收购量由1962年的33.1万立方米增加到45.3万立方米，毛竹收购量由307万根增加到446万根，分别增长36.8%和45.2%。

与此同时，对木材的收购价格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大跃进”期间，木材收购在分区计价基础上，以公社为定价单位。农村土地四固定(农具、耕地、耕畜、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队)后，改以生产小队为定价单位。1962年，林区森工采购站运交省贮木场的木材，只分树种不分规模等级，按国家统价结算。1963年，根据木材产区采伐向深山延伸、集运木材里程长、采运费用增加等情况，对木材收购价格作了调整。歙县木材平均收购价由每立方米30.92元调为32.46元，其中杉木由每立方米30.81元调整为32.24元、松木由30.04元调整为31.31元、杂木由38.14元调整为41.4元。从1964年1月起，各地根据省林业厅提出的“促进生产、鼓励到场、有利于经济核算”的指示精神，对运交贮木场的木材分树种、规格、等级按质论价，按国家核定的木材出场价进行结算。1965年，安徽再次确定以生产队为定价单位，对木材收购价格又一次作了调整。徽州地区由1963年的每立方米32.44元调整为31.96元，下降1.48%；六安地区木材收购价水平同1964年比较，杉木下降4.38%，松木提高1.09%，杂木提高6.2%。

责任田始末

责任田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安徽省委为了扭转当时生产、生活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行了“田间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简称“责任田”)。

责任田酝酿于1960年秋,试点于1961年春。由于这个办法与当时人民公社所强调的集中经营、集中管理、统一分配的制度不相吻合,因而在探讨这个办法的过程中,省委是很谨慎的。

一、责任田的背景

50年代后期,安徽同全国一样,在“左”的路线方针指导下,过急变革生产关系,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由于安徽刮得特别严重,导致全省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极为低落,生活十分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60年初,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省委先后采取了恢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动员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村第一线、退赔向集体和个人无偿平调的物资、发还自留地、调整粮食统购指标、支持社员恢复家庭副业、下放干部、整风整社等措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虽然对遏制“共产”风、安定群众情绪、改善干群关系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措施没有触及到当时人民公社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弊端。农村中普遍存在“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群众劳动积极性仍然很低,生产仍然上不去,生活仍然困难,群众对人民

公社的集体经济开始失去信心。

这种状况,促使人们特别是省委不得不进一步考虑探讨有效对策,改变困难局面。

二、责任田的酝酿过程

开始,省委是从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入手研究对策的。省委认为:集体生产必须有相应的责任制,人民公社化以后,过去一套包工包产的集体责任制,在高指标和“共产”风的影响下,全被吹掉了。没有责任制,生产就搞不好。为了参考国外的经验,省委办公厅和农村工作部的有关人员,查阅了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的资料,研究了定额管理、小段包工的生产管理办法,并在认真分析了包产到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利弊的基础上,决定采取划小包产单位、实行包产到组、认真评工记分、超过底分奖励的做法。

1960年8月28日,省委召开县以上干部工作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提出包产到组的办法,即在生产队下“划分三个小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各有责任”。不久,他又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应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生产队除养猪可以成立专业队外,一律不搞专业队,什么都搞专业队,就会把评工记分搞乱,评工记分一乱,社员做事就没有责任心了。对社员干活超过基本工分的,都可以适当予以奖励。每月结算一次,按月发奖。”这套办法被列入了曾希圣主持制定的有关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方面的十条具体政策中,并以省人民委员会名义颁布。各县先后召开了有生产组长参加的六级干部会进行贯彻。

10月,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去山东工作一段时

间。11月，中共安徽省委为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曾希圣赶回安徽，在会上继续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问题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

此后，这套办法在全省得到全面贯彻。各地都把生产队下的作业小组改为生产组，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这种办法对恢复生产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群众最厌恶的干活大呼隆、分配吃大锅饭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群众形容这种办法是：大呼隆变成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二锅饭，大矛盾变成小矛盾。生产小组的评工记分，仍然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这些情况，促使以曾希圣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对生产责任制进行进一步探讨。

1960年冬，曾希圣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大区书记会议上，听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谈到“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的讲话，于是他就系统地研究了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在包工包产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他认为过去安徽省“包工包产，本身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一是责任不明。过去的包产只是干部操心，社员没有什么责任，社员只关心工分，不关心产量。二是社员干活只争工分，不讲质量，用工多，废活多。三是评工记分搞得很细，手续相当麻烦，等工、窝工、混工的现象很严重。四是只顾自留地，不关心大田生产”。

接着，曾希圣又广泛研究了各行各业所实行的责任制。他在总结这段工作时说：“任何生产都要有责任制，不管什么工厂，只要是个生产单位，就要有责任制……没有责任制，工作就搞不好。”“工厂也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每一个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

一台机床……超产奖励，谁超谁得。”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工业上按件计酬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上来？曾希圣通过对责任制的反复研究、充分酝酿，终于设想了一个把责任制同社员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办法。它的具体内容是：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耕地，按实际产量记工分，产量越高，得分越多，收入越多。这就是“责任田”的雏形。

1960年底，省委书记处书记黄岩、桂林栖等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时，曾希圣就提出要他们按他设想的这个办法在安徽搞个试点。

1961年2月，曾希圣回安徽工作。他路经蚌埠时，向驻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谈了他设想的责任制办法。当时张祚荫反映：宿县有一个老农，带着一个有病的儿子上山开荒，连年丰收，还交给大队很多粮食。曾希圣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并作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个老农叫刘庆兰，是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的社员，73岁，儿子有肺病，不能做事，别人劝他进敬老院，他向公社党委提出：现在我还不能吃公家饭，还要尽我的力量做事。他带着儿子到山里，一面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第二年收了3300斤粮食，交给大队1800斤，还交了60元现金。这个老农的事迹，启发了曾希圣。此后，他曾多次表扬这个老农很有社会主义觉悟。

2月14日，曾希圣回到合肥，当天召开了书记处会议。曾希圣提出了他设想的“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联产到户的责任制办法。书记处对此进行了研究，对他设想的办法是赞成的，但都感到有风险。会后，省委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指示说，这个办法不推广，每个县先搞一个典型试验一下。

不久，柯庆施来安徽，途经全椒县古河镇休息时，与当地几个老农交谈。老农提出：“你们最好把田包给我们种，我们保证种好。”并且质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柯庆施到合肥后，即把这一情况转告曾希圣。

宿县、全椒两处老农的事迹和建议，进一步增强了曾希圣推行这一办法的决心和信心，他决定亲自进行试点。

三、责任田的试点

1961年2月下旬，曾希圣带领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联产到户的试点。

工作组提出这个办法后，南新庄生产队29户社员中，有25户积极拥护；有3户赞成，但家中劳力弱，感到有困难；只有一个队干部不赞成。当时也有少数干部有疑虑，主要是怕这种办法被说成是单干、是土地还原。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单干，理由是土地和大农具仍属公有，包产部分仍然统一分配，不同于单干时的土地私有和谁种谁收。这种做法也不是土地还原，理由是土地按劳动底分承包，生产队可以根据情况定期调整，不会造成土地还原。还有人担心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干活争先恐后怎么办、不会技术活的农户怎么办，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作组提出了“五个统一”，即：计划统一、生产指标和主要作物安排分配统一（包产部分）、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强调必须在“五统一”的基础上实行这个办法。

认识统一后，开始试包。先按劳动底分划田块，再根据各块田地的好坏，逐块定出不同作物的产量、用工量，并计算出需要统一的大农活、技术活与包到户的小农活的用工比例。最后按逐块定

出的产量总数包产到队,超产或减产,均按大、小农活的用工量比例均摊。其基本内容就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这一办法简称“责任田”。

责任田的推行

一、省委决定在全省试行责任田

1961年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南新庄试点材料,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会后形成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后来这个草稿经两次修改,称做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3月7日上午书记处又开会,决定携带草稿(不是正式文件)分头下去进行传达,组织试点。到3月14日,不少县已着手搞了一两个试点,还有一些社队自发搞了责任田。

1961年3月7日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在会上,曾希圣把这个办法向华东小组作了汇报。大家议论纷纷,有不同意见。鉴于有人说这是“组织起来的单干”、“农民向国家交地租”、“似乎回到土改分田的时候去了”,曾希圣在3月15、16日把这个办法的好处和缺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泽东的这些话,曾希圣立即叫秘书用电话告诉省委,并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于是,省委向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立即发了一封信,说,“希你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中央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社员的责

任心,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很大意义。”省委这封信对推行责任田起了关键作用。为了指导搞责任田,3月17日,省委又批转了张世荣关于广德县誓节渡公社牌坊生产队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工作报告。

正当全省各地广泛试行责任田的时候,毛泽东又经由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含意与原来有所不同,限制了试行面,因此,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比较详细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这个办法的一些缺陷。毛泽东看信后未作进一步表态。3月28日,曾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在简要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同时,他说:“这个办法(指责任田),现在看来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实践证明不好,以后不搞就是了。”他也提出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叫办公厅电话通知下面停止推广。但当时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二、责任田在广泛争议中迅速普及

责任田的推行,几乎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广大群众衷心拥护,干部中有不少人赞成,但更多的是怀疑,少数人反对。于是导致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个办法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大多数群众拥护责任田的主要原因,一是增产可以多吃,由于粮食自己经手,不怕再购过头粮;二是实行责任田后,多年来生产瞎指挥、分配不兑现、集中劳动吃“大锅饭”的问题就好解决。少数社员态度不积极,或者表示反对,主要是这样几种人:(一)单身汉,没有辅助劳力;(二)家中有个把两个劳动力,但是年纪都很轻,种

田不在行；(三)本人做手艺，想种责任田吃超产粮，又怕做不好赔产；(四)主要劳动力死去，剩下寡妇和几个孩子，顾里不能顾外；(五)职工家属，主要劳动力在外；(六)个别懒汉。

干部中有许多人到农村调查责任田，看法不同，大体分三种：第一种，热情称赞。认为这个办法适合当前的农业生产水平，最大好处是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好。只要确实多生产粮食，群众又赞成，它就有理由站住脚，就应该肯定它。如果有别的办法，经实践证明确实比这个办法更好，才可以否定它。第二种，认为可作权宜之计。理由是，这个办法虽然能够增产、坚持“五统一”，并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但有可能削弱社会主义因素。因为：这个办法能调动社员个人积极性是肯定的，但正因为个人积极性调动了，就会同时影响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穷富差别可能扩大，困难户不能像劳力强的户同样超产，而且弄不好要赔产；私有观念必然滋长，社员为了增产，不仅想添置小农具，而且想添置耕牛、大农具，不能说这对巩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是有利的；由于定产到户，社员对统一分配的方法也可能逐渐产生动摇；每户社员都考虑增产奖励，减产赔偿，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自然也会首先考虑自己而把集体放在次要地位。第三种，持反对态度。认为责任田是单干，是倒退。理由是：它实际上使农民一家一户变成一个生产单位，这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根本矛盾的，违背了农业集体化的方向，违背了共同富裕的要求；它全靠超产归个人来激发农民的干劲，实际上是建立在单纯物质刺激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会出现许多消极现象，违背了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农民，不利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农户负责自己责任田从种到收的全部农活，家家为了超产，会争先恐后，各顾各，不讲集体协作，

增加了一部分人在生产上的困难,这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组织协作和分工的原则。

对不同观点的争论,省委作了分析,于1961年7月24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华东局作了报告。报告说:

第一,这个办法不是单干。它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并没有改变产品收入的分配办法,包产以内的产品收入仍由大队统一分配,社员仍然是按劳取酬;并没有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这不仅表现在大农活是统一做的,而且小农活也是为了完成总的包产任务而进行劳作的,所以仍然是集体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的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

第二,这个办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社员与社员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扩大。因为,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虽然工分会做得多些,超产也可能多些,但是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劳力少劳力弱的困难户,他们的收入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要少一些,但是不会少于他们以往的收入,原因是田间管理工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承包的,又有许多关照,如帮助搞副业,包近田、好做的田。同时,产量比一般的田间管理责任田定得低一些,即使超产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可能会少一些,但不会少得太多。在关照以后还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困难户,则从公益金中予以补贴,从救济款中给以救济。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第三,这个办法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社员的私心,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收益的私心,一是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关于对收益的私心问题,社员回答得很清楚,他们说:“这种私心过去有,现在

也还有，所不同的是过去的私心是暗的，如许多人混工、争工分，不关心农活质量，不关心庄稼长得好坏，这种私心对生产危害最大。现在的私心是明的，大家想种好责任田，争取多得超产粮，这种私心和责任心是分不开的，对生产有很大好处。”对于这种明的私心，只要加以正确引导，经常加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就能使大家把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关于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也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触动起来。理由是：社员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数量，是按照每户的劳动能力来确定的，不是按人分摊的；同时，田间管理责任田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每年都要根据劳力增减情况进行调整，这就不会使社员把责任田看成自己的私有田；包责任田的社员只管小农活不管大农活，大农活仍是统一做的；社员对田间管理责任田只有操作权，没有所有权，正如工厂的机器、部队的武器固定给专人管理使用一样，这只会增加他们的爱护心理，不会增加他们的私有观念。

基于上述认识，省委向干部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当时在本省和邻省，人们对于责任田，不仅在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上议论纷纷，而且一些农民写信给在工厂做工和在部队服役的亲属，要求他们回家生产。省内外一些机关、工厂、学校、部队也不断有人来信来访，提出疑虑和批评。于是，省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说明责任田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请求中央把这个办法告知邻省，以免在群众中发生误解。同时，又将这个报告印发给省直各部门和各地、市、县委，要求各地在有人前来了解这个办法时，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解答。省委

还派人向各大专院校、机关干部、军区部队作报告,说明情况。

为了取得毛泽东的进一步支持,顺利推行责任田,1961年7月曾希圣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问题。曾希圣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的办法(指责任田)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可能私心重;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群众反映不光是包责任田有私心,评工计分也有私心,过去评工分是抢工分,现在是要把田做好。这个私心比那个私心好,这个私心能提高产量。”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曾希圣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部署各地继续推行。从此,责任田的推行大大加快了。到8月中旬全省实行责任田的队猛增到74.8%,10月中旬增加到84.4%。

在推行责任田的过程中,曾希圣和省委始终要求各地坚持“五统一”。1961年5月23日,他将安庆地委的一个报告批转各地、市、县委,他在批语中说:“从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回忆对比教育,来克服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办法产生的副作用,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各地要“针对那种自私自利思想,不愿当干部的思想,怕犯错误不负责任的思想,作好政治思想工作。”“生产队长要少包一定数量的责任田,使他们能有时间加强生产领导。”“包责任田的范围,只是包小农活,大农活必须分别不同情况包工到组,实行季节包工、分段包工,改变协作办法,因为这样才能消除各顾各的现象。”

1961年5月23日,省委向各地委发出《关于认真调查和全面总结“包工包产责任制”的通知》,要求每个地委第一书记亲自组织

并参加调查、总结一两个典型，摸准摸透经过夏收夏种和夏收分配的考验后，责任田到底管用不管用，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管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

1961年9月14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调查和总结两种包工包产办法的通知》，要求各地委对两种不同包工包产办法（责任田新办法和包产到队老办法），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各选择两个条件大体相同的生产队，再深入地进行一次调查，加以对比分析、研究总结，以便改进提高。

三、实际效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了实行责任田的信心和决心

根据省委关于调查研究两个通知，省委和各地委及时组织了调查。大量调查材料雄辩地证明南新庄试点材料提出的责任田十大好处，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个办法确能大幅度增产，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优于其他办法。干部群众对这个办法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赞成的更坚决了，犹豫的变为坚定了，许多原来反对的也变为拥护了。有一部分干部还有疑虑，认为责任田不是方向，但是不否认能够增产，转而主张再搞两三年。

1961年8月7日，桂林栖向省委作了关于太和县试行责任田情况的汇报，所述材料具有广泛代表性。汇报说，太和县有81.4%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经过夏收、夏种、夏管的考验，明显的表现是：（一）劳动力充分利用，社员说过去干活是干部挨门找，社员装病，明是去干活，暗地去睡觉；现在是干活不用邀，个个头里跑，老少都下地，家家闲人少。不仅整、半劳力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二）耕畜、农具显著增加。全县实行这个办法4个月，已购买耕牛4200头，其中1200头是群众自筹资金买的，大小农具也增加了不少。社员说：“去年农具往外丢，今年农具往

家添。要不是实行这个办法,那有心肠添这些东西。”(三)生产面貌大大改变。一是种的多。去年全县抛荒 29 万亩,今年除留 2 万亩晒垡地外,其余耕地全部种上庄稼。二是管得细。秫秫普遍锄了五六遍;黄豆一般锄了两遍,部分锄了三遍;红芋都进行了补苗、拔草、冲垄、翻藤。在解决了大田与自留地争肥矛盾以后,各种作物施肥量显著增加。不少地方还发现社员出钱买肥施地、买种补种、买药灭虫。三是长得好。我们在 160 华里沿途看到,庄稼长得都比较均匀,没有草荒,秋粮作物中秫秫长得最好。往年这里秫秫穗头的基部都是壳多粒少,而今年从上到下都是籽粒饱满。据 70 多岁的老农说,是 40 年来所罕见。山芋秧苗也多数生长茁壮。汇报还说,在太和县曾经有老办法、有包产到组的办法、有责任田新办法,但当实践显示出包责任田确比其他办法有更积极作用时,干部推行这个办法的态度也就由摇摆转为坚决,原来的多种办法也就自然趋向于单一的即包责任田的办法。汇报最后说,从阜阳全区来看,对执行包责任田新办法,凡是抓得早、搞得快的地方,夏季生产都搞得较好。亳县因抓得晚,6 月下旬才布置全面推行,就很被动,生产搞得较差,全县抛荒 21 万亩、草荒 40 万亩,与太和县庄稼生产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现在亳县县委已感到吃了亏,下定决心全面推行责任田新办法,力争在秋种中改变现在的被动局面。

全省各地向省委报送的许多调查材料,都证明责任田比其他办法更能增产。据 1961 年 10 月份 36 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 36 个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一年增产 38.9%;而另外 36 个条件大体相同、不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平均每亩产量只比上年增产 12%。繁昌县峨山公社铁厂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说,这个队 3 月底开始实行责任田,全队承包责任田的 17 户社员除 1 户保产外,

其余户都超产。午季、早稻、中稻的上交任务,都已超额完成。全年预计粮食亩产 638 斤,比条件相同没有实行责任田的宗塘生产队平均亩产 402 斤要高出 58.7%。

实行责任田的较好效果,增强了省委推行这个办法的信心和决心。1961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省委召开整风整社工作会议,在总结报告中说:“半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对加强社员责任心,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报告根据事实材料,阐述了这个办法的许多好处,强调说明它不是单干、不会形成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私心和对土地的私有观念,而后说:“有些人认为这个办法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怕搞了以后再变。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办法是不是要变,要看实际效果来定。如果这个办法确能调动积极性,增加生产,不仅不会变,而且要作为一个好的经验,加以普遍推广;如果这个办法不能增产,不利于社会主义,那就不能不变。根据现在各地试行的情况来看,这个办法群众非常拥护,有的大队干部不愿意实行,生产队就偷着实行,有的县原来不实行,现在群众对领导施加压力,不实行不行。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能促进生产,是完全应该坚持实行的。”报告继续指出,为了坚持“五统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要训练,有工作队的地方,作业组长也要训练”,“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

1961 年 12 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到 1961 年底,全省试行责任田的有 261249 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 90.1%。

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露不同意继续搞责任田的意思，省委决定在1962年继续实行。省委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于1962年2月3日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当时，中央七千人大会尚未结束），指出：“我省去年在贯彻六十条的前提下，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有些地方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大农活不统一做，有些单位产量没有交齐，对困难户照顾不够等等，但是，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社会粮食总产量，这是个客观事实。如果说这个办法搞错了，搞坏了，是不合事实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只看到生产搞的好，走了样子也不积极去纠正，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也是不对的。”省委接着提了三条意见：（一）凡是已经采用这个办法的地方，应当在抓好“五统一”的前提下继续试行。搞得不好的，特别是走了样的，必须大抓“五统一”。（二）凡是走了样子的单位，经过努力工作，“五统一”仍旧抓不起来，群众又确实不愿继续实行，可以实行老办法。（三）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又增加了一级。已经实行的，应该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立即纠正过来。

责任田的改正

实行责任田，虽然有明显增产效果，得到广大群众拥护，但由于它在相当程度上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不符合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要求，围绕这个问题的方向道路之争始终没有间断。

一、省委决定改正责任田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大会结束以后，中央留下安徽的代表继续揭盖子，对

曾希圣压制民主的霸道作风进行了严肃批判,并指责曾希圣对责任田没有经过试验就推广,“五统一”也很难全面搞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对安徽省委进行调整,并根据曾希圣的请求,将曾希圣调离安徽,派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葆华当即在北京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在研究和部署生产工作的同时,提出“对责任田要采取谨慎态度,下去摸些点,一个月以后再研究”。

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李丰平、刘季平来安徽以后,多次主持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常委会议和其他会议,研究责任田问题。几次会议上,原积极推行责任田的省委负责人黄岩、王光宇、桂林栖、李任之、张世荣、郑锐以及张立治等,都受到了批评,也都作了检讨。在第五次书记处会议上,李葆华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说:“对责任田办法如何估计,当时安徽灾情很重,提出责任田办法是好心,从解决灾情出发的。”“但是,是否一定要用责任田办法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呢?”“现在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徽的责任田,一种是中央的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证明,按中央的办法做不会走回头路,按责任田办法做要走回头路,而且后果很坏,会把农民引向单干的道路,发展下去会两极分化,出现高利贷。”又说:“昨天我和王光宇同志谈了一下改责任田的问题,他开始说,责任田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没有矛盾,性质也是集体所有制。这也要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矛盾。”“在北京时,改责任田问题曾经向少奇同志讲过,少奇同志说,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

3月4日省委常委会议召开,讨论改变责任田。会议文件提出:“大家一致认为,责任田办法,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与中央六十

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的指示是相违背的,它的方向是错误的,肯定要改变过来。改变责任田又必须本着积极谨慎的精神,分期分批有步骤地改,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闻风而起,全面铺开,草率从事,影响农业生产。必须根据真正多数群众意见办事,反对强迫命令,包办代替。时间要求在1962年内基本改完。”会后,省委草拟了改变责任田的决议,报请华东局审查。华东局建议把“改变”换成“改正”,还提出了两条具体意见:“一是要向群众说明‘五风’是错误的,改正责任田办法并不是要再刮‘五风’……正是为了按照中央政策办事。二是今年基本改完,改为1962年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内改过来,如果个别生产队大多数社员不愿意改仍可保留下来,继续进行教育,不要急于去改。”

根据华东局的意见,省委对文件作了修改后,正式形成《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决议》指出:“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二、改正和反对改正责任田的争论

责任田试行了一年,广大群众尝到了甜头,对它更加拥护,因此,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下达以后,使一度缓和了的围绕责任田的方向道路之争又激烈起来。参加争论的人员范围也较前更加广泛。

在改正责任田的争论中,一些了解基层情况的同志上书毛泽东和省委,反对改正责任田。1962年6月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钱让能在给毛泽东《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中写道：“根据太湖县一年多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它，当前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在陈述了事实之后，钱让能对责任田的优越性和性质作了分析。他说：“1955年是太湖解放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1955年之所以成为解放后的最高一年，除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后连续三四年农民积极性所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和初级社的生产关系还相适应的原因所致。而现在的‘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责任田，它比起1955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可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说，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因为“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简单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件农活都是与自己利益发生直接的关系，并且马上就能兑现。过去的办法，主要就是靠评工记分，实际上产量不到田，责任不到人，评工记分就不能真正的搞得更好。”当年7月，宿县符离集区委会以武念兹为书记的全体同志也写信给毛泽东，用该区大量事实材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驳斥了反对责任田办法的几种论调，说明责任田不是方向错误，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并且认为，“‘责任田’办法，在现阶段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简便易行，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它是与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相适应

的。它可以发挥每个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使每个社员的生活都有保障。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而推行‘责任田’办法,则比较彻底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可以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1962年6月,李富春同志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表示支持责任田:“本月16日路经安徽滁县专区嘉山县管店公社,看了车站、邱郢两个生产队部分社员的夏收,并同一些农民谈了话,他们反映今年麦收比去年好”,“他们说生活比去年也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的了,用他们的语言是‘没有饿病了’”,“这两个生产队,土地都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他们说现在自己种了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

7月,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看过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兹4月写给中共中央推荐责任田的信后,派张其瑞等到符离集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后写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报告》说:“群众突出的要求是责任田不改,超产兑现。连过去年年增产的王楼大队也要坚决实行包产到户。原因一是责任田增产显著,超产归己,所以群众认为责任田越干劲越大,一辈子不要改变。干部认为,责任田是农业生产的最好出路。二是实行责任田解决了经营管理中最难解决的评工记分问题……所以基层干部说责任田是万能,社员干活解放了,有松有紧,时间可以灵活支配,生产可以当家作主。”因此,调查组意见是:“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的时候,邓子恢直言生产责任制很好,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可以在农村普遍推广。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

会议上,邓子恢又一次推荐了这个报告。当时,邓子恢的意见不但没有被理解,反而受到严厉的批评。邓子恢重申:“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邓子恢的部长职务,一起被撤销了。

7月,华东局董家邦也来安徽来安县大余郢公社大余郢大队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说,“这个地方是抗战时期有名的骆腾云互助组的所在地,互助合作基础和骨干力量都比较强。全大队19个生产队,去年有15个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4个队包产到组,今春改正责任田,除3个队坚持不改仍实行责任田、1个队把责任田改为包产到组以外,其余的队都改为以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去年实行责任田的15个生产队,队队超产。4个包产到组的队,2个队减了产,“当前作物生长普遍好于去年……3个坚持责任田的队和1个包产到组的队都公认比去年好,而15个改为集体生产的队,据干部分析,如同去年相比,有的好些,有的就差些。”“从当前的思想情况来看,在座谈会上,干部老农比较一致的反映:留恋责任田是普遍的。”“就是改变为集体生产的队,社员留恋责任田也为数不少,大余郢这样好的队也不例外,按照这个队的老农李长春的说法:‘十个里头有九个。’”“至于包产到组的万山生产队,其所以改到组,就是在既不愿改变责任田又不能不改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样是留恋‘责任田’的。”因此,“我们的初步看法是:在当前生产力水平、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的现实状况下,实行责任田办法,比之一般队的集体生产,可以增产是肯定的。在已经实行了责任田的地方,目前可不必急于改变。”“实行这个办法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责任田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前途,我们认为,由于有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土地不能买卖,基本生产资料由集

体所有变成私人所有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省委还收到不少干部群众来信，陈述他们对责任田的看法。根据省委办公厅汇编的 28 封有关责任田的人民来信（包括 46 人和 2 个集体）进行分类：有 7 人因家属在农村或怕“倒退”而赞成改正责任田；有 2 人同意改正但要求在秋后改正或改一部分、留一部分；其余 37 人和 2 个集体都反对改正责任田。有的认为，责任田不是走回头路，也不同于单干，而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民公社管理方法的经验结晶。“如同工业管理上实行的责任制和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一样，是管理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条正常的基本管理制度。”因此，他们有的建议“把纠正责任田问题，暂缓 3~5 年”，否则，“能不能考虑找一个专区或几个县再试行几年，以实际效果再做实事求是的比较，认识也会清些，光扛顺风旗，没有比较对工作是不利的”。有一位中央下放干部，还上书刘少奇，“要求主席在全国各省都要实行田地承包到户，都要学习安徽的经验，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多打粮食，才能国富民强，才能更快的提高工、农的生活”。

省委倾听了各方面意见，对改正责任田工作还是比较谨慎的。1962 年 7 月 20 日，省委召集出席省人代会的部分劳动模范，座谈责任田、大队干部编制等问题。巢县劳动模范杨桂枝说：“实行责任田能多收粮食，去年实行责任田后，群众自己买工具，老老少少都参加劳动，做活讲究质量，圆田变方田，田埂都种了粮食，几年的田漏子也补好了，田底子也恢复了，有的群众甚至卖掉老母鸡买肥料。”贵池县劳模罗光明反映：“现在群众对政府有四怕：一怕责任田马上收回；二怕搞集体，大呼隆；三怕不自由；四怕基层干部作风

不改。我看群众真正的害怕是大呼隆。”宿县劳模黄景堂说：“三八公社实行责任田的 101 个小队，今年午收前改了 70 个小队，现在未改的队到外地买肥料追秫秫，改过来的队偷偷的（把肥料）搞到自留地里。”萧县劳模张长民反映：“责任田办法能使群众多上肥，我们那里 1961 年每亩地上半车肥，今年上一车肥，再过年把二年，把地力恢复了再改，对生产有好处。”听了劳模的反映和各方面的意见，当天李葆华在省人民代表大会、省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这个问题（指责任田问题），目前争论很大，主要是责任田是不是方向的错误，应不应该改，何时改，怎样改……这个问题可以继续争论。”“责任田怎样改，何时改，我们是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要听群众的意见，群众多数愿意改就改，不愿意改我们就耐心等待，不追求数字，不强迫命令。”以后又多次强调：“改正责任田要慎重，要尊重群众的意见，群众不愿改的不要强扭。”到 8 月中旬统计，全省改为以队集体经营、恢复吃大锅饭的生产队仅有 36595 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 12.2%。

三、责任田在批“单干风”中加速改正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全会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受到批判。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2 日，省委一届十三次会议召开，传达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强调“这次会议反对了‘单干风’、‘一片黑暗风’、‘翻案风’”，“全会批判了以邓子恢同志为代表的单干风，邓子恢同志作了检讨，曾希圣同志也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闹单干的中央有，省、地、县、公社都有。单干风大，但为数不多，不过百分之几，全国只有安徽最多”。“单干风不是偶然的事情，这反映了富

裕中农思想。”“首先拥护分田的是富裕中农。”并且联系实际，指出这三股风“在安徽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单干风’最为严重”。“以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和宿县符离集区委为代表，坚持错误观点，积极替责任田辩护，不贯彻执行省委决议，特别是今年夏季，邓子恢同志大肆宣扬安徽的责任田，并派人到宿县等地搜集所谓责任田优越性的材料，助长了我省一部分干部在改正责任田问题上的抵触和抗拒情绪，有少数同志甚至做了邓子恢同志的传声筒，一度在干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指出“这个决定对安徽更有特殊意义，它为我们顺利地改正责任田，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强调“我省过去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六十条，反而错误地实行了责任田办法，这股严重单干风，是由过去省委带头和强制下面刮起来的。”“必须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把它改正过来，彻底纠正单干风。”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联合其他愿意改正责任田的农民，把责任田改正过来。如果有些人暂时还不愿意改，可以让他们留在外面，但负担不能减少，政策法令必须遵守，所种田地由生产队重新安排，使用集体所有的耕畜、农具要付给适当代价；等到什么时候想通了，经过公社批准再让他们参加进来。”

会后，全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一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到农村强制改正责任田。省委要求：“在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省委还强调：“在改正责任田过程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积极谨慎’的方针。”从1963年

开始,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责任田即被当作单干风受到批判。接踵而来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资本主义”,揪“走资派”,全省大批干部群众因责任田的牵连受到了批判,责任田也就随之被全面改正。

安徽的责任田饱经沧桑,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我国国情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安徽农村从1979年开始,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了进一步为责任田正名,省委于1982年12月28日发出《关于为钱让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钱让能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于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关心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保荐责任田,向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主席直陈己见,是完全符合党章的。况且,他在《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中提出的“‘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有了它,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等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因此,省委决定撤销原皖发[1962]345号文件和1962年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文件之五、文件之十五,为钱让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因受钱让能保荐责任田问题株连的家属子女及其他党员、干部、群众均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本文选自《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原文标题为《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收编时有改动。

工业的调整

沈 葵

20世纪60年代安徽工业进行的调整,可谓不同寻常。不仅是调整的背景和形势不同寻常,也不仅是调整的规模、内容、政策和措施不同寻常,而且调整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也与以往不同。历时5年的工业调整,对于安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一、实施工业调整的背景

安徽是一个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省份。1949年解放时,全省工业总产值仅有3.4亿元,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16.4%。小手工作坊构成了全省工业企业的主体,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相当落后,工业产品甚少。经过50年代整整10年的努力,全省工业在数量、质量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解放后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经过改造,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淮南煤矿已经形成年产原煤1000万吨的能力;中央政府安排在安徽的苏联援建项目,如淮南煤矿机械厂、蚌埠空压机厂等重点工业企业建成投产;沿海城市(主要是上海)100多家企业内迁安徽后,得到扩建;新建扩建了一批国营工业企业,如马鞍山钢铁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此外,更多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及全省城镇。1958年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兴办了大批以炼铁、机械加工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小型社队企业。1959年底,全省建有

各类工业企业 15103 个,比 1949 年增长近 4 倍。到 1960 年底,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 56.6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2.1%,工业经济的框架和规模建立起来。

在短短 10 年时间内实现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制定的向工业化倾斜的政策。在“动员一切力量加速国家工业化”的方针指导下,把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第一优先目标,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从事工业建设,使工业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在资金、物资相当匮乏的条件下超常规发展工业,无形中忽略了农业的基础性作用,甚至以剥夺农业再生产条件为代价来完成工业化。1953 年至 1957 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全省国民收入共计 161.6 亿元,其中 119.74 亿元来自农业,占国民总收入 的 74%。同期,基本建设投资额中,农业为 4.71 亿元,工业为 5 亿元,工业超过农业 0.3 亿元,其中对重工业的投资又占全部工业投资额的 79%。急剧增长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大部分来源于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造成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巨大资金积累又主要来自农业,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一再扩大,使农业难以实现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重工业本身建设周期长、使用资金多,在农业长时间得不到发展的基础上建设重工业,重工业自身也难以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因此,虽然经过 10 年建设,安徽仍然算不上工业省;农业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生产条件落后,再生产能力弱,农村人口众多的状况依然存在。只不过这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当时并未能引起大多数经济决策者的重视。不仅如此,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依靠中央政府的

计划、安排、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来推行工业化,造成资金、人力、资源投入巨大,削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所以,50年代安徽经济的发展已埋下了隐患。“大跃进”运动,又将这些推行工业化的办法、方式、途径推至极点,隐患被深深压埋下去了。

导致60年代安徽工业调整的直接原因是“大跃进”运动及由此而带来的三年经济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安徽“大跃进”运动发起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群众性大规模参与经济建设为主要形式,力图使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化等各行各业的建设有个跃进的速度,促使经济超常规地飞速增长。安徽“大跃进”运动与全国其他省份有着共性的方面,如钢铁产量坐上了“火箭”,粮食产量放出了“卫星”,但安徽钢铁生产计划指标定得更高。华东七省市1958年钢铁跃进计划指标为800万吨,安徽被确定必需完成200万吨,占华东地区1/4。而1957年,安徽钢铁产量仅21.64万吨,其中钢产量仅2300吨。在这样的基础上使钢铁产量成十倍、百倍地增加,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完成规定的跃进指标,全省调集了数百万从未从事过钢铁生产的农民土法炼铁,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在钢铁会战的高潮中,全省每天有500万农村劳动力弃田炼铁,占当时全省农村劳动力将近一半,而且绝大多数是强壮劳力,致使大量成熟的农作物因无人收割而烂在田里,进而催发第二年农村出现春荒。

安徽“大跃进”运动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仅就建设资金而言,1958年至1960年的3年间,全省对钢铁及重工业的投资高达17亿元,占同期全省投资总额的60%,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小土高炉、小土煤矿等土法上马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在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绝大部分被砍掉。据统计,全省直接用于钢铁企业的

基本建设资金,3年累计损失3.1亿元,相当于同期全省轻纺及食品工业投资额的1.3倍。

“大跃进”运动最惨痛的代价在于给农业带来的灾难性损失。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连续4年大幅度下降。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84.5万吨,比1957年下降13.9%;1959年为701万吨,又下降20.7%;1960年为674.6万吨,再下降3.8%;1961年为629万吨,再一次下降6.8%。全省人均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08公斤下降到1961年的210公斤,其中1959年只有204公斤。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且农业并不发达的省份出现粮食产量持续大幅度下降的局面,给经济及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极为严重。全省人民生活处于解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在农业经济连续下跌之时,安徽工业产值从1961年起也迅速下降。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为28.2亿元,比上年骤降51.5%;1962年为20亿元,再降29.3%,工业经济跌入谷底。

二、被迫进行工业调整

粮食产量连年下滑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于1960年初显现出来了。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城镇口粮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工业生产所需的农副产品严重匮乏,农业已经无法给工业建设提供资金。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此举表明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转变。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及有关部门连续下发文件、通知,着手准备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安徽也因为严重困难的农业经济和建设资金奇缺,不得不对工业建设进行限制,目的是降低已经

制订的“大跃进”计划指标。采取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倡导各行各业勤俭办事、厉行节约。9月，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批转省委和省人委办公厅《关于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意见的报告》，要求全省的机关和厂矿企业立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明确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年内不再增加编制和人员，精简会议，节约办公费、购置费，减少厂矿企业非生产性开支等。二是着手压缩基本建设规模。8月，省委同意省计委、省建委对全省在建工程项目进行清理、分类，以控制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并提出“基本建设要缩短战线，保证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省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将全省基建项目划分为一、二、三类，要求集中财力、物力确保一类工程，严格控制二、三类工程，并停建、缓建非生产性工程。当年，全省基建项目比上年减少近2/3。11月，省委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基本建设缩短战线情况的报告》，指示财政部门和建设银行不得向一类以外的基建工程拨付资金，要求各地各部门不得自行调增基建项目类别，不得向二、三类及停建、缓建工程追加资金，不得挪用其他资金从事基建工程，不得自行安排计划外基建项目，并立即就此开展对照检查，发现有违反规定的要及时纠正，给予处理。

但是，整个1960年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还没有把经济大范围调整摆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促使经济“大跃进”仍然是奋斗目标。3月，在省委批转省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中，还提出1960年全省国民经济要继续“大跃进”。随后，在资金严重短缺和中央下发文件要求压缩基本建设项目的情况下，全省被迫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同时又提出要集中力量加强一类重点建设工程。当年全省工业基建资金达8.08亿元，比

上年净增 1.87 亿元,为历年投资最高额。其中对重工业的基建投资为 7.18 亿元,占当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58.4%,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的 89%。当年全省在建项目 1121 个,但建成投产项目只有 592 个,比上年减少近 1/4,投产率只有 52.8%。这说明全省建设资金十分缺乏,一类重点建设工程仍然过多,工业建设摊子仍然铺得过大,超过了财力物力承受能力。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当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重点是调整。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对工业调整的要求是:增加轻工业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应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增加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精神,在实施工业调整之初,仍然把调整重点放在压缩基建规模上。制定工业计划指标时,不再提“大跃进”的口号,但思想认识还没有立即转变,调整工作的思路还没有理清,工业经济难以顺应“急转弯”。全省工业调整工作只能在所能认识到的范围内进行,没有能够把调整作为扭转经济严重困难局面的非常手段,因此,只能是初步的调整。

1961 年,安徽经济调整的目标是加强农业战线,工业调整围绕加强农业进行。主要采取减少城镇人口,以减轻城市口粮供应;裁并部分工厂企业,以减少长线产品产量和原材料的消耗;减少投资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等办法。1961 年 3 月,省委发出《关于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确定全省年内精简职工 13.5 万人,裁并工业企业 1831 家,并严格审批新开工建设项目。到年底,全省减少城镇人口 82.2 万人,占当年城镇总人口的

18.7% (主要是“大跃进”以来进入城镇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裁并工业企业 2354 家,比计划多裁并 523 家;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1311 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人民公社办的企业)1043 家,裁并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大跃进”期间兴办的土法炼铁厂、煤矿、机械企业;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为 2.92 亿元,比上年净下降 5.16 亿元,超额完成了省委确定的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的任务。

在调整工业规模的同时,全省加强了对工业生产的管理,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紧缺工业品产量,扩大人民生活日用品的生产。还恢复了在“大跃进”中被撤销的手工业合作社。

但由于中央在年初确定经济调整任务时主要强调“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工作尤其是对重工业的调整进行得并不彻底。当年安徽基本建设项目仅比上年减少 24 个,项目投产率只有 36.1%;对重工业的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总额的 62.5%,达 2.7 亿元;轻工业占 4.6%,只有区区 0.2 亿元;农业占 21.3%,为 0.92 亿元。

1961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这是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党中央第一次将工业发展速度“坚决退下来”写进正式文件中,表明全党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和提高。1962 年 1 月至 2 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又对“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左”的做法进行了清理和纠正,号

召全党齐心协力战胜经济严重困难,以渡过“非常时期”。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安徽省委改组。1962年2月底省委向各地发出《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全省上下把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在工业生产上,强调着手开展《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试点工作,加强企业管理;抓紧煤炭生产,提高产量;同时全力完成国家规定的轻工、手工业生产任务;增加支农产品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在基本建设方面,省委要求全省各行各业坚决执行中央统一部署,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不允许再搞计划外建设项目,正在施工的计划外项目必须立即停止施工,水利建设工程也不得新增项目、增加上工人数。省委还要求抓好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省委决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即对全省工业企业进行一次彻底的摸底排队,尽早拟定下一步工业企业调整方案。

5月,省委决定对全省工业企业作较大幅度的调整,计划当年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由2350个调整为1405个,减少40.2%。8月,省人委批准省计委《关于工业企业调整方案的报告》,提出调整的原则:(一)凡是生产需要的企业,要积极加以充实;(二)凡是市场需要、有原料、有销路又不影响原材料外调的企业,要挖掘潜力积极增产;(三)中央企业,一般根据主管部门意见调整;(四)重工业企业要根据中央安排的任务,坚决进行压缩;(五)城市街道和农村人民公社办的企业,除极少数有正常生产条件、产品有销路、质量好的企业交由当地工业部门管理外,其余一律停办。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工业企业调整工作的领导,按照调整方案,分级负责,分批进行,抓紧落实。

在调整工业企业的同时,全省还大幅度减少基本建设项目和

投资额。1962年,基建项目比上年减少587个,减幅达50%以上;投资额比上年减少1.3亿元,减幅为45%,实现了基建项目和基建投资额同时大幅度减少的目标。到1962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实际比计划减少115个,集体企业(主要是社队企业)仅比上年减少57个,大量的社队企业没有按照调整方案关、停、并、转。加上中央直属企业和新建的工业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尚有2036个,没能达到调整方案确定的关、停、并、转企业数字目标。但是,当年全省下大力气执行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计划任务,采取种种办法安置被精简的职工,如集体下放到农场,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等。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6.5万人,减少城镇人口35.7万人,基本完成计划规定的年度精简职工任务。

1962年的工业调整,改进了全省工业布局,缩短了长线工业,充实了短线工业,加强了支农工业企业的实力,使得工业内部结构不平稳状况开始向好的方向改善,产、供、销趋向合理平衡,企业管理有章可循,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下降,亏损减少,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

三、在调整中恢复

1962年,安徽农业在连续4年大幅度下降之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当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提高16.3%,粮食产量开始回升,达到670万吨,比上年增长6.6%。尽管这一增长率还远远不足以弥补“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巨大损失,但对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安定民心起了积极的作用,为全省工业继续调整进而实现恢复,奠定了比较有利的经济基础。

1963年,安徽进一步加大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力度,仍然把重点放在调整上。5月,省人委批准省计

委《关于进一步调整工业企业的报告》，确定工业企业进一步调整的原则：继续加强支农企业，保留骨干企业和“五好”企业（质量好、成本低、品种适宜、原材料消耗低、劳动生产率高）。继续关停生产任务少、分散重复的企业，继续转或关生产任务不固定的小厂。计划全年调减企业 81 个，加上上年计划减少而实际未能减少的 115 个企业，以及一些已经关停但还未完成收尾工作的企业，1963 年全省计划减少工业企业 254 个。

在实施上述调整计划过程中遇到不小的阻力，主要是被关停的企业以种种理由拖延时间；被精简的职工安置任务难以落实；关停并企业的财产物资不能尽快清理和交接。省委、省人委和各级党政部门在总结前两年特别是 1962 年工业调整经验基础上，采取分级分工负责的办法，将减少工业企业的目标数字分解到具体主管部门，要求各有关单位协同主管部门做好关停并企业的清理工作，并在安置精简职工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包括许诺部分被精简职工待经济恢复后再回企业。至当年 7 月，全省再次精简职工 28 万人，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两年内精简职工 54 万人的任务，相应地又减少城镇人口 85.8 万。9 月，省委批转省委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确定精简任务完成后，从 1964 年开始，在严格控制职工总数前提下，不再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

到 1963 年底，全省完成了精简工业企业的任务，实际减少全民所有制企业 383 个，保留 1653 个（包括中央直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减少近千个，社队企业骤减 3/4，只保留 833 个。当年，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20 亿，其中轻工业比上年略增 0.9 亿元；重工业略降 0.77 亿元，仅及 1961 年的一半左右。轻、重工

业产值比重趋向合理。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经济继续小幅增长,全省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比较协调的局面初步形成。

1964年,安徽把整顿和提高工业企业效益作为调整的重要内容,即通过贯彻“工业七十条”,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在工业布局、产业重点和产品结构方面,一是确定了企业的生产方向和生产规模;一是继续扶持支农工业,同时增强轻工、化学和机械工业企业的实力。区别企业实际情况,对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在设备更新、厂房维修、扩建改建等方面给予资金投入;对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小型钢铁厂,继续实行关停,鼓励产品质量好、设备较先进的中型钢铁厂挖潜改造,提高效益。

1964年,全省工业基本建设资金主要投向支农工业和轻工业,如新增水电装机容量12500千瓦,新增化肥生产能力3200吨。全年用于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比上年略增0.31亿元。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企业更新改造的资金投入。

1964年,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24.3亿元,比上年增长4.4亿元,增长22%,彻底扭转了工业产值连续下降的趋势。140种计划产品的产量,有108种比上年增长;试制成功一批新的工业产品;产品质量明显提高,钢材、电动机、轴承、卷烟纸、保温瓶等产品的质量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全省工业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1965年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调整方针的最后一年。在经过前4年的调整、特别是1964年工业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后,1965年安徽工业调整继续以“巩固、充实、提高”为主要目标,着力提高工业增长速度,全面恢复工业经济,使其走上正常发展的轨

道。

为加快工业增长速度,省委、省人委继续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加大投资支农及轻工企业两个方面入手。在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省委、省人委要求工业企业学习大庆油田的创业精神,抓好企业管理革命、特别是企业干部的思想革命,对亏损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以推动企业生产,实现扭亏为盈。1965年,全省投资轻工业的资金比上年增加近两倍,新增化肥生产能力6.9万吨。建成投产的工业项目265个,项目建成投产率达72.7%,创造了调整以来基建项目投产率的最高纪录。一批有较强实力、产品有销路的企业如江淮化肥厂(扩建工程)、蚌埠纺织厂、合肥仪表厂、安庆造纸厂等迅速投产,增强了全省工业经济的实力。

1965年,全省工业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的目标,工业总产值31.8亿元,比上年猛增30.1%,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创造了调整以来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纪录。企业实力增强,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有销路,劳动生产率上升,工业经济全面恢复,并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年底,全省工业调整任务全面完成。从1966年起,安徽工业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四、工业调整的效果

安徽工业调整的直接效果是使全省工农业比例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按当年价格计算,1957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为30.4:69.6,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重为67:33;1960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为62.1:37.9,轻重工业比重为44.1:55.9;工农业及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经过长达5年的调整,到1965年,上述比重分别为45.7:54.3和60.3:39.7,农、轻、重三者比例关系为54.3:27.6:18.1。农轻重三者比例基本恢复

到 1957 年的状况,符合安徽当时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发展条件。

工业调整为全省初步建立工业体系和改善工业布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9 年是全省工业企业最多的一年,共有 1.5 万个各类工业企业,其中的 2/3 是以极其落后的技术和极其简陋的设备临时凑合起来的小型工厂,如从事与钢铁生产有关的小土法炼铁厂和小煤窑等就占 7000 多个。1960 年,各类工业企业仍有 1.1 万个,生产条件、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并没有改变。到 1965 年,全省各类企业减少到 5741 个,其中 1479 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部实现机械化生产。一批大中型企业诞生,并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如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重型机械厂、淮北煤矿、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以及 1964 年建成投产的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的马鞍山火车车轮轮箍厂和 1965 年建成投产的淮南化肥厂等。全省已形成 15 个主要工业行业。经过调整,工业布局比较合理。马鞍山市集中了全省主要钢铁及相关企业,成为钢铁生产基地;淮南市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炭基地,煤炭年产量占全省 70% 以上;淮北煤矿的开发,催生出一座新的能源城市——濉溪市(后改为淮北市);合肥市已发展成为全省重要的机械、纺织、化工基地;芜湖、蚌埠两市也从原先的消费城市转变为以纺织、轻工、食品、建材产业著称的工业城市。全省的专区驻地城市都建立起一批工业企业,工业布局在发挥传统优势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趋向合理。

工业调整推动着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逐步提高。全省工业企业把贯彻落实“工业七十条”作为调整的基本措施,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促进企业管理和生产的制度化、规范化。1965 年,全省 5741 个工业企业实现产值与 1958 年 8652 个工业企业实现产

值相当。其中冶金企业 1958 年有 1084 个(全民所有制正规企业),产值 5.19 亿元,1961 年分别为 95 个和 5.7 亿元,1965 年为 16 个和 4.1 亿元。1965 年,平均每个冶金企业创产值 2562 万元,比 1958 年的 478 万元和 1961 年的 600 万元分别提高 2514.2 万元、1962 万元。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8 年至 1962 年的 5 年间,年均降低 11.7%,而 1963 年至 1965 年的 3 年间,年均上升 29.9%;1965 年人均 8472 元,比 1962 年的人均 3867 元增长 1.19 倍,比 1957 年的人均 7228 元增长 17.2%。全省绝大部分企业生产成本明显降低,亏损减少,盈利增加,彻底扭转了企业效益连年下滑的局面。

安徽完成工业调整的事实说明,省委果断有力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针对安徽工业现状制定的调整政策、采取的具体措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尽管有些政策、措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行的,如 5 年精简职工 80 多万和减少城镇人口 120 万,关、停、并、转数千个企业,大幅度压缩基建规模等。这些紧急措施的有效实行,彻底扭转了经济严重困难以至可能崩溃的局面,将陷入困境的经济重新拉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

但是,工业调整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对经济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企业“下马”过急过猛。有些可以不关不停的,关了停了;有些可以不并不转的,并了转了。调整中,全省关、停、并、转、改数千个工业企业,占全省企业数的一半左右。并且关停的企业多数是“拆庙搬菩萨,扫地出门”。安纺一、二、三厂生产条件较好,因为一时缺少棉花,将 3 个厂精简的 3000 多职工下放城西湖农场;纺织学校也被迫“下马”;年产 20 万锭成套设备的纺织机械厂也被关掉;化肥、机械、轻工等行业的一些企业也下得过多。轻工

行业一些生产手表、闹钟、自行车、缝纫机的小厂也纷纷关停“下马”。曾许诺在经济恢复后再回到企业的被精简职工,大部分并未能重回企业。全省社队企业除极少数转为集体企业、收归主管部门管理外,其余统统被砍掉。这样不加分析地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的做法,造成了严重损失,影响了后来安徽工业的发展。

调整是对“大跃进”错误做法的纠正,是在严峻的经济困难情况下采取的紧急措施。但是,工业调整并没有纠正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对工业化的片面认识,没有减低人们对重工业的偏好。在调整期间,安徽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对重工业的投资比对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的总和还多。其中1963年全省重工业投资额占全部基建投资额的67.3%,比1958年的59.7%还高近8个百分点,创下安徽解放14年来投资重工业最高比例。

调整也没有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大跃进”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在调整中,这些弊端仍然存在,甚至随着工业调整的进行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调整使各个工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权越来越大,管理的企业越来越多。企业的生产计划、原材料配置供应、生产设备更新改造,直至产品规格、品种和销售等等,统统归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安排确定。企业没有经营权,只有按上级计划生产权,连盖个澡堂、修个厕所等一些纯属企业内部的事情也要逐级上报批准,严重挫伤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综观安徽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调整,因为决策对路、措施得力,挽救了处境艰难的经济,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益探索;又因为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对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探索充满了曲折和坎坷。调整终于使工业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

商业的调整

杨久梅

建国初,安徽商业工作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对促进工农业生产、改善城乡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度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倾向,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等商品流通渠道被取消,商业工作被严重削弱,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1961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6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12月,商业部下发了《商业工作条例》(简称“商业一百条”)。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3个文件对商业调整作了一系列原则规定,成为调整商业的重要依据。据此,安徽着手对商业工作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安徽商业调整前的状况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安徽商业工作违背客观规律,积累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机构合并、政企不分、管理混乱

1958年,省属各商业专业公司被撤销,并入省商业厅,作为其内部职能处(室)。市、县专业公司改为当地商业行政部门的直属经营机构,实行政企合一。同时,取消了各专业公司系统上下之间

的业务领导关系,原来各专业公司承担的行业管理职能并入商业行政部门,取消公司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在广大农村,为了适应人民公社体制的需要,安徽商业部门和全国一样,执行“两放、三统、一包”(即下放人员、下放资产,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包财政任务)政策,把基层商业的资金管理权、商品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经营管理权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其结果是基层商业机构被撤并,人员被调出,资金被挪用,还随意赊购商品,预支收购款等等,造成国家资财的大量损失和浪费。

(二)商品流动渠道单一,造成商业萧条

一是关闭集市贸易,取缔小商小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小商小贩绝大多数被取缔,并入国营或合营商业企业,当时称之为“一步登天”。1958年,全省私营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网点,由1955年的19.48万户减少到3.82万户,减少80.4%;到1960年末,全省各类商业管理机构只剩下近3万个,比1957年下降61%。其中国营占67.3%,公私合营占3.9%,合作社商业占27.7%,私营只占1.1%。

二是搞所有制升级,取消集体商业。1958年2月,国务院决定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同城市服务部合并,改称第二商业部。5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省供销社并入省商业厅。各专区办事处和市、县供销社也相继与当地商业局合并,执行国营商业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从此,各级供销社由集体所有制升级为全民所有制。与此同时,对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城市集体商业、饮食服务业也进行合并升级,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国营,一部分转为合作店组。

由于取消集体商业和拆散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及取缔集市贸

易、小商小贩,传统的商品流通形式如物资交流会、庙会、合作货栈、信托货栈、骡马大店等也销声匿迹,商品流通只剩下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单一渠道,严重妨碍了商品流通,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三)盲目购销,造成严重的浪费

1957年冬和1958年初,安徽商业部门贯彻商业部“大购大销”方针,在农副产品经营中一度出现高指标、高征购,继生猪实行派购之后,鲜蛋甚至牛、羊一度也实行派购。对地方工业品的收购按照“工业生产什么,商业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原则,无论是否适销对路,一律加以收购。不仅对计划商品包销,对三类商品也扩大了包销范围。由于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以致把大批不适销甚至质量低劣产品也收了进来,造成商品库存严重。仅1962年全省国营商业通过“三清”(清理库存、资金、账目)削价处理的商品损失就达3.8亿元,其中百货公司系统“三清”商品(“三清”运动中查出的冷背呆滞、质次价高、不配套、无下落的问题商品)11100万元,削价报废损失2400多万元。

另外,“大跃进”期间,全省各地商业部门挪用了1亿多元的商业流动资金,抽调了大批商业技术骨干,办起了500多个大小工厂,其中有适应市场供应需要的,如肉食禽蛋加工厂、糖果糕点食品厂、调味品厂、豆制品厂等,为发展商办工业奠定了基础。但有不少工厂办得不适当,打乱了社会分工,大部分在调整期间下马或移交给工业部门,给商业部门造成了损失。

总之,“大跃进”期间,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工农业生产下降,商业工作深受影响。一方面,商品供需矛盾突出,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和副食品匮乏;另一方面,商业体制弊

端丛生,造成流通不畅,又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

二、恢复国营、集体、个体三条流通渠道

1960年9月2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提出要“活而不乱,管而不死”。次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商业四十条”,提出要把“过去撤销或合并的农村供销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按照全国统一部署,1961年9月,安徽省供销社从省商业厅划出单设。年底,各级供销社先后从商业系统划出,恢复了阜阳、宿县、滁县、六安、安庆、芜湖、徽州7个专区和合肥、蚌埠、淮南、芜湖、安庆、马鞍山、铜陵、濉溪8个市的办事处,以及67个县供销社(包括屯溪市)、701个基层供销社,建立了基层社门市部等分支机构7183个。过去供销社的社员股金和积累基金由国营商业退还。次年9月,中央重新明确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在供销社单独设立的同时,“大跃进”期间被不适当合并升级的合作店、组纷纷恢复。1962年8月,全省恢复合作商店6077个、合作小组2648个。到1965年,全省建有合作商业网点6710个,从业人员43990人。

从1961年起,原被并入国营合作商业的小商小贩被重新划出,分别由所在地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归口领导和管理。发挥小商贩的经营特点,恢复货郎担子和饮食服务业,恢复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夜间售货等多种服务方式,经营一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的小饮食、小土产、小百货、零星副食蔬菜、日用杂品及从事服务业等。同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到1961年底,全省90%以上被关闭的自由市场重新营业。1962年起,安徽商业系统通过普遍开征集市

交易税来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在此前后,大批被精简的职工纷纷投向市场从事个体经营,小商小贩数开始回升。1962年底,合肥市小商小贩恢复到5448人,比1957年增长90%;蚌埠市1963年恢复到5836户,比1957年增长1.7倍。到1965年,全省个体商户发展到10109户,从业人员12066人,分别比1957年增长11%和11.6%。

在恢复商业机构和供应渠道的基础上,按照“商业四十条”中“把商业行政部门同商业企业分开,恢复必要的专业公司”的指示精神,1962年4月,安徽省商业厅实行政企分开,恢复省公司。各级专业公司也随之恢复。收回下放给县和人民公社的人、财、物权,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集中领导,更好地组织商品流通。

三、稳定市场,千方百计安排好人民生活

为了确保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之需,大力回笼货币,有效遏制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从1960年下半年起,根据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安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稳定18类商品价格,管好粮食。1961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对占城市居民支出70%以上的生活必需的18类商品稳定价格。18类商品分别是:粮食,棉布,针棉织品,棉絮,食盐,鞋子,酱、酱油、醋,肉、鱼的定量供应部分,食油的定量供应部分,食糖、糕点、糖果的定量供应部分,大宗蔬菜(粗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纸张、课本、书报杂志,主要西药,搪瓷制品、铝制品、橡胶制品等由国家供应原料的日用工业品,房租、水电、交通、邮电、医疗、学费等。

二是扩大凭票、凭证和定量供应的商品范围。除原有的粮、油、棉布定量供应凭票证外,增加了毛巾、袜子、汗衫、背心、床单、

蚊帐等 10 多种凭布票供应商品,并对其他一部分供应不足的主要消费品如食糖、糕点、火柴、肥皂、豆制品实行专用票、购货证(本)、购货券等限量供应办法,以保证消费者的最低生活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采取这种方式供应的商品有 50 余种,1962 年达 64 种。

三是开展高价商品供应。从 1961 年起,首先在城市和工矿区逐步对糖果、糕点、酒类、手表、自行车等商品以高出牌价 2~3 倍的价格敞开供应,并开设高价餐馆,出售高价菜肴。以后高价供应商品逐步扩大到食糖、时钟、部分针棉织品、卷烟、茶叶、海味品、照相器材、红糕(胡萝卜糕)等 14 个品类。高价敞开供应,促进了货币回笼。据 1962 年度省商业厅统计,当年销售高价商品就达 1.2 亿元,约占同期全省商品零售总额的 6%。1961 年至 1964 年间,全省通过经营高价商品共获利 1.94 亿元,占同期全部利润的 50%。从 1963 年 6 月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高价商品逐步退出。到 1965 年底,全省高价商品只剩下针织品一种。

四是安排好特需供应。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安徽从 1960 年起对侨眷、婚丧嫁娶的家庭、从事特殊工种人员、病幼人员和高级劳动者实行照顾供应和补助供应。供应的商品主要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猪肉、鸡蛋、鱼类、食糖、卷烟、酒等,也有一些穿的和用的商品。

五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油料、生猪、鲜蛋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以生猪为例,1961 年 4 月 9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下达的《关于提高生猪、蛋类、家禽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通知》规定:生猪收购价要比 1957 年提高 27%。安徽另外规定每头猪出肉量在 40~45 公斤的再加价 5%;出肉量在 45.5 公斤以上的,加价

10%。这样,全省生猪收购价平均比1957年调高33.1%,促进了养猪数量的回升。

六是奖售农副产品。为鼓励广大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和出售农副产品,省人委从1961年起开始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奖售办法。奖售的品种主要有饲料、粮食、食糖、布票、煤油、火柴、肥皂、胶鞋等。具体奖售的品种和标准结合各个时期市场供求情况及牌价、市价差距,不断有所调整。如1961年规定,收购鲜蛋每市斤奖售食糖2两5钱;收购粮食750公斤,奖售食糖2.11公斤;收购植物油50公斤,奖售食糖0.65公斤;收购1.5公斤以上活鸭,每只奖售饲料粮1公斤。从1962年6月1日起增加活鹅奖售,同时对出口冻家禽和家禽罐头实行布票奖励。1963年,对出口鸡、鸭也予以奖励。

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商业企业效益

1962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改善经营管理问题。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上作了《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员报告,明确提出改善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应以降低商品流转费用、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并紧紧抓住经营环节、运输保管、收购分配、服务质量、经济核算5个问题。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继续抓紧开展商业部门改善经营管理运动的通知》。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1963年3月上旬,安徽分别召开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工作会议,决定在全省全面开展以降低商品流转费用、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内容的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群众运动。

安徽商业改善经营管理主要是强化了盈亏意识。围绕扭亏增

盈、提高效益,全省商业系统采取了多种方法和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按经济区划组织商品流通和调运。1957年以前,安徽商业系统基本上是按经济区划组织商品调运。1958年商业体制改革,自上而下按行政区划设置专业机构,造成商品流转环节增多、调度不灵,地区封锁现象比较突出。如位于阜阳和蚌埠之间的颍上、蒙城、涡阳等县,从蚌埠调进商品,大部分要经过阜阳中转,倒运里程达160多里,增加了商品流转费用、在途时间和损耗,也造成运力的浪费。1962年9月,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强调推广唐山经验,按经济区划组织商品流通。在安徽省财贸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省商业厅组织商业、供销部门近百人的调查队,在六安地区进行按经济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调查,并对肥皂、水瓶等主要商品运销地点、运输线路和工具作了规划。通过调查,从当年第四季度起,全省逐步实行按经济区划组织商品流通,调整进货方向。全省精简了阜阳、屯溪、铜陵、马鞍山、宿县等中转批发机构,保留了沿水陆交通干线的一批二级批发站,担负工业品调拨供应任务;以二级站为中心,调整部分县(市)的省内进货地点。至次年5月,国营商业部门相继调整了54个县(市)的省内外进货地点和332条运输线路。另有202个基层供销社将经营的食盐、煤油、五金、文化用品等改由按照经济区划调拨进货,节约了商品流转时间和费用。如巢县忠庙等7个供销社,过去在巢县城关进货,改从合肥进货后,短短两个月就节约费用1.3万余元。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全省相继恢复了31个县跨省向江苏、浙江、河南、湖北、上海等地进货(如靠近江苏、浙江的20个县的五金、交电、化工、百货、文化用品等,原来分别从省内宿县、芜湖和省商业厅驻浦

口办事处进货,现改为向徐州、南京、杭州进货,越过了省界),28个县实行跨行政区进货,294个基层商业企业跨行政区供应工业品或交售副食品,调整163个基层供销社的进货地点。

二是开展“四就”拨货和直线直达运输,减少商品流转在途时间。“四就”即就工厂、就码头、就仓库、就产地到销地。1962年,国营商业对省内调拨的火柴、水瓶、卷烟、肥皂、搪瓷制品、胶鞋等28种商品,采取“四就”直接拨货方法。另对县以下基层商业网点的商品调拨,实行沿途丢货和就站、就码头直接调拨的办法。过去由二级批发站包销的小商品,也改为由各地商业部门直接到厂选购或工厂自销,减少中间环节。1963年后,直拨品种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据省百货纺织、五交化、糖业烟酒、石油煤建、食品、盐业等公司统计,仅1963年上半年直拨量就达61万吨,节约费用83万元。

在运输方面,1962年以后,安徽省国营商业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广泛推行直线直达运输,商品流转要求走最经济、最合理的线路。各企业均按照路程短、时间省、花钱少的原则重新审查过去采用的运输线路和工具,凡不合理的都及时作了改进。1963年1月~9月,全省共调整运输线路300多条,缩短运输里程2.4万多公里,节约流通费用4000多万元。其中食品行业调整运输线路的结果,使鲜活食品在途时间平均缩短6天。在推行直线运输的同时,许多商业企业坚持能水运的不陆运,能用火车运的不用汽车运。芜湖百货站从天津调进商品,原用火车直运芜湖,后改为江、海联运,进货时间不受影响,但每吨商品的运费却节约30多元。

三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在改革商业流通体制的同时,1962年前后,商业部门加强了企业内部管理。

首先,试点并推行定额管理办法。1962年,各省公司在青阳等县开展定额管理试点,对基层批发和零售商店一般都确定经营范围、经营商品目录、制定商品合理库存、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包干。之后,全省逐步扩大了试行定额管理的地区范围。

其次,实行民主管理制度。1960年后,安徽国营商业系统的批发和零售企业纷纷实行以“两参一改”、“三参一改”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其要点是: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参加经营劳动,广大职工参加柜组和企业经营,居民参加监督;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当时,领导干部一般都抽出30%~50%的工作时间参加劳动。各企业坚持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听取职工关于改善企业经营、职工福利和评优的建议,让职工对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提出表扬或批评。必要时,在上级主管部门主持下,民主选举企业负责人。此外,各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社还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消费者代表会议,听取消费者意见,依靠群众监督,堵塞商品“开后门”漏洞。

第三,积极推行岗位责任制。从1963年开始,安徽国营商业企业对企业内的经理、副经理、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工会主席、楼层主任、商品部主任、柜组长、营业员以及财务、会计、统计、后勤等不同岗位建立不同的岗位责任制。总的原则是:遵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遵守各项规章制度,遵守社会主义商业道德,遵守柜台纪律。具体内容根据不同企业、不同岗位分别制定。如对零售企业规定:五权(商品采购权、资金使用权、费用开支权、劳动调配权、残损商品处理权)下放,五员(进货员、核算员、物价员、服务质量检查员、商品陈列和卫生检查员)分工;分级核算,组为基础;工作到人,各有专责。

第四,加强商品管护工作。对调进的商品细致盘点,拆包检查,验质验量,做到数量准确、包装完好、单货相符、手续清楚。运输途中配押送员兼做养护工作。对容易造成损耗的商品如石油、酒类等规定漏桶不装和漏桶不出门;食糖、盐易溶化,就采取密盖和防潮措施;对仓储商品,勤检查、勤倒仓、勤吹风、勤翻晒,采取各种防鼠、防潮、防霉、防虫、防火措施,努力降低损耗。以防火为例,1963年省商业厅制定了《安徽省商业系统仓库分级管理责任制(草案)》,规定各级商业行政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选择一批重点仓库直接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当时,全省自上而下确定由厅长、处长、专(市)县商业局长、各级专业公司经理等共494人,直接管理重要物资仓库854处。另外,商业部门还成立安全组织677个,建立定期检查制度,修复、增添各种消防器材6000多件,有效防止火患的发生。

第五,改革工资制度,恢复奖励制度,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1958年10月,全省商业企业相继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制度,统一执行单一的计时工资制度,不仅职工收入普遍下降,而且助长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挫伤了职工积极性。196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提出改革工资制度,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和计件工资制。据此,全省商业部门对煤建公司的生产、装卸工以及储运公司的跟车装卸工恢复了计件工资制。1963年11月,商业部下发了《商业部系统饮食服务企业实行计时工资加提成工资制度的试行办法(草案)》,安徽迅速进行贯彻。1964年1月,省饮食服务公司在合肥市饮食企业进行试点。之后,又在其他行业推广。在实行提成工资制中,其计时工资部分一般按职工原工资标准的80%发

给,其余 20% 作为提成工资。在此之前,1963 年 5 月,全省商业系统全面恢复和建立了综合性的奖励制度。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把职工的工资收入、劳动成果和国家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有效地提高了职工积极性。

第六,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各商业企业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研,了解消费者需求。积极开辟货源,克服“重大轻小”和重视名牌、轻视地方产品的思想,使经营的商品供应对路,能满足生产单位和基层零售单位的需要。各商店和门市部纷纷降低零售起点,耐心做一分钱生意。营业员接待顾客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百问不厌、百拿不烦”。各地还根据市场情况和季节变化,适当调整商业网点和营业时间,以方便顾客。如理发、浴池、洗染等服务部门,普遍提早营业;饮食店一般早晨 5 点就开业,影剧院附近的饮食店要到晚上 11 点后才停业,车站、码头附近还开设夜市;粮店普遍交叉安排营业时间,中午休息时间和下午机关下班后半小时照常营业。积极恢复摆摊出售、推车挑担、走街串巷、送货上门等流动供应方式。1963 年,全省商业职工掀起勤学苦练基本功热潮,要求企业领导人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学习经济政策和业务知识,基层领导与职工学习商品知识、熟悉商品性能、学习操作技术、练好计算技术,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此后,随着以“五好企业”(政治思想好、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好、经营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干部作风好)、“六好职工”(政治思想好、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好、团结互助好、爱护公共财物好、经常学习好、服务态度好)为内容的比学赶帮竞赛运动的开展,服务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涌现出大批先进企业和模范工作者。

五、精简城市商业机构和人员,充实农村

由于受争利润、争业务的思想影响,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纷纷在县城设点,致使县城商业机构重迭、人浮于事,而广大农村商业网点却很少。如徽州专区占人口8%的城镇,集中了全区50%以上的商业人员和1/3以上的商业网点;而占全区人口90%以上的农村,商业人员却不到总数的一半,商业网点也不到总数的2/3。城乡商业网点的布局严重不合理,老百姓买点日用品往往要跑上几十里,很不方便。1965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商业工作要进一步面向农村的号召。26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城商业人员应该到农村去》和《县城商业管理机构大可精简》的文章,《安徽日报》及时作了转载并配发评论。此后,全省开始有计划地精简商业机构和人员,充实农村。具体作法如下:

(一)以合署办公、撤并科组的办法,精简专(市)、县两级商业管理机构。以徽州专区为例,1965年12月,专署商业局与专区百货、药材、糖业烟酒分公司合署办公,在不打乱财务、核算体制的原则下,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专区供销合作社办事处将原分设的秘书、组干、业务、计财、集市贸易管理等5个科撤掉,合为一个办公室。

(二)撤并县城的重迭门市部。如宁国县供销社把设在县城的工业品门市部交给了县百货公司经营;太平县土产杂品公司和甘棠区供销社原先都在县城设有生产资料、日用杂品和农副产品采购门市部,后撤掉了甘棠区供销社的门市部,腾出人员下乡工作。

(三)适当利用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力量,动员他们中的多余人员下乡设点,为农民服务。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城镇商业部门实现了机构精干、效率提高

的目的。同时,农村商业网点和人员的增加,支援了农业生产,方便了农民生活。

六、商业调整的效果

通过大力调整,安徽商品流通逐步扩大,业务逐步增长。1965年,全省商业部门商品纯购进总额 196204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31.65%,比 1962 年增长 76.8%;纯销售总额 239156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38.72%,比 1962 年增长 41.77%;商品库存总额 140835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26.4%,比 1962 年增长 24%。

(一)支援了农业生产

为了搞好农商关系,疏通城乡交流渠道,保证供给,安徽商业部门在农村增设供应网点,组织驻队人员深入了解群众需要,使商品分配做到大体合理。工业系统还通过派联络员深入农村,带样品试销、巡回供应等形式,组织工业品下乡。五金、交电公司组织修理员下乡,使农具修理做到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为扩大农村商品供应,商业部门还通过召开省内外物资交流会等形式,大力供应农业生产资料,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当时供应的农业生产资料品种主要是中小农具、种子、牲畜、化肥、农药等。尤其是 1965 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量急剧扩大,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共销售化肥 27.07 万吨、农药 17036 吨,分别是 1962 年的 3.87 倍和 3.2 倍。同时,农副产品收购增长也较快,1965 年,商业部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13341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26%,比 1962 年增长 95.2%。

(二)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全省商业部门贯彻合理收购、按质论价、等价交换原则,积极收购农副产品,通过调整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实行粮食补贴和

工业品奖售等措施,促进农民交售积极性。为了增加市场供应,商业部门不仅加强与当地生产部门的协作,还与浙江、上海、江苏等历史上有经济往来的地区沟通联系,互通有无,换购或购进本地的缺档商品。此外,还与东北一些省份建立新的经济购销关系,努力扩大购销额。1962年至1965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递增3.7%,1965年达20884万元,比1957年增长28%,比1962年增长18.1%。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从钢精锅、绸缎、毛线、棉毯、面盆、闹钟到蔬菜、肉食、豆制品等一应俱全。在主要城市里,不仅有经济小吃,还有川扬大菜,各种早点 and 特色小吃遍布街头。调往外省的肥猪、鲜蛋、菜羊成十倍、几十倍地增长。

(三)支持了地方工业生产

商业部门对地方工业生产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供应和收购两方面。一方面,商业部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辅助材料和燃料,如汽油、柴油、棉花、麻类、烤烟、纯羊毛、牛皮、废钢铁等;另一方面,商业部门大力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1963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后工业品收购的第一个丰收年,当年钢精锅、胶鞋等22种主要工业品收购均超计划完成任务,许多产品收购量较1962年大幅增长,如棉布、绸缎、呢绒、胶鞋、热水瓶、肥皂、牙膏、卷烟、机制纸、搪瓷制品等日用工业品的增幅最小达25%,最高达602%。而且,产品花色品种丰富,质量进一步提高,对地方工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教育事业的调整

陶有浩

安徽教育事业的调整,起步于1961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止,历时5年多。前3年主要是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着重压缩办学规模,以节约劳动力支援农业战线,理顺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同时试行大、中、小学《工作条例》,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从1964年起,主要是实施“两种教育制度”,以完善教育事业的结构,同时在全日制学校推行教学改革,减轻学生负担,以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具有创造精神、创造能力的劳动者。

一、教育调整的背景

安徽教育调整是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导致安徽从1959年到1961年经济状况持续恶化。财政收入急剧下滑,1960年为11.6亿元,1961年为6.7亿元,1962年为4.7亿元,对各项建设事业的投入已陷于难以为继的地步。虽然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一向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再穷再困难,都要想办法给教育多搞一些”,1962年全省财政收入用于教育投资的部分已达22.38%,但是,安徽如此窘困的财政状况,对于“大跃进”期间盲目发展起来的庞大教育摊子,实已不堪重负,无力继续支撑下去。教育事业的出

路只能是大力进行调整、压缩规模、挤出人财资源支援农业生产，以适应复苏农村经济的急迫需要。

二、教育事业的全面调整

安徽教育事业的全面调整从1960年末启动，到1963年基本结束。主题是调整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使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此前，在“大跃进”期间，为压缩教育战线过多占用的农业劳动力，充实和加强农业战线，安徽曾对教育事业进行过局部调整。1959年，省委印发《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意见》，指出：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需要，不能过多占用农村劳动力。对农业中学没有初中毕业程度和17岁以上的在校学生，可以动员他们回家生产，转入业余初中学习，以后农业中学原则上只招收13~16岁的高小毕业生；对农村小学中超过14周岁的学生，动员回家生产，转在业余时间学习；对1958年以来国家办的农村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实行“半农半读”；各地小学戴帽子的初中和新建初中，都停止发展，其他中学适当增加劳动时间。这些部署在全省范围得到了认真贯彻执行，收到明显效果。1960年和1961年，仅动员小学超龄生回家生产一项即达73.4万人。

1960年11月和1961年2月，中央文教小组先后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和印发《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研究和部署教育工作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有关问题。强调提出：要正确处理文教事业发展和生产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关系，以及文教事业的数量和质量、政治和业务等关系，解决好教育事业发展过快、战线过长、占用劳动力过多的问题，“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教育工作安排是：节约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今后三五年内，农村16岁以上的在校学

生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应控制在2%左右”;要区别城乡和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计划地、积极地普及适龄儿童的小学教育,通过多种形式逐步发展中等学校,积极地有控制地办好业余教育,办好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要着重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安徽于1961年至1963年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全面调整和必要压缩,大量裁并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适当控制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业余学校的发展,以有效地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

高等学校的调整工作于1961年上半年开始,计划到1963年将全省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44所减至14所。1961年5月,省委召开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认真贯彻“八字方针”,坚决纠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革命中一些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继又批转了省教育厅党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意见的报告》,根据“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好基础较好而又需要的学校”的原则,采取合并、改办、停办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和压缩。当年,安徽水电学院与安徽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安徽农业机械学院,安徽机械学院、蚌埠机械学院、芜湖电机制造专科学校、马鞍山钢铁专科学校、铜官山有色金属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安徽工学院,安徽农业专科学校并入凤阳农业专科学校,阜阳、皖西、安庆农业专科学校和安徽纺织工学院、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改为中等技术学校,合肥师专、淮南师专分别改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全省高等学校调减至31所,学生26578人。1962年继续进行调整。安徽交通学院并入安徽工学院,停办安徽体育学院、安徽水产专科学校、安徽茶叶专科学校、阜阳和宿县农业专科学校、合肥医专、淮南医专、安庆医专、滁县师专、安庆师专。全

省高等学校减至 20 所,学生 24941 人。1963 年,安徽艺术学院、安徽教育学院、阜阳师专、芜湖师专、六安师专、淮南化学工业专科学校撤销建制,停止招生。全省高等学校调减为 14 所,分别是: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学院、安徽水利电力学院、淮南矿业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医学院、蚌埠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皖南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财贸学院、凤阳农业专科学校、芜湖医学专科学校,学生 21735 人。

对中等技术学校的调整,根据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党组关于调整工作的方针和原则,采取合并、停办或停止招生、改建、迁址、缩小规模等办法,逐步开展。调整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1 年 7 月至 10 月,要求凡 1958 年以后戴帽子办起来的中技、初技、五年一贯制技术学校全部停办,每个专区、市只办几所农业学校、1 所卫生学校,不办艺术、体育等类学校;学校的发展规模,省属重点学校每校不超过 600 人,专、市所属学校不超过 300 人,县办学校 200 人左右。1963 年又规定,各学校专业设置一般为 2~4 个,最多不超过 6 个,规模控制在 300~800 人之间;非经省委、省人委批准,不得增建新校。全省中等技术学校调减至 153 所。第二阶段从 1961 年 11 月至次年春,全省中等技术学校再压缩到 82 所。调减的 71 所,除少数改办技工学校或农场办半日制学校外,其余均改为普通中学。第三阶段从 1962 年底至 1963 年暑期,再调减 38 所(内停办 18 所,停止招生 14 所,与其他学校合并 5 所,改为训练班 1 所)。1963 年秋调整工作基本结束。全省中等技术学校为 44 所、学生 8428 人,比 1960 年减少 167 所、65451 人。

中等师范学校调整工作,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

撤销初师,合理设置中师,逐校核定任务、规模、编制,纠正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偏向,以巩固和办好中等师范教育,为小学、幼儿园培育合格师资。1961年,全省30所初师全部撤销,59所中师撤销3所。1962年,将中师压缩到40所。1963年,全省中师调整为26所、学生6600人。

对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调整,省教育厅根据省委指示于1961年3月召开工作会议,作了具体部署:1958年以来兴办的全日制农村初中,一律改行劳动为主,业余学习;1958年以前办的全日制农村中学,一律实行“一、三、八”制,即全年放假1个月、劳动3个月、学习8个月;农村小学一律实行放农忙假制度;动员农村中、小学超龄生回乡生产,改为业余学习;农村全日制中学控制发展,并作适当调整。1963年与1960年比较,全省普通中学设置布点基本维持原状,少有变动,在校学生由35.7万人减为21.5万人,调减了14.2万人;小学由22191所增至24736所,略有发展,在校学生由319万人减至202万人,减少近四成;适龄儿童入学率由59.2%降至49.9%,减少9.3个百分点,普及适龄儿童小学教育的任务遭到挫折。

对幼儿教育事业,遵照“对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幼儿园,予以停办或合并”的方针,实行了大幅度压缩。1960年至1963年间,全省幼儿园由20237所减为347所,在园幼儿由84.6万人减为4.5万人,专任教师由28222人减为1740人,裁并的规模达八九成。

农业中学和农业职业中学的调整,由各地、市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大批农业中学、农业职业中学因办学条件困难而纷纷下马,3年内农业中学由481所减至106所,学生由34720人减至4684人;农业职业中学由75所减至24所,学生由8100人减至

2590人,坚持办学的不过十之二三,半工半读教育事业也被削弱。对于农业中学的办学方向,省里一直是肯定的,曾多次开会研究农中的发展问题,并把办得较好的枞阳县铁铜农中、颍上县新庙农中、巢县庙何农中、太和县斤沟农中、萧县黄口农中等校办学经验在全省推广。1963年7月,省教育厅在颍上县召开农业中学座谈会,研究新庙农中等校得以坚持下来、越办越好的经验。座谈会认为,根据安徽农村经济情况、群众需要和农中办学实践,当前应当多办一些面向生产、半农半读、以农为主的农业中学;学生应是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以走读为好;对生产、学习“两集中”(集中在校生产、集中在校学习)的农中要进行调整,条件不具备的可以逐步改为走读;农中教师应就地取材,选拔当地符合条件的人担任,并由公社聘请,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对农村业余教育,省教育厅于1961年3月作出部署,要求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必须服从农业生产和整风整社总的部署,分别不同地区作具体安排:灾区可以暂时停止;轻灾地区和穷队、落后队也不要多搞;一般地区和丰收地区可酌情安排,但均应注意群众的适当休息和体力的保持,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妨碍生产。1961年至1963年,全省扫盲教育事业从完全停顿到初步恢复、逐步回升,入学人数分别为7万、10万和37万人。

1961年,农村开始兴办青少年业余小学和业余农业中学,分别招收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超龄生和中、小学毕业生,坚持以生产劳动为主,进行业余学习,培养农村技术力量,取得一定效果。

对职工业余教育,省总工会党组、省教育厅党组于1962年3月联合发文指出:今后两三年内,职工业余教育以扫除文盲和业余初等教育为重点,同时认真办好现有的业余大学。业余中学主要

是提高质量,总结经验,为将来普及中等教育打好基础。1963年在学人数为:业余大学 9196 人、业余高中 5993 人、业余初中 21881 人,规模较小,远不及 1958 年的水平。

农垦学校是教育调整期间兴办的一种半农半读的职业学校。学校实行场(农场)校合一,以场为主;半耕半读,以耕为主。举办这样的学校,是安置中等城市不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引导和帮助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也是控制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的积极办法。1962 年,省委要求各地迅即着手筹建。合肥市和宿县地区很快各办起 1 所。其后,在调整中等技术学校过程中,阜阳专区林业学校、宿县专区农业学校等 5 校先后改办农垦学校。1964 年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农垦学校又有较大发展。

调整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成效。首先,教育事业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全省全日制高、中等学校由 988 所调整到 725 所,在校学生由 51.6 万人压缩到 25.2 万人,教职工由 50169 人压缩到 38501 人,分别减少 263 所、24.6 万人、11688 人;小学、幼儿园教职员由 14.8 万人压缩到 9.9 万人,减少 4.9 万人。调整下来的 105 万名师生员工(含回乡生产的小学超龄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返回农村,充实了农业第一线,也缓解了城市供应的沉重负担。此间,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也相应减少,1963 年全省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9028.8 万元,比 1960 年减少 34.8%,使财政困难的状况略有缓解。此外,教育事业在缩短战线的同时,还初步调整了诸如政治与业务、教学与劳动、领导与群众、教师与学生等多种关系,促进了学校的巩固发展和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三、试行高等学校和中小学《工作条例》

1961年9月和1963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要求在有关学校中试行。

这3个条例是在总结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三年教育革命的成绩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一套适合国情的大、中、小学规章制度,是规范全国大、中、小学办学工作的法令性文件。条例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正确方针,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教育体制;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明确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形式,教师在教学、科研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建立尊师爱生的同志式的师生关系;要求党组织要善于团结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学校干部和师生充分认识到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安徽随即在大、中、小学有计划有步骤地试行条例,改进学校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1961年暑期,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讨论研究贯彻“高教六十条”,并组织专人对试行情况作专题调研。1962年,全省高校全面试行“高教六十条”。各高校除按照教育部制订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外,并根据省有关主管部门的部署,从本校实际情况出发,制订贯彻的具体规划。如皖南大学和合肥师范学院

为贯彻 1962 年 1 月全省师范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对专业科类的设置各有侧重,皖南大学侧重理科,合肥师范学院侧重文科。两校的政治课、专业课、教育课的教学时间和生产劳动时间占教学总时数的比重:政治课,文科约为 18%,理科约为 11%;专业课,文科约为 60%,理科约为 70%;教育课,约为 5%~6%;生产劳动时间每年不少于 1 个月。在专业课中,基础理论课时约占 95%,其余 5%由学校根据自身条件开设选修课,理科专业适当增加实验时间。各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执行《安徽省二年制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教学计划》,开设政治、教育学、体育、文学概论、汉语、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范文选读与写作、逻辑学常识、初中语文教材教法、外国文学作品选读共 11 门课程,加强了专业基础课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各高校均以教学为主,切实保证教师有 5/6 的业务时间、学生每天有 8 小时的上课、自修时间;妥善安排教师工作,加强教学第一线的师资力量;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踏实,坚持正面教育,避免简单粗暴、乱批乱斗。政治理论教学坚持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配合学校各种政治思想工作,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为根本任务。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学校行政组织的作用,全省有 8 所高等学校建立了校务委员会,实行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系一级行政机构中,加强了系主任和系务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学校还加强了总务工作,改进物资供应,以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全日制中学于 1963 年起试行“中学五十条”。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总结建国以来中学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对中学教育的领导,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克

服生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现象,纠正学校工作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使中学教育重新步入正轨。各中学分别执行不同的教学计划:(一)试行“中学五十条”的初中,从初中一年级起完全执行教育部制订颁发的教学计划;试行“中学五十年”的高中和完全中学,从高中一年级起,基本上按照部颁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二)暂时没有条件全面试行“中学五十条”的中学,初、高中各年级均执行省教育厅原订的教学计划,适当增加语文、数学、外语等科的教学时间。其中初中的教学计划分为开外语课和不开外语课两种。政治课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克服单纯传授理论知识的教条主义倾向。思想品德教育特别强调正面教育,广泛开展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等活动,以英雄模范人物的思想品德影响学生,并通过访贫问苦、请“三老”(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各中学对体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普遍较为重视,积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体育达标活动;大多数中学组建了以球类、田径为主的体育运动代表队,以平时训练为主,辅以假期集训。规模大的中学一般配有专职校医,建有医务室,定期对学生进行体检,实施体育医务监护,开展疾病防治。省教育厅除制订《中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中学生守则》供各校试行外,并就如何正确对待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这些学生在校与其他学生一样有言论、通信的自由,有参加集会的权利;品学兼优者,应与其他同学一样受到表扬奖励,一样可以当选学生干部;生活确有困难的,学校应酌情评给助学金;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应严格按照中央规定办理,中学招生也应以他们本人德、智、体条件作为录取的依据。学校要注意教育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要多接触这些学生,

关心他们的进步,不要疏远、孤立、歧视他们。

关于“小学四十条”的试行,省教育厅在全省范围选定了领导力量较强、师资水平较高、设备条件较好的 217 所小学(共 3023 个班、147656 名学生)作为首批试行学校。各校严格遵照教学计划和教科书的要求进行教学,保证学生掌握应有的基础知识,得到必要的基本训练;适当控制各年级的考试、测验,加强平时考查,防止学生不正常的留级和大量学生中途辍学;正确处理毕业班的复习补课工作,加强对毕业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之正确对待升学和参加生产。加强以阶级教育为纲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着重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努力上好每周两节的体育课(从三年级起体育课增加体育知识基础教学),坚持早操、课间操,开展小型多样的体育竞赛活动,试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做好学生视力保护工作,促进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随着 3 个条例的逐步实施,安徽大、中、小学的工作呈现出依法管理、规范运作的局面,教育质量稳步上升。

四、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961 年 8 月,省委开始对 1957 年以来在各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包括教育战线)进行甄别,重点是 1959 年“反右倾”斗争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安徽大学等 6 所高校,自 1958 年以来受到批判斗争的高级知识分子计 157 人,经过甄别,属于错批错斗的有 118 人,分别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平反,一些专家、教授重新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1962 年 5 月,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所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

来在报告中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对知识分子作出的正确估计。副总理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冕”(戴上人民劳动者的桂冠)。8月,省委、省人委在黄山召开全省知识分子会议。会议发扬民主,谈心通气,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两次会议得到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鼓舞了知识分子。

为了提高人民教师的社会地位,党和政府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及时给予表彰和奖励。1960年和1962年,全省文教群英会和中、小学优秀教师代表会先后召开。一批优秀教师被推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参加地方政权管理工作,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三年困难时期,还对部分教师给予一定数量肉类、食糖、黄豆、香烟等特需供应,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为稳定和加强教师队伍,1961年3月,省教育厅召开专门会议,对各级学校人员编制标准、整顿和加强教师队伍以及提高教师水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随后,省委批转了《安徽省各级各类学校人员编制标准暂行规定(试行草案)》,正式付诸实施。为端正师范教育的办学方向,1962年1月,全省师范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坚持师范院校这个培养师资的主要阵地,面向中、小学,办好师范教育,并要加强在职教师的进修,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针对高等师范院校向综合大学看齐的倾向,省委明确指出:“皖南大学就是理科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就是文科师范学院,现在死心塌地不变,至少20年不变,踏踏实实地培养新师资”,从而确保了高等师范教育的稳定发展。1963年秋季起,在师范学校开设小

学教师轮训班,首先轮训校长、教导主任,1964年暑期开始转入轮训教师。这一措施切实有效地提高了小学行政领导和教师的整体水平。

五、实行两种教育制度

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发展半工半读教育事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在统一的教育目的下,办学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全国将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学校三类学校。当时安徽教育事业“大跃进”,就是按照多元化的要求来兴办学校的。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安徽及其他地方视察时,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指出:半工(农)半读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是结合的。推行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从当前看,既能够办学校,有希望普及教育,又能减轻国家和家庭负担;从长远看,能够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有利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建议各省、市、自治区,每个大城市都着手试验、试办,至少5年才能总结经验,10年以后推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教育部在当年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提出: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方针;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全日制普通中学基本上不发展,着重提高质量;有些普通中学偏多的地区,要有计划改一部分为职业中学;要积极发展小学,特别是简易小学(后改称“工读小学”或“耕读小学”,以便同全日制小学有所区别),

解决贫下中农子女入学问题,逐步普及小学教育;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工农业余教育。

遵照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教育部的部署,安徽于1964年下半年开始推行两种教育制度。9月,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半工(农)半读学校工作会议,学习刘少奇有关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讨论发展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具体要求和办法。10月,省委、省人委批转省教育厅《关于积极试办和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的意见》,决定恢复和兴办一批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并将一批全日制学校改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省委、省人委还决定,在全省教育经费中划出25%(最低不少于20%)用于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省教育厅增设半工(农)半读教育局,以加强管理。此后两年间,全省工读教育和耕读教育事业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各级各类工读、耕读学校达6.3万多所,在校学生达165万多人,占全省全日制、半工(农)半读、业余学校学生总数的1/4,与全日制学校学生数的比例为0.45:1。一个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完整的半工(农)半读学校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安徽工读、耕读学校设置有以下几种:

(一)耕读小学。由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主办。1965年,全省设60881所、学生152万多人。全省小学生有三成多在耕读小学就读。耕读小学大都办在农村,布点分散,规模不大(平均每校25个学生),便利贫下中农子女就近入学,并有暇照顾家务,对普及小学教育起了很大作用。这一年,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79.7%,比1963年增长29.8%。

(二)农业中学。由公社或大队主办,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3年,办学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

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并具备农业及其他基本生产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把培养新人和研究推广当地急用的新技术结合起来，为社、队培养初级农业技术人员”。办学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生学习、劳动都集中在校；一种是学生学习集中在校，劳动分散在队。1965年，全省有农业中学 2554 所、学生 107 万人，分别比 1963 年增长 23 倍和 22 倍。

（三）农垦学校。这是安置中等城市待业的初、高中毕业生的一种专门学校。1962 年初创时由专区、市兴办，以后农垦系统、农业部门、教育部门也都办过这种学校，实行“谁办谁管”。办学目标是：“面向农村，服务农业，多快好省地为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技术后备力量。”学习年限为 3~5 年，要求学生毕业后“乐于在农垦学校办的农场或其他国营农场就业，安家落户”。办学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学校附设于农场，一种是学校与农场合一。学校主要根据耕地面积确定办学规模，一般按每个学生拥有水田 4 亩或旱地 5 亩计算招生人数。1966 年初，全省有农垦学校 28 所、学生 5497 人。

（四）半耕半读农业技术学校。这是在全日制农业技术学校改行半耕半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1964 年 10 月，省委决定将合肥林业学校、凤阳农业学校、屯溪茶叶学校、六安农业学校、芜湖农业学校、宿县农业学校、阜阳农业学校共 7 所全日制农林技术学校改为半耕半读学校。这是安徽最早的一批半耕半读农业技术学校。1964 年，刘少奇在安徽视察时指出，在农村办这种学校更顶事、更管用。这种学校发展很快，1965 年底全省已有 69 所、学生 9689 人。

（五）半耕半读师范学校。1964 年秋，省委决定在灵璧师范、

凤阳师范、寿县师范、巢县黄麓师范 4 所全日制中师进行半耕半读“大改”试点,学制年限暂不变动,每年教学、劳动、假期时间的安排,由原来的“九、一、二”改为“七、四、一”。学校工作贯彻“面向农村,面向贫下中农,面向工(耕)读教育”的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劳动锻炼,加强教育革命和实践。安排教学计划时,注意加强政治、语文、教育学科的教学,政治、语文和小学语文教材教法、教育学与实习 3 门课程的课时,比其他全日制中师分别增加 18.5%、5.6% 和 8.3%。

(六)半农半读职业学校。由市、县教育部门主办,农业部门协助,分初、中两级,分别招收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初级学制 4 年,中级学制 2~3 年。培养目标是“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农业生产技能训练,为农村培养和输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后备力量”。学生毕业后,来自农村的回到原生产队,来自城市的到学校所在县的农村人民公社参加农业生产建设。1965 年,全省有半农半读职业学校 102 所、学生 9774 人。后更名为农垦学校或半耕半读农业技术学校。

(七)半工半读职业(技术)学校。创办于 1964 年。当年底,全省设 24 所,其中由全日制中等技术学校改办的 1 所,普通中学改办的 1 所,工交、财贸、卫生等系统办的 22 所,另有普通中学附设的职业班 5 个,学生共 3907 人。学校招收高小或初中毕业生,学制均为 3 年,达到初级或中级职业学校毕业水平。学生在校劳动、学习和假期的时间安排为 6:5:1,课程设置的教材参照全日制中等技术学校同类专业,适当降低要求。1965 年底,全省半工半读职业(技术)学校有 77 所、学生 1.3 万人。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或改回原制,或被撤销,学生部分到工厂当工人,部分

到农村插队落户。

(八)安徽劳动大学。1965年1月在宣城县叶家湾成立。这所学校是省委为积极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以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为模式而创办起来的。学校属高等师范性质,其任务是培养半农半读中等学校师资,为发展耕读教育事业服务。学校设政治、中文、数学、农学4个系,学制4年,实行半耕半读。当年在校本科学生663人,专任教师43人。此后,又在宿县专区固镇县新马桥增设安徽劳动大学新马桥分校。

在积极恢复和兴办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的同时,安徽在普通中学开展了“改制”试验。在学习年限、培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劳动、渗透职业教育因素,以适应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使普通中学真正担负起“两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任务,做到毕业学生“升学有基础,就业有技能”;并为普通中学逐步过渡到半工(农)半读摸索经验。参加第一批“改制”实验的学校有1所高中(寿县下塘中学)、24所初中。实验的基本内容是:(一)增加劳动时间。全年教学、劳动和假期时间的比例为8:3:1或7:4:1。(二)改寒暑假为农忙假,试行“三学段”。(三)精简课程,改多科并进为单科独进,把每年10门左右的课程减为5~6门;加强生产知识技能教育和政治教育。对“改制”的初中还拟定3个不同的教学计划供学校选用。(四)改编教材,有重点地编选适用的教材(如高、初中理化、应用文、测绘、农业生产知识等)。(五)改革教学方法,实行“少而精、启发式”、“精讲多练”,加强课外辅导,注意因材施教,做到课堂教学时间减少,又不加重课外负担,不降低教学质量,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省教育厅和六安专区教育局组织了

一批中学各科教材教法专家到下塘中学蹲点,指导实验,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于1966年5月初视察下塘中学,对该校“面向农村,坚持劳动,勤俭办学”的经验和教学改革中对“少而精、启发式”的探索,予以充分肯定,誉之为“全日制教学改革的榜样”,“第一次解决了‘少而精、启发式’的问题”,认为有普遍意义,并部署在全国推广。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止。

在这期间,各类业余教育密切配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出现了巩固提高、稳步发展的新局面。1965年在校学生中,大学班11997人、高中班9484人、初中班71473人、高小班166686人,与1963年在校学生数比较,大学班增加30%、高中班增加58%、初中班增加2.3倍、高小班增加2.1倍,显示了业余教育的文化层次逐步提高。

安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1961年至1963年调整的基础上,经过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兴办半工(农)半读学校,加强业余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到1965年,全省全日制学校计有:高等学校13所、学生1.8万人,中等学校708所、学生28.6万人(其中中等专业学校43所、学生1.7万人,普通中学665所、学生26.9万人),小学4.5万所、学生337.8万人,幼儿园338所、在园幼儿4.3万人,盲聋哑学校5所、学生382人。半工(农)半读学校计有:高等学校2所、学生1079人,中等专业学校170所、学生1.2万人,农业中学2554所、学生10.8万人,耕读小学6.1万所、学生152.6万人。业余学校计有:高等学校24所、学生1.2万人,中等学校学生8.1万人,初等学校学生143万人。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农)半读学校在校学生合计538万人,比1963年的223万人增长1.3倍,增幅较大。在校学生中,全日制学校学生占53.9%,半工(农)

半读学校学生占 24%，业余学校学生占 22.1%，半工(农)半读学生与业余学校学生合在一起，占近半壁河山。至此，安徽教育通过实行多元化办学，已经探索出一种比较合理的教育结构。

六、全日制学校的教学改革

1964 年春起，毛泽东就全日制学校的教学改革，连续发表了《春节讲话》(2 月 3 日)、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来信的《批示》(3 月 10 日)、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讲话》(8 月 29 日)、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七三指示》(1965 年 7 月 3 日)和在杭州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2 月 21 日)，提出的问题涉及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诸多方面，批评甚多。毛泽东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好，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的教育制度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学校课程太多，讲授不甚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不利于青年们德、智、体主动得到发展；“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现在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工科、理科学生“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学生“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毛泽东这些指示的核心，是要使学生能生动活泼地成长发展，成为创造性的人才。

安徽本着“思想积极，步骤要稳”的精神，在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此次教学改革。省教育厅两次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学习毛泽东有关指示，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

党的教育方针,改进教学,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德、智、体得到发展。会议认为:继续进行全日制学校教学改革,克服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促进青少年一代身心健康发展,是关系到办什么样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原因,在于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和教师要从自我做起,清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思想,并要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克服社会上实际存在的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倾向;同时在教学工作中,要贯彻执行少而精、学以致用原则和启发式的教学法,以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教学改革的主要做法,应该是加强正面教育,发展积极力量,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少数进行“大改”试点的学校,在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考试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劳动、学校体制等方面都可以改,不受过去条条框框的束缚。会议还学习了上海育才中学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并提出了把寿县下塘中学办学经验和办学精神与上海育才中学经验结合起来的教学改革试验方案。

为改进对学生的成绩考核和学校的课程设置,省教育厅于1964年6月和1965年10月先后印发了《关于中小学、师范学校本学期的考试和学生升留级、毕业标准等问题的意见》和《关于调整全日制中小学课程问题的意见》,以克服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切实提高教育质量。调整课程设置的原则是:适当减少课程门类,尽可能安排单科独进;适当减少每周上课总时数;保证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的程度不降低,其他学科适当精简内容。省教育厅党组并作出安排,组织全省高等学校师生参加农村“四清”(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

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的调整

程小俊

1957年至1960年间,受反右派、“反右倾”和“大跃进”等运动的影响,安徽省的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1961年至1965年间,中共安徽省委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在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一、开展甄别平反工作,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57年至1961年间,党内党外进行了多次批判斗争,安徽省有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据统计,全省受到批判和处分的脱产干部共134906人、农村基层不脱产干部392106人。政治上的批判斗争对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产生和加剧,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此,调整国民经济必须解决党内过“左”斗争的问题。1961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反右倾”和“大跃进”中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在不脱产的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6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提出:“要对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7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初步总结了几年

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对前几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讨。9月8日,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和省委监委提出的《关于认真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甄别工作的目的是弄清是非,加强团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发扬党内外民主,造成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甄别范围一般是1957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工作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重点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同时明确了甄别的步骤、方法和要注意划清的各种问题的界限。全省各地根据《意见》开始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但由于认识不足、执行不力,这项工作进展比较缓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再次强调要为“反右倾”斗争中处理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指出:自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要求各地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5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召开了一届十二次全会,总结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省委在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恢复民主集中制、改正责任田等十个方面的工作。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对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

加以甄别平反。6月,省委又召开地、市监委书记会议,对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此后,省委先后召开了第五、第六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体会议,对李世农、张恺帆、陆学斌、杨效椿、魏心一、刘秀山等重大案件进行了讨论。7月20日,省委印发了关于对李世农、张恺帆等人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撤销了省委一届六次全委会议关于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错误决定,撤销省委1959年9月《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李世农、张恺帆等人的名誉、党籍、级别和职务。此后,全省各地的甄别平反工作进度明显加快。到1962年10月,已经甄别的脱产干部87443人,占64.82%;不脱产干部355830人,占90.7%。到1963年7月,全省已甄别的案件占应甄别案件总数的99%。其中全错全平的占60%,部分错部分平的占21%,不错不平的占19%。对于甄别平反后应安排工作的干部,都适当地安排了工作。这次甄别平反工作虽然不够彻底,但对当时发扬民主,增强团结,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全省甄别平反工作到1963年基本结束,剩下的少数遗留问题转由正常的审干工作办理。

与此同时,安徽还进行了右派摘帽工作。据1962年9月30日统计,在反右派斗争中,安徽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根据中共中央1959年9月17日《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9月22日,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安徽省特赦罪犯和摘右派帽子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任组长。当年国庆节前后,全省首批摘掉240名右派分子的帽子。

为了加快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的进度,1959年10月,省委召开改右和特赦工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思想。会后,省委特赦罪犯

和摘右派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向省委呈送了《关于特赦罪犯和摘右派帽子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关于特赦罪犯和摘右派帽子的工作计划》两个文件。10月29日,省委向各地批转了上述两个文件。此举促进了安徽右派摘帽工作的开展。1960年2月,全省有2250人摘掉了右派帽子。9月,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会议要求,安徽加大了对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工作的力度,于9月间成立了由组织、统战、公安、政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改右工作领导小组,各地、市也相应成立改右工作机构。从1960年10月至1962年春,全省又摘掉了10329名右派的帽子。1962年6月,全省地、市委监委书记会议决定对明显划错了的右派分子,首先是党内的,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平反。到9月,已甄别平反4010人,待批和已批尚未宣布的3286人,两项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3.2%。

但是,由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反对“翻案风”,右派摘帽和平反工作受到冲击。1962年9月19日,省委发出通知,对党内外右派一律暂停甄别处理。196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对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右派案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于已经作出平反结论的右派分子,如果不违背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就不再变动。对于尚未进行复查的右派案件,今后一律按照中央指示的“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的方针处理。

按照上述批示精神,至1964年3月,全省分两批共摘掉1595名右派帽子。至此,全省计有14414人被摘掉右派帽子,占右派总数的45.8%。由于受“左”的干扰和历史的局限,当时右派摘帽工

作进行得不够彻底,一些摘掉帽子的右派尚留下不少“尾巴”。

二、精简整编,组织轮训,加强管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大跃进”期间,安徽省干部人数增长较快。到1961年,全省干部总数达416339人,比1956年增长了0.77倍。针对这种状况,1961年9月,省委组织部在《关于几年来组织工作的检查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在今后提拔干部工作中“必须全面理解和处理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既要考虑需要,又要考虑可能;既要注意数量,更要注意质量”。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从1962年起,安徽开始了精简整编、下放干部工作,使干部队伍过量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1963年,全省干部总数下降到347360人。1965年底,全省干部总数仅有406095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干部队伍的扩大,干部教育和训练工作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是“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会后,省委于7月27日至8月2日召开全省干部训练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两三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级各部门的主要干部以及一些专业技术干部普遍轮训一遍,使广大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阐述,学习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党的基本知识。通过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克服某些片面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和“左”的错误;帮助干部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论,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克服干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完成这一任务,会议提出五点要求:(一)健全和加强各级党校和公社干校的训练机构,充实教学力量,健全教学组织和制度。(二)本着“农忙少训、农闲多训”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干部训练工作,并坚持常年训练。(三)各级党校和干校应贯彻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作指导、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教学方针,让广大干部深刻领会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会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五)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努力培养提高干部,切实组织教学人员的理论进修、调查研究和集体备课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9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根据中央决定和省委干训会议精神,1961年11月24日,省委下发了《关于轮训干部的计划》,要求在1963年底以前,将全省各级各方面的党员领导干部约13.8万人分期分批轮训一遍。训练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从1961年10月至1962年10月,全省共训练党员干部91000多名,其中省委中级党校训练了2200多名,省直属机关党委初级党校训练了600多名,地、市委党校训练了13600多名,县委党校训练了74000名。1962年12月至次年3月,省委在合肥、蚌埠、芜湖三地举办了两期训练班,抽调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集中进行训练。各地也抽调了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集中进行短期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是中央选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省委对举办训练班十分重视,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王光宇,候补书记陆学斌都亲自讲课、作报告。三地也分别成立由地、市委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办班工作的领导。1963年,全省各级党校又轮训干部 33157 人。至此,基本完成了省委轮训干部的计划。

在干部调配方面,主要是根据全省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重点为农村和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新建、扩建单位,以及技术力量薄弱的部门配备大批干部。1962年,全省共调配 5.1 万多名干部,重点加强农村领导力量(其中抽调 5500 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加强农村工作)和监察、政法以及财贸部门的干部力量。1963年,全省共选调 1492 人(其中科以上 878 人、技术干部 272 人),加强农村区和人民公社的领导力量。

在干部管理方面,适当收回了下放的权利,加强了对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要求适当收回下放的干部管理权力,集中统一管理干部,并且决定今后不再采取层层委托下级党委代管干部的办法。根据这一精神,1963年1月,全省第十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各级党委仍然实行在党委领导下、在组织部统一领导下分部门管理干部的办法。省委过去委托地、市委管理的干部,应该适当收回;地、市委委托下级党委代管的干部,亦应适当收回;今后不再采取层层委托下级党委代为管理的办法。各级党委任免干部时,均由组织部统一汇总上报。

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1965年8月21日,中组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培养提拔新

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等3个报告。11月17日中央批转了3个报告。11月30日,根据中组部报告精神,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向省委提出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报告》,经省委二届六次全会讨论通过后批转各地执行。《报告》认为,全省现有干部年龄在30岁以下的有9万多人,占干部总数近1/3,从中培养选拔年轻的优秀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是完全可能的。《报告》对各级领导班子中年轻干部所占的比例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出要“通过培养提拔新生力量,使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实现老壮青结合。”《报告》及省委的批示下发后,各地都很重视,制定了规划,挑选了培养对象,并提拔了一批新生力量担任县、公社党政领导职务。

三、放慢发展步伐,加强教育管理,增强党员队伍的战斗力

1958年至1961年间,安徽省接收的新党员数量较多。4年内共发展319509人,占1957年党员总数477936人的62.01%。1960年全省实际发展党员155483人,是1957年后最多的一年。有些地区的党组织,接收新党员时,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审查不严,甚至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和采取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如:“超额完成任务”、“全年计划半年完成”、“火线入党”、“评功大会入党”,以及不经党委讨论而由个人决定接收党员等等,降低了党员标准,把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根据省委组织部的典型调查,1958年至1960年接收的新党员,约有6%~10%的人不够条件。同时,预备党员的数量很大,在对他们的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到1961年9月全省有到期超期尚未办理转正手续的预备党员13万余名。

为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根据中央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的批示精神,1962年7月4日,省委组织部发出《关于暂时停止接收新党员的通知》,指出:由于1958年以来接收新党员单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决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般均暂时停止接收党员,以便集中精力巩固党的组织,做好对现有党员的教育训练工作,对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的甄别平反工作,对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处理工作,以及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工作”。此后,全省各地按照这一精神抓紧进行了党员整顿巩固和教育提高工作,一般没有发展新党员。1963年和1964年,全省总共只发展党员150人。1964年中央提出有领导有控制地发展一批党员后,从1965年上半年开始,开展“四清”运动的重点县和省、市直属单位在运动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开始注意对积极分子的挑选培养和考察教育工作,并有少数单位有控制地个别地接收了一些新党员。

由于连续几年很少发展党员,结果又导致许多地方和单位党员数量减少,党员的构成、分布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青年党员偏少、第一线党员偏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偏少、农村党员偏少,有的地方基层第一线甚至没有党员和党组织。1965年11月30日,根据中组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及中央的批示精神,省委组织部提出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接收党员的意见》,经省委二届六次全会讨论通过下发执行。《意见》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慎重地接收一些新党员”,“发展党员的重点,从单位来说,主要是生产第一线、要害部门、薄弱环节和缺乏新

鲜血液的支部；从人员上说，在农村主要是在贫下中农中接收，在城市主要是在工人、高等院校的学生、营业人员和年轻优秀的技术人员、财会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医护人员、教学人员、文化技术人员中接收。无论农村和城市都要注意在壮年特别是青年中接收党员，都要注意在妇女中接收党员”。农村生产队一般应建立党小组，全民所有制企业 20 人以上的一般应建立党小组。此后，接收党员工作逐渐受到重视。1965 年全省共接收新党员 12091 名。其中女党员 1866 人，占新党员总数的 15.43%。

1961 年至 1965 年间，在放慢发展党员步伐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中央有关精神，安徽省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1961 年 4 月 27 日，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意见的报告》，强调要加强对党员的经常性管理教育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经常了解和研究党员的思想状况，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制度，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两次小组会，要建立和坚持党课教育制度，至少每月给党员上一次党课；要定期抽调党员到各级党校进行轮训。党校训练和党课教育，应着重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政策、党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学习和教育。同时要严格执行党员登记、统计和转移组织关系等各种手续和制度，严密党的组织。

1961 年冬和 1962 年春，根据中央批转的中组部《关于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精神，全省 74 个县、市党的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党员进行了教育训练工作。这次教育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以使每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中组

部和中宣部共同编写了《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书,作为各地进行训练的教材。1962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参训党员占总数的70%。经过教育训练,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状况起了很大变化,党内存在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党员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的进一步增强。

1962年10月,中组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全党1700万党员中,大多数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但是,大约有15%~20%的党员不符合条件,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一部分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不够巩固,没有真正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会议提出“必须在党内开展一个大规模、普遍深入的教育运动。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形势、阶级、社会主义方向,党的政策、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三个方面。在重新教育党员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63年,全省各地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全面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训练党员工作。5月份前,主要是结合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党员中开展形势、阶级、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政策教育,农村中约有92%的党员、城市中约有52%的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5月份以后,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两个“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的教育,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搞重新登记党员试点的社、队和单位,还向党员进行了“党员标准十项条件”的教育。

1965年12月16日,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农村“四清”运动中整顿党的组织的意见》,提出要把整党作为“四清”运动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到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去,要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重新教育、审查党员,对党员普遍进行一次登记。“在整党中要从教育提高党员入手,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对党员进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进行党的性质和任务、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三大作风和党员标准的教育,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党的观念,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几次大规模的党员教育活动,虽然深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但对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1年至1965年间,省委在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方面进行的调整,较好地调动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组织保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接连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有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

1961年

1月2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突击治疗疾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

1月10日至15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整风整社汇报会。提出：搞好整风整社，各级领导要下决心揭盖子；根据干部标准，对所有干部进行排队；坚决退赔“一平二调”的财物；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队”，兼顾全面等。

1月16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发《全省各级法院精简编制的意见》，提出全省法院编制减11.7%，其中高院机关压缩17%。9月6日，省高院确定从实有干警96人中压缩26人，比确定的编制数减少19.5%。

1月中旬 安徽省开放水面，发动群众捕捞。天然水面谁捕谁得；养殖水面，野鱼谁捕谁得，家鱼养殖单位适当提成。

2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补充通知》。指出：放手活跃农村集市；坚决禁止并取缔少数商贩和富裕农民利用集市进行长途贩运、投机倒把和转手买卖。

2月18日至3月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并讲了话。省委领导对过去的工作作了检查。会议讨论部署当前工作，提出吃饭第一，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以整风整社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力争今年农业有一个较好收成。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月下旬 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到合肥郊区蜀山公社南新庄

生产队进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点。这个办法又称“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

3月6日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南新庄生产队的试点经验,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15日,省委决定,在全省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责任田办法。

3月25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指示》。确定全省年内精简职工13.5万人,裁并工业企业1831家,并严格审批新开工建设项目。到年底,全省精简城镇人口82.2万人。大批工矿企业停办。

3月25日至31日 安徽省教育厅召开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农村各类中学进行调整的具体措施。到12月31日,全省普通中学为589所、在校生279258人,农中及职业中学129所、在校生8805人。

4月10日至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广州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4月17日 安徽省对种植经济作物实行奖励:凡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保证社员吃到与附近余粮队同等数量的口粮,并按收购数量供应一部分粮食。

4月21日 安徽省公安厅发出《保护牲畜安全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抓好侦破耕牛等牲畜被盗案件,建立管理和使用耕牛制度,协助基层组织建立耕畜专管、专用制度。

4月27日 安徽省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包购。要求在包产的基础上使包购任务切合实际,落实到生产队,有的通过合同落实到户,并实行奖励粮食、补助饲料粮的办法。

5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护青的紧急通知》。同日,省公安厅向各级公安机关发出《关于加强午收保卫的指示》,要求广泛宣传偷青吃青的危害,制定护青公约,以生产队或作业组为单位组织护青小组,划片包干;安排好群众生活,解决困难户的实际困难;制定纪律,谁吃青谁赔偿。

5月22日 全省已退赔“共产”风中平调的社队财物34267万元,占平调折款的60.2%。其中退还原物的占退赔总数的33.5%。

5月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继又批准教育厅党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意见的报告》。根据“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好基础较好而又需要的学校”的原则,有计划地对高等学校逐步进行调整。

5月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科委《关于1961~1962年科技工作的意见及发展计划》。提出科技工作必须继续坚决贯彻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农业服务的方针。

6月25日至7月19日 中共安徽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采取整风的方法,检查省委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7月24日 中共安徽省委继3月20日、4月27日之后,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书面报告。

7月25日 中共安徽省委通知各地:留足自留地,划给社员养猪饲料地,临时借地给社员耕种。

8月12日至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轻工业书记会议。提出压缩重工业生产,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增产日用工业品,

供应人民需要；回笼货币，稳定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8月30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安徽省开始对1957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重点是1959年“反右倾”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9月8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和省委监委《关于认真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到1962年1月20日，对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案件已甄别22735件，其中结论定案的16696件，有28.3%的错案得到平反。

9月8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印发《关于国家购买粮食实行奖售工业品办法的规定》。

9月 全省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合肥召开，传达和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和陆定一、周扬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会上还研究了省文化局制定的《剧团工作十条》，提出创作和演出“数量要少一点，质量要高一点”。

10月5日至11月5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八月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到会作了国内和国际形势报告。会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拟订了到1964年和1967年的工农业生产规划。会议还讨论了粮食问题，粮食生产因灾减产，决定将原定当年秋粮征购任务由14.47亿公斤减为13.46亿公斤。

11月5日 安徽省各地已在104个生产大队进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

11月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意见》。要求

对手工业所有制进行调整,缩小企业上缴比例,实行计件工资,组织手工业工人归队。

11月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制定轮训干部计划。要求通过轮训,帮助干部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这一年,全省干部培训学校增加到185所。

12月 经过调整,安徽省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2863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5841个,分别比1960年底减少1311个和1043个。

1961年 安徽省划小了人民公社,公社数达到2965个,比1960年底增加了2160个。

1961年 安徽省一些国营工业企业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到1962年1月,全省试点企业有104个。

1961年 安徽省生铁产量下降到128.5万吨,钢产量下降到16.8万吨。

1962年

1月4日至15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召开地、市、县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代表省委在会上检查了前几年出现的“五风”问题,要求向干部、群众宣传“农村六十条”,进行政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向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党员修养的教育及道德品质教育。

1月30日至2月9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会)后期和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安徽省地、市、县委负责同志,揭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尤其是曾希圣同志在安徽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根据曾希圣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将曾希圣调离安徽,派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刘季平、李丰平任书记处书记。

1月 安徽省教育厅召开全日制完全中学会议。以整风精神总结了近几年的工作,明确今后全日制中学必须以学为主,进一步妥善安排教学、生产劳动和假期时间;必须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要有计划深入细致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妥善安排师生生活。

1月 全省手工业会议召开,决定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继续加强集中领导,努力增加产量、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2月2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工业交通部、宣传部《关于在职工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要求各地向全体职工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工农联盟教育,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

2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政治理论教育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贯彻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保证按期完成干部轮训任务。在职干部的学习,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精神进行。县以上机关干部主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两本书,以及《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学习贯彻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发扬民主,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

取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

2月14日至17日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2月28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作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抓好甄别平反工作;进一步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全力抓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同时抓好生活安排;对于农业“三改”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好压缩重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粮食征购和财政贸易工作。

3月1日 安徽省交通厅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将全省汽车运输企业三权收回,重新组建江南、淮南、淮北3个汽车运输管理局,分片管理屯溪、芜湖、六安、安庆、滁县、宿县、阜阳7个汽车运输总站;撤销11个车辆监理所,分别并入蚌埠、合肥、芜湖3个车辆监理所;恢复皖江、淮河两个航运局,再度形成按长江、淮河水系统一管理的格局。

3月5日至9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研究如何改正责任田为包产到队的问题。会后,各地人民公社都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决了生产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

3月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

4月2日 安徽省轻工业厅颁布《加强企业经营的十项

制度(草案)》。

4月14日 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发出《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以及1957年底以前安排从业的资本家家属,均不得精简和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也不作编外处理。

4月17日 纺织工业部发出通知:安徽省第一批关闭的纺织及棉针织企业共9家,分别是:蚌埠纺织厂、合肥针织厂、蚌埠针织厂、安庆纺织厂、宣城纺织厂、巢县纺织厂、肥东纺织厂、阜阳棉针织厂和六安棉针织厂。

4月2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保障人民通信自由的指示》。

4月28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通知各地组织19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以学习民主集中制问题为中心,弄清民主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识客观世界、正确认识 and 对待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等问题。

4月 安徽省已有449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试行“工业七十条”。5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批准省委工交部关于试行“工业七十条”的报告,要求全省所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都要立即实行“工业七十条”,对企业进行整顿,开展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

4月至9月 安徽省公安厅纠正案件统计工作虚报浮夸错误。1958年后,案件统计工作出现虚报浮夸现象。为实现“双百”指标(反革命案件破百分之百、刑事案件破百分之百),一些地方在统计发案少报,或干脆不报;在统计破案数时多报或“不破不立”

(案)。1962年4月至9月,省公安厅多次召开公安处、局长会议,要求各地总结教训,纠正案件统计工作虚报浮夸现象,平反冤假错案,切实执行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对政法干部的约法八章。

5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工业企业调整意见的报告》。

5月10日至18日 中共安徽省委一届十二次全委会召开,讨论进一步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全会通过了关于省委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安徽经济调整的任务还很重,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是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坚决缩短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5月11日 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关于进一步调整、精简科研机构的报告。要求加强农业科研机构,撤并其他研究部门。到年底,全省科研机构调减为36个、科研人员1550人。

6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视察嘉山县管店公社车站、邱郢两个生产队,支持农村搞责任田。他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的信中说:“这两个生产队,土地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

6月18日 安徽省召开地、市监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6月21日至7月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山区工作会议,明确山区工作方针应以林为主,多种经营。

6月22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抓紧办理清理三类分子中的法律手续,做好错判案件的复查、改判工作的通知》。针对政法工作中由于混淆敌我界限、错捕错判、乱劳改乱劳教了一

部分好人等问题,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各劳改场所的人民法庭遵照省委、省人委《关于清理劳改人员、劳教分子和刑满就业人员的指示》,抓紧办理清理工作中应由司法机关办理的法律手续,做好错判案件的复查、改判、平反工作。

6月 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10月,钱让能此举被视作搞“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

7月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暂时停止接收党员的通知》,决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暂时停止接收新党员,以便集中巩固党的组织。

7月6日 安徽省教育厅拟订《1962年安徽省中等专业学校调整方案》。到1964年底,全省中等技术学校调减为36所,中等师范学校调减为26所。

7月11日至22日 安徽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59人。省长黄岩作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撤销1958年11月6日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罢免李世农同志安徽省副省长的决定〉的决定》,号召全省人民为完成国民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会议补选戴戟为副省长。

7月20日 中共安徽省委印发省委关于李世农、张恺帆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决定撤销中共安徽省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和1959年9月省委《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原级别。

7月25日至8月3日 安徽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全国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检查了几年来全省民族工作的情况,研究了今后民族工作的任务。会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加强各民族间和各民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充分调动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会议对全省今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提出了具体办法和措施。

8月1日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成立安徽省文化教育界精简小组。其任务是:在精简工作中协调关系,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同时注意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推动民盟、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做好对文教界的宣传教育工作,吸收他们参加有关的调研组织,推动团体及私人办学等。

8月6日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省计委《关于工业企业调整方案的报告》。

8月10日至25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黄山召开全省知识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6人。会议发扬民主,谈心通气,讨论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同时对1958年以来受到过火斗争和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平反,调动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8月20日 国务院批准安徽省高等学校调整方案,同意保留合肥工业大学等13所高等学校。到1963年底,调整高等学校任务完成,全省有高等学校14所(含安徽教育学院),在校学生21735人。

8月 全省调整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将汽车、船舶的管理和使

用由按行政区划划分改为按经济区域和完整水系划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9月19日 中共安徽省委根据第三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精神发出通知,对党内外的右派一律暂停甄别处理。

9月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山区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关于林业政策的规定及《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林业十八条”)的精神,部署各地在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认真做好清理山林权的工作,加速恢复和发展山区生产。

10月9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并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使广大党员、干部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认清当前形势和任务,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12月初至春节前,省委在合肥、芜湖、蚌埠分批集训全省农村区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同时由县里组织集训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

10月12日至11月12日 中共安徽省委一届十三次全委会召开,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出安徽也存在“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特别是“单干风”最为严重。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决定坚决改正“责任田”,恢复和巩固集体经济。

11月1日 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转发国务院批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小商小贩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意见的报告》和

《关于妥善安置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中老弱病残的小商小贩的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地、市、县委统战部一律按此规定执行。

11月25日至12月5日 安徽省天主教代表会议召开，正式成立安徽省天主教爱国会。

11月26日 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

12月6日 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央局、华东局并中央监委、中央统战部报送《关于我省右派案件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安徽的反右派运动，没有完全按照中央规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办事，而是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机会，在党内进行了一些十分错误的斗争。《报告》对妥善解决右派案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还提出了意见。196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徽的报告。

12月30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请示报告，指出全省科技工作应该着重农业生产服务，为解决吃、穿、用服务。

1962年 安徽省继续调整钢铁生产，生铁产量降为31.2万吨，钢产量降为2万吨。至此，全省1958年至1960年间兴建的28万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1080座（总容积1万立方米），已全部下马，损失投资3亿多元。

1962年 安徽省高等学校开始全面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

1962年 安徽省财政收入降至4.74亿元，财政支出降至3.86亿元，分别比1961年减少28.9%和54.1%。

1962年 安徽省人口出生率高达 53.2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45‰。年末总人口为 3134 万人,比 1961 年末增加 4.89‰。

1963 年

1月2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供销社党组《关于加强供销社合作社工作的意见》。要求:保证完成国家委托的购销任务,积极、适当地开展自营业务,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正确处理供销社与其他方法的关系;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依照社章规定按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加强理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建立商店委员会,做好原有社员登记、股金清理和扩大股金工作,做好股金分红。

1月22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造林运动”的指示。

1月2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省直文艺座谈会。省直文艺团体的作家、画家、编剧、导演、文艺评论工作者共 30 余人参加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与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创作更好的作品,以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

1月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经过一年的工作,安徽省对 1957 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绝大多数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其中,原批判、处分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占 60.5%,已得到纠正。

3月11日至25日 安徽省交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决定:延长支农运输线路 376 公里,增设公路站点 32 个;派出 147 辆汽

车常驻县站,方便农民乘车,负责支农运输;航运面向支流小河,对支农物资运输优先进港、配载、装卸、转运;客运航线延伸2条,新增24条;加强公路养护;安排经费250万元,修建桥梁61座、涵洞151个、土路245.5公里,造渡船3艘,铺砂礓路面25公里、碎石路面50.9公里。

3月20日至4月4日 安徽省农业科研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调整和充实科研机构,订出当前和长远的农业科学技术规划;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必须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必须抓住关键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将重点放在水利、肥料、种子和植物保护方面;必须把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切实加强技术推广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和植物保护检验站的工作。会议号召全省农业科技工作者鼓足干劲,埋头苦干,为实现农业增产和农业现代化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3月25日至4月9日 安徽省教育厅召开部分中学校长会议,学习贯彻《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总结教育工作经验,研究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

5月8日 中共安徽省委转发《关于全省第十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总结》。《总结》指出,要全面估计安徽党的组织状况,既要看到前几年发生的严重问题,又要看到安徽党组织有好的根基和传统,党内积极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省委批示要求进一步改进各级党委的领导方法,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学会做党的工作,努力加强党的建设。

5月8日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批转省计划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调整工业企业的报告》,确定在1962年实际调整的基础上精简254家企业。

5月21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印发《向中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和参加生产劳动教育的提纲(初稿)》，要求全省中学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加强对中学生进行阶级观点和劳动观点的教育，这是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两项基本内容和经常任务。

5月31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农垦学校的意见》。提出：在每个专区和市举办一所或几所场校合一、以场为主，半耕半读、以耕为主的农垦学校，是安置中等城市不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引导和帮助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切实可行措施，也是控制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的积极措施。

6月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林业厅党组《关于整顿巩固社、队林场的意见的报告》，在全省开展社、队林场的整顿巩固工作。

7月 安徽省从1962年以来，共精简职工54.05万人，减少城镇人口85.82万人。至此，精简工作基本结束。

8月28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文艺界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和改进对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的领导，做好支援农业、为农业服务工作，加强文艺评论，积极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培训文艺干部。

8月 安徽省企业开展学上海、赶先进的群众运动。全省轻工、纺织等6个系统部分企业的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分期分批到上海学习。

10月28日至11月20日 中共安徽省委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九月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分析了安徽省当前形势，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业生产、生产救灾、支援农业、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等问题。会后，印发了中共安徽省委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当前农村工

作问题讨论纪要》。

11月28日 马鞍山钢铁公司车轮轮箍厂试轧成功中国第一个国产火车轮箍。1964年7月29日,车轮轮箍厂轧出中国第一个直径840毫米的辗钢整体车轮。车轮轮箍厂规模为年产车轮17万吨、轮箍3万吨和钢锭45万吨。

12月9日至27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和华东农业科技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和审议安徽省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要求科技工作要为生产服务,特别是为农业生产服务。

12月23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省委认为,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加强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应着重做好第五批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并注意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和管理工作的。到1964年3月,第五批有741人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至此,全省五批共有14414人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占1962年统计的31472名右派分子的45.8%。

1963年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国营、公私合营、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和全面登记,重新核定各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

1963年 《安徽省轻工业七年发展规划(1963~1969)》开始实施。

1964年

1月18日至2月9日 安徽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确定1964

年的任务：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并与增产节约、“五反”运动紧密结合。

2月上旬 安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 安徽省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出全省农业、工业、医学方面的科技长远规划。

4月4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关于我省血吸虫病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血吸虫病流行地区迅速健全组织，加强领导，整顿防治专业队伍，着重抓好治疗病人的防护工作。

4月10日至5月7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财贸工作会议，贯彻中央财贸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加强财贸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改善经营管理。

4月17日至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第一次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以“五好”（政治工作好、三八作风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计划完成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运动。会议对全省工交系统各级政治机构的设置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4月22日 合肥工业技术革命展览开幕。共展出1961年以来合肥市的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在改革设备、革新工艺、改进刀具及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综合利用和节约原材料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果1216个项目，还有工业产品1353种。

4月 安徽省教育厅设立半工（农）半读教育局。

6月16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批转省商业厅《关于精简商品流转环节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指出商品流转环节多，费用大，是全省当前商业企业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要

求结合当前工作抓紧解决。

7月10日至8月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军事、反对修正主义、培养革命接班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长期规划、团结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议的中心是阶级斗争问题。

7月12日至13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安徽,就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作了指示。

8月2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在工业交通系统和财贸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通知(草案)》。随后,全省工交和财贸系统逐步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

9月2日至17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大、中学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会议贯彻高教部、教育部召开的大、中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此后,安徽大、中学校均执行中央关于“政治理论课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根本的任务”的指示,把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9月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颁布《安徽省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暂行办法》。

10月26日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转发省教育厅《关于积极试办和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的意见》。

10月 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的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两座现代化平炉建成。

1964年 工业部门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抓住重点产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运动。全省确定棉纱、布、丝绸等41种产品为打歼灭战的重点产品。

1964年 含山县第一个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1965年

1月 安徽劳动大学在宣城叶家湾成立。

2月20日 安徽省医务界首批8个巡回医疗队下乡,分赴寿县、全椒、砀山、界首、青阳、繁昌、歙县等县农村开展巡回医疗。

2月26日至27日 安徽省计委、建设厅、财政厅、物资局联合召开全省基本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今年建设项目500多个,其中大中型工程18个,重点是水利、电灌、安全渡汛等工程。

3月23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党组《关于建立人民银行系统政治机构和党的监察机构的报告》。提出:省分行建立政治部,地、市支行建立政治处,县支行和城市办事处设专职教导员。农村办事处设指导员。省监委派驻分行监察组拟由2人增加到4人。建议地、市监委向地、市支行派驻3人监察组,县监委向县支行派驻监察员1人。

4月30日 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成立安徽省三线建设指挥部。当年全省开始进行的“小三线”建设项目16个。

5月15日至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业生产座谈会,讨论进一步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对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意见。7月17日,省委印发了会议纪要,要求各级党委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对本地区生产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深入调研,正确指挥生产。

7月 安徽省文化局召开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总结各地农村文化工作经验,要求各文化部门迅速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

群众文化工作。

8月17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卫生厅党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事业建设的报告》，要求把医疗卫生的主要力量放到农村。

9月15日至24日 安徽省工业交通企业管理革命现场会在马鞍山市召开。马鞍山钢铁公司开展的“三清”、“五不漏”、“一条线规格化”文明生产活动，成效显著，马钢因此被誉为江南“一枝花”。会议要求所有工交企业学大庆，以马钢为样板，克服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逐步搞出一套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10月7日至16日 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大力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加强农村医疗卫生网建设。

10月31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党组《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半农半读教育工作指示的意见的报告》。指出：半农半读是新型的教育制度，它不仅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多快好省地普及教育，而且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途径，是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本措施之一。各级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并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切实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农业、劳动、安置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等各有关部门对这一工作都必须予以积极支持，与教育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办好这件大事。

10月 安徽省新型农机具展览会在合肥开幕。一个多月接待了4万多人。随后，由省科委组织了农村巡回展出队，携带29种434件展品和14部科教影片，先后到长丰、六安、霍邱、金寨县等3个专区9个县42个公社进行巡回展览和放映，历时4个多月，有36万多人次观看了展品和科教影片。

11月5日 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供销合作社《关于精简环节、合理组织商品流通的报告》。全省309个经营化肥的基层社改为省、基两级直接结算,减掉县、市经营环节。

11月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研究全日制中、小学如何进一步改革教学,减轻学生课内和课外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使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地得到发展。

1965年 合肥无线电厂研制的65~5A型黄山牌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在全国评比中获一等奖。

1965年 经过1961年以来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原来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基本协调起来。1965年,全省社会总产值为82.94亿元,国民收入为47.3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90.02亿元。1963年到1965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3%,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5%。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1965年农业总产值仍低于1955年农业大丰收的历史最高水平。

统计表

年份	总人口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性别
	总人口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性别		
1950	2717	2707	109	男 139	2707	女 139
1951	2765	2755	110	男 140	2755	女 140
1952	2813	2803	110	男 140	2803	女 140
1953	2861	2851	110	男 140	2851	女 140
1954	2909	2899	110	男 140	2899	女 140
1955	2957	2947	110	男 140	2947	女 140
1956	3005	2995	110	男 140	2995	女 140
1957	3053	3043	110	男 140	3043	女 140
1958	3101	3091	110	男 140	3091	女 140
1959	3149	3139	110	男 140	3139	女 140
1960	3197	3187	110	男 140	3187	女 140
1961	3245	3235	110	男 140	3235	女 140
1962	3293	3283	110	男 140	3283	女 140
1963	3341	3331	110	男 140	3331	女 140
1964	3389	3379	110	男 140	3379	女 140
1965	3437	3427	110	男 140	3427	女 140
1966	3485	3475	110	男 140	3475	女 140
1967	3533	3523	110	男 140	3523	女 140
1968	3581	3571	110	男 140	3571	女 140
1969	3629	3619	110	男 140	3619	女 140
1970	3677	3667	110	男 140	3667	女 140

单位:万户、万人

表 1 总户数 and 总人口

年份	总户数	总人口	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
1949	651	2787		
1952	693	2966	179	2787
1957	775	3337	356	2981
1958	779	3394	486	2908
1959	774	3427	606	2821
1960	743	3043	498	2545
1961	758	2988	438	2550
1962	770	3134	387	2747
1963	767	3232	387	2845
1964	770	3181	386	2795
1965	782	3286	397	2889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表 3

表 2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年份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人数(人)	出生率(‰)	人数(人)	死亡率(‰)	人数(人)	自然增长率(‰)
1949	957000	34.34	452000	16.23	505000	18.11
1952	1196000	40.69	485000	16.50	711000	24.19
1957	978566	29.75	299526	9.10	679040	20.65
1958	801858	23.83	415820	12.36	386038	11.47
1959	678238	19.89	570080	16.72	108158	3.17
1960	367140	11.35	2218280	68.58	-1851140	-57.23
1961	372151	12.34	244420	8.11	127731	4.23
1962	1629999	53.26	251909	8.23	1378090	45.03
1963	1613333	50.69	251961	7.92	1361372	42.77
1964	1278031	39.85	275624	8.60	1002407	31.25
1965	1351099	41.79	233958	7.24	1117141	34.55

单位:万吨

主要农产品产量

表 3

年份	粮食	油料	棉花	麻类	烟叶	蚕茧	茶叶	水果
1949	639.20	14.93	1.74	1.47	2.49	0.03	0.71	
1952	891.50	25.64	3.63	2.83	3.23	0.05	1.38	3.46
1957	1027.00	26.30	4.60	2.94	3.12	0.17	1.95	4.10
1958	884.50	27.72	5.57	3.36	3.85	0.21	2.75	4.09
1959	701.00	18.84	5.50	2.68	2.39	0.19	2.66	6.49
1960	674.60	5.83	3.32	1.74	0.77	0.10	2.56	4.69
1961	629.00	3.94	1.92	1.07	1.01	0.06	1.22	4.74
1962	670.70	7.48	1.86	0.91	1.42	0.04	0.95	3.35
1963	697.70	8.79	3.23	0.98	1.54	0.06	1.11	3.51
1964	812.10	14.49	6.48	1.36	4.55	0.09	1.24	2.25
1965	966.60	16.52	10.15	2.61	3.60	0.18	1.47	4.92

表 4

牲畜饲养情况

年份	大牲畜 (万头)	牛 (万头)	马 (万头)	驴 (万头)	猪 (万头)	羊 (万只)	家禽 (万只)
1949	216.53				243.76	25.80	
1952	263.42	201.56	3.98	56.41	317.73	32.00	
1957	261.40	212.82	3.06	44.03	560.07	164.99	4553
1958	246.65	202.95	3.21	39.13	427.14	174.85	3077
1959	223.17	185.24	3.10	33.67	310.71	175.83	2130
1960	174.47	147.84	2.58	23.09	199.30	145.83	1478
1961	170.12	145.84	2.47	20.79	226.29	251.53	1673
1962	180.55	155.17	2.47	21.98	403.43	359.08	2299
1963	185.57	161.09	2.49	21.15	502.92	166.59	2602
1964	190.35	166.62	2.62	20.26	499.26	89.64	2626
1965	213.57	186.49	3.15	22.89	604.39	111.19	3146

单位:公斤

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

表 5

年份	粮食	棉花	油料	水果	水产品
1949	229.0	0.6	5.4		1.4
1952	300.0	1.2	8.6	1.2	1.8
1957	308.0	1.4	7.9	1.2	3.2
1958	260.0	1.6	8.1	1.2	3.2
1959	204.0	1.6	5.5	1.9	2.9
1960	221.0	1.1	1.9	1.5	2.9
1961	210.0	0.6	1.3	1.6	1.6
1962	214.0	0.6	2.4	1.1	1.5
1963	216.0	1.0	2.7	1.1	1.6
1964	255.0	2.0	4.5	0.7	2.0
1965	294.0	3.1	5.0	1.5	2.1

表 6 粮食征购、净征购数量及其占总产量的比重

年份	征 购			净 征 购				议购
	总量 (亿斤)	占总产量 (%)	农业人口 平均(斤)	总量 (亿斤)	占总产量 (%)	农业人口 平均(斤)	占征购 总量(%)	
1957	76.95	37.5	258	50.00	24.5	167	64.9	
1958	69.68	39.4	240	34.21	19.3	118	49.1	
1959	70.94	50.6	251	41.79	29.8	148	58.9	
1960	49.74	36.9	197	30.37	22.5	119	61.1	
1961	32.08	25.5	126	24.44	19.4	96	76.2	
1962	31.64	23.6	115	22.47	16.8	82	71.0	
1963	35.54	25.5	125	14.61	10.5	51	41.1	6.78
1964	46.87	29.9	161	30.87	19.0	110	65.9	0.31
1965	46.36	23.9	170	30.98	16.0	107	66.8	3.06

表 7

畜禽产品收购

年份	肥猪 (万头)	菜牛 (万头)	菜羊 (万头)	禽蛋 (万担)	蜂蜜 (万担)	牛皮 (万张)	山羊皮 (万张)	纯羊毛 (万斤)	兔毛 (万斤)	家禽 (万只)
1957	144.0	2.49	15.10	63.76	0.23	40.6	98.0	21.1		558.0
1958	308.0	2.28	62.4	95.44	0.34	18.7	268.0	37.4		742.0
1959	159.0	5.62	73.8	27.04	0.19	30.0	156.9	43.4		1108.0
1960	51.0	6.42	22.7	16.50	0.12	24.9	85.2	42.6		546.0
1961	23.0	1.18	32.5	11.23	0.09	7.5	64.9	24.1		276.0
1962	66.0			25.55	0.16	5.4	567.0	44.0	3.8	409.0
1963	179.0	0.73	20.5	38.04	0.31	11.6	553.0	81.0	1.0	202.1
1964	248.0	0.95	5.0	53.82	0.75	13.2	167.5	46.0	0.8	346.1
1965	312.0	1.90	7.7	86.27	1.31	8.0	104.3	58.0	2.5	531.5

年份	纯收入	按收入来源分						按收入性质分		
		报酬收入	家庭经营 纯收入	农业				转移性和 财产性收入	生产性 纯收入	非生产性 纯收入
				农业	牧业	建筑业	运输业			
1957	74.56	42.08	25.76	5.50	7.40	0.63	0.41	6.72	67.84	6.72
1958	79.20	56.15	20.64	7.28	8.62		1.86	2.41	76.79	2.41
1962	130.89	40.52	73.33	25.59	29.72		0.57	17.04	113.85	17.04
1963	113.32	46.72	53.85	19.16	19.76		0.34	12.75	100.57	12.75
1964	104.70	48.20	47.70	18.06	18.75		0.26	8.80	95.90	8.80
1965	108.70	59.50	39.90	15.18	16.84			9.30	99.40	9.30

表 9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

年份	绝对数(万元)					构成(%)				
	总产值	总产值				总产值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1949	172778	152256	225	19361	936	100.00	88.12	0.13	11.21	0.54
1952	221698	198216	342	21820	1320	100.00	89.41	0.15	9.84	0.60
1957	352000	308035	1232	36995	5738	100.00	87.51	0.35	10.51	1.63
1958	369495	307457	1552	53577	6909	100.00	83.21	0.42	14.50	1.87
1959	350938	306544	1509	35831	7054	100.00	87.35	0.43	10.21	2.01
1960	345728	321423	1279	16111	6915	100.00	92.97	0.37	4.66	2.00
1961	296748	271228	2166	19170	4184	100.00	91.40	0.73	6.46	1.41
1962	286000	241986	2862	37726	3426	100.00	84.61	1.00	13.19	1.20
1963	293850	237877	3158	47611	5204	100.00	80.95	1.08	16.20	1.77
1964	310168	252569	3333	50134	4132	100.00	81.43	1.08	16.16	1.33
1965	377361	309996	5400	57748	4217	100.00	82.15	1.43	15.30	1.12

表 1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指数(按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

年份	绝对数(万元)				指数(上年为 100)			
	总产值				总产值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1949	782347	3182	179555	16166	102.92	101.13	102.77	107.67
1952	972649	4837	202378	22797	114.64	86.31	110.03	90.75
1957	1264190	961489	15252	44576	94.62	105.01	120.67	100.87
1958	1196149	842085	16016	44966	83.29	87.98	60.44	92.24
1959	996308	763611	14091	41475	86.61	78.52	41.61	90.35
1960	862945	740705	11064	37473	78.94	153.21	211.07	54.90
1961	681173	564072	16951	20572	120.04	106.46	216.17	94.75
1962	817652	600503	25636	19492	106.67	116.72	117.49	164.89
1963	872172	607999	29922	32140	143.93	100.29	109.16	85.13
1964	1255282	977291	30009	27361	99.24	150.77	114.89	107.80
1965	1245734	917517	45244	29494				

年份	合计	工业	基本建设	农林水利气象	交通运输和邮电	商饮服务和物资供销	城市公用事业	科研文教卫生	金融保险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
1952	33.2	4.6	1.6	0.9	2.1	5.0		8.2	1.3	9.4
1957	65.9	15.1	5.7	2.4	3.2	13.9	0.2	13.8	1.3	10.2
1958	171.4	103.8	19.4	4.0	7.3	11.4	0.4	15.3	0.9	8.9
1959	158.2	79.6	22.7	6.5	7.9	12.4	0.6	17.9	0.9	9.8
1960	171.2	80.0	24.7	9.9	10.1	13.7	0.7	20.7	0.9	10.5
1961	147.7	58.4	15.3	13.9	9.0	16.3	0.8	20.8	0.8	12.2
1962	107.0	32.4	11.1	12.9	6.4	14.8	0.6	18.3	1.1	9.4
1963	99.7	28.0	10.4	11.5	6.2	14.9	0.6	17.1	1.2	9.9
1964	103.2	29.3	10.5	12.0	6.4	15.4	0.7	17.5	1.4	10.0
1965	99.3	25.1	8.0	11.6	6.7	17.1	0.7	18.1	1.4	10.6

表 12 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年份	工业企业单位数			工业总产值				
	企业单位 数(个)	国有工业	集体工业	乡办工业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国有工业	集体工业	乡办工业
1949	3813	79	3734	3734	36279	3051		
1952	4439	650	3789	3789	64999	21775	357	
1957	1596	1576	20	20	153999	102794	24948	
1958	8652	7922	728		318042	258612	58535	45915
1959	15103	4786	10317	9217	493294	411180	82114	52079
1960	11058	4174	6884	5520	556182	501185	64997	49490
1961	8704	2863	5841	4132	282384	251040	31344	12037
1962	7820	2036	5784	3493	200144	169362	29155	5693
1963	6455	1653	4802	833	201348	174537	24979	1729
1964	6099	1517	4582	686	244492	216109	27249	1681
1965	5741	1479	4262		318044	280897	36384	2369

注:工业企业单位数不包括村办、城乡合营及个体工业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包括村办、城乡合营及个体工业企业产值。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	单位	1949	1952	1957	1962	1965
原煤	万吨	114.05	261.06	504.25	1395.95	1137.53
铁矿石原矿量	万吨			87.49	96.20	49.91
铜金属含量	吨		2.98	10240	11999	14136
罐头	吨			1	1300	1700
饮料酒(商品量)	万吨	0.36	1.19	2.14	1.62	2.35
卷烟	万箱	11.48	12.7	22.51	15.82	32.98
纱	吨	341	2472	8241	10211	32282
布	万米	3000	5500	10800	6200	16100
麻袋(混合数)	万条	5.8	16.7	29.9	14.7	239.3
丝织品	万米			5	383.9	625.2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0.43	1.78	5.31
焦炭	万吨			0.21	75.3	73.16
硫酸(折100%)	万吨				1.27	7.05
烧碱(折100%)	万吨	0.01	0.02	0.01	0.1	0.13
合成氨	万吨				0.37	3.45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量 13

续表 13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	单位	1949	1952	1957	1962	1965
农用化肥	万吨				0.43	4.42
肥皂	吨	609	1789	4833	2204	10642
轮胎外胎	万只				0.05	0.03
水泥	万吨				10.95	40.99
日用玻璃制品	万吨				0.96	1.10
生铁	万吨	0.11	0.27	21.41	31.23	50.14
钢	万吨			0.23	2.01	25.53
成品钢材	万吨				0.86	15.84
铜	吨				1220	3472
内燃机	万千瓦		0.001	0.001	1.46	2.38
金属切削机床	台			53	333	486
锻压设备	台		1	15	32	98
泵	台		28	70	117.5	3504
气体压缩机	台			172	175	484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2.27	6.05	6.7
发电量	亿千瓦时	0.24	0.50	2.77	12.53	15.46
火电	亿千瓦时	0.24	0.50	2.50	9.50	14.03
水电	亿千瓦时			0.27	3.03	1.43

表 14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

年份	农业总产值(%)	轻工业产值(%)	重工业产值(%)
1949	89.42	9.41	1.17
1952	85.06	13.01	1.93
1957	77.10	16.75	6.15
1962	65.74	21.56	12.70
1965	65.46	22.71	11.83

表 15

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

单位:万元

年份	按当年价格计算					
	合计	按经济类型分		按轻重工业分		重工业
		国有	集体	轻工业	重工业	
1949	9723	3051		5189	4534	
1952	31576	21775	357	21365	10211	
1957	127834	102794	24948	79956	47878	
1958	317149	258612	58535	179490	137659	
1959	493294	411180	82114	250445	242849	
1960	566182	501185	64997	249743	316439	
1961	282384	251040	31344	121447	160937	
1962	198517	169362	29155	109127	89390	
1963	199516	174537	24979	117814	81702	
1964	243358	216109	27249	147964	95394	
1965	317281	280897	36384	191288	125993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年份	国内生 产总值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元)	
		第一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 邮电通信业	批发零售 贸易餐饮业		
1952	22.88	17.18	2.27	0.50	3.43	0.70	2.15	78
1957	41.37	28.06	6.38	1.31	6.93	1.42	2.98	126
1958	51.31	29.41	13.55	2.95	8.35	2.25	3.55	152
1959	57.97	27.45	19.71	3.63	10.81	2.65	4.35	170
1960	59.76	25.60	23.00	4.69	11.16	2.90	4.09	185
1961	43.65	22.96	11.15	1.59	9.54	2.04	3.51	145
1962	39.47	22.68	7.91	0.81	8.88	1.66	3.40	129
1963	40.81	22.79	8.68	1.09	9.34	1.87	3.48	128
1964	44.97	23.64	11.32	1.54	10.01	2.19	3.59	140
1965	52.75	28.09	14.56	1.43	10.10	2.27	3.65	163

表 17 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资源 勘探	农林水 利气象	交运 邮电	商业外 贸粮食	文教卫 科研	城市公 用事业	行政机 关及其他建设
1949	232	132		11	57					32
1952	11478	2343	39	79	7304	373	316	525	207	292
1957	32340	12488	608	62	11539	2686	834	2335	912	876
1958	74091	52354	488	297	13678	3615	1107	1409	1082	61
1959	91871	62059	815	653	15092	7279	1898	2933	615	527
1960	122953	80768	872	768	24115	6192	2709	4937	1708	884
1961	43419	29163	388	284	9236	1703	372	1003	424	846
1962	23774	16137	275	27	6047	493	92	378	187	138
1963	30348	20650	440	161	6986	943	314	385	362	107
1964	41920	23748	2729	217	10151	1606	1056	1262	695	456
1965	35210	21419	499	74	8027	1898	514	1503	700	576

表 18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时期	安 徽			全国农业基建投资 占基建总投资(%)
	国家基建 投资总额(亿元)	其中农业基 建投资(亿元)	农业基建投资 占基建总投资(%)	
	1949~1957	15.31	6.05	
1958~1962	35.61	6.82	19.15	12.14
1963~1965	10.75	2.47	22.98	18.00

表 19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单位:亿元

年份	各项存款					各项贷款		
	企业存款	地方财政存款	储蓄存款	农村存款	各项存款	短期贷款	中长期贷款	信托类贷款
1949	0.01				0.02	0.01		
1952	0.45	0.08	0.11		1.18	0.89		
1957	0.61	0.40	0.42	0.81	3.77	13.95		
1958	2.48	0.65	0.66	1.08	7.89	18.28		
1959	2.94	1.28	1.03	1.49	12.96	25.12		
1960	3.08	1.56	0.82	1.95	11.48	29.22		
1961	3.40	0.65	0.60	1.64	11.49	28.72		
1962	3.60	3.33	0.44	0.72	11.06	25.10		
1963	2.81	2.17	0.52	0.82	9.19	18.82		
1964	2.69	1.95	0.64	1.10	8.46	19.35		
1965	2.98	1.33	0.76	1.21	8.83	21.10		

单位:万元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表 20

年份	合计	城镇	农村
1949	2	2	15
1952	1122	1107	1156
1957	5398	4242	5750
1958	12377	6627	4562
1959	14888	10326	5338
1960	13551	8213	5687
1961	11717	6030	1515
1962	5913	4398	1929
1963	7119	5190	2056
1964	8452	6396	2442
1965	9994	7552	

表 21

财政收入与支出

单位:万元

年份	财 政 收 入					财 政 支 出					
	合计	工商 税收	农业 税收	企业 收入	其他 收入	合计	经济 建设	文教 卫生	抚恤 救济	行政 管理	其他 支出
	1949	5416	334	4801		281	2247		3034	1855	4789
1952	26971	12797	10704	899	2571	15146	3055	3034	1855	4789	2413
1957	37091	15053	10882	3239	7917	34286	11304	11104	4306	6894	678
1958	45600	20161	8365	14897	2177	108168	85908	12977	1643	7282	358
1959	92626	43443	16710	31515	958	144386	115276	16044	3169	9408	489
1960	115921	44822	11630	58561	908	174208	140088	20991	3659	8872	598
1961	66616	33126	8302	24731	457	84162	57335	13607	4746	8163	311
1962	47363	34185	11160	1380	638	38637	15143	12302	3531	6846	815
1963	60796	34173	11300	14393	930	51999	23748	12775	6361	7528	1587
1964	76508	39251	13700	22692	865	62953	28543	14227	11275	7559	1349
1965	76426	36443	13406	25512	1065	59408	32232	15046	3570	7429	1131

表 22

居民消费水平

年份	绝对数(元)		城乡消费 水平对比 (农民=1)	指数(上年为 100)		指数(1952 年为 100)	
	全省 居民	农村		全省 居民	农村	全省 居民	农村
		城镇					城镇
1952	64	59	138	2.34		100.00	100.00
1957	93	82	192	2.34	128.02	115.81	110.43
1958	73	62	152	2.45	66.95	81.62	73.93
1959	76	60	159	2.65	84.62	74.36	62.56
1960	74	55	170	3.09	81.82	67.09	51.18
1961	93	73	200	2.74	124.07	76.92	63.51
1962	110	102	155	1.52	164.93	104.70	104.74
1963	100	91	160	1.76	90.95	96.58	95.26
1964	95	86	165	1.92	103.54	100.00	96.21
1965	113	102	196	1.92	119.23	119.23	114.69

表 23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总额 单位:万元

年份	商品购 进总额	从生产 者购进		商品销 售总额	年末 库存额
		农副产 品购进			
1952	43788	43788	39628	42817	21029
1957	149032	149032	89972	172405	111424
1958	145806	145806	98476	217795	104776
1959	184874	184874	102315	273085	125169
1960	158039	158039	79876	273257	121196
1961	118164	118164	62298	200581	122797
1962	110954	110954	58066	168692	113608
1963	132680	132680	80661	189068	121226
1964	165913	165913	98137	217152	134087
1965	196204	196204	113341	239156	140835

单位:万元

表 2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行业分)

年份	批发零售贸易业	餐饮业	制造业	其他	
				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	
1949	36657	1859	7969	6641	6614
1952	70159	2185	9906	6332	6280
1957	138859	8484	12771	8930	8485
1958	166776	9335	17594	7326	6023
1959	214010	9697	13646	7879	4100
1960	203715	8466	14986	7676	5000
1961	157975	10599	9244	21749	17691
1962	148881	14441	12179	19162	17068
1963	170449	13444	11369	14746	13551
1964	188854	10857	10724	10905	9803
1965	188266	9239	9970	8871	7505

表 25

各级各类学校数

单位:所

年份	普通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学校	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1949	2	167	24	143			12399	1	102
1952	3	237	88	147	2		23093	2	588
1957	5	302	78	223	1		21167	3	470
1958	34	1895	426	492	977		31336	3	47890
1959	32	1307	231	614	462	2	25001	3	17564
1960	44	1501	300	644	557	57	22191	6	20237
1961	31	853	135	589	129		19662	5	712
1962	20	850	91	649	110		22230	5	312
1963	14	841	70	641	130		24736	5	347
1964	14	1568	62	631	875	60	47291	5	328
1965	15	3432	213	665	2554		105846	5	338

单位:人

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数

表 26

年份	普通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1949	168	2210	486	1724		19855	3	93
1952	392	4084	1253	2791	40	46860	11	528
1957	1310	8199	2157	6015	27	75144	16	1031
1958	2018	14716	4316	8235	2165	96078	22	73659
1959	2537	18154	4816	11696	1642	93894	23	32533
1960	3936	23546	7289	14550	1707	92337	38	28222
1961	4413	19561	3929	15187	445	84219	34	2419
1962	4257	18658	2933	15350	375	80253	37	1637
1963	3875	18184	2483	15261	440	79633	37	1740
1964	3632	19055	2389	14739	1927	104333	41	1745
1965	3361	26043	3384	17137	5522	176931	43	1846

表 27 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单位:人

年份	普通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1949	1052	36040	5446	30594		663868	44	6917
1952	2621	92633	21601	70390	642	1934410	100	22020
1957	8632	188920	35976	152591	353	2814157	213	26864
1958	16236	424556	112817	236530	75209	4149313	230	1585965
1959	21818	471390	103995	312692	54703	3904460	215	633256
1960	23048	536282	135326	357175	43781	3193580	308	845734
1961	26578	327494	39431	279258	8805	2423779	250	53754
1962	24941	262265	24159	231264	6842	2183826	260	42300
1963	21735	237818	15167	215377	7274	2024423	279	45186
1964	19637	285064	17638	226585	40841	3193572	328	43631
1965	19328	417675	40758	269187	107730	4903989	382	43184

表 28

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数

单位:人

年份	普通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
1949	205	14082	1605	12477		145969	
1952	1296	48885	10999	37441	445	546083	
1957	2110	63229	5823	57406		577155	
1958	9803	294380	93763	132197	68420	1613201	
1959	8108	222912	52986	147019	22907	978427	
1960	7891	214941	56558	137115	21268	982301	
1961	5111	104523	8646	92964	2913	633277	
1962	3891	83728	4662	74956	4110	558588	
1963	4219	92491	4516	84385	3590	551851	47
1964	4401	133842	9479	88869	35494	1433196	
1965	4974	198329	19238	106741	72350	1949441	93

单位:人

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

表 29

年份	普通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
1949	6.26	16.31	11.21	17.75		33.44	14.67	74.38
1952	6.69	22.68	17.24	25.22	16.05	41.28	9.09	41.70
1957	6.59	23.04	16.68	25.37	13.07	37.45	13.31	26.06
1958	8.05	28.85	26.14	28.72	34.74	43.19	10.45	21.53
1959	8.60	25.97	21.59	26.73	33.31	41.58	9.35	19.47
1960	5.86	22.78	18.57	24.55	25.65	34.59	8.11	29.97
1961	6.02	16.74	10.04	18.39	19.79	28.78	7.35	22.22
1962	5.86	14.06	8.24	15.07	18.25	27.21	7.03	25.84
1963	5.61	13.08	6.11	14.11	16.53	25.42	7.54	25.97
1964	5.41	14.96	7.38	15.37	21.19	30.61	8.00	25.00
1965	5.75	16.04	12.04	15.71	19.51	27.72	8.88	23.39

单位:个

文化艺术、文物事业机构数

表 30

年份	电影放映单位	影剧院俱乐部	艺术表演团体	艺术表演场所	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	文化站
1949	64	64	77	55	4			2	
1952	151	124	113	106	6	4		100	615
1957	477	222	132	154	16	1		90	207
1958	592	267	153	163	31	1		80	178
1959	698	296	173	165	76	13		80	226
1960	709	273	124	130	73	13		81	233
1961	702	147	126	91	74	10	1	81	242
1962	778	186	139	96	39	7	1	81	234
1963	815	167	146	174	21	7	1	81	228
1964	885	181	144	205	22	6	1	93	324
1965	895	193	140	196	34	3	1	93	560

注:艺术表演场所包括工会、其他部门及民营、集体办的剧场、影剧院。

表 31

卫生机构数

单位:个

年份	总计	医院		疗养院、所	门诊部、所	专科防治所、站	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所、站	药品检验所、站
		县及县以上医院	卫生院						
1949	31	17	17		14				
1952	2011	100	92	6	1779	11	3	104	1
1957	6318	112	103	8	5366	34	74	478	1
1958	20035	11248	137	9	3263	34	80	335	1
1959	24140	9433	184	13	8165	33	77	332	3
1960	21744	8610	123		9795		84	223	
1961	14616	3177	209	26	8142	37	88	495	3
1962	9984	294	170	20	8523	37	75	413	2
1963	8678	362	173	11	7375	37	76	413	2
1964	8303	351	169	12	7155	37	82	442	3
1965	7888	423	171	12	6734	39	90	414	3

表 32 卫生机构人员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年份	卫生机构人员数(人)					医院卫生院 床位数(张)
	合计	卫生技 术人员	其他技 术人员	管理人员	工勤人员	
1949	544	310		170	64	190
1952	16953	12963		2289	1701	4524
1957	51392	44792		3470	3193	9595
1958	67749	61781		5968(注)		73695
1959	69480	61373		4795	331	66253
1960	74084	66189		4233	366	65490
1961	75677	65776		5384	451	38020
1962	70989	61622		5268	409	24928
1963	69777	60845		4955	397	26413
1964	69730	60252		5422	405	26769
1965	72059	60637	479	6456	4487	28246

注:当年工勤人员未单列。

表 33 全省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基本情况 单位：人、个

年份	党员 总数	新发展 党员数	干部 总数	新提拔领 导干部数	基层 党委数	总支数	支部数
1949	72169	29500	47550				
1952	103141	1661	115426				7164
1957	477936	3593	183490	461	2189	1131	23079
1958	493991	53387	331804		1286	3443	29987
1959	586213	98899	361621	816	1495	8094	48522
1960	708317	155483	403436	4137	1453	10376	69254
1961	699757	11678	416339	5695	3488	3044	44317
1962	698688	3188	381004	2387	3506	1641	41400
1963	713920	95	347360	265	3539	1298	41699
1964	717610	55	355484	484	3539	1321	42419
1965	729385	12091	406095	989	3628	1350	43400

注：1949—1957年的干部总数不包括中小学干部数。

后 记

《“大跃进”运动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安徽卷)》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部署,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

该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全面反映安徽“大跃进”运动及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全貌,重点展示了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大跃进”的原因,主要过程和后果,以及开展调整的情况与效果,为加快我省经济建设步伐、实现富民强省目标提供历史借鉴。

该书由刘延年、杨久梅担任主编,分别负责“大跃进”运动部分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部分有关稿件的组织、编辑、校对及大事记的编写工作,杨久梅还承担了统计数据的收集编排工作。周言久、刘彦培审阅了书稿。

该书的编纂得到了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竭诚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限于资料 and 水平,该书难免有欠妥和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2001年8月

书名
前言
目录

一、“大跃进”运动

综述

专题资料

农业“大跃进”

工业“大跃进”

淮北河网化

新民歌运动

教育“大跃进”

除“四害”运动

典型材料

高丰社早稻放“卫星”纪实

1958~1960年的马钢建设

淠史杭灌区建设纪实

跃进中的水利之花

文化“卫星”——司集乡

界首除“四害”

大事记

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

综述

专题资料

农业的调整

林业的调整

责任田始末

工业的调整

商业的调整

教育事业的调整

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的调整

大事记
统计表
后记